库恩·贝拉传

〔匈〕库恩·贝拉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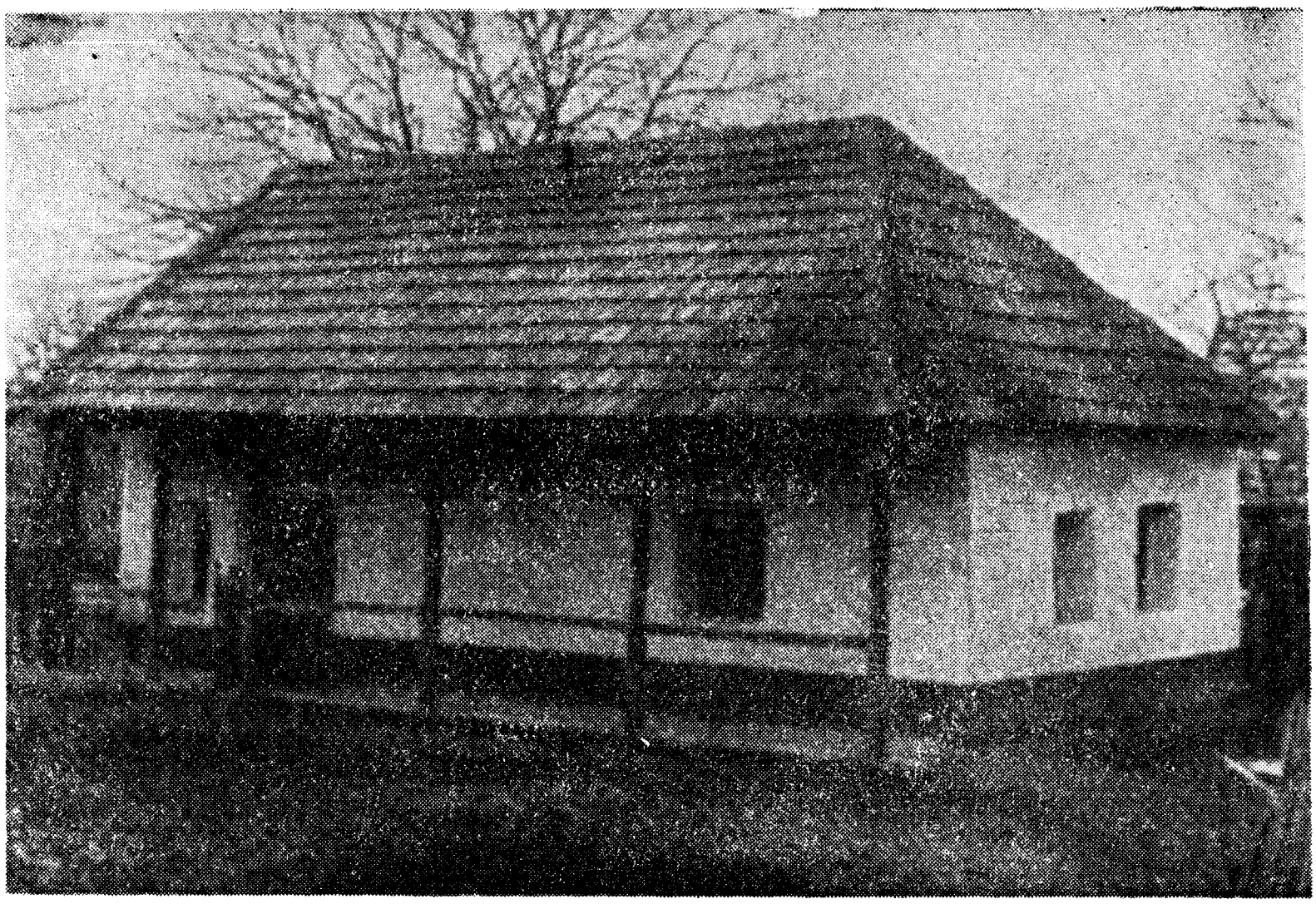
库恩·贝拉传

〔匈〕库恩·贝拉妮著

柴鹏飞　侯凤菁译

人民出版社

记念库恩·贝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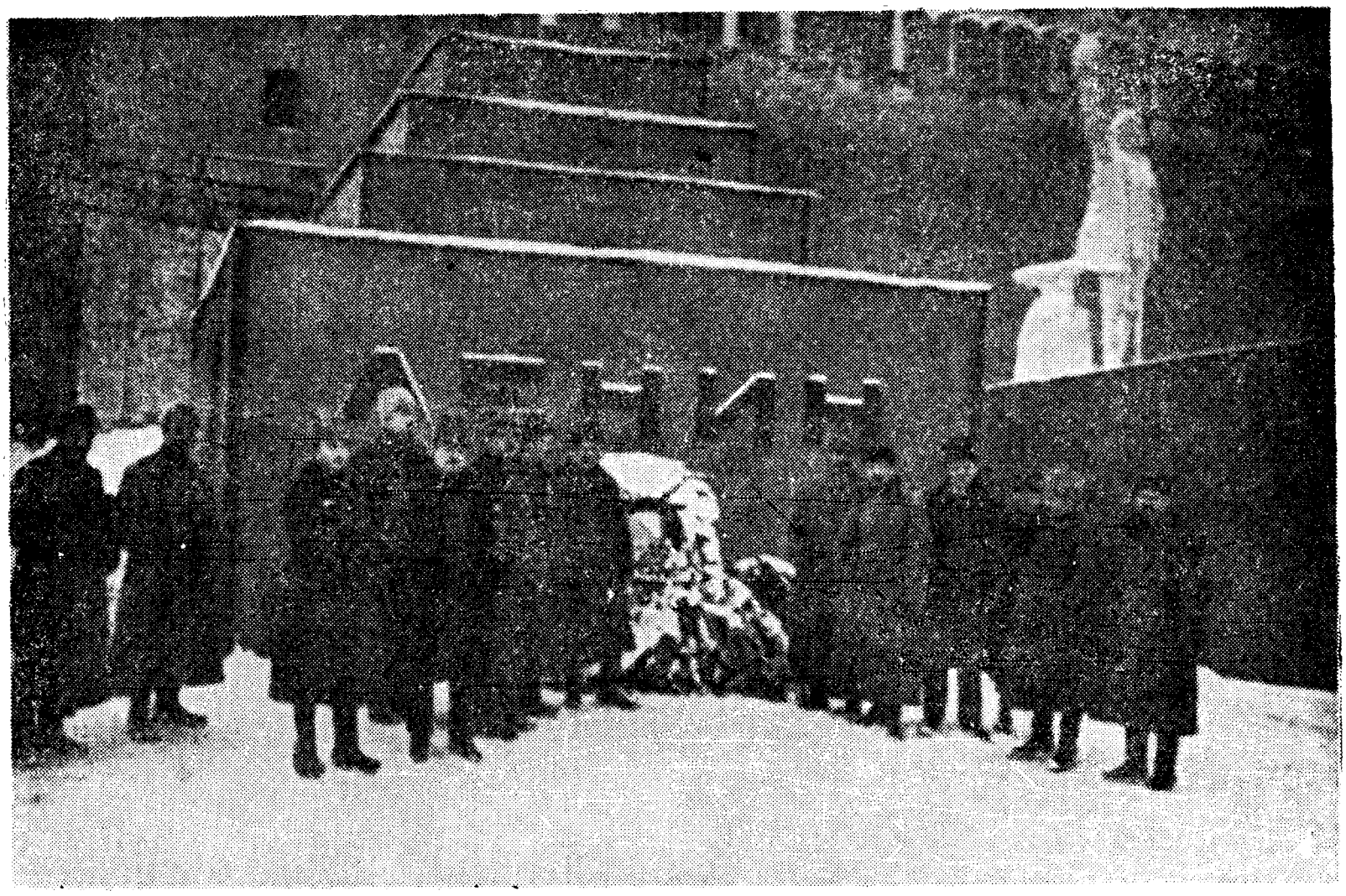


库恩·贝拉在埃尔代伊(今特兰西瓦尼亚)
地区西拉基沙格莱莱村的出生地

库恩·贝拉同妻子及女儿
1915 年在埃尔代伊

1919年3月库恩·贝拉在
布达佩斯国会前发表演说

1920年库恩·贝拉在
巴库召开的东方人民
代表大会上



1924年在最早的列宁陵墓前

库恩·贝拉在列宁格勒库恩·贝拉工厂的工人中间

本书作者库恩·贝拉妮，
摄于1934年

译 者 的 话

库恩·贝拉（1886—1939）是匈牙利共产党的谛造者，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本书是他妻子写的回忆录。

作者库恩·贝拉妮（匈牙利妇女婚后的名字是在丈夫的姓名后加上“妮”字，表示某某人妻子的意思）1890年12月14日生，婚前的姓名叫加尔·伊琳（Gál Irén）。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她在奥地利、意大利度过短期流亡生活，并参加了那里的地下工作，不久去苏联，193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她曾因受库恩·贝拉冤案的牵连被监禁了九年，恢复名誉后于1959年回匈牙利定居。为表彰她的功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向她颁发了“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勋章（1967年）和“劳动红旗”勋章(1969年)。她于1974年9月17日逝世。

作者根据个人回忆及大量的档案材料，以深厚的感情和生动的文笔再现了库恩·贝拉战斗的一生。书中提供的许多珍贵史料，对于了解及研究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匈共早期的历史，以及库恩·贝拉的生平，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从1966年初版问世以来，曾于1969及1978年两次再版，中译本是根据1978年的增订版翻译的。书中的注释除了说明是作者、编者及译者注外，都是原书的注释。

匈牙利人的姓名次序是姓在前，名在后，和大多数欧洲人的名在前、姓在后的次序不同。我们在译文中保持了各自的次序。

1985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章　在莱莱村的岁月 …… 1
第二章　科洛日瓦尔 …… 4
第三章　青年时代的库恩·贝拉 …… 12
第四章　瑙杰涅德 …… 23
第五章　“你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安宁……” …… 28
第六章　最后一个“太平年” …… 36
第七章　战争—战俘生活…… …… 48
第八章　建党 …… 86
第九章　维谢格拉德街 …… 114
第十章　苏维埃共和国 …… 150
第十一章　失败 …… 214
第十二章　卡尔斯泰因—施托克劳—斯泰因霍夫 …… 232
第十三章　在意大利 …… 247
第十四章　维也纳—斯德丁—彼得格勒—莫斯科 …… 273
第十五章　在乌拉尔 …… 313
第十六章　“博士先生”…… …… 346
第十七章　维也纳诬陷案 …… 371
结束语 …… 394

第一章　在莱莱村的岁月

我对他的童年了解不多。他不愿讲述自己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搜集到一些有关他童年的片断。

1886 年 2 月 20 日，库恩·贝拉出生在埃尔代伊① 地区西拉基沙格的莱莱村。全村只有七百人。

他父亲是这个小村的村长。全家住在一个狭小的农舍里。他在莱莱村念完小学。当时，不同年级的男女孩子们同坐在学校仅有的一间“教室”里，等待老师轮流给他们上课。

他父母养育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儿伊琳学缝纫，后来参加了埃尔代伊的女工运动。小儿子山多尔长大后成为农艺师。

库恩·贝拉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

做村长的父亲为养家糊口也耕种一点土地（这块地现在已变为牧场）。莱莱村瘠薄的土地上长不出多少粮食，村长的薪水又微薄得可怜，经济相当拮据。库恩·贝拉的父亲性好贪杯，家庭因此更是捉襟见肘，全家人难以温饱。

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村长先生”带着儿子进城去了，在那里办完公事以后顺便领了一、两袋粮食。然后把儿子放在马车上，自己找个小酒店“喝一杯”。但往往是解囊畅饮，连素昧平生的人也请上一、两杯，直到不名分文，才怅然离去。

---

① 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库恩·贝拉仅有一次向我讲述过他对童年的记忆：他独自坐在马车上，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父亲才趔趔趄趄地走来赶起车回家。

或许是在夜色中产生的孤独感，或者因失去维持家计的钱而产生的沮丧刺痛了早熟少年的心，这件事给这个并非多愁善感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库恩·贝拉的父亲受到莱莱村村民的爱戴。他生活在农民中间，替他们说话，并总是保护着他们。

村民们需要他这样的人，特别是在莱莱村这个地方。那里的地主戴根弗尔德伯爵对待农民和雇工心狠手辣。此人的凶残是遐迩闻名的，在一次争吵中他竟枪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戴根弗尔德伯爵想让村长帮他了结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库恩·贝拉的父亲拒不从命。伯爵先是威逼，继而又想通过劝说和贿赂使固执的村长就范。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地主便花钱收买人在一个假案中提出伪证诬陷村长。

陷害达到了预期效果。库恩·贝拉的父亲被关进齐洛赫①监狱，几个月后虽然获释，但不得不搬离莱莱村了。

库恩·贝拉在齐洛赫学完了初中的课程，奥第·安德烈②当时也在那所学校里读书。

库恩·贝拉的父亲曾经委托奥第给他聪明但不专心的儿子辅导几门功课，甚至允许奥第进行体罚。

关于这件事，在既非心地善良又谈不上思想进步的奥第·拉约什③所写的书里有过极其夸张的描述："孩子的父亲，

---

① 今罗马尼亚的扎拉乌。——译者

② 奥第·安德烈(1877—1919)，匈牙利著名诗人。——译者

③ 奥第·安德烈的弟弟。——译者

西拉吉切赫村的村长曾托付邦迪① 管教他的儿子，并且留下话说，每次辅导前要无例外地先打板子。应该打脑袋，打别处他会木无感觉……”

童年时代的库恩·贝拉在家是否真的挨过那么多打，以至已经“木无感觉”？对于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只好让奥第·拉约什在九泉之下凭良心去证实。但库恩·贝拉自己对我从未提起过这种事。他对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连手指也不碰一下，这一点倒是实际情况。每逢谈起别人对孩子实行体罚，无论孩子们犯有什么过错，他总是表示反感和气愤。

我不知道库恩·贝拉在受奥第辅导时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然而可以肯定，奥第是喜欢和信任库恩·贝拉的。每当老库恩一走，他就对库恩·贝拉说：“没关系，小兄弟，我自己也是个犟脾气。”

① 安德烈的昵称。——译者

第二章　科洛日瓦尔[①]

库恩·贝拉的父亲被赶出西拉吉切赫，全家迁到科洛日瓦尔市去住。父亲在地产交易所谋了个文书的差事。他们住在科洛日瓦尔城郊的莫诺什托尔街 61 号。周围的邻居是一些工人、蓬头垢面的小手工业者和只有临时工作的“公务员先生”。

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当时同十九岁的库恩·贝拉一起在科洛日瓦尔从事工人运动的加尔多什·玛利什卡[②] 后来在一本题为《翱翔吧，思想》的书中这样描写他们的生活：“……我只能每两天吃上一顿热饭菜……那天库恩·贝拉买了腊肉、面包，用他自制的烤肉叉在小铁炉的煤火上烘烤。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一顿了不起的美餐了……我每月付六克郎租来的房子是楼底层的一间小平房，与库恩·贝拉家住的房子一模一样……”

这时，库恩·贝拉同加尔多什·玛利什卡过从甚密。这位年轻的姑娘去科洛日瓦尔是为了在那里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玛利什卡虽然年轻，当时却已经是一个“老练的”社会主义鼓动家。她考试未果，整天同库恩·贝拉一起在科洛日瓦尔社会民主党

---

① 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译者

② 加尔多什·玛利什卡(1885—1973)，作家，新闻记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左派，参加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后流亡国外。1931 年回匈，多次被捕。匈牙利解放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译者

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和参加示威游行。

有意思的是，在1905年或1906年，库恩·贝拉和加尔多什·玛利什卡这两位社会主义者同胡萨尔·卡罗伊在科洛日瓦尔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首次交锋。后来在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时期，胡萨尔·卡罗伊一度充当霍尔蒂反革命政府的总理。

看来，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偶然，充其量只有无法预料的必然。

在这个时期，库恩家境窘迫，情有万状。他母亲常常几个月足不出户，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她没有御寒的衣服。

这位贤惠的妇人从不抱怨，默默地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当时贝拉已经可以通过教课和为报纸撰稿挣一点钱。她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吃饭和供子女读书上。她喜爱贝拉，曾对加尔多什·玛利什卡说，“他是干大事业的人……”加尔多什·玛利什卡回忆道：“我去她们家时，她常常坐在我们身旁，在争论中得体地插上几句话……”

母亲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稍有时间，她还读点书报。她不仅不阻挠儿子参加埃尔代伊的工人运动，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支持他的行动。她乐于招待儿子的朋友和同志，必要时还在狭窄的住房中腾出地方留他们过夜，尽可能地盛情款待他们，即使第二天全家可能会因此断炊也毫不在意。街坊邻居中的穷苦人都很喜欢这善良的一家，特别是爱戴库恩·贝拉的妈妈。

不久前有位老太太来找我，当年她是库恩·贝拉一家的邻居。她在一本已经变黄的小册子中指给我看库恩·贝拉1903年写给她留念的话。还很动情地讲述了库恩·贝拉如何帮助莫诺什托尔街的孩子们写作文的往事。乐于助人是库恩·贝拉毕生

的美德。

库恩·贝拉在科洛日瓦尔的新教寄宿学校结束了中学的学业。

教师们都说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孩子。库恩·贝拉的父亲记得，毕业典礼之后，校长沙尔卡尼·拉约什博士对他说："先生，您的儿子已经毕业了，成绩堪称优良。可是我感到有义务提醒您这位做父亲的：如果您不能使自己的儿子抛弃要扭转乾坤的想法，那么您的儿子可能会成为大人物，但也可能被送上绞刑架……"

库恩·贝拉在中学时期就从事匈牙利文学的研究工作，这是超出中学教育的课程范围的。他曾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说来也奇怪，他1936年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是谈裴多菲① 的，而他最初两篇在征文比赛中获奖的作品也是结合匈牙利民歌谈裴多菲和阿兰尼② 的。

"科洛日瓦尔新教寄宿学校1902—1903学年的毕业班还有几天就要离开学校了。那天上匈牙利文课……。科瓦奇·德热老师走进课堂，干咳一声朝左边一排最后一个座位上的学生说：

"孩子，'请向大家谈谈裴多菲和奥洛尼的爱国主义诗歌。'

"教师是让这个学生谈泰莱基·山姆伯爵当年出的征文比赛题中的答卷。这个学生写的《谈匈牙利民歌中的叙事诗歌》在征文比赛中获奖。

"门被推开了，……沙尔卡尼·拉约什校长和几个人走进教室。校长开始谈起这位少年的作文来，他说，他觉得少年在文章里不仅代表这所历史悠久的寄宿学校讲话，同时也表达了热烈追求匈牙利民族觉醒与向往自由的知识界的心愿。

---

① 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匈牙利革命诗人。——译者

② 阿兰尼·亚诺什(1817—1882)，匈牙利大诗人。——译者

“‘年轻的朋友’，校长说，‘希望你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象阿兰尼和裴多菲那样至死不渝地热爱你的祖国！’

“这位少年便是库恩·贝拉。”①

不久前我从当年的科学院科洛日瓦尔分部的档案库中得到了这两篇获征文奖的复制件。它们写在笔记本纸上，一篇是128页，另一篇是96页。

从这两篇中学征文的摘录中，可以看到十六、七岁时的库恩·贝拉的内心世界。

“……大自然赋予匈牙利人以何等敏感的心灵和东方式丰富的想象力啊！

“……匈牙利民歌是永恒美的宝库，在那里有丰富和崇高的感情，也有质朴和古老的风俗。它是民族的瑰宝。

“……阅读这些含有赤子之情的诗意盎然的民歌，对于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感到疲惫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而那些……反映我们时代混乱的诗篇则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当时是奥第·安德烈名作《新诗》发表以前四年。——作者）

“……匈牙利的历史环境极不相同，人们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民间诗歌创作也相距甚远，简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

“……在群山之中生息的塞凯伊人② 与世隔绝，但他们并不落后，天生具有追求文化的习性。他们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道德观和旧风俗，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善于接受新的思想，用新的概念来丰富诗歌，同时以极其细腻的感情将其溶合在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这样的诗歌有的象一潭静静的湖水，很少

---

① 《我们的道路》，1957年9月克卢日版。

② 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的匈牙利族人的总称。——译者

见到暴风雨，然而当暴风雨来到时，它能翻起惊涛骇浪；而有的则象一条不停流淌的清澈小河，倒映出两岸不断变化着的景物……”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学生的库恩·贝拉研究了丰富的民歌材料(六、七十首诗之多)，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深入地分析了这些诗歌的思想、感情部分，同时还讨论了它们的音韵和格律。

他写的文章引用了许多民间叙事诗和短歌，如今只有透彻了解马扎尔和塞凯伊民歌的民俗学者才熟悉它们。

他对叙事诗(《费赫尔·安娜》、《卡达尔·考陶》、《塞普·伊丽莎白》) 中一些人物所作的社会分析的深度，使读到他中学时代的文章的人感到惊讶。这些文章使人预感到后来的库恩·贝拉将是什么样的人。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他在1903年写的题为《裴多菲与阿兰尼的爱国主义诗歌》一文更加成熟：

“……我们现在有，将来也会有精彩的历史书籍，然而如果我们想最直接和最准确地体验时代的精神和那时候人民心灵深处的秘密，那么我们还得读民间诗歌，因为它们能表达得最忠实和最生动……

“……如果把匈牙利诗歌看作是一部匈牙利民族史，那么裴多菲的作品可以说最完美地描绘了人们被自由战争所激发起来的情绪，这些诗篇最忠实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和人们的内心世界。

“阿兰尼的诗歌则描绘了我们近代历史中最悲惨的时期……

“……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区别在于：阿兰尼是以普遍性为尺度衡量自己的心灵、思想和感情；裴多菲则相反，是根据自我和

本身的性格、思想来衡量普遍性。

“……谁都不会象他那样为一场充满理想的革命、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流血斗争和为一个行将沦丧的人民如此热情地讴歌。

“……对于裴多菲来说，人民不仅是被压迫的阶级，而且也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对于他来说，人民不仅是未来社会的基础，而且也是一种理想中的自由的保障……

“……他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争取权利……。不仅是为在祖国实现自由的憧憬，也是为了自由能在世界传播的这一思想鼓舞裴多菲奋起……自由是十九世纪最崇高、最美好、最神圣的理想。但我们这个鼠目寸光的时代却把它当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抛弃了。但是裴多菲却象福音派的教徒和殉道者信仰福音派教义那样信仰它……

“……他以痛苦的心情同国会议员们交锋，谴责领导人物的迟疑和蹒跚不前……

“……裴多菲的《起来吧，匈牙利人》① 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民族呼声，今天听起来也依然象一篇号召进行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斗争的檄文……

“……裴多菲发自心灵的暴风雨般的呼声……向特权阶级、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宣战，并以革命的激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裴多菲深知在他的年代一切不能按部就班……他感到，能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不可能是温和与礼让，而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显示力量。他对于那怕是一丝退缩的念头都感到

---

① 即《民族之歌》。——译者

憎恨……

“裴多菲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革命中，谨小慎微势必一事无成，只有大胆和勇敢才能将革命带到胜利的彼岸。因此，裴多菲不仅鞭笞某些人的投机和观望，而且也谴责民族本身，特别是其中的那些以空话和大话试图解决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贵族老爷们。

“……新时代的声音在裴多菲的诗中响起，世界文学中能与他相媲美的诗人寥若晨星……

“……谁能说他的过早谢世是他的不幸？我们是贫穷的，而他却富有……他流过鲜血的伤口变成了一张张嘴，劝慰着后人，并且鼓舞他们奋勇前进……

“……这些优秀的作家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在工作上是我们的楷模，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是我们的护法神……

“……裴多菲和阿兰尼的作品是匈牙利人心灵的法则……这些作品是爱国之情的源泉、鼓舞力和慰藉者……”

1903年，库恩·贝拉在科洛日瓦尔以这几句话结束了他那篇长达一百多页的作文。

……库恩·贝拉总是以感激之情思念他的文学教师科瓦奇·德热，在流亡的年代里也经常谈起他。多少年后他还从莫斯科向这位教师问候，当然不是通过邮局。女画家卢卡奇·胡戈妮因家事回埃尔代伊，她把这张纸条塞进了科瓦奇·德热的窗里，老先生一直没有弄明白库恩·贝拉的问候是怎样和通过谁转达给他的。但后来听别人告诉我：当年学生对他的关心——尽管是秘密地表示的——使他感到十分欣慰。

在中学的各种课程中，除文学和历史以外，库恩·贝拉最感

兴趣的要算是植物学了。

每逢星期日，这位少年就起大早离开家，很晚才回去，裤子总要撕破几个口子，在家里免不了要受责怪。但他并没有因责怪而动摇。有一次裤子又撕了个大口子，母亲气愤之余夺过那些长根须的“新植物”，库恩·贝拉央求母亲宁可惩罚他，只是不要碰坏那些难得的“珍品”。

学习优秀、有良好语感的库恩·贝拉在上学期间，居然德文课成绩不佳。他拉丁文学得很好，不想学德文是“出于原则”。有一次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当年他想以不学这个语言来表示对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匈牙利的抗议。但后来他还是掌握了德文，当他领导共产国际的宣传鼓动部时，曾不止一次地用德文撰写文章和号召书。他的俄文是无懈可击的。他还可以阅读法文材料，在近五十岁的时候又学会了阅读英文。

库恩·贝拉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懂英文，看不懂英国和美国报纸，那他今天就无法研究政治问题”。他羡慕自己的波兰朋友拉平斯基每天能翻阅三十四种外国报刊，而他每天只能翻阅二十种。他说，“……这都是因为我英文不行的缘故。”

库恩·贝拉生性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怨天尤人。他说，“哀叹使人裹足不前”。他将愿望付诸行动，终于学会了阅读英文材料。他说，“我不想只是依赖助手们工作，我想独立地去研究那些我感兴趣的问题。”

库恩·贝拉中学毕业以后，顺从父母的意愿，考入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尽管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去当法官或检察官。

第三章　青年时代的库恩·贝拉

对青年时代库恩·贝拉的观点和个性的形成方面起作用的诸多因素中，埃尔代伊这块土地复杂的历史和革命的过去，以及两个世纪之交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有着突出的地位。当然，埃尔代伊地区的大城市——尤其是瑙杰瓦劳德① 繁荣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作用也同样不能忽视。

以马尔基·山多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发扬进步传统，使之成为积极的精神力量。在动荡不安的现状后面人们可以感觉到这块土地上活生生的历史：巴博尔纳起义② 中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农民曾经攻占我的故乡瑙杰涅德③；多热·久尔吉④ 在泰迈什瓦尔被送上烧红的铁椅，据说他的尸体被切成四块，分别钉在布达、佩斯、久拉白堡⑤ 和瑙杰瓦劳德城市“永远”示众；多热在泰迈什瓦尔失败后，“红色神父”梅萨罗什·洛林茨逃脱了，但尚有力量率领农民起义军的残部围攻并占领了科洛日瓦尔；在博奇卡伊和拉科齐⑥ 反抗哈布斯堡王朝传统感召下，这里发生过埃尔代伊的多次民族起义；马戴法尔瓦第三次农民大起

---

① 今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译者

② 指1437—1438年在胡斯运动影响下匈牙利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译者

③ 今罗马尼亚的阿尤德。——译者

④ 1514年匈牙利历史上最大农民起义的领袖。——译者

⑤ 今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尤利亚。——译者

义⑦失败了；以霍里亚和克洛什克为首的第四次农民起义⑧也被扼杀在血泊之中；1848年革命中发生过瑙杰涅德的悲剧⑨；伯姆将军的士兵曾在这里胜利地抗击哈布斯堡及罗马尼亚统治者的军队；裴多菲·山多尔牺牲在谢盖什瓦尔；匈牙利人瓦尔加·卡塔琳领导了本地罗马尼亚矿工的斗争；两个世纪之交时在科洛日瓦尔的马加什国王塑像揭幕典礼上发生奥地利国歌事件⑩；在埃莱什德的排枪下牺牲的三十三名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工人同样以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埃尔代伊土地，记下了阶级统治的“光荣”；匈牙利贵族和蒂萨·伊斯特万⑪的民族政策当时就声名狼藉，日后也遭人唾弃；又是瑙杰瓦劳德，在以奥第·安德烈为首的新文学的发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明日社”的杜特卡·阿科什这样写道：

“十八岁⑫的库恩·贝拉的形象至今依然浮现在我眼前。他不但是‘明日社’的积极会员和我们的好同事，而且当1908年9月，《明日丛书》发刊时他恐怕是在深夜为之纵情喊出：‘孔雀飞到州府顶上了……’的第一个匈牙利人。”

下面我想摘引当时的报刊若干片断，也许有助于读者了解青年时期的库恩·贝拉。首先当然是他自己编辑的《前进报》。

---

⑥ 这两个人都是匈牙利大部分土地被外国占领后统治埃尔代伊的匈牙利大公。——译者

⑦ 这次起义发生在1764年。——译者

⑧ 这次起义发生在1784年。——译者

⑨ 1848年12月奥军在普契奈尔率领下击败革命力量开进瑙杰涅德进行屠杀。——译者

⑩ 在仪式上演奏奥地利国歌，受到匈牙利人的抵制。——译者

⑪ 蒂萨·伊斯特万(1861—1918)，当时的匈牙利总理。1918年被起义士兵杀死。——译者

⑫ 杜特卡·阿科什弄错了。库恩·贝拉当时已经是二十二岁。——作者

每期《前进报》上差不多都有他的文章。

“好象几个世纪的风暴一下子集中起来了似的。在这个国家里短短几年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个改革并不表现在机构的更改，因为经济和法律始终是少数人的特权，但在人们的心头已经燃起革命的火焰，把华丽的谎言燃成灰烬……

“在人们心头燃起的火焰其威力不亚于几个世纪风暴的总和。这火焰将向我们阐明真理，向人们显示幸福的伊甸园。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向往伊甸园。由于缺乏向导，他们认可了别人对历史的篡改，也接受了别人对今日的歪曲。但是我们将要成为人们的向导，我们将高举真理的火炬，在斗争中无畏无惧，带领人们奋勇前进。我们要为受压迫的人争取富裕的生活，为无权的人争取权利，为实现法治而奋斗。我们理解时代的召唤，我们将向黑暗挺进。我们将驱走拿空话骗人而自己却又害怕光明的家伙。我们将唤起民众，与他们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实现这个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复兴而战。今日的社会鬼蜮横行。富贵门第和趋势附炎者结成罪恶的联盟，试图扼杀强项的斗士。揭起斗争旗帜的人就得冒成为烈士的风险。为了人民和真理，我们将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真理不会置为之斗争的人于不顾。”（《前进报》1906 年 9 月 18 日）

两个月以后，1906 年 11 月 19日，库恩·贝拉针对新通过的《禁止罢工法》写道：

“我们要召集大会反对《禁止罢工法》……

“奴隶主为镇压工人群众的企图必然遭到反抗，因为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正在越来越坚强地团结起来，向那些依仗权力试图残害百姓的人进军。……（政府）试图剥夺百万无产者的权利和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但是，封建统治的好日子不长了，人民

将把他们的黑暗势力一扫而光。瑙杰瓦劳德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工人们将显示自己的力量……”

对于二十岁的库恩·贝拉的这类文章人们的态度怎样？他在埃尔代伊的工人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通过下面的几段引文虽不能窥全豹，但也可以见一斑。

“……昨天下午诺格拉第·久拉打电话到《自由报》编辑部，以极为粗暴的语气要求编辑部解雇两名职员，否则他将采取行动。

“库恩·贝拉去接电话，当然严厉地申斥了对方。

“诺格拉第·久拉回答道：‘好，咱们街上见！’

“……六点左右库恩·贝拉和费赫尔·阿尔帕德以及根德尔·费伦茨前往圣·拉斯洛广场…… 诺格拉第站在教堂拐角上，身后是两名保镖……

“我们的同行库恩·贝拉走到诺格拉第面前……诺格拉第几周来一直宣称和库恩·贝拉势不两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伸手去摸手枪。说时迟那时快，库恩·贝拉朝暴徒顺手一棒，……诺格拉第对准库恩·贝拉肚子就是一枪……子弹没有命中。

“整个城里当天晚上的主要话题就是这场冲突，每个人都为库恩·贝拉而欢呼……”①

“一件新闻案

“瑙杰瓦劳德检察官就库恩·贝拉进行煽动活动提出起诉。库恩·贝拉系科洛日瓦尔人，原为《前进报》责任编辑，现在布达佩斯从事新闻业。法庭原定前天开庭，然而库恩·贝拉并未来到。丘约克庭长决定请布达佩斯警察局传讯库恩·贝拉于昨天

---

① 1907 年 1 月 10 日《瑙杰瓦劳德快报》。

前来。然而库恩·贝拉昨日仍未出庭。加蒂·巴林特要求逮捕库恩·贝拉。”①

“新闻记者遭逮捕

刺刀影下开法庭

“……首都记者库恩·贝拉于昨天被警方拘捕……由两名身背刺刀的警察从布达佩斯乘火车押送前来科洛日瓦尔。首都警察局此举为应科洛日瓦尔警方要求而采取。据悉本地法庭将于明日开庭审理库恩·贝拉案。鉴于库恩·贝拉未能应传讯出席第一次庭审，因此已决定将其逮捕并加以监禁。”②

事情是这样的：科洛日瓦尔泥瓦工人举行了长达数周的罢工，厂方威胁利诱都未能奏效。建筑业业主从摩拉瓦招徕泥瓦工前来破坏罢工。摩拉瓦的泥瓦工绝大部分参加工会，但他们并不清楚事情真相。他们到达科洛日瓦尔后立即被从火车站拉到舍贝什津·戴维建筑公司木料场居住，与外界隔绝。罢工的泥瓦工还是获悉了这一情况，决定将真相告诉摩拉瓦工人。然而对方不懂匈语，居住地又无法随便接近。罢工者想物色能说德语并能说清道理的人，库恩·贝拉自告奋勇，承担这一危险任务。他和罢工的领导人前往摩拉瓦人住地。然而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宪兵在门口站岗。他们绕木料场走了一圈，无法入内。库恩·贝拉思索片刻道：“可以把我扔进去！”“扔进去不难，可是怎么出来？”库恩·贝拉回答道：“如果我和他们达不成协议，他们可以把我扔出来。如果达成了协议，他们更会帮我了。别犹豫！”

同行者把库恩·贝拉扔了进去，没过二十分钟，库恩·贝拉

---

① 1907 年 3 月 28 日《瑙杰瓦劳德快报》。

② 1907 年 5 月 16 日《瑙杰瓦劳德快报》。

在铁丝网那边出现了。接着科洛日瓦尔的工人和摩拉瓦工人一起走向警察局门口游行示威，警察开了枪。罢工委员会委员丹·彼得中弹身亡。

“宪兵、警察刀枪齐下，于大街上肆虐！”库恩·贝拉在第二天散发的传单上这样写。

那时他二十一岁。

他被捕了。

然而罢工获得了胜利。

警方释放了库恩·贝拉，然而接着对他进行起诉。

“监禁六个月！

“科洛日瓦尔法庭昨日开庭审判《布达佩斯日报》记者（原科洛日瓦尔记者）库恩·贝拉。库恩·贝拉于去年夏天就泥瓦工人罢工行动时被枪杀的丹·彼得一事写过《大街上肆虐》的传单。检察官据此以‘在报刊发表危险言论和煽动武力向当局进行威胁’提出起诉。法庭曾多次向被告发出传票，但库恩·贝拉未予置理。最后科洛日瓦尔法院向库恩·贝拉发出逮捕令。就象我昨天已经报道的那样，库恩·贝拉被押送前来，科洛日瓦尔法庭并已于昨日作出判决。

“科洛日瓦尔法庭宣布库恩·贝拉犯有向当局煽动武力行动罪判处六个月徒刑，并罚款六百克朗……”①

我们还可以看看几年以后另外性质的报道：

“在科洛日瓦尔建设工人住宅！

“总社设在科洛日瓦尔的合作社不日成立。合作社的宗旨是为本社社员筹措地皮，并负责建立符合卫生要求的实用房屋，

---

① 1907 年 5 月 16 日《瑙杰瓦劳德快报》。

建房对象仅限工人及其家属。参加合作社的工人仅需支付相当于一年工资的金额，不必全部付清即可得到住房……

“愿参加者可在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库恩·贝拉处报名。”①

“工人建房合作社成立。约二百名工人在市府礼堂参加了该合作社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雅各比·卡尔曼、科苏塔尼·伊格纳茨、佩特兰·蒂博尔和库恩·贝拉。”②

“……大会选举库恩·贝拉为常务主席，为筹备合作社的建立库恩·贝拉贡献殊多。”③

“……科洛日瓦尔法院已开具许可，并将在洪韦德街五十二霍尔特④ 地皮的土地购买证交予工人建房合作社主席库恩·贝拉。”⑤

在“血腥的星期四”⑥ 事件之后一天，我们可以在报上读到：

“科洛日瓦尔人的抗议

“布达佩斯街头的血激怒了科洛日瓦尔的工人阶级和市民。数以千计的群众拥向马加什国王⑦ 广场举行集会。戴尔科维奇·伊扎克、库恩·贝拉和尤恰克·卡尔曼发表了激烈的演说……”⑧

---

① 1911 年 1 月 6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② 1911 年 1 月 26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③ 1911 年 1 月 28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④ 计量单位，一霍尔特约零点五七公顷。——译者

⑤ 1911 年 3 月 8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⑥ 指 1912 年 5 月 23 日（当天是星期四）布达佩斯的一次工人示威游行，遭到当局残酷镇压，死 6 人，伤数百人。——译者

⑦ 马加什，匈牙利国王，1458 — 1490 年在位。我国有些历史书译作“马提亚国王”。——译者

⑧ 1913 年 2 月 15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工人们行动起来了。

“科洛日瓦尔举行了示威大会。

“布达佩斯的街上沉寂无声，但每个人都清楚，这沉寂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席卷大地的狂飚在等待着号令，在等待着爆发的那一瞬间。

“昨天晚上，在科洛日瓦尔的街上也出现了行动的先兆。有组织的工人在马加什国王广场举行大会。星期六和星期日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全部被没收。没收的报纸昨日已分发给订户，但大部版面开了天窗。社会民主党科洛日瓦尔市委于今日下午六时召集群众大会，抗议检察官的刽子手行径。缝纫工人维莱什·尤若夫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书记库恩·贝拉发表长达三刻钟的演说，……并控诉了蒂萨侵犯了神圣的新闻自由。

“在工人的抗议声中库恩·贝拉扬着被没收的《人民之声》报说，蒂萨要用这个手段从战斗的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手中夺走武器。

“在库恩·贝拉的演说过程中已经可以感觉到工人们不会轻易散会回家，而将在街上表示他们的激愤。

“工人们果然在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实现普遍、平等和秘密的选举。但是前来干涉的警察命令游行群众解散……两位受伤的工人被送往‘工人之家’进行包扎。愤怒的工人直到十点左右才集队回返。大会和游行结束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①

“罢工！

---

① 1912 年 6 月 12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科洛日瓦尔的工人也在积极筹备罢工。昨晚在莫诺什托尔啤酒厂举行工人集会。前来参加大会的不但有工人，还有住在城里的市民和妇女，不但工厂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大会选举费凯泰·拉约什担任主席，蓬格拉茨担任记录。尤恰克·卡尔曼向与会群众介绍了斗争的意义，库恩·贝拉谈了斗争的方式。讲话以后与会群众一致通过决议参加政治罢工……”

“准备罢工

“科洛日瓦尔工人正在积极地准备罢工，反对卢卡奇①—蒂萨体制。星期五晚上在金鹰咖啡馆和餐厅举行的集会吸引了附近的大批工人。库恩·贝拉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尤恰克·卡尔曼作了政治形势的演出。大会以库恩·贝拉的演说结束……”②

“莱多特大会

“大批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参加了星期日下午三时在莱多特举行的大学生抗议集会，但许多自由派的市民也踊跃地与会。警察、宪兵严阵以待，监视着会议的进行。会上首先是大学生发表演说，之后是奥巴蒂·伊斯特万教授发表了激烈的演说，与会者以持续好几分钟的掌声对精彩的演说表示支持。接着，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副主席库恩·贝拉发表演说。

“‘我不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是作为它的一个士兵给青年带来了问候。在匈牙利，新闻自由从来也不是处女，但今日当我们看到《人民之声报》整版整版的天窗时，她似乎更成为在警察管制下的妓女了。匈牙利是假民主的国家，唯一的民主

---

① 卢卡奇·拉斯洛(1850—1932)，1912 年任匈牙利总理，次年因贪污案被迫辞职，但仍在幕后支持蒂萨·伊斯特万。——译者

② 1913 年 2 月 15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成果是新闻自由。可是他们把这仅有的一点民主遮羞布也要揭掉了。现在，禁止工人和反对党的报纸被列入了法令。今后没有警方的许可就不能散发传单、张贴海报，今后如果有谁在街上挨了耳光，他只能散发名片。新 闻检查制度强加到了我们头上。今后每个法官都是专政者，每个警长都是霸王，每个书记官都是卢卡奇式的受贿者。新闻事业也就完了。那么我们可以在报上写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写：

“美丽祖国真自由，
新闻自由消息多。
神甫高举十字架，
小牛一胎生五个。
骆驼背上双峰起，
三胞兄弟笑呵呵。
美丽祖国真自由，
新闻自由消息多。

“今后如果有贿赂事件，只能就象厄特沃什在他的《农村书记官》里一样地打哈哈了。

“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运动中总是有什么工具就拿什么进行斗争。如今蒂萨之流把议会民主和法律踢在一边，那么我们也把他们踢在一边。民主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并把这不齿于人的政府连同蒂萨—卢卡奇之流一起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长时间的欢呼声和掌声。）①

杜特卡·阿科什写道：

“每当谈到‘谎话院’，即蒂萨·伊斯特万的贵族议会时，他

---

① 1913 年 12 月 2 日科洛日瓦尔《新闻报》。

总是以无限激情引用匈牙利伟大革命诗人奥第的这几行诗：

……总将有一天，虽然是晚了，
地震来到，宫殿动摇。
麻木的世界却把
灵魂的觉醒当作死耗。
到那时，
谎话院面向多瑙河的顶上
将会有新的旗帜升起……”

在1913年动荡的夏天，我成为库恩·贝拉的妻子。

第四章　瑙杰涅德

我出生在埃尔代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父亲毕业于商业学校，除匈牙利语外还会讲罗马尼亚语和德语。他二十一岁那年娶了我母亲。母亲当时十七岁，是个富裕家庭的女儿。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全家搬到布扎什-博恰尔德乡居住，我父亲在班菲男爵的土地上租了一点地。他不善经营，却又秉性公正，加之遇上连续三年颗粒不收的干旱，他破产了，我母亲的一点陪嫁也搭了进去。

看来班菲男爵还算器重我的父亲，由于班菲家族在瑙杰涅德有很大影响，男爵把我父亲安排在这里的州医院管理膳食。

供应医院膳食的工作由我母亲来管，我父亲掌管账目。那时家里人口已经很多，我父母承担的差使已经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当我的两个弟弟在瑙杰涅德寄宿中学毕业之后（我的三弟连中学都没上，后来从商），父母决定家里的一部分人搬到科洛日瓦尔去，因为父亲在那里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母亲则同我的一个姐姐一起继续留在瑙杰涅德。两地相距不远，父亲每月可以回瑙杰涅德一两次，兼理医院账目。这样，男孩子和女孩子们的求学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这种办法对于我父母来说是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为了孩子们，乐于这样做。

我父亲在科洛日瓦尔找到了工作，租下了房子，于是给全家带来忧伤的两地分居生活就开始了。但终于我妹妹和两个哥哥得以在大学毕业，我念完中学后又上了音乐学院。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了独立谋生的本领。

由于两地生活开销大，还有其他不好的后果，两地分居的生活不宜于长久继续。于是，几年后我母亲和那个姐姐也搬到了科洛日瓦尔。

我父亲几次试图独立经营点什么，但连遭失败。他不善于借助别人施展自己的宏图。

最后，他放弃了独立经营的计划，到毛罗什新城的盐矿当了一名小职员。

1919 年，我流亡出国，此后再未见到我的父母。然而我知道在他们年迈的时候，得到了儿子们的照料。我父亲去世时八十八岁。除了几件旧家具，一两套衣服和内衣外，他身后留下的只是正派、清白的名声。

我父亲持“蒂萨派”的保守观点。他的政治观点扰乱了和谐的家庭生活。我的哥哥奥尔图尔当时已当上律师，常常因政治观点顶撞父亲，使得他老人家勃然大怒，因为他不能容忍在“他的家里”居然有人胆敢对蒂萨出言不逊。

说实在的，我当时认为这种不时发生的家庭风波是多余的。我不明白蒂萨·伊斯特万想踢开议会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弄不懂修改兵役法、增加招募新兵到底为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①

---

① 当时奥匈帝国政府要求匈牙利议会通过增募新兵百分之二十五，并统一由帝国（即奥地利）指挥，遭到匈议会反对。匈总理蒂萨·伊斯特万在帝国政府指使下企图修改议会法强行通过议案。——译者

然而有一次，包括父亲和奥尔图尔哥哥在内，全家的观点一致了。那天，在科洛日瓦尔市的马加什国王塑像揭幕，军乐队演奏的是《上帝保佑》① 而不是匈牙利国歌，全家每个人都勃然大怒。我当时尽管只有十二岁，也感到非常气愤。

1890 年，我出生在瑙杰涅德，父亲那时已经破产。我只从大姐尤哈娜口中听说过我家当年的“盛况”和“富裕”，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委实想象不出当年家庭的“极盛时代”可能是什么模样。

我在科洛日瓦尔高等女子学校结业以后，本想通过中学考试，以便能够报考大学。但由于前面已谈到过的经济上的原因，我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以前的“富裕日子”给家里留下一架钢琴，我从小就弹奏它。这样我考入了科洛日瓦尔音乐学院，准备将来靠教人弹琴谋生。出于需要，我在上学之时就已开始教儿童们弹琴。

老师们认为我在弹奏钢琴上有才华。学习了几年之后，我已在学生音乐会上登台演奏。科洛日瓦尔有一两家报纸还登过赞扬我的文章。我还特别记得的是，一位名叫萨斯·安德烈写的评论文章对我推崇备至，现在回想起来未免有点过誉了。

从童年开始，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就使我愤愤不平。父亲当时是我最崇拜的人，我不止一次问他：对某些民族和有的宗教为什么有歧视？有大学文凭的人的子女与其他人的子女相比为什么有优待？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世上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次我还“建议”最好实行均贫富。

---

① 奥地利国歌。——译者

我父亲回答说：富人和穷人从来就有，以后也还会有，重要的是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要诚实。均贫富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有人勤劳，有人懒惰。过一段时间以后世界又要分富人和穷人。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上帝的意愿，应该安于现状。

我安于现状了，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后来，我在科洛日瓦尔大学里听了保拉季·迈尼黑特① 的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演讲。尽管我对演讲不能说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还是懂了许多道理。当然，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我在高等女子学校时的经历。在班上我们六个优秀生形成一个“小圈子”，都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但当这些姑娘们举办茶会的时候，她们那些地位高的家长却不邀请我。我体会到，一旦毕业离开学校，那几位姑娘也将会同她们的家长一样行事。

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

我大姐的命运也令人深思。尤哈娜可能是在二十岁那年，一位团军医爱上了她，并且想要娶她作妻子。他们深深相爱，但在当时一个军官没有婚姻保障金②（四至五万弗朗茨－约瑟夫克朗③）不得成家。按照那时的习俗，要向姑娘追求多年之后才可订婚和结婚。就在军医求婚期间，我们家破产了，父母出不起本想当婚姻保障金的陪嫁。热恋中的军医为了能娶我姐姐，打算离开军队，但我父亲不赞成。他的理由是，当军医是铁饭碗，退役后还有养老金。如果出于一时“冲动”放弃了它，以后将会

---

① 保拉季·迈尼黑特（1859 — 1929），匈牙利哲学家。——译者

② 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霍尔蒂统治时期，军官必需有规定数量的“婚姻保障金”才允许结婚。此项规定的目的是确保军官团的阶级构成及军官家属的“上等人”生活水平。——译者

③ 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自1848年至1916年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这里说的弗朗茨-约瑟夫克朗是指铸有他头像的硬币。——译者

噬脐莫及，婚后生活也不会幸福。

姐姐虽然十分爱恋她的对象，但还是顺从了父命，她既不敢也不愿同父亲争辩。

哈妮卡（我们都这样叫她）对她的意中人终生不忘，一直没有出嫁。后来她同我住在一起，替我教管孩子。

四十年之后，她同我们全家一起回到了匈牙利。尽管她早就盼望能再探望故乡的城市瑙杰涅德、久拉白堡和科洛日瓦尔以及两个还活着的兄弟，但是终于没有能够如愿。

回国后没有几个月，她便在布达佩斯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第五章　“你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安宁……”

一

我的哥哥贝拉、奥尔图尔和亨利在世纪初结束了学业，后来我最小的妹妹也大学毕业了。我这三个哥哥都能自食其力。贝拉哥哥在毛罗什新城，奥尔图尔在久拉白堡，玛尔基特妹妹在索特马尔，亨利在科洛日瓦尔。

父亲后来又回到了瑙杰涅德。为了使我能继续学音乐，他把我托给了科洛日瓦尔的一个熟人，每月付二十五克朗。

在科洛日瓦尔这样的小城市，大家不但对亲戚熟人，对在那里生活的每个“知名”人士也都“了如指掌”，每当茶余饭后，这些人总免不了成为人们的话题。对他们的褒贬当然因家庭、因时间、因环境而异。根据真实的或编造的、目睹的或耳闻的，有的捧上九天云霄，有的诋毁得恨不得把他们送进地狱。谈论的内容无所不包：服饰、住房、家具、饭食、茶会、求婚、订婚、结婚、桃色纠纷、离异、子女、财产、收入、后门……人们还谈论谁有办法，谁迂腐，谁聪明，谁愚蠢；谁有教养，谁粗野；谁明智，谁糊涂；谁爱打牌，谁善于勾引女人，谁古怪乖戾……上帝才晓得他们还谈些什么。最重要的是对整个世界赞扬不多，而咒骂不少。这些小市民常是自命不凡，认定只有自己说的才是真知灼见。

当时已经二十五岁的“臭名远扬”的库恩·贝拉就是他们的话题之一。

我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那些人来说都是“岂有此理”，然而我却觉得“不无道理”，从而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

“他要替穷光蛋包打天下。”“他是科洛日瓦尔工人之家最能狡辩的人物。”“他在哪里都呆不长。”“他在科洛日瓦尔、瑙杰瓦劳德和佩斯都当过新闻记者，现在是这里的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的秘书。”“他专门组织示威游行同当局作对，因此多次入狱。”“他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大概要造反。”“他连穿戴也奇形怪状。头戴半米宽帽檐的黑帽，脖上系着大得要命的红领结。”

这个青年是谁？

“以后我在街上指给你看，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在哪里才能让你见见他。”我的一位熟人比尔盖尔·埃尔诺① 这样对我说。他的笔名叫戈尔·帕尔，曾在科洛日瓦尔攻读法律，是我寄宿、吃饭那个人家的常客。

但后来把库恩·贝拉指给我看的并不是他。

有一天我隔窗闲眺，工人们正在街上游行，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位头戴宽边黑帽的年轻人，系着很大的红领结，同群众一起高唱《马赛曲》。

“库恩·贝拉！”我心里想。

---

① 几十年之后我在布达佩斯重遇比尔盖尔·埃尔诺。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但我没有忘记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是他第一个以同情的口吻同我谈论社会主义者库恩·贝拉的。比尔盖尔如今已近八十岁，但仍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作为律师曾勇敢地为被监禁的共产党人进行辩护，他本人也没有躲过坐牢的厄运。——作者

我的女房东这时也走到窗户那里。她象看到怪人一样指指点点地说：

“瞧见了吗？”她不住地摇着头“这就是库恩·贝拉……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竟和‘暴民’们一起示威。”

后来我从戈尔·帕尔那里得知，库恩·贝拉每天下午都去科洛日瓦尔的纽约咖啡馆。他在那里阅览国内外报刊，同别人讨论问题，讲述过去发生的革命并鼓吹进行新的革命。咖啡馆里的大部分小市民对他的言论都感到毛骨悚然，但好奇心又使他们不愿离开。使他们吃惊的是，这个“捣乱”的青年——起码应该把他叫做“怪人”——竟如此通晓历史、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文学一艺术更不在话下。

奥尔图尔哥哥有一次说，“有人把库恩·贝拉当成洪水猛兽，他一走进咖啡馆，不仅他坐的桌子上会有人离开，就连他座位附近有些人也避之唯恐不迭。”

……那时大概是五月，我老是有意无意地每天两次绕道经过纽约咖啡馆去音乐学院，手里拿着厚厚的乐谱。有一次我从咖啡馆凉台前面走过，库恩·贝拉瞧见了我，向坐在他旁边的戈尔·帕尔说了些什么。我感到他是在说我。

此后我很久没见到他，依旧过着我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学习、教课、看书和在家里长时间地弹琴。当我几乎把库恩·贝拉遗忘了的时候，却在一位女友家里结识了他。那天库恩·贝拉送我回家。我们一路谈得很投机，并且相约以后见面，只是没有讲定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卢卡奇·胡戈的家里又见到了他。卢卡奇的妻子伊尔玛是我的远亲，也是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卢卡奇是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的医生。他是神经科大夫（也

曾是奥第·安德烈的朋友和医生），不仅因公事常和库恩·贝拉见面，而且也由于他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因此两人关系密切。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段时间里他们正在筹建一个类似布达佩斯的“伽利略俱乐部”① 那样的“鲍耶② 俱乐部”。

我在卢卡奇家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库恩·贝拉。说实在的，最初我有点害怕他。因为听人说他爱挖苦人，谈话时极为傲慢。

他开始时对我也颇带讥讽，但后来谈话变得严肃起来。

以后我才明白，他只攻击那些自以为比别人都高明、好讲空话的小市民。这些人开口闭口谈论进步，但却蔑视工人，不愿承担任何风险。他们赞同某些原则，但却认为付诸行动是别人的事。

“不值得在他们身上耗费时间，”库恩·贝拉有一次高声地说“让他们去，说不定到头来自己会明白过来的。”

当我们比较接近以后，他也向我建议：与其同这些浅薄、无聊的人一起消磨时光，还不如读点好书。他带来一些读物，其中有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他要我仔仔细细地读，不要匆忙，因为我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他最后要求，“看完这本书请对我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时期我常想到，“浅薄的小市民”里我也算一个，这不免使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是慢慢地认识到他说得有道理。

当我成为他的妻子以后，家里常有一些我过去很不了解的

---

① 伽利略俱乐部是1908年匈牙利进步大学生创立的组织，受到社会民主党一部分领导人的支持。有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大部分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追随者。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取缔。——译者

② 鲍耶·亚诺什（1802—1860年），匈牙利数学家。创立“非欧几里得几何学”。——译者

工人来作客，这时候我发现库恩·贝拉对他们从不傲慢。他愉快地讲解各种问题，如果感到对方还没完全听懂，便再重复一遍。如果他意识到已把某个真理注入到工人们的心田，便会非常高兴。

当这些印刷工、石匠和钳工走了之后，他便会说，“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他还会兴致勃勃地说，“这位乔姆皮埃赖多聪明，”“这位拉约什法尔维（支部书记）是个多好的同志，可是还不是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但以后他会学会的。”

许多人来过我们家，可惜我把大部分人的名字都忘了。我还记得一位印刷工人，是个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染上了肺病。库恩·贝拉设法把他送进疗养院，然而已经无济于事。我也参加了葬礼，葬礼上库恩·贝拉讲了话。当时大家都哭了。这不仅是因为死者是大家的好朋友，也不仅是因为孤儿寡母本身就是催人泪下的景象，而是因为大家都感受到了生活的严酷。库恩·贝拉在悼词中控诉了统治阶级，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坚决斗争。葬礼之后回家时，我以为库恩·贝拉会被逮捕。从工人们的目光中我也看到了这种担心。

他们陪伴着我们，来到我们的家，把我们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库恩·贝拉象往常一样，拿出食品摆到桌子上，请大家吃。同志们走后，我们两个人还久久地谈论着他们。库恩·贝拉说，“您看到没有，小市民的空谈与这些人的思想、语言之间有多大差距？同他们值得谈上几天几夜。我们不光是可以教他们，同时也可向他们学习。”

二

自从第一次见到库恩·贝拉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见面越来

越频繁。

有一次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库恩·贝拉严肃地，并且有点激动地对我说，“加尔·伊琳，做我的妻子吧。您要是嫁给一个小市民，同他度过无聊的、与您不相称的一生，我会感到遗憾。”然后他又略带讽刺地说，“我知道，按照有产阶级的习惯，结婚要征得父母的同意。那么您现在马上当着我的面给令尊写封信，请他到科洛日瓦尔来，对这件婚事表示许可。”

简单、明了、合乎人情，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和动人的表示。

库恩·贝拉相信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他预感到我不会反对。然而后来的情况表明，婚姻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给爸爸写了信。他来到科洛日瓦尔，仔细地倾听我的想法，然后说他过几天再答复我。我感到满意，安心等待回答。第三天，我得到了答复，但并不是我同库恩·贝拉所盼望的那样。

我爸爸在两天之内走遍了全城，拜访他的熟人，打听这个库恩·贝拉究竟是何许人。他听说库恩·贝拉原来是个“危险的颠覆分子”、“粗野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听到：“库恩·贝拉不久前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同各种可疑的人交往，每天夜里都同他们在小酒馆里厮混”；“库恩·贝拉以前就已经进过监狱”；“他鼓动工人向老板们示威，带领他们去游行”；“他诋毁上等人”；“他还攻击州长”；“他写乱七八糟的文章策动人们造反。”等等。此外，他的职业——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秘书——也不对我爸爸的胃口。因为它不是“国营”的。爸爸认为库恩·贝拉的生计并无保障，况且他还将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因为他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工人之家”。别人对我爸爸说，正经人是不去那里的，只有懒汉才去，也唯有在这些人中间，库恩·贝拉的“妖言”才有市场。

“难道你想嫁给这样的人？”我爸爸失望地问我。

我默不作声。

“你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安宁!”他说。

我仍然没有回答。

他激动地在房里踱来踱去，稍微消了一点气之后他长时间地看着我，那诚实的性格使他没有对我隐瞒这样一些事实：

“我也遇到了几个称赞库恩·贝拉的人，说他有头脑，甚至是当议员的材料。但是我对社会主义的议员不感兴趣。他现在的薪金还不够建立家庭，何况还得补贴他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很穷的人。我倒没听到关于他家里人的坏话，只知道他们住在郊外的一所土房子里”。

我爸爸然后又就当代“不慎重”的青年人说了几句“表示理解”的话，当然我也被划入了这些人的行列。他还说，在他年轻的时代，这样的婚姻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他最后说，如果我不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就把我带回瑙杰涅德去。“在那里你会把库恩·贝拉忘掉。如果你改变了主意，仍然可以继续留在科洛日瓦尔。”

同他顶撞没有用处。我固执地默不作声，也没有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爸爸走了。我同库恩·贝拉一起决定准备冲破一切阻力。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让步，也就是为结婚开始进行物质准备。他到报馆找了一份差使，我则将继续教人弹琴。

这个决心主要是库恩·贝拉下的。他这个人从来不向困难低头，相反，困难只会砥励他的斗争意志。困难越大，越能激发他的一切力量和对生活的热爱。但年轻的库恩·贝拉对生活的热爱，并不象有些人的只局限于卿卿我我的小天地或是“明智”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表现于好动、叛逆、勤奋和不停地追求事物的真谛，表现于急公好义的美德。

库恩·贝拉善于与人们的接触中得到愉快，这样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从不会躲进狭窄的、必然走向压抑和悲哀的“自我内心世界”里。他仅仅在生活的最后几年，由于被别人切断了和人们的来往而“与世隔绝”。

我要重申，仅仅在最后几年是这种情况。活在我记忆中的他是一个热情奔放、幽默诙谐、动作敏捷的年轻人，他丝毫没有利己主义，热爱周围的世界——大自然、人、书籍，热爱现在、过去和将来。

我们婚后最初一个时期，还住在科洛日瓦尔。我常和他去邻近的某个城镇或乡村。我们乘坐着出租马车，他时而望着在我们身边疾驶的田野和村庄，时而望着我，一路哼着快节奏的民歌。我感到他从肉体到灵魂都已陶醉在歌曲的韵律之中。在库恩·贝拉身上这点对我并不陌生，但此刻他灼热的目光更使我理解了他。

显然，只能用心灵上的火焰可以解释他那种乐观主义和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只要反抗、斗争和行动，任何障碍都可以克服，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也能找到出路。

当然，在婚姻问题上要妥善处理一切，包括克服父母的反对，就是有他那样的性格和意志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后我的父母和兄长终于看到反对已无济于事，便提出我们要置办好我的嫁妆、找到住房和买好家具。

这一切得需要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爸爸认可了我的婚事，把我接到瑙杰涅德，说订过婚的姑娘应该住在父母家里。

我知道，争论也没有用。

第六章　最后一个“太平年”

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应该承认，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那番话终究还是错的，因为当他对拟议的婚姻为我的终身担忧的时候，所想到的实际上是生活琐事而并非重大政治变革。但不管怎么说，在库恩·贝拉身边度过的二十四年虽不象父亲和我自己当初希望的那样“安定”，但却是美好的。在我一生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从没为自己的抉择而悔恨。

家庭生活的颠沛不安并不来自库恩·贝拉的“性格因素”，而是来自惊扰了全世界的那些战争、革命、反革命、流亡和监狱。从不涉猎政治生活的人同样也没有得到“安定”，这个时期不断发生的“地震”不同样也毁坏了他们的家庭，甚至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吗？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1913年那个最后一个“太平年”去。

结婚的条件渐渐成熟。库恩·贝拉每周到瑙杰涅德去看我。他星期六下午到，星期一早晨乘火车赶回科洛日瓦尔。当时他在科洛日瓦尔任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书记。

我们家的人慢慢同他亲近起来，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如果库恩·贝拉因持社会主义观点而受到什么人的指责，我父亲便出面袒护地说：“事实总归是事实，我看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有好人。”

父亲也承认库恩·贝拉是个聪明人，说他不虚度时光，总是学习、读书和提高自己。然而仅此还不足以打消父亲的顾虑。他常常沉思：

“可惜这个人不愿与上层社会打交道……”最使父亲费解的是：“然而他本人并非工人。”

父亲虽说是认可了这门婚事，然而不时会发生干扰他决定的事情，从而又促使他劝我“从长计议”。

其中的一件事是科洛日瓦尔《新闻报》在 1913 年 2 月 26 日刊登了如下一条消息：

“……科洛日瓦尔的工人领袖们在日尔河谷的矿工们中间。

“全国工人阶级联合资产阶级为争取普遍、平等和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同保守、落后的封建地主公开决战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将起最重要的作用。发动群众的准备工作正在地方上积极进行。当然地方上的恐怖行动更肆无忌惮，法官和宪兵更易于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与集会的权利。为了取得群众罢工的胜利，工人运动的先锋尤恰克·卡尔曼和库恩·贝拉正在埃尔代伊的各个城市和各工业中心从事大规模的鼓动活动。这两位工人领袖没有把他们的计划通知任何人，而于星期五秘密地乘火车来到埃尔代伊有三万矿工的著名的日尔河谷。当尤恰克和库恩到达佩特罗尚的时候，受到宪兵的检查。他们随身携带的传单被没收，甚至还受到拘留和遇到其他麻烦。这两位鼓动者的工作因此受到干扰。”

库恩·贝拉是被警察押送回来的。这在我父亲看来不啻是奇耻大辱。

另外一件事使我父亲更为恼火：

社会民主党人及各反对党派为争取实现普选在瑙杰涅德联

合召开大会。社会民主党派库恩·贝拉在会上发表演讲。大会开过之后，库恩·贝拉没去我家就离开了瑙杰涅德。父亲本来对此事一无所知，可是第二天早晨拿起报纸，才从发表的演讲稿中和那些“热心人”所撰写的报道中得知库恩·贝拉对政府以及地方当局“慷慨地”使用了大量激烈的言词。父亲怒气冲冲地回到家，严厉地责备我。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库恩·贝拉为什么非要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来攻击政府不可？在他看来，库恩·贝拉本是应该避开不到瑙杰涅德来的。幸而当地医院的院长也参加了那次大会，他是个反对派人士。院长遇到我父亲时，祝贺他女儿找到了一位非常勇敢、聪明的女婿。我父亲这才稍微平静一点。这番夸奖虽然使他消了点气，但还是对家里人说：“库恩·贝拉与我们不是一路人！”

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关系破裂，但是要想使我父亲“忘记”库恩·贝拉在瑙杰涅德的那场表演，显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订婚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一起读了许多书。他来时总要携带一大堆书籍，少不了有奥第的诗集。他把奥第·安德烈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说：“对奥第望尘莫及的，远不止当代的匈牙利诗人……”“至于说许多人还不理解他，还有一些反动的教师和某些糊涂的知识分子认为奥第·安德烈是‘思想混乱、精神不正常，以毒害青年为能事’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他的赞誉。历史将证明奥第·安德烈是正确的。”

卢卡奇·胡戈、库恩·贝拉和其他人与科洛日瓦尔的反动势力对抗，为奥第呐喊，但是他们在争论中没有击垮对立面中的多数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住在科洛日瓦尔时，屋里的墙壁上只挂了一幅照片。

那是奥第·安德烈赠送的。照片的下方写着："赠给亲爱的库恩·贝拉，奥第·安德烈"。库恩·贝拉不止一次地指着照片说："他以多么痛苦而充满智慧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腐朽的世界！"

这幅照片是什么时候遗失的和遗失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什么时候它还能在埃尔代伊的某个地方被发现。

在我哥哥的帮助下，我们在科洛日瓦尔终于找到一套有家具的住房。它在当时的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六号的第四层楼上。1913年6月29日，我们在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亲戚和熟人的不胜惊异之下完婚。尽管有人预言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了六个月"，有人说库恩·贝拉早晚会抛弃我，也有人为我嫁给了库恩·贝拉而深感惋惜。……但我们还是幸福地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如果不是由于不取决于我们的原因，我们本来是可以一起生活得更久的。

婚宴之后，我们外出蜜月旅行。是从瑙杰涅德到科洛日瓦尔，旅程只要两个小时，然而"蜜月"却一直延续到1937年库恩·贝拉被带走为止。

……在我们和谐的婚后生活中，也遇到不少日常的困难。由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习俗我们也无法避免，所以需要维持一定的外表。但是我们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几乎离"群"索居，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入不敷出。有一个时期我因生病不能工作。

库恩·贝拉每天早晨八点去工人保险协会基金会，两点回家吃午饭。饭后如有时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又离开家去演讲和开会，一直忙碌到深夜才由几个同志护送回家。送他的同志往往也上楼坐坐，库恩·贝拉总要款待他们。在遇到家里没有足够食物的时候，他便对客人们开玩笑地说："这也不赖，至少耗子在我们这里无法繁殖。"

要不然他就拿我开玩笑，说我不会烹调，还得由他来教。他讥笑高等女子学校培养不出能干的主妇。……在轻松的气氛中，时而丰盛时而不象样的晚餐做好了。

他们在饭后的谈话就比较严肃了。我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从不插言。尽管他们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已经并不陌生，但我仍然感到自己还没资格参加关于工人运动的各种理论与迫切的实际问题的讨论。

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不止一次激烈地批评社会民主党中央为提高工资进行斗争不力。他们指责《人民之声报》①，无视工人要求缩短每天干十、十一小时活之类的呼声。他们表示，如果《人民之声报》编辑部不改弦易辙，他们将不再订阅报纸。

人民的选举权和人民的无权地位问题经常是他们的话题。他们不断为工人代表什么时候能进入议会，在那里为劳动者的利益斗争而苦苦思索。

1913 年秋天，库恩·贝拉作为科洛日瓦尔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两次发言，在几个问题上对党的领导提出尖锐的批评。

他是独自去佩斯开会的。我本来也想到那里去住几天，但又考虑到火车票、旅馆费和其他花销太贵。虽然库恩·贝拉多次鼓动，可我还是留在科洛日瓦尔了。

两个星期以后库恩·贝拉回来了。

他带回不少礼物。为买这些礼物所花的钱，足够我到佩斯去两次。礼物固然使我高兴，但我还是责怪了库恩·贝拉。可他却不愿意地说："礼物你既然喜欢，而我又已经把钱花出去，放马后炮又有什么用!?"

---

① 当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央的报纸。——译者

我曾多次想，如果命运能赐给库恩·贝拉一张“魔桌”就好了。只有“魔桌”才能适应他那慷慨大方的秉性。当然，也正是这种秉性会妨碍他拥有“魔桌”，因为迟早连“魔桌”也会被他送人。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性格主要并非由于他有“应该帮助每个人”的信念，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聚敛财富的嗜好。他全然不会理财。如果有人向他要钱或其他什么，他会不加思索地立即拱手相送。好在是我姐姐主持家务，他总能及时地把库恩·贝拉的薪金拿到手里，否则我们连最必需的开支都会没有着落。但即使这样也发生过一些风波。

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常常要接待合家前来的客人。我们很少有饭桌上没客人的时候。靠什么才能维持这一切，靠最初每月一百七十五卢布、后来每月二百二十五卢布的“党的最高津贴”吗？我姐姐当然不免要嘟哝：“又来人啦？！”库恩·贝拉就要说：“您说得对，可是同志们还是得款待。”至于第二天还没有米下锅或者如何支付其他无法拖延的费用，库恩·贝拉根本不加考虑。“过去能够活下来，将来也能活下去！”他还同我姐姐开玩笑：“您肯定有私房钱，拿出来吧，别小气！”

沙发套已经破旧，房内墙壁斑驳，早该粉刷了，窗户上连窗帘都没有。特别是每到月底，我姐姐往往得向别人借钱买食品。库恩·贝拉对这些都置若罔闻。他就象个匆匆过客一样，似乎停息不了多久，又要重新投身于解放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地下工作。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谁还能想到沙发套、粉刷房屋、窗帘、隔日午餐和别的“琐碎事”呢？因此，我们在莫斯科的家就象个中转站一般。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库恩·贝拉常把认识或不认识的客人带回家，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他只到时关照一声：“这位同志要在咱们这里住几天。”由于他的书房里存有

秘密文件和其他材料，所以谁也不能在那里住。于是他请我姐姐把住房“调整一下”，也就是说让两个孩子和我姐姐睡在饭厅。每当深夜的“民族迁徙”结束以后，库恩·贝拉就把客人们让到餐桌上，同他们一起吃晚饭。不论桌上菜多还是菜少，他都亲自分食物，有时他还跑到厨房去，看柜子里是否还有可以吃的东西。

至于每批客人在我家要住多久，事先谁也不知道。孩子们并不过分喜欢客人们的来到，因为有的客人甚至干预我们对孩子们的教育。总而言之，宾至如归，他们感到宛如住在自己家里，根本不想离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饭有人给他们做，衣服有人给他们洗，在需要的时候，他们的内衣也有人给缝补，连脱落的纽扣都有人给他们缝上。

如果客人是来自匈牙利的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往往会突然出现，又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离去，然后杳无音信。如果某个客人要在莫斯科定居，库恩·贝拉就会千方百计地为他找房子，这在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有如登天之难。

但居然有人在得到住房和分配了工作以后，从我们家搬走时满肚子不满意和牢骚。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以后他们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得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不可能处处求助于我姐姐和库恩·贝拉了，连房间都得自己整理了。总而言之，他们有“理由”埋怨库恩·贝拉。

这时候我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在你家里吃喝过的人更容易成为冤家。”

库恩·贝拉对于这种人的忘恩负义感到恼火，但很快又都忘记了，在他心灵里这种事留不下什么痕迹。每当来了新的客人，他依然热情、周到地接待他们。库恩·贝拉竭尽所能帮助别

人，给他们出许多好主意。只要需要，他会把自己的另一双鞋送人，“但愿你穿着合适”。他也会把毛背心送人，因为“我穿它太热了”。衬衫、袜子、领带以及一切归他所有的东西，往往片刻之间会更换主人，如果尺码不合适，他就会特别遗憾。每当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他的东西藏起来。要做到这并不难，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究竟有什么，没什么。有，那很好，没有，他也不在意。他头脑里想的是别的事，而不是物品。

最后，这个变成了“旅馆兼餐馆”的家也成了他的负担，因为妨碍他工作。他开始发火了。就是在这时候，他也不埋怨赖着不走的客人，而是拿家里人特别是拿孩子们出气。我记得他对十二岁的阿格奈丝大发脾气，批评她没读过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著作，或者还没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然后冲出屋子，重重地把门在他身后摔上。他对七岁的米克洛什叫嚷说：“你要落在时代的后边了。”原因是孩子不会用一种“建筑师”牌的积木搭铁路。往往在旷日持久的客流高潮中他会指责汤“太差劲”、“不够热”或者“太烫”，要么说汤“太咸”。总而言之，除客人和我之外，他向所有的人发脾气。他了解我的性格，从不触犯我。他甚至向家里其他人发过火之后，虽然没有得罪我，却也要向我道歉，表示赎“罪”。

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发作以后很快就平静下来。然而被有些人称为“理智”，特别是所谓的“老成持重”却很少在他身上起作用。他缺乏谨慎、诡诈、谋算之类的性格。我也许应该对这一点感到遗憾。

我想我前面提到的那件关于因他过于重感情而需要“魔桌”的说法是不贴切的，应该说，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应该生在共产主义社会，即生在马克思当年谈论过和想象过的那种共产主义

社会里才好。

在列宁近卫军当中不仅他是这样，许多人都具有他这种超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性格。

当回想起库恩·贝拉的性格，我常常会写得很远，这是因为我每当一念及此，就情不自禁地怀念起那些列宁式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还是让我们回到科洛日瓦尔的日子吧！

他回到科洛日瓦尔以后，在工人俱乐部做报告介绍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情况。他在会上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还记得他向被邀请到家里作客的工人们所说的那些话："布钦盖尔① 总是强调应该建立党的下层组织，但只不过说说而已，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党的下层组织在地方上只停留在书面上。党的领导机构认为党的下层组织不起任何作用。但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起作用？如果宣布实行选举，那怎么办？由谁在科洛日瓦尔、奥劳德②、瑙杰瓦劳德、佩特罗尚、毛罗什瓦沙尔海伊和其他地方组织选举斗争呢？"

聚会的工人们同意他的看法。有人提议这么做，有人提议那样干，但更多的只是发泄不满，除了建议"应该再次提请党的领导机构注意这种不应存在的局面"以外，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别无他法，大家便谴责起《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来，说它对贿赂行为揭露不力，连资产阶级左翼报纸，甚至连《朝日》、《晚报》

---

① 布钦盖尔·毛诺(1875—1953)，当时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央书记。——译者

② 今罗马尼亚的阿拉德。下面的几个城市也都在如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这样的无聊报刊都比《人民之声报》走在前面。

在同资产阶级反对党建立竞选联盟方面，库恩·贝拉认为社会民主党已倒退到使加拉米① 满意的地步。看来库恩·贝拉对这一点最感到气愤。在加拉米看来，联盟是有益的，谁批评这种合作谁就会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危害。“活见鬼!”（这是库恩·贝拉常用的口头语），他高声嚷道：“这种合作是危险的，因为并不是他们投入到斗争中来接受我们的要求，而是党和工会的领导要适应伯爵们和瓦若尼② 之流的资产阶级策略的需要，做他们的应声虫。长此以往，我们慢慢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性质”。

蒂萨·伊斯特万之流新的选举法草案在工人们看来是对普选权的嘲弄。因为根据这个草案，只有三十岁以上、有文化和在一个地方居住多年的工人才有选举权，而且还必须是技术工人才行。

连续几周，这是在我家聚会的科洛日瓦尔工人的议论中心。当时的气氛总充满火药味。有时库恩·贝拉对我说：

“有什么吃的吗？端一点来……同志们，增加一点物质基础!……”说完就哈哈大笑。只有这时气氛才缓和下来。

有一次工人们离开之后，我问他：“应该怎么办？”

库恩·贝拉看着我，神情忧郁地说：“这几个月我也在思考这件事……”说着，他低声吹起口哨。每当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说，他总是这样。

---

① 加拉米·埃尔诺（1876—1935），二十世纪初至1919年曾是匈牙利社会民主运动最有威望的领导人物，《人民之声报》主编。苏维埃时期在瑞士躲避，反革命上台后回国。——译者

② 瓦若尼·维尔莫什（1868—1926），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译者

工人们不止一次地抱怨说，党的领导人脱离他们，住在首都，不到外地来，对存在的问题只是一知半解。

意见得到反应，举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讲座。除当地人以外，主持讲座的还有从布达佩斯下到科洛日瓦尔的人士。我记得孔菲·日格蒙德①、加尔巴伊·山多尔② 和基什·阿道夫③ 都曾经前来发表过演说。工人们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们的讲话，讲话结束后把他们团团围住，诚恳地表示自己的看法，陈述不同意见，建议如何才能使问题更好地得到解决。这个时期物价飞涨，罢工运动已经提上日程，政治性的示威接连发生。局势很不安定。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后来所发生的事。

……1914 年 6 月底的一天，我们刚吃完午饭，和我们同住在一个楼里的哥哥突然来敲我们的门，他神色紧张地说，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亚遇刺身死。

我叫醒熟睡中的库恩·贝拉。他睡眼惺忪地问："出了什么事？"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说："死就死吧！"然后闭上眼，翻过身去想接着睡。但是过了不一会，他翻身坐了起来，让我把消息再重复一下。然后，他跳下床，穿好衣服，一边说："要打仗了！"一边走出家门。

直到晚上他才回来，向我讲述弗朗茨·斐迪南被刺杀的原因和可能将要发生的事。他又提到婚前对我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会有分离的时候，因为事实上会出现这种情况……"

---

① 孔菲·日格蒙德(1879—1929)，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派首领之一，《人民之声报》副主编。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教育人民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译者

② 加尔巴伊·山多尔(1879—1947)，社会民主党中派领导人，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共和国失败后任派德尔工会政府的教育部长。——译者

③ 基什·阿道夫(1867—1938)当时是《人民之声报》副主编。——译者

在待嫁期间，对这句话我没有多想，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这种“情况”竟然这样快地出现。

大战爆发了。他在入伍之前写出《马克思与战争》一文。这部手稿现在已经遗失（也许什么时候还会被发现）。

第七章　战争—战俘生活……

弗朗茨·斐迪南被刺杀和随之而来的宣战，在最初几天几乎使每个人都大为吃惊。对于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同阶层的人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态度。

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战争感到喜悦。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将要成倍地增加。他们也不必担心自己和亲属会被征入伍，万一轮到头上，也可以设法到后勤部门或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服役。

职业军官们喜形于色，急切地盼望着在战争中迅速晋升。他们确信这场战争只能以奥匈帝国及其盟国的胜利而告终。他们命令士兵们到街头去唱战斗进行曲和讽刺歌曲（“你等着，你等着，塞尔维亚狗”）。职业军官们的家属围挤在军官们乘坐的披红挂绿的军列两侧。那些军官在头等车厢，从窗口微笑着接受人们的欢呼。特别是在战争初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景。

库恩·贝拉在为期数月的士官训练班里结业以后，立刻被送上前线。我忧愁满怀地为出征的队伍送行。“别为我担心！”库恩·贝拉在告别时留下这句话，然后跳上列车。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多大意义。“照顾好您自己、孩子和我父母！”他又隔着车窗嚷道。过一会他又托带队的科尔曼迪大尉下车，向我说几句劝慰的话，以便使我打起精神。（他向来不喜欢周围的人愁眉苦脸。如果有的同志因为工作上不顺心

而垂头丧气，他会责备说："有什么可懊丧的？快算了吧，我不愿意看见你们这副样子！"遇到我发愁的时候，他只是以指责的目光看着我。）

被初期的胜利激发出来的和在欢送头几批军列上前线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很快就开始低落了下来。第一批伤亡人数传到了后方，尽管官方极力缩小伤亡人数，但是后来的军列出征时，从人们的情绪上已经可以感觉到战争的恐怖了。鲜花、军乐、欢呼和掌声都大大减少，这时的人们还不大敢于用其他方式表达不满与失望。谁要是不想受军法惩处，他就得把自己的感情掩饰起来。

数十万工人、农民被送上战场，他们的家庭得不到照顾，军属补助金一部分被贪污，在农村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但人们还不能有怨言，否则会受到威吓和被说成是"流氓社会主义者"。在军队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首先被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区去。

在库恩·贝拉应征时，征兵的大尉（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名叫科瓦奇）笑着对他的熟人说："且看这位库恩·贝拉以后还有没有兴致妖言惑众！"……库恩·贝拉在受训期间，到埃涅德看望过我两三次，当时我正住在父母家里。我问他在部队里表现怎样。他回答说："我服从纪律就是了。可别让某些狐假虎威的小中尉当众找茬，引出麻烦来。进行个人反抗，盲目闹无政府主义，没有任何意义。"

库恩·贝拉是作为士官学校毕业的上士走上战场的。他从战场上寄回许多封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参战士兵遭受的各种苦难。他很少讲述自己的情况，也不怨天忧人，相反却夸耀把在战壕里的住处布置得多么舒适，甚至墙上还挂有照片等等。（可惜，这些信件与后来从战俘营寄回的那些信件一起都丢失

了。）

1916 年他被俄国人俘获，当年与托木斯克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证明他加入托木斯克党组织的登记表暂时尚未找到。不过，有一份 1921 年 7 月 1 日填写的党员登记表目前存放在十月革命档案馆（莫斯科）。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栏目：

“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登记管理局

党证号码：232.811

姓　　氏：库恩

名　　字：贝拉

出 生 年：1886 年

民　　族：匈牙利族

本 族 语：匈牙利语

还能用何种语言写、读：俄语、德语

熟悉苏俄哪些地区：莫斯科、彼得堡、西伯利亚、乌克兰、克里米亚。

出　　身：平民

主要工作：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前从事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

专　　业：律师

曾在何种军队中服役：奥匈帝国军队、1918 年在乌拉尔地区、1920年在乌克兰地区的赤卫队、红军，曾任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有过何种军衔：开始时当列兵。

经哪个党组织吸收加入俄共（布尔什维克）：1916 年 6 月以前由托木斯克党组织吸收入党。

是否参加过其他党派：1902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作为党的创始人）；参加过奥地利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

曾否因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受过。

截止1917年曾从事过党的什么工作：1917年3月至10月在托木斯克从事宣传和写作，任市党委委员；1917年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记者和《社会革命报》① 编辑；1918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后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德国曾任共产国际代表……”

自从匈牙利报纸也在头版以粗黑体字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沙皇逊位”、“和平即将到来”，直到后来刊登列宁等人掌握了政权并建议停火三个月，接着又建议实现和平，科洛日瓦尔人也越来越多地谈论俄国革命。大家的看法也越来越对立。我们第一次是在报上看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名称，第一次听说了“苏维埃”这个词的。不过，基本上谁也弄不准它的真正含意，特别是不知道它将来会怎样。至少我所生活的那个阶层里的人是这样的。

大部分人议论说，——这方面他们的看法是相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些人称之为“无政府主义”）对“同盟国”大有好处。俄国将从同我们交战国家的行列中退出去，“同盟国”的胜利现在已成定局。

他们认为我们还会得到新的领土。德国与奥匈帝国将分别

---

① 生活在俄国的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匈牙利战俘的报纸，1918年和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译者

从波兰和乌克兰各割过一块土地来。匈牙利也将“对领土进行调整”，从罗马尼亚得到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布达佩斯的一家极端沙文主义的报纸，甚至刊登地图以资说明）这样，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三年前“战争万岁”的口号已被“和平万岁”的口号所取代。

不过，也有一两件事情使科洛日瓦尔的资产阶级担忧。

报纸同时也报道说，俄国的土地已归人民所有，对银行实行了国有化，工厂里实行工人监督，房屋属于居住者所有，新闻和出版由国家管理等等……

科洛日瓦尔的先生们对于这些并不大喜欢，但是他们却说：“随他们的便好了，让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发展下去吧，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以获得新的领土来结束这场战争。”

工人们的想法则不同。

1917 年 12 月 布达佩斯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之后，1918 年 1 月 12 日 在欧兹德也发生了示威。欧兹德群众召开过大会的那个广场被命名为“列宁广场”。（在匈牙利，这是第一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甚至在全世界，当时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在那里钉上纪念牌才好。）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库恩·贝拉作为战俘第一次到了托木斯克。

1917 年托木斯克可能有八万人口。有不少政治流放者，不用说，他们对该城的工人运动有着巨大影响。

在库恩·贝拉到达托木斯克战俘营之前，已经有一个小组在那里同反动军官展开斗争，不服从战俘营纪律的管束。其中

有明尼赫·费伦茨①、亚罗什·贝拉、赖伊奈尔·卡罗伊、保夫利克·盖扎、劳比诺维奇·尤若夫② 舍伊德勒·埃尔诺③ 等。他们在战俘中进行宣传鼓动，反对奥匈帝国和战争。库恩·贝拉去了之后，这项工作得到加强，特别是得以扩大。

明尼赫·费伦茨曾经写道："库恩·贝拉的到来，将小组活动明确地引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小组同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且第一次接触到列宁的几篇著作。库恩·贝拉已经思索了十年的许多问题得到了答案。"

（库恩·贝拉与明尼赫·费伦茨这时建立起友谊。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友谊进一步加深。他们后来几乎是同时返回匈牙利的。从建党开始直到整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和在这一斗争失败后流亡生活的艰苦岁月里，他们相互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政治上的联系。库恩·贝拉之所以喜欢"费里"④——我们全家都这样称呼他——不仅仅是因为明尼赫·费伦茨一贯兴致勃勃、充满了乐观主义，与库恩·贝拉的性格如出一辙，更主要的是因为明尼赫在后来二十年代初的政治斗争中也一直是库恩·贝拉可以信赖的勇敢、有原则性的同志和朋友。

明尼赫在返回到匈牙利的当天，立即去找库恩·贝拉。库

---

① 明尼赫·费伦茨（1886—1967），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曾任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内务部长、第一副总理、总理等职。1965年退休。——译者

② 劳比诺维奇·尤若夫（1884—1940），匈共创始人之一。匈共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后任党中央书记。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去苏联。——译者

③ 舍伊德勒·埃尔诺（1886—1940），匈共创始人之一。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布达佩斯红色警卫队负责人之一。苏维埃失败后在苏联经济部门工作。——译者

④ 费里是费伦茨的昵称。——译者

恩·贝拉把明尼赫介绍给我时是这样说的:“这是我的朋友明尼赫·费里。我们一起在战俘里没少给反动军官们找麻烦。国内战争期间我们也是在一起干的。”)

从工人运动老战士凯莱曼·安多尔撰写的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库恩·贝拉在托木斯克战俘营里开展活动的某些片断。

“……库恩·贝拉当时已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到来,他的活动以及他的坚定性,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将反战小组的活动引上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库恩·贝拉精力充沛，极其刻苦，很好地利用了战俘营提供的自由时间和其他条件。

“他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后,得到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把时间都花在阅读最重要的经济、政治著作上。他喜欢躺在他的‘包厢’里的床上看书。当他钻进书本以后,特别是在他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大部头的时候,如果有人去和他聊天或是议论某甲长某乙短,他是不愿理睬的,有时干脆把不速之客赶走。同‘包厢’的西拉吉·伊姆雷可亲、沉静而温和,对于库恩·贝拉来说,是个理想的同伴。西拉基想尽一切办法，使他尊敬的朋友贝拉的宝贵时间不至于被糟踏。

“库恩·贝拉除深入地钻研书本以外，喜欢同人辩论，有时还开开玩笑。每逢这种时候,同志们都聚集到他的‘包厢’里,热烈的政治辩论往往进行到深夜。这种辩论不止一次地跨出‘包厢’的范围，移到宽敞和热闹的营房走廊以及火炉周围进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都投入到思想活跃的讨论中去。库恩·贝拉多次受到我们这个营房里的反对派(宪兵大尉、地主子弟和一位‘民主派’的伯爵等人)的围攻。这些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对日常发生的政治事件格外感兴

趣。

“……从 1917 年春天开始，库恩·贝拉已经定期发表公开演说传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了。他在战俘营里的威望越来越高。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对于那些同情革命和拥护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人也更加仇恨，并且加紧对他们进行暗算。

“我记得库恩·贝拉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有一次曾经这样评价列宁：‘他是个无比勇敢和大胆的革命者！世界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堪与比拟的领袖人物……’”

1917 年 4 月 12 日，托木斯克报纸《新生活》刊登了“一位身为战俘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来信”。

让我们从这封信中摘引几段：

“……也许，人类的灾星——世界大战削弱了国际大团结，但是它无法灭绝这种团结。

作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埃尔代伊委员会的委员和无产阶级的积极战士（环境使我来到了托木斯克），我向您和胜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致敬，我以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我以愉快和羡慕的心情欣赏革命所取得的令人振奋的奇异成果，并且激动地等待着我们可以一起从事解放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事业的那一天到来；社会民主将完成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会把解放全世界的伟大事业推向胜利。

“我利用假日写信，向您——托木斯克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主席同志和俄国同志们表示问候。

“如果能够当面向您或某位不太忙的同志在新的市医院里致以问候，我会感到无比喜悦（我正在这里治病）。国际社会民

主万岁！革命万岁！

致以

社会民主党人的问候！

科洛日瓦尔（匈牙利）工人保险协会

基金会主席，目前的战俘军官

库恩·贝拉”

据我们所知，这是国际主义者库恩·贝拉第一次公开地向俄国革命致意。

此后，他可能与托木斯克的布尔什维克们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1917年的二月革命胜利以后，这些布尔什维克从地下活动转入公开，找到了与托木斯克战俘营里的国际主义者们——库恩·贝拉小组联合的途径。弗·姆·克利波夫曾经写道：“匈牙利的战俘们坚定地想要帮助俄国的革命。”

然而不管决心有多大，在行动上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因为战俘营是在铁丝网的包围之中。

库恩·贝拉向托木斯克当局提出要求准许他从战俘营搬到城里的私人寓所去居住。

“关于被俘军官库恩·贝拉向托木斯克临时委员会申请迁入私人寓所一事，兹决定：

1. 该被俘军官没有这样的权利。

2. 库恩·贝拉因触犯禁令，直接向委员会递交申请，……将受到惩处……”

当局的简单答复没有使库恩·贝拉退缩，而是使他感到愤怒，甚至促使他采取行动。

与西比尔采娃同志一起介绍库恩·贝拉加入列宁的党的沃

斯特罗季娜·康科尔季娅·斯捷潘诺夫娜在她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

“卡尔·卡洛维奇·安松受托木斯克党委会的委托，同二月革命后仍在战俘营里的匈牙利国际主义战士们保持着联系。有一天他把匈牙利同志们带到市党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库恩·贝拉。他穿着短大衣和军靴，打着绑腿。脸色苍白，长期在战俘营里的人都这样。他当时俄语还说得不好。市党委一位同志的妻子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西比尔采娃会讲德语，由她给我们当翻译。

“后来库恩·贝拉不仅天天都到市党委来，而且要求我们委派给他工作。我们把他当作匈牙利国际主义战士的政治领导人来看待。他还愿意在市党委会里帮忙做事。我记得他认真地整理了市委的小图书馆和热情地去散发布尔什维克的报纸。”

沃斯特罗季娜和西比尔采娃等同志对库恩·贝拉马克思主义的造诣，以及在革命的环境下群众工作的要领和国际共运问题的了解程度深为惊讶。

康科尔季娅·沃斯特罗季娜说：“有一次库恩·贝拉同塔吉亚娜一起来找我，要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当时吃了一惊。后来我们二人在他志愿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申请书上签了字。我们知道他是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富有经验的革命者，曾积极参加过共产党的工作，这样的人自然应该是党员。但是……居然由我和西比尔采娃这样两个如此年轻和阅历不多的人介绍他这位久经考验的战士入了党……

“……西伯利亚的严寒使我们这位匈牙利朋友吃了苦。他身上只有一件轻飘飘的大衣，脚上穿着一双旧皮靴，准备就这样过冬。我与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倾市党委小互助会的存款，给他买

了一双毡靴。库恩在托木斯克市场上有生以来第一次试穿毡靴的情景令人感动，同时也有点滑稽。他高兴得就象孩子一样。”

1917年4月22日，《新生活》报刊登了库恩·贝拉表示坚信俄国无产阶级必将胜利的文章，他写道：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向受苦受难的人类奉献过比这更宝贵、更美好的礼物。俄国革命喝令停止那种令人发指的杀戮。遮住欧洲人民视线的腥风恶雨从此开始消散。

“我以前曾在远离俄国同志们的地方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却又同他们一起呼吸产生伟大的社会民主思想的西方的空气。但我只是在新的、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光辉下才懂得：‘光明来自东方’。

“当一个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直接受到革命清风的吹拂，他的感情是难以描述的。我们总是深深地热爱着革命的俄国无产者，我们的许多良师来自俄国无产阶级战士的队伍。虽然当我首次听到关于革命的消息时，我对俄国的状况尚不了解，内心也不免产生过忧虑和怀疑。

“马克思主义者象化学家一样，总是力图对一切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我曾经探索粉碎沙皇专制的那种力量何在。无疑，这种力量主要来自无产阶级。但是我又怕这仅仅只是一次爆发，就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部谈俄国农民问题的著作中所谈的那样，各国人民的生活中都可能出现那种爆发。

“作为一个求知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还有疑惑，但是我却已感到眼前的这一切并不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暂时表现，而是工人阶级业已强有力地控制着一切。从工人的报纸以及从日益完善的组织工作来看，我认为这已经发生的事绝不是一场戏剧，也不是某种必将带来失望的冲动，而是一场真正的、标志着无产阶级

特性的革命。”

不久，库恩·贝拉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地区的领导机构。这个期间，他在《革命旗帜报》和《西伯利亚工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批文章。

不久之后，十月革命发生前刮起的暴风将一直被囚禁在铁丝网里面的战俘们解救了出来。

匈牙利工人运动的优秀战士劳比诺维奇·尤若夫这样回忆那段日子：

“……我们在无法描述的喜悦与欢乐中搬进城里去住。军官们在沉默中怀着仇恨的心情注视着这次迁居。他们猜测事情的背后大有文章。军官们在记事册上写道：‘一群叛国者未经上校先生许可擅自迁入城内。’

“上校先生无可奈何，只愤愤地说：‘回国以后再算账！’

“我们回答道：‘回国后我们要算你们的账！’然后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跟在运送‘家具’和‘炊具’的车子后边上路了。

“我们住在布尔瓦尔纳雅街的一个清静的别墅里，共有三间房子。里面住有九名军官，他们的名字是：库恩·贝拉、亚罗什·贝拉、赖伊奈尔·卡罗伊、西拉吉·伊姆雷、明尼赫·费伦茨、舍伊德勒·埃尔诺、高尔迪·久洛、考夫曼·阿尔明和沃尔芬盖尔。住在那里的士兵只有两个：我和托洛茨考伊……

“……新的生活赋予我们新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信心百倍，精神十足。

“库恩同志从大学图书馆借来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书，我们一个个地传阅。他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读彼得堡和莫斯科报纸上刊登的最重要的消息。”

劳比诺维奇同志接着写道，他们同在托木斯克城里工作的

其他战俘建立了联系，组织了第一次聚会并且决定把这种聚会制度化。他还谈到其他国籍的战俘也参加了聚会。这些聚会都是在俄国党的省委机关里举行的。

“……到党的机关去办事的俄国同志总要把会议室的门推开，站在门口听听、看看。他们直摇头，因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党的书记是个短发、戴夹鼻镜的女同志，是位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她走出来叫那些俄国同志安静一点。

“‘里边是些什么人？’一位上年纪的人问道，他看上去与其说象个工人不如说更象个农民。女书记笑嘻嘻地、一字一句地小声说：

“‘他们是匈牙利人，战俘。他们也在准备进行革命，回国以后就会干起来。’

“那位老年人看了又看，然后毫无把握地慢慢问：

“‘他们也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还不都是，但迟早都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就在我们这里’女书记回答说。

“‘那你指给我看看哪个人是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老人说着，从语气上看似乎他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神话故事。

“‘喏，走过来的那个人就是他们的领导！’年轻的女书记笑着说，把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的库恩·贝拉指给他看。

“老农民走到库恩·贝拉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你真是奥地利人吗（当时俄国人通常把匈牙利人也称作奥地利人）？’

“‘是的。’库恩回答说。

“‘你是布尔什维克？’老人接着问。

“‘是的，布尔什维克。’

“‘他们也是?’老人指着会议室里的人问。

“‘他们也是’库恩说。

“‘你们回家以后也闹革命?’他盯着库恩·贝拉一个劲儿地问。

“‘闹革命，肯定无疑!’

“‘那么你把这个带给奥地利弟兄们!’他用力地亲吻了库恩·贝拉的两颊。

“在场的俄国同志们都高声大笑，并且向老人鼓掌。库恩挽着老人的手，把他带进会议室……”①

1917年底，库恩·贝拉到了彼得堡，亲自见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列宁思想的培育下，他的革命世界观最终地形成了。

从此，他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报纸《真理报》的专职工作人员，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除谈论俄国革命、国际运动和战俘运动以外，主要论述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问题，研究卷入了世界大战的匈牙利。他向哈布斯堡王朝开火，抨击匈牙利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他在彼得堡欢呼匈牙利建立第一批工人委员会，在莫斯科欢呼佩奇士兵起义。库恩·贝拉先后编了《国际社会主义者报》和《社会主义革命报》，在前线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和在俄国生活的匈牙利战俘当中传播和平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他还协助德文报纸《火炬》的出版工作。

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他第一个号召匈牙利劳动人民和士兵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榜样，掉转枪口对准压迫者；是他号召工人占领工厂，号召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号召全体匈牙利人民拿起武器结束战争。库恩·贝拉1918年1月26日在《真

① 《镰刀与锤子》，1930年第4—5期。

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此，无产者的口号很快将不仅是'第三国际万岁'，而是'国际苏维埃政权万岁！①'"他还曾经写道："社会党叛徒们的一切旨在避免发生革命的挣扎都将是枉费心机。"②

库恩·贝拉在一篇题为《奔萨纪念碑》的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革命当中产生的，它成为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指南。""由于无产阶级专政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将不会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那样成为半官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革命的理论，就象马克思本人也不仅仅是个理论家，而是一贯为无产阶级的胜利顽强斗争的革命战士一样。

"革命的阶级永远不会堕入个人迷信的罪恶之渊。"③

1918年，库恩·贝拉编写了《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土地属于谁？》、《战争给谁造成负担？》、《苏维埃共和国是什么样的？》等几本小册子。

他的这些著作对到了俄国的数以十万计的匈牙利及其他国家的战俘，对匈牙利的工农群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在邻近莫洛杰奇诺战线和其他战线的城市都驻有"洗脑队"，由于库恩·贝拉组织运送，匈牙利的工农还是读到了这些小册子。这些著作间接地也发生了影响：回到匈牙利的那些"被洗过脑"的战俘，讲述和传播了印在他们头脑里的小册子上的思想和关于无产阶级及农民革命的道理。

---

① 《匈牙利的工人苏维埃》，载1918年1月26日《真理报》。

② 《匈牙利革命之诞生》，载1918年7月24日《真理报》。

③ 《奔萨纪念碑》，载1918年4月28日《真理报》。

早在1917年，我就猜测库恩·贝拉已积极地参加了战俘运动。我的学生先后以种种借口离开了我。俄国二月革命发生以后，许多战俘逃跑回国。他们对于战俘营里的生活作了各式各样的描述。军官们咒骂那些支持俄国革命的匈牙利人，说他们是叛国者。普通人则同情自己的这些同胞。1917年11月以后回国的战俘都被送进“洗脑营”，每个人都填写长达数页的调查表。

我还记得一位名叫格勒格·贝拉的熟人，他从“洗脑营”被放出后径直来找我，让我看他们回国后填写的那种表格。表格里的询问项目中多处出现库恩·贝拉的名字，调查他如何参加俄国革命和如何对待奥匈帝国军官的情况。

在科洛日瓦尔的其他熟人也来找过我，其中有的人并未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他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俄国发生的革命变革和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们确信，匈牙利的资产阶级社会也已风雨飘摇，这里似乎也应该发生点什么事情。

我的处境很艰难。学生纷纷离开了我，这还是小事，难忍的是我每次上街没有听不到熟人讲“好话”的时候。有个亲戚对我说：“可怜的人！库恩·贝拉尽干了些什么？难道他就不想想自己还有家室吗？别人都说他是叛国者，回国之后要被绞死。那时你可怎么好？”“难道库恩·贝拉疯了吗？”另外一些人这样问。他们说：“他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组织战俘们支持革命和保卫俄国革命。”有的熟人甚至不敢同我一起在街上走。他们说：“你丈夫参加了俄国革命，出卖了祖国”。有个人曾告诉我，他在火车上听到两个军官扬言：不把库恩·贝拉的脑袋拧下来带回国，他们誓不罢休。我听了关于库恩·贝拉的这类谈话，心情可想而知。

对于宣扬革命的库恩·贝拉，他们怎么能不恨之入骨呢？了

解了库恩·贝拉的主张，就对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这些著述我当然是后来才读到的：

“……为了进行帝国主义强加给自己的新的斗争，无产阶级需要有新的武器、新的斗争方式和新的组合。不能仍然采用旧的手段、旧的斗争方式，而要使一切符合无产阶级新的需要。

“无产阶级这种新的组合是建立共产党。它要采用的手段是总罢工和工农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斗争方式是革命和内战。它的目的是立刻进行国际性的社会革命、组织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压迫有产阶级和消除阶级差别引导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①

“……这样，作为享有特权的立法者——官吏和法官们的统治将被取缔……一切官职都要通过选举确定担任者。所有的官员随时都可以被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薪金……”②

“……无产阶级国有化不仅是指根据统一规定进行生产和合并工厂，而且也包括没收归资本家所有的工厂、作坊、铁路和航运公司……一切银行和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工人国家所有。由无产阶级的国家来组织和控制消费是第三大任务……”③

“……我们应该立即跨上革命的道路，跨上‘摧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的社会革命的道路。

“……走夺取土地的革命道路！”④

---

① 库恩·贝拉：《共产党人要干什么？》，载《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科苏特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7 页。

②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 64 页。

③ 同上书第 68—69 页。

④ 库恩·贝拉：《土地归谁所有？》，1918 年 5 月载《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 79 页。

"……应该利用本来交给我们用于去压迫、管制我们的弟兄和掠夺我们的土地的那些武器，去争取自身的解放……"①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将要取得政权……

"……同志们，我们回国去！回匈牙利去！到国内重新相见，联合在一起！"②

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对于库恩·贝拉、成千上万的战俘、匈牙利国际主义战士、国内的受到新思想熏陶的数百万工农群众和社会主义革命，确实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说他们不可能消灭自己的特权地位赖以存在的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的话，那么他们却想方设法干掉劳动群众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共产党人，首先是库恩·贝拉。

至于库恩·贝拉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1918年做了些什么？我几乎没有听到他本人提起过。他不愿意谈论自己，特别是不愿谈论自己的"作为"。如果他偶尔还是谈了自己，那也只是因为谈别的人或别的事的时候顺便提及，不过往往是语焉不详。幸亏别人对库恩·贝拉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不足。

关于1918年库恩·贝拉在莫斯科时的情况，我首先引用科瓦奇·亚诺什③的《回忆录》加以介绍：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82页。

② 库恩·贝拉：《筹建匈牙利共产党》，1918年11月4日，同上书第134页。

③ 科瓦奇·亚诺什上前线时还是个年轻的农民，后来在库乔莫沃战俘营（莫斯科）里认识了库恩·贝拉。他对库恩·贝拉景仰备至，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一直追随着库恩·贝拉。1919年，他在蒂萨河前线负伤，失去一条腿。革命失败后，我再未得知他的音讯。1959年庆祝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四十周年时，我才知道基什科瓦奇（我们大家当年这样亲切称呼他）还活着，他作为老战士从拜赖格萨斯（即苏联乌克兰的别烈戈沃）赶来参加庆祝活动。

“……在莫斯科正值寒冬。成千上万的战俘聚集在库乔莫沃战俘营里……1918年3月第一周的一天上午，一个穿便装的匈牙利人来到我们住处。他似乎全不理会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酷寒，足登浅腰皮鞋，身穿薄薄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宽檐帽。他不寻常的上等人模样立刻吸引了大家，我们把他团团围住，问他“是不是要把我们送回家”。他说，“同志们！谁这时候回去，马上就会重新赶到意大利前线去”。听到“同志”这个称呼还有意大利前线这个名词，大家都不出声了。

“……二十三号木板棚来了个生人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棚子里挤满了人，我被挤到床铺之间的夹缝里。

“这时有人喊道：

“‘同志们！同志们！地上没处站的人可以上床！’

“如果让别的棚里的人上床，东西很容易丢失。所以，大家都纷纷爬上自己的床，让别的棚里的人留在地上。

“当大家安静下来时，有人宣布‘库恩·贝拉同志将给大家讲俄国革命的意义和我们大家的责任……’

“我们这才知道那个穿便服的匈牙利人是谁。不过那种说法很奇怪，什么责任不责任的?!有人开始小声嘀咕，但是库恩·贝拉热情、宏亮的声音压过了嘈杂声……他谈到富人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如今还在如何剥削劳动人民。我对这些话不大感兴趣。不过当他说到俄国把土地从老爷们手里夺走了，对于这一点我倒很赞成……

“最后，我同五十七个伙伴一起参加了赤卫队。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库恩同志计划让我们武装起来以后返回匈牙利。老爷们肯定要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土地，为了战胜他们就得有武装力量……”

关于1918年这段时间，恐怕要算吉斯特尔·帕尔① 记得最有意思，也最忠实：

“……革命政府于1918年2月中旬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外国同志就这样地与列宁同志领导的政府聚集到一起。

“库恩·贝拉同志到莫斯科之后就来到赤卫队，他知道那里有大量的匈牙利战俘。扬奇克·费伦茨② 和该书作者（吉斯特尔·帕尔）在赤卫队队部接待了库恩同志。

“库恩同志向参加了革命的战俘发表了讲话，然后又与扬奇克同志和我个别谈话，其中提到我们将建立俄共（布尔什维克）匈牙利组。他还说我们将出版一份四版的匈牙利文报纸。当库恩同志知道我是印刷工时，立即委托我负责筹办这份报纸。库恩同志把两期1917年底在彼得格勒出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匈文报给我看，要求我办得超过这份报纸。因为印刷这份报的俄国排字工把许多句子都排错了，往往使人看不懂。

“1918年3月24日，我们成立起俄共（布尔什维克）匈牙利组。

“库恩同志到达莫斯科和拜访过赤卫队之后，以维护经济利益为主的争取战俘工作改变了方向，从而使大部分战俘都站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加入了红军，面对反革命分子和武装干涉军队的进攻拿起武器保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库恩·贝拉周围形成了一个信仰共产主

---

① 吉斯特尔·帕尔（1882—1970）印刷工人，俄共（布）匈牙利组成员。191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委员会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任布达佩斯一个区的苏维埃负责人。——译者

② 扬奇克·费伦茨（1882—1938），匈共创始人之一。苏维埃共和国时任首都工人赤卫队司令。共和国失败后被判死刑。1922年根据苏匈协议去苏联。——译者

义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每天都到德累斯顿旅馆①（即后来的《社会革命》编辑部）去找库恩同志。他向他们讲解俄共（布尔什维克）党史，谈论列宁同志在地下斗争时期、被流放和在瑞士流亡时期所度过的岁月以及在这些年代写的大量著作。他还给大家讲述布尔什维克党内历次重大转折。

“根据参加这些活动的人的愿望，库恩·贝拉在 1918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俄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匈牙利组成立大会。

“参加这次会的有：库恩·贝拉、萨穆埃里·蒂博尔②、波尔·埃尔诺③、扬奇克·费伦茨、吉斯特尔·帕尔、毛耶霍费尔（毛罗什）·卡罗伊、图班·阿尔帕德、基什考·维克托和其他一些人。

“会议由库恩·贝拉主持，波尔·埃尔诺记录。

“库恩·贝拉在报告中概括地介绍了俄共（布尔什维克）党史以及列宁同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孟什维克进行的重大斗争。当时需要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一方面在党内同孟什维克的妥协和阻挠斗争，另一方面同沙皇专制制度斗争。

“接着，库恩·贝拉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问题，即建立列宁同志的新型的党的问题。这个党教育党员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作为党员的基本条件是要学习、积极和对党忠诚。每个

---

① 莫斯科的一家旅馆。原在如今的苏维埃广场，后来被拆毁。1918 年时，战俘革命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这家旅馆。

② 萨穆埃里·蒂博尔（1890—1919），匈牙利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副军事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战时任后方委员会（镇反特别法庭）主席，红军指挥员。——译者

③ 波尔·埃尔诺（1888—1943），匈共成立后任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国际宣传部部长。——译者

党员都应该不断地学习，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是党员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每个党员都应该积极，因为这样汇集起来的力量才能实现党的最艰巨的任务。党不容忍消极的党员。对党忠诚才能使党具有强大的力量——团结。学习、积极和对党忠诚是所有党员的口号。最后……他还谈到，我们党的任务是在战俘中开展组织、教育和宣传工作。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我们要时刻想着‘在匈牙利创建强大的共产党’。

“投票之后，库恩·贝拉以宣布俄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匈牙利组成立而结束这次会议。组织建立以后决定发行一份名为《社会革命报》的匈牙利文报纸，以宣传共产主义。该报拟每周两期，每期四版。报纸的拼版工作由我吉斯特尔·帕尔担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我搜集到的那些铅字里，很少有匈牙利文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带点和撇的字母。经过两天的奔波和寻找，我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第一期《社会革命报》于1918年4月13日问世。这天早晨，莫斯科匈牙利组的全体领导人都集聚在印刷所。我们大家都与库恩、萨穆埃里两位同志一样，心情十分紧张。轮转印刷机终于转动了，我们以抑制不住的喜悦接过第一张匈牙利共产主义者的报纸。

“……俄共莫斯科匈牙利组的领导产生之后，立即决定举办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宣传员训练班。它通过报纸呼吁各战俘劳动点的负责人准许战俘们参加这个训练班。共有三十人报名，匈牙利组也获准为这三十人举办训练班。

“……1918年4月初，莫斯科匈牙利组和战俘委员会向全国各城市中的战俘负责人发出联合呼吁，要求他们派代表参加4月

13日至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在俄战俘大会’。据在莫斯科匈牙利组的会议上所听取的报告，有几百名代表受五、六十万战俘的委托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们从两、三千公里以外，甚至从西伯利亚赶到莫斯科。

“参加大会的人当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托曼，还有劳比诺维奇·尤若夫、毛伊泰尼、弗赖伊斯塔德、霍奇费尔戴尔，听到莫斯科匈牙利组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大会代表从顿河煤矿赶到莫斯科的万图什·卡罗伊、① 来自萨拉托夫的铁匠霍蒂和来自西伯利亚的马尔库什等人。

“库恩·贝拉同志十分高兴地见到万图什·卡罗伊同志，并且委托他领导刚刚开始举办的宣传员训练班。库恩在瑙杰瓦劳德任党的书记时就认识万图什，并且知道他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就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解救了被虏到俄国的数百万名战俘。在1918年2月、3月和4月，他们的组织活动在全国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莫斯科匈牙利组的成员们与莫斯科人民一起，庆祝了1918年5月1日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性的伟大节日。

“在莫斯科匈牙利组1918年5月1日举行的成员大会上，库恩·贝拉同志作每月一次的工作报告时说，有人几经辗转，把一封信从匈牙利带到莫斯科，交给了匈牙利组。匈牙利国内秘密的反战运动和左派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在信中向莫斯科匈牙利组的成员表示祝贺，并且答应在短时间内与在莫斯科的团体

---

① 万图什·卡罗伊(1879—1927)，匈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匈社会民主党书记，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农业人民委员。1922年去苏联。——译者

取得联系。库恩同志认为，这封信是萨波·埃尔文① 同志领导的地下运动写来的。

“我们在会上十分兴奋和欢欣鼓舞地听到库恩·贝拉同志宣布的这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意味着在匈牙利国内也已经有了左派社会主义运动，还因为我们得知萨波·埃尔文同志的一伙人尽是大学生，我们感到他们所从事的地下革命工作非常重要。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的伽利略俱乐部早在我们之前很久就已开展活动。至于萨波·埃尔文同志，所有的共产党人则都知道他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莫斯科匈牙利组的党的生活是和谐的。我们大家每天晚上聚集在一个小饭厅，在吃简单的晚餐的同时，由库恩同志讲述最新的世界政治新闻和介绍在居住在莫斯科的匈牙利人当中开展活动的计划，还经常就此征求大家的意见。他也常常谈论列宁严谨的生活，把这个在个人生活方面十分俭朴的人树为我们的榜样。后来我们人多了，每次召开成员大会，只要库恩同志没去前线，都由他来主持。他很希望他讲过话后每人都能诚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并且希望我们能展开争论。他曾多次说过，敢于争论是共产党人的特征。会议结束以后，他往往坐着不走，与大家同志式地聊天，讲述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些往事。我们都愿意听这种对大家颇有裨益的谈话。

“1918 年 7 月 6 日夜十二点，莫斯科匈牙利组负责人库恩·贝拉同志接到苏维埃政府的通知，要匈牙利组的成员、宣传员训练班学员和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工人小组（来自原奥匈帝

---

① 萨波·埃尔文(1879—1918)。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左派，匈牙利最早传播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他没有成为共产党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网。——译者

国的战俘）携带武器和弹药，尽速秘密开进克里姆林宫，与那里的一排立陶宛红军士兵会合。会合以后由匈牙利组一负责人指挥前去收复被举行暴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领的邮电总局大楼及其周围地区。

“在出发去执行任务时，我们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这支队伍的指挥员是库恩·贝拉同志，他把萨穆埃里·蒂博尔同志安排在自己身边。从克里姆林宫我们步行出发，沿路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在接近邮电总局大楼时，侦察兵报告：在这座巨大建筑物的对面停放着一辆装甲车，炮口对着大楼的门口。库恩和萨穆埃里同志与立陶宛红军排长略为商量了一阵，然后那个排长把七十八名红军士兵分成三队，从三个方向向装甲车发动袭击。几分钟之后，他们抓获了车上的人员，夺下装甲车，在邮电总局大楼里的暴动者还丝毫没有觉察，装甲车已经成为我们的防御武器。

“库恩·贝拉在收复邮电总局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参加战斗，一会出现在这里，一会出现在那里，一面鼓舞赤卫队员，自己也手持武器参加战斗。

“当战士们在清查邮电总局周围的街道和房屋时，一辆卡车开到总局大门台阶前面，车上下来一名高级军官。他不知道邮电总局已不是他们的了，依然命令车上的士兵把带来的两挺机枪和弹药卸下车。东西卸下，军官本人也就被我们俘虏。萨穆埃里同志让他交待自己的身分，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于是我们就动手搜查，搜出镀镍手枪一支，交给了萨穆埃里同志，两挺机枪和弹药也由我们扣留，我们把这个军官押到库恩·贝拉那里，他正同两个苏联人处理事情。这个被俘的军官仍然不讲自己的身分，于是我们就把他连同两个士兵和汽车司机一起押送到赤卫队去。

“清除隐藏在邮电总局附近街道上和房屋里的暴动者的工作进行得很迅速。第二天，邮电总局大楼里已经完全平静。第三天，整个莫斯科都已恢复了秩序，就连暴动的老巢波克罗夫斯基兵营附近也是这样。”

……关于这个事件，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基什科瓦奇在他简短而提供了珍贵资料的文章中也有过回忆：

“……一个炎热夏天的晚上，库恩·贝拉同志很早就回到克里姆林宫。从他的表情来看，城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帽子扔在床上，但是没脱上衣。他告诉在场的同志们：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基什科瓦奇总是把社会革命党人称作孟什维克。——作者）表现恶劣，他们要求苏维埃政权继续与德国交战……库恩·贝拉接着说，当天下午他们杀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男爵，想让德国再度进攻苏维埃……库恩·贝拉说，学员们应该带着武器走出城堡……大家立即就这样做了，例如我就是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那里（莫斯科大剧院。——作者）去值勤的。……早晨别人去替我。我朝城堡走去……在波尔·埃尔诺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大约八十人向邮电总局的方向进发。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库恩·贝拉同志，他显得很疲倦。我们到了以后，他指示占领邮电总局。几分钟之后，我们接近了这座建筑，并且同由萨穆埃里同志率领的队伍会合。接着我们便收复了邮电总局。萨穆埃里同志当时呼唤‘跟我来！’的形象现在还呈现在我的面前。

“搜查过大楼之后，我们又接到库恩·贝拉同志的命令：‘到波克罗夫斯基兵营去！’因为那里还有孟什维克盘踞着。在这座兵营附近的一个工棚里，我们俘虏了一支二十七个人的小部队，

并且遵照萨穆埃里同志的指示把他们押送到克里姆林宫。我们交完俘虏，又回到库恩·贝拉同志那里。库恩·贝拉看到我，高声喊道：‘基什科瓦奇！您还活着？’

“‘您怎么这样问，库恩同志？’‘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看见您被子弹打中。当时我还对同志们说：‘可怜的基什科瓦奇！’

“……这天早晨，孟什维克在莫斯科街头散发了诽谤库恩同志的传单，说他是德国间谍。

“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亲眼见到库恩·贝拉同志是收复邮电总局整个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就传单问题，库恩同志没有和同志们多谈，他很快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说了声‘我必须在《真理报》上答复他们’就走了。”

吉斯特尔同志还写道：

“……1918年7月中旬左右，库恩·贝拉同志为宣传员训练班的三十一名学员举行结业式。学员们在两个月当中每天上九至十个小时的课，学习《共产党宣言》、各种社会形态、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历史和练习演讲。此外，他们还得到有关资本主义和世界商业地理方面的知识。

“在苏联的人民委员当中，有不少人是莫斯科匈牙利组的朋友。当然首先是指列宁同志，他不仅非常尊重，而且也非常喜爱库恩·贝拉同志。从而也表现出列宁对整个匈牙利组的尊重和喜爱。列宁认为，匈牙利组通过每周出版两期编辑得很好的印数为三至四万份的报纸、印发《革命文选》、组织和举办宣传员训练班、出版《共产主义丛书》和其他革命活动，为巩固和发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卓有成果的工作。”

1918年1月匈牙利大罢工被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破坏，库恩·贝拉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引用了弗兰克尔·列奥①的话："宁肯死在巴黎的战壕里，也不参加这些无聊者的运动……"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党里是待不下去了"，"建立新的党在匈牙利已是势在必行。"

这些勇敢而坚定的话标志着匈牙利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1918年2月16日，匈牙利内务部在一份气急败坏的通报中提到战俘问题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小册子。匈牙利内务部认为"这些人亲眼见到过俄国的革命勾当。他们不仅沾染了俄国的革命思想，也通晓俄国无产者用以实现其革命目标的那些破坏手段和办法。从而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谋反内容的宣传材料越过俄国前线被偷运进来……"

有组织的和自发的密探显然从1917年就开始活动。这些告密材料的大部分内容现在还不为人们所知，尚保存在我们无法接触的各类档案里。我们希望它们总有一天会公诸于世，可以从中了解有关库恩·贝拉革命历史的一切，其中包括了解国内外反动派针对着他的各种秘密指示。

有一份已被了解的密信是1918年4月23日写就的。它从俄国被传送到奥匈帝国的国防部。密信提请当局注意一个名叫库恩·贝拉的预备军官(上士)，原科洛日瓦尔的记者。

有一封1918年7月1日写的密信是一个名叫科尔布·里查德的军官发往帝国国防部的。这封密信特别提出库恩·贝拉。

---

① 弗兰克尔·列奥(1844—1896)，匈牙利人，国际工人运动和匈牙利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曾任巴黎公社劳工委员会领导人。——译者

告发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奥匈帝国的公民中开办“革命学校”。它还提到库恩·贝拉在托木斯克时就破坏纪律，鼓动战俘们采取暴力行动。

还有些密信被送到中立国家的使馆，发信者请这些使馆将他们的信件转交给奥匈帝国的军事当局。这些密信列举了那些参加赤卫队的战俘的姓名，并且记载了他们的确切情况和“罪行”。

一些回国的战俘先被关进凯涅尔迈泽① 集中营，然后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关于这方面，伯伊特什·山道尔是这样写的：

“第一天军事法庭就开始审讯。军事法官先生引用惩处条款，告诫我们从实交待与鄂木斯克组织活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有关的一切。他们特别提到利盖蒂②、福多尔③、劳比诺维奇和库恩·贝拉同志的名字。（连库恩·贝拉从未到过的地方也要查他的活动！——作者）他们强调说：‘你们当然认识他们，因为这些人组织你们参加共产党，让你们回国进行革命。’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周有三、四次把我们带到军事法庭。他们用各种威吓手段，想从我们嘴里掏出点什么情况：除你们之外还有谁被派回来？你们应该同谁取得联系？你们接受了什么任务？你们的职务是什么？还有谁被编入现在派回来的这个鄂木斯克小组？在鄂木斯克发生过红旗事件吗？经过如何？是谁打掉那个摘旗军官牙齿的？”

---

① 指今罗马尼亚的西博特和奥勒斯蒂之间的一块地方。——译者

② 利盖蒂·卡罗伊(1890—1919)，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当战俘时负责编辑鄂木斯克的匈文《革命报》。1918年为参加保卫鄂木斯克作战的匈牙利部队指挥员。被白军俘虏后杀害。——译者

③ 福多尔·久拉(1901—1975)，1948—1951曾任匈建筑部长。——译者

匈牙利内务部和警察局发出要干掉库恩·贝拉的秘密指示。接着，奥地利和德国的内务当局作了类似的秘密安排。协约国关于库恩·贝拉的秘密指示和秘密报告也是异曲同工①。

这样，匈牙利内务部长1918年2月28日指示有关部门仔细审查从俄国返回的伤残战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特别命令对沾染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战俘实行隔离，“整天清除他们头脑中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匈牙利一些地方城市发生混乱之际，在德布勒森的一个战俘集中营里……“战俘们大批地逃离……”② 也就不足为怪了。匈牙利国防部长发布命令，“对携枪逃跑的士兵可以无条件地和不加请示地立即正法”……由地方行政官和检察官提供的一份关于5月份在特伦钦③ 和佩奇发生兵变的报告说：“共有二千三百三十七名从俄国返回的军人参加了佩奇兵变。兵变的为首者是一些从后备役分配到作战连队去的人。作战连队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人是从俄国返回来的沾染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战俘……”

佩奇兵变之后成立了八个委员会，在头三天之内就公开处决了十二名士兵。秘密处死的人数及战死者的人数当然严加封锁，直到如今还无从知晓。

---

① 就目前而言，至少在匈牙利、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让历史学者研究这些文章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只有在收集到的文件和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有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的伪造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很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仅歪曲事实，而且隐瞒真相，对于内容丰富的档案文件不加整理。从而造成无法撰写各个革命阶段和之后一些年代的完整和真实的历史。

②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5卷第163页。

③ 现属捷克斯洛伐克。——译者

1918年4月13日至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战俘代表大会。共有四百人作为五十万名组织起来的战俘代表出席了大会。

《真理报》1918年4月16日报道：俄国工人和革命农民向大会致以祝贺后，库恩·贝拉以俄共(布)匈牙利组主席和《社会革命报》编辑的身分首先登上讲台。他是用匈牙利语发表讲话的。

库恩·贝拉说："你们要回到祖国去，在全国点燃熊熊烈火，把胆敢阻拦解放被压迫者的一切障碍统统打碎……你们要象多热·久尔吉当年那样在全国点燃熊熊烈火……不搞武装起义，你们将一事无成。（人们高呼，"革命万岁！"）

"同志们！"库恩·贝拉接着说："你们生活在这里，亲眼目睹了俄国革命，它表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自己的状况……

"回国后他们会对你们说祖国处于危亡，将把你们派往法国、意大利前线或巴尔干山区……你们去为谁而战？为祖国吗？……这个祖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祖国！……你们要调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和将军。你们要与宫廷势不两立，你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团队里都要成为革命的传播者。要向大家讲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人们：只有革命才能解救我们。"

他的建议被接受了，"……我们决心在自己的国家——在德国、在奥地利、在匈牙利、在保加利亚同政府展开革命斗争，举行武装起义。只要不推翻资本主义、军国主义，还没有在它们的废墟上建设起苏维埃自由共和国，我们就决不罢休……"①参加代

---

① 1918年4月16日《真理报》。

表大会的代表列队来到红场，向在十月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们敬献花圈。战俘乐队演奏《马赛曲》。

1918 年春天成立了直属俄共(布)中央领导的“外国人团体联合会”。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外国团体时说：

“我应当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成立第三国际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基础……这些团体中有数十个成员已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政治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如果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对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页。”①

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主席是库恩·贝拉。

库恩·贝拉不仅是联合会主席，而且由保存下来的文件可以证明他还是联合会的灵魂。

整理和发表库恩·贝拉在联合会，特别是在 1918 年所从事的卓越的活动并不是我的任务，这事应该让历史学家去做。以文件上的材料来诠释列宁 1918 年 3 月 18 日② 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并非我的任务。鉴于列宁这些话的重要性，我更详细地引用一遍：

“……这些团体中有数十个成员已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政治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从帝国主义者专为自己的私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136 页。

② 实际上是 1919 年 3 月 18 日，作者此处有误。——译者

利而建立起来的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就布满了这些国家。如果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对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页。”①

库恩·贝拉同列宁、马尔赫莱夫斯基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一起，签署了筹备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2月，他率领一支由国际主义战士组成的部队在纳尔瓦参加了对威胁彼得格勒的德军进行反击的战斗。2月23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苏联建军节。

在国内战争的每个战场，都印满了由库恩·贝拉及其伙伴组织起来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足迹。在布琼尼骑兵中，在土耳其斯坦、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畔，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远东游击队负责人谢尔盖·拉佐在谈到曾在他领导的远东部队中战斗过的国际主义战士时说：“这些国际主义者打仗很出色，其中大部分人是匈牙利人（占百分之八十五）。”③ 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匈牙利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库恩·贝拉领导下，于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参加了镇压社会革命党人发动的反革命的斗争，同年又参加了击溃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机枪排排长的库恩·贝拉曾在波瓦尔街（如今的沃罗夫斯基街）的房顶上用机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6页。

② 马尔赫莱夫斯基（1866—1925），波兰人，国际共运的杰出人物。——译者

③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5卷第120页。

枪向举行反苏维埃政权暴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扫射。

1918年秋天，他走上乌拉尔前线，在那里遇见老战友明尼赫·费伦茨。这两位匈牙利革命者共同与白军搏斗。

关于1918年11月的那些日子，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基什科瓦奇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10月里的一天（实际上是11月。——作者）下午我去设在德累斯顿旅馆的党的办公室，在街上看到许多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高声欢呼。当我走近群众，才发现列宁同志站在一个阳台上向群众讲话。他的话虽然多次被群众的欢呼声和掌声打断，但是仅凭我会的很少的那点俄语也可以听懂：昨天匈牙利发生了革命。由于我去得晚，前面讲的话没听到，还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列宁同志的讲话很快就结束了，然后由站在列宁身边的库恩·贝拉讲话。库恩同志嗓音宏亮……首先用俄文简短地讲了几句，然后用匈牙利语讲，因为到会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匈牙利人。那里还有正在营房受训的国际纵队的士兵，他们欢呼雀跃，兴奋之情无法用笔墨形容。‘小伙子们，回国去！’他们相互呼喊着‘推翻资产阶级！’‘问问库恩·贝拉，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走？’

“……从这以后，战俘们返回祖国的准备加快了。

“库恩·贝拉给那些不在莫斯科的负责同志发去电报，要他们赶回莫斯科，到匈牙利组办公室报到。

“……11月4日至5日，我们参加了党的会议。根据库恩·贝拉同志关于革命形势的讲话，与会者决定在布达佩斯创建匈牙利共产党……

“……1918年11月6日，库恩·贝拉与万图什·卡罗伊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告别了沐浴着红色光芒的莫斯科。

“……莫斯科的许多广场上正在放焰火。站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或透过大都会旅馆及许多建筑物的窗户，可以看到探照灯光交织地照射的莫斯科的夜空。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我和其他人把回国的同志们送到亚历山德罗夫火车站……

“与库恩同志的分别使我很激动，这不仅因为他要离开而我还留下，更主要的是我们第一次相互亲吻脸颊。

“……我是1919年1月10日离开莫斯科的，十天之后我在维谢格拉德街又见到库恩·贝拉。”

至于苏联同志与库恩·贝拉告别时寄托着什么样的希望以及库恩自己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上路的，下面的段落或许是最好的说明：

“……1918年在德国革命和奥匈革命爆发之前，我曾准备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取道维也纳回到匈牙利，目的在于创建匈牙利共产党。然而我首次登程没有成功，不得不从车站返回。一天以后（这里可能是印刷上的错误，应为一周以后。——作者），我穿过被占领的乌克兰进入奥匈。

“再次去车站之前，我同当时担任俄共书记的雅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又谈了一次话。斯维尔德洛夫是这样同我告别的：‘我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会在你们那里——布达佩斯举行……’晚上我去大都会旅馆（当时称作第二苏维埃大厦）参加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分组会议，会上就组织名称和任务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两、三位‘成年’同志得知我将回国，也是这样同我告别的：

‘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无论如何要到苏维埃匈牙利去召开。’”①

可惜历史不完全和不总是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即便这些人被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历史的创造者”也罢。

这一期间，我感到从俄国捎信来的“库恩·贝拉的使者”来得过于频繁。最初我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以为是库恩·贝拉想这样转告关于他自己的消息。然而慢慢地事情变得可疑。我怀疑这些“消息”可能都是警察局的人带来的。

来人总是问我收到库恩·贝拉的信没有，他什么时候回来等等。他们过分的追问终于表明了这是一些什么人和来找我的使命是什么。我设法摆脱他们。

库恩·贝拉的这些“使者”后来安静了一段时间。我满以为事情算是过去了。岂知1918年夏天当我正在瑙杰涅德探望父母时，来了两个带着士兵的军官。士兵们拄着枪守在大门口，两个军官——一个大尉和一个上尉——则走进房子，表示歉意以后先是找我，后来又找我父亲。

我心中很吃惊，但是未动声色。我父亲这时走进来，询问他们有何公干。那个身为军事法官的大尉说，他们来找库恩·贝拉的妻子，因为他们在科洛日瓦尔的住处了解到她在瑙杰涅德的父母家里。他们要求我父亲准许他们查找库恩·贝拉从前线和从战俘营写回的信件。我父亲开始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他们解释说需要进行搜查。我父亲听后大怒，最强烈地进行抗议，拒绝别人玷污他清白之家的名声。这时，那两个军官出示了搜查证，我父亲这才不得不服从。

搜查开始了。当找到库恩·贝拉的信件以后他们就停止了行动。并再次道歉说：给这样正派的人家造成不愉快，不是他

---

① 《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如何召开的?》，载莫斯科《国际青年》杂志1934年第11—12期。

们的罪过，而应该归咎于库恩·贝拉与祖国为敌并参加了俄国革命。然后他们象突然才想起来似地要我三天内就回科洛日瓦尔去，因为实际上我的住所在那里，那里也还会有信件。我没有反抗，因为我知道，那样做没任何用处。我回到了科洛日瓦尔。这时在我们家对面的咖啡馆里，已有一个暗探坐在窗前监视着我。这个人后来走进我的家，在翻找信件的时候用最平静的语调说他怜悯我，因为库恩·贝拉由于叛国，已被缺席判处死刑。回国后肯定要被绞死。我回答说，库恩·贝拉暂时不会回家，他们不必等候。这时那位当军事法官的大尉又来了，拿走了已搜出的信件，并且诚恳地答应过两、三天就把信件退还来。他说，他只不过是拿去看看。我说，这些都是私信，只是寄给我的。他笑了起来，显然觉得我是多么愚蠢和天真。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这些信件。当我通过熟人向那个当法官的大尉追问信件的下落以及问他是否遵守诺言时，他回答说信件已存入波若尼① 档案库。他早已把诺言忘得一干二净，我对此也不引以为怪。②

在这段不愉快的插曲之后不久，我又到瑙杰涅德去了，然后同我姐姐和我女儿阿格奈丝一起又回到科洛日瓦尔，继续过我的教弹钢琴的生涯。

这一期间，匈牙利的局势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变化着，可是是朝着搜查我们家的那些军官等人所期待的相反方向发展。

10 月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③。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了国

---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译者

② 我回到匈牙利以后，曾去过捷克斯洛伐克党史研究所，要求他们在波若尼的档案库寻找这些信件，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③ 1918 年 10 月 25 日匈牙利成立了由激进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民族委员会”，由卡罗伊·米哈伊（卡罗伊，《列宁全集》译作卡罗利）出任总理。

民议会和政府。科洛日瓦尔的国会议员文采·山多尔不断向我打听库恩·贝拉什么时候回来。这时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有的说他已率领一支庞大的由匈牙利战俘组成的部队首途回国，有的人(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以为库恩·贝拉将会支持他们给工人和贫苦农民反对地主和工厂老板的革命运动降温。我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说，不要对库恩·贝拉寄托这样的厚望，因为他不会支持你们，反而会反对你们。然而这些话无济于事，他们不相信。他们回答说，让库恩·贝拉回来吧，他们会同他达成一致意见的。他们以为库恩·贝拉回国是为了趁"紫菀花"革命之机参与对国家的领导。

科洛日瓦尔的一位大学教授在街上遇到我时说，"库恩·贝拉有可能当上议员，甚至当国务秘书。"

10月31日宣布推翻奥匈二元帝国，卡罗伊任总统。在士兵的示威游行中群众把当时开放的紫菀花抛向士兵，士兵摘下象征奥匈帝国军队的帽徽，戴上紫菀花。因此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也叫"紫菀花革命"（也有译作"秋玫瑰革命"的）。这章里多次提到的匈牙利十月革命以及"民族委员会"等事，还有前面基什科瓦奇说的匈牙利国内发生的革命都是指这件事。——译者

第八章　建　　党

他在11月果然回来了，不过没有率领军队。匈牙利战俘中的革命者那时还编在红军各国际纵队在俄国土地上同反革命浴血奋战。这些国际纵队是由库恩·贝拉及他的以下一些战友组织起来的：萨穆埃里·蒂博尔、明尼赫·费伦茨、利盖蒂·卡罗伊、亚罗什·贝拉、维纳曼·拉约什、扬奇克·费伦茨、瓦尔加·久拉、劳比诺维奇·尤若夫、万图什·卡罗伊、舍伊德勒·埃尔诺、波尔·埃尔诺、高夫罗·拉约什、扎尔卡·马泰① 等。

库恩·贝拉化名谢拜什真·埃米尔医生，带了少数人秘密地回到布达佩斯。他没有去埃尔代伊，因为他已经知道那里正在通缉他。他在布达佩斯会见了一些过去因政见不同而被开除出党的社会民主党老党员，还会见了一些年轻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他到达后一、两天，身负列宁的委托，前往维也纳同弗·阿德勒② 会面。他派了一位名叫博尔恰尼③ 的同志去科洛日瓦尔找我。起初，我不理这位博尔恰尼，然而他说的话还是使我相信

---

① 扎尔卡·马泰(1896—1937)，作为指挥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基辅、克里米亚作过战。后任苏联国家出版局副局长。1936 年化名卢卡奇将军参加西班牙内战，1937 年在作战中牺牲。——译者

② 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当时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译者

③ 博尔恰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俄国当战俘，后来作为国际主义战士参加了俄国国内战争。解放后为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后来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不久前刚刚去世。

了，我决定去佩斯。博尔恰尼没带信，但交给我一笔盘缠。他说等我们到了布达佩斯，库恩·贝拉也能回来了。在科洛日瓦尔的民族委员会帮助下，我买到了三张车票，库恩·贝拉的父亲也与我同行。他当时正好来看望我，不愿意把我交给一个陌生的军人。

一路风尘仆仆，在火车上我们只给库恩·贝拉的父亲找到了一个座位，我们自己则站了一路。

清晨，我们终于到了布达佩斯，然后按照指定的地址去找舍伊德勒·埃尔诺妮的家。主人不愿意接待我们，当时我认为这是很失脸面的事。舍伊德勒妮的母亲只隔着门缝说她女儿和女婿都不在家，她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当她正想关门的时候，她丈夫走了出来，说了几句比较和气的话。他说库恩·贝拉还未从维也纳返回，建议我们先到什么地方找个住处，然后再回来，那时他的女婿或女儿可能回来了，他们能多告诉我一些情况。

他们的这种态度使我吃惊，但使我更加吃惊是，在库恩·贝拉看来，离开三年之后，去维也纳与阿德勒会面竟然比同我团聚更加重要。

我感到悲伤。

但是，当我想起他在结婚那年说过的关于对革命负有义务的话，心情略微平静了一些。

我同博尔恰尼同志一起离开了这家人去找旅馆，但一无所获，因为布达佩斯正召开什么代表大会，所有旅馆都住满了。我又回到舍伊德勒家，这次受到的接待与前次大不相同。舍伊德勒的妻子什泰拉在家等我。我们商定，库恩·贝拉的父亲暂时住在他们那里，我到亲戚家里去借宿，就说我来佩斯是为了同一个从俄国回来的人见面，拿库恩·贝拉的一封信。

我对亲戚如此这般一说，他们很高兴，说如果库恩自己回来就更好了，因为他们想听听有关俄国、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真实情况。眼下有种种传说，可是什么传说比较合乎实际，谁也无法证实。我的这家小资产阶级的亲戚还诚恳地强调说，库恩·贝拉从俄国获得的经验也是有益的。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话的细节现在当然记不清了，但肯定谈到了卡罗伊革命① 的形势、前景、困难，也谈到不知库恩·贝拉他们是否支持这场资产阶级革命。

我一路奔波，感到十分疲倦，向他们道了晚安想去睡觉，这时门铃响了，一位年轻人站到我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我叫舍伊德勒·埃尔诺，是库恩·贝拉的朋友和同志。"他请我原谅他一直不在家，说他本应在家等我，但没料到我会从科洛日瓦尔来得这么快。在库恩·贝拉秘密住过的那家旅馆里，他们已为我们准备了住处，但我也可以到私人住宅去住，等库恩·贝拉从维也纳返回。由于劳累，我几乎没有听舍伊德勒·埃尔诺说了些什么。我同他说话时很不耐烦，其实是在生库恩·贝拉的气。我气愤地对舍伊德勒说，我任何陌生的地方也不去，什么秘密住处！？我不懂，我不习惯这一套。我说，如果库恩·贝拉到早晨还不回来，我就返回科洛日瓦尔，他要想见我只好劳他的大驾到那里去，等等……

在我说这些话时，舍伊德勒·埃尔诺一直在微笑，虽然心里在想：可怜的库恩·贝拉，同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妻子在一起可怎么好？之后，他向我告辞，"看来您已经很劳累，快点歇息吧，等到了早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① 指1918年10月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译者

他说完就走了。

凌晨，有人把我叫醒，说有位老人急着要见我。开门进来的是库恩·贝拉的父亲，他非常激动，结结巴巴地让我快穿衣服，因为他儿子贝拉正在大门外边等候。我当时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衣服是怎么穿上的，只记得匆匆地告别了亲戚跑下楼梯。

大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身穿带皮领的大衣。他笑着向我走来，拥抱着我问道："生气了？"我回答说："非常生气！"他说："不要紧，咱们快走吧。"我们坐上汽车，他在车里开始吻我。

由于过于用力，他的大衣都被扯破。我在慌乱中不知所云地说："您衣服的料子真差！"（不过倒也是实际情况。）

我们把他父亲送到舍伊德勒家里，然后继续乘车去旅馆，我就变了谢拜什真·埃米尔医生的太太，这时我连想都没想要反对过地下生活，而在昨天这还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面，分离之前也只一起生活了一年半。他被征去当兵以后，我怀着孩子搬到瑙杰涅德我父母那里去住。他上前线之前，曾多次到瑙杰涅德去看我，但每次都只呆一、两天。有一次他从前线带病回来，患了弹震症。病刚刚好，他又被赶上前线，在战场又呆了八个月。等到轮到回家休假时，他与全师一起被俘了。代替他回家的是一个小箱子，里面是几件脏内衣。

他最初常从战俘营寄回明信片，后来便越来越少。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我只收到过他发回的一封电报，说他身体健康，住在德累斯顿旅馆。

尽管这样，我还是了解到不少有关他的情况，因为每个回国的战俘都带回关于俄国、革命和他的消息。这些消息当然并不

全都可靠，但无论如何可以从中知道库恩·贝拉还活着，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回国的战俘往往在我那里一坐几小时，我听他们讲述发生在那个当时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家里的事情，有时一直听到深夜。

在当过战俘的军官当中，不少人毫无根据地诋毁革命。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抢劫，库恩·贝拉也同他们同流合污。甚至有人说库恩·贝拉把那些不愿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的想回家的被俘军官统统绞死了。（这些军官后来也都健康地、完整无缺地回来了，可是他们自己又传播类似的蠢话。）还有人说库恩·贝拉成了百万富翁，又结了婚，娶了个年老的布尔什维克妇女。说他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番演说，然后群众就把全城的知识分子都杀光了。另外还传说布尔什维克屠杀了所有的孟什维克，列宁杀死了托洛茨基。之后又有人说是托洛茨基杀死了列宁等等。总之，这些消息无比地骇人听闻，一个比一个惊人，虽然谁也不会相信，然而却又不停地传播。

也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士官是同情俄国革命的，他们尊敬这一革命的领袖人物列宁及其战友，尤其尊敬斯维尔德洛夫。他们在谈到列宁时说："这样的思想家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为劳动人民牺牲了一切，自己从中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说自己虽然对俄国革命不敢苟同，但是却有敬佩之心。

从战俘营回国的工人们能比较清醒地看待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即使他们并非对一切都理解，但是却能凭工人的本能意识到这是一场关系到他们的革命，涉及到解放他们的问题。他们言简意赅地解释列宁的作用。同他们谈话能给许多以前不懂得的问题找到答案。他们说："列宁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他站在

解放工人阶级的前列，他指引世界的劳动者如何为解放自己去斗争。”对于库恩·贝拉，他们也不人云亦云。他们说，他与战俘伙伴们一起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许多人在克里姆林宫遇见过他，他们还自豪地说，一些匈牙利士兵也在那里为列宁担任警卫。他们认为在匈牙利也应该效法俄国，库恩·贝拉必定将很快与战友们一起回来领导革命运动，使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也获得解放。

除此之外，这一期间我还从别人捎来的两封信中得到他的消息。有一封信说他身体健康，工作繁忙，要我同阿格奈丝一起通过乌兰克去俄国。一位名叫巴罗蒂·尤若夫的演员也给我寄来过一封类似内容的信。这两封信在一次搜查中被警察拿走，看来永远不能物归原主了。

虽然离别了三年，但我们在见面时彼此并未感觉陌生。就好象他出差小别一样。我们之间的言语不多，但相互心领神会。他先问我个人、家庭情况，打听他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也问到他的弟弟山多尔①。山多尔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一年又被送到前线。库恩·贝拉始终默默地听我讲述山多尔的情况，他还打听我的家里有谁去过前线，境况如何。我说我大哥被送到意大利前线，音信全无。他又沉默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士兵在意大利前线处境艰难。

---

① 库恩·山多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埃尔代伊，在那里结了婚并重操农艺师的旧业。1925 年罗马尼亚政府以他是库恩·贝拉的弟弟为理由，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山多尔及其一家不得不移居苏联，在那里从事农业工作。1937 年，在库恩·贝拉被捕后不久，库恩·山多尔也被逮捕，不久被处决。他于 1955 年才得到昭雪。

他又问我当他不在家时是怎样生活的，同时以不太满意的神情打量我寒酸的服饰，又默不作声了。

我知道他不爱谈使他不愉快的事，如果我因此责怪他，他会回答说："我的脊背足以担负自己的一切困难。我不需要拐杖，我想用自己的脚走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必需面对这个现实而无法改变它。

他问："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们表现如何？"他记得每个人和每件细小的事。

他询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特别关心我大姐尤哈娜。在他上战场以后，尤哈娜就已同我住在一起。从此直到去世，她同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五年，同我们一起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与我们同甘共苦。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库恩·贝拉对她最敬重，感激她在我工作时替我们教育阿格奈丝和担负起全家的日常家务。

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流亡时期，大家都亲切地称我姐姐加尔·尤哈娜为哈妮卡。这位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勤劳的妇女八十五岁时在布达佩斯逝世。

同志们都喜爱和尊敬哈妮卡。不论谁登门，她都热情地款待。在流亡期间，她主持我们的家务，做一手使库恩·贝拉引为自豪的美味匈牙利菜。每个月的一日和十五日，库恩·贝拉和我都把领到的工资交给她。如果有时库恩·贝拉发表了文章，我姐姐就会把这笔也列入计划（当时每篇文章的稿费是五十至一百卢布），如果库恩·贝拉没有及时给她，她就会说："贝拉，还没收到稿费吗？"于是库恩·贝拉就笑着掏出在口袋里揉皱了的钞票递给她，并且孩子般地讨要十个卢布当"零用钱"。"买什么用，您不是一切都有了吗？"哈妮卡会这样同他辩论。库恩·贝

拉就会说:“我想同伊琳一起到高加索餐厅吃顿饭。”

经过几分钟的讨价还价,最后确定给库恩·贝拉五卢布。等我姐姐刚一走出房间,库恩·贝拉就会得胜似地又掏出一张五卢布的钞票朝我一扬,“这是早就藏起来的,”他笑得直流泪,“千万别告诉她!”

库恩·贝拉最后一次见到阿格奈丝时她才六个月。这个小姑娘后来曾骄傲地告诉别人:“爸爸给我的小车插上花,推着我出去散步。”

库恩·贝拉将孩子的照片同我的照片一起带到前线,被俘后仍然精心保存,最后带回家来。

我们谈话时,他问我是怎样教育阿格奈丝的,说他希望我没有教她信仰上帝。不等我答话,他就立即以不容置辩的语调说,以后由他教育阿格奈丝。“我想让她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关于儿童教育,他说俄国在夺取政权以后为无产者的子女办了不少事情。原产业主的最美丽的别墅和府第建成了托儿所和少年之家。他讲述这些时非常激动,就好象马上要去没收资产阶级在佩斯的所有大楼和别墅,并且立即把它们转交给无产者的子女似的。

记得就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布达散步。当时库恩·贝拉指着那些别墅和府第说:“看,在列宁的俄国,这样的建筑里住的都是无产者的子女。我们取得政权以后也照这样办。”

……我们又回到家。他接着问了些别的事,然后说他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才同参加过战俘运动的伙伴们一起回来的。由于他扮作医生,路上还得给人看病。有一次他开的药治好了患者,人

家甚至想付给他酬金。然而他说得最有声有色的却是那件毛皮大衣惹出来的麻烦，说别人怎样骂他是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分子等等。他说："尽管有人几乎要揍我，我还是装出一副八面玲珑的神态。"

他接着说，过不了多久将会有许多同志回来。明尼赫·费伦茨、扬奇克·费伦茨、劳比诺维奇·尤若夫、费茨科、波尔·埃尔诺、万图什·卡罗伊已经到达，另外还会有别的人到来。到时候他们这些人将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左派，一批因从事反对活动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的人、青年革命家科尔文·奥托①、海韦希·久拉②、莫肖伊戈·安道尔③以及其他人一起，创建匈牙利共产党。这个党的任务是领导匈牙利工人群众和穷苦农民闹革命。库恩·贝拉说应该发动群众，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社会民主党已没有能力领导革命，早已脱离群众的右派领导人既不能也不想了解形势，他们还想按照改良主义的框子搞工人运动。这在昨天就已经算是糟糕，今天简直可以令人诅咒。

他问我对他在俄国从事的活动和回国后仍想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从他参加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在俄国和回国后都站在革命的一边是自然而然的事。警察到我那里去搜查时，曾问我：库恩·贝拉为什么参加外国革命，当时我也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我说："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库恩·贝拉是社会

---

① 科尔文·奥托(1894—1919)，匈共创始人之一。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共和国失败后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1919 年被捕牺牲。——译者

② 海韦希·久拉(1890—1970)，化学家，苏维埃共和国时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解放后任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译者

③ 莫肖伊戈·安道尔(1891—1921)，社会民主党左派。苏维埃共和国时任红军指挥员。——译者

民主党的左派，为什么对他参加俄国革命还惊奇呢？难道你们认为他会站在俄国反革命一边？”库恩·贝拉听后连忙问：“他们怎么说？”“他们无言以对，只是大发雷霆。”“您呢？”“我不予理睬。”

我赞同他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打算。我认为，匈牙利的这次紫菀花十月革命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工人和农民都不满意，连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以赞许的口吻谈论从俄国回来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有一次在科洛日瓦尔召开的一个不仅有工人参加的大会上，我看见群众都朝天上看。我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回答说：等待库恩·贝拉，因为他们听说库恩·贝拉将坐飞机回来。有人当场说：“有一支由战俘组成的庞大队伍随后就到，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听了微微一笑，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笑。

库恩·贝拉象往常一样，只要别人谈到他就立刻扭转话题，开始谈论别人。这次他把话题转到他的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的老朋友文采·山多尔身上，当时文采是民族委员会的成员。库恩·贝拉曾经把自己在俄国写的几本小册子寄给他，其中有《谁是战争的受害者？》、《什么是苏维埃共和国？》和《土地归谁所有？》他问我这些小册子的命运如何。我说这些小册子文采·山多尔都收到了，并且曾经把《谁是战争的受害者？》给我看，但只借我看一夜，并且不许我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告诉库恩·贝拉：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由文采·山多尔主持召开的学生大会，他在大会结束时呼吁与会者走上街头，因为暴徒们正在横行。可是事实的真相是，“暴徒”们企图占领工厂，农民们想要夺取土地。有的地方已经在驱赶地主和村里的富人。民族委员会没有足够的力量镇压这些“暴动”，一再向佩斯求援，但是援助姗姗来

迟，他们便想借学生之手抑制这种举动。

库恩·贝拉惊讶地听我的讲述，为我以这样的观点介绍情况感到高兴，甚至简直不敢相信。与此同时，他不停地大骂文采·山多尔，说他是社会民主党的败类、投机分子。他赞许地对我说："我早就知道您是可以信赖的，我们是志同道合，以后会一道工作。"

我不想扫他的兴和冲淡他对我的好感。他信赖我，对此我并不怀疑，但当时我对自己是否将会在党内工作还不能肯定。我既认为自己不够成熟，也认为自己斗争性不强，不适合做党的工作。此外我还存在着一些成见，克服它们尚需时间。库恩·贝拉觉察到了我的回答模棱两可，但没有挑明，只是说第二天要把我介绍给几个他已经见过面并且详细交谈过的同志。

突然有人敲门。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住在这里是不公开的。库恩·贝拉安慰我说："准是有人从俄国回来，需要为他们安排房间。"

（我很熟悉他这种处处为他人考虑的性格。他不仅对自己小家庭里的每个人体贴入微，而且对广义的家庭也是如此。他认为在安排工作、解决住房和其他事情上帮助他人是自己的义务。同志们有什么需要时也习惯于去找他，对于别人的要求，他从未拒绝过。在后来的流亡岁月中也是这样，别人不论什么时候到家里或到共产国际去找他，他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诉说，然后写张条子设法使他们能分配到工作或能得到治疗，有时还要叮嘱一番再放他们走。由于鱼龙混杂，有不少得到帮助的人事后给他带来了不愉快，有人甚至警告说"你别滥施好心了！"他总是答应以后注意。不过到时候依然故我。当然，这种事总是少数，特

别是在莫斯科的大部分匈牙利流亡者都很正派，库恩·贝拉对这一点总是感到欣慰。）

……门敲过之后，没等里面答话，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就闯进房间。他一见房里的情景便着了慌，连忙道歉。库恩·贝拉介绍说："这是劳比诺瓦茨，一位忠诚的同志，是参加战俘运动的老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布尔什维克仪表工……"他这时对客人说："请坐，劳比诺瓦茨，您家里情况怎样，有什么新闻？您的未婚妻好吗？"

劳比诺维奇（他当然不叫"劳比诺瓦茨"，只是库恩·贝拉兴致好的时候这样称呼他）掏出一张照片，自豪地给我看。

他说："我的未婚妻已经等了我……（我已不记得他说的是多长时间）不久我们就要结婚了。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姑娘。我把自己的情况和在俄国的革命活动全都如实说了，但是她并不退缩，我做的事她都同意。"

（所谓"都同意"是指革命工作，因为那位新娘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劳比诺瓦茨"本来担心在婚姻问题上会产生麻烦。）

他们久久地叙谈。我不习惯于外人不打任何招呼在我躺着的时候闯进卧室来，这使我特别不自在。然而由于疲劳，我还是睡着了。当我醒来睁开眼睛，屋里已经没有陌生人。我本想再睡一会儿，却又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一个同志，至于是谁我已记不清。他报告说又有人从俄国回来，询问应该安排来者住在哪里。库恩·贝拉答复了他，并且请求说，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再叫醒他，因为已经是黎明时分，天亮后他还有许多事要办。

他回国之后的最初一些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其间我结识了几个年轻的同志，其中有舒加尔·蒂沃道尔、杜钦斯考·伊洛

娜、科尔文·奥托、海韦希·久拉、什泰恩·约兰、希波什·伊丽莎白、豪伊杜·巴尔、博罗什·拉斯洛、伦杰尔·尤若夫、里瓦伊·尤若夫①、雷考伊·亚诺什、科莫尔·伊姆雷等，他们都是反战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自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莫肖伊戈·安道尔也来过(他实际上也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忠实地站在共产主义者一边斗争。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他被关进监狱，后来作为被交换的犯人到了苏联，在那里染上严重的肺病。虽然为了给他治疗作了一切努力，但最终疾病还是过早地夺去他的生命)。

这些热情洋溢的革命者很快就同从俄国返回的战俘取得了联系，并且愉快地投入共同的工作。当时他们已经同一个在匈牙利活动的俄国战俘小组接上头。这个小组是由尤斯图斯、弗拉索夫、穆勒等人领导的，他们已与伽利略俱乐部、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工会运动中的左派同志建立了联系。

库恩·贝拉回国以后，很快就见到了尤斯图斯和弗拉索夫，向他们介绍了关于建党和出版共产主义者的报纸的计划。这些俄国同志自动提供帮助，并且积极投入到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来。

弗拉基米尔·尤斯图斯在十八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革命。他与列宁的一家特别是和安娜·伊里尼奇娜过从甚密，这友谊持续了一生。1912年，尤斯图斯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匈牙利，从此将自己的一生和全部工作与匈牙利工人运动联系到一起。他学会了匈牙利语，极力将自己的革

---

① 里瓦伊·尤若夫(1898—1959)，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去苏联。1945年回国后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十年代初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分管文化。1953—1958为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副主席。科学院名誉院士。——译者

命经验传授给匈牙利工人。库恩·贝拉总是极其尊敬地谈到他，把他奉为真正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楷模。

库恩·贝拉第一次在匈牙利同俄国战俘弗拉索夫见面是在1918年，当时我们已化名为谢拜什真·埃米尔和谢拜什真·埃米尔妮在绍沃伊旅馆居住。弗拉索夫具有从事革命工人运动的丰富知识。早在1906年，弗拉索夫还未满二十岁，就已成为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乌拉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的一员。他建立地下印刷所和战斗小组，并且从事党的其他工作，多次被关进沙皇的监狱和被流放。

1918年弗拉索夫第一次见到库恩·贝拉时，一交谈就发现他们在乌拉尔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库恩·贝拉1918年夏天曾在乌拉尔打过仗)。弗拉索夫听库恩·贝拉讲俄语时带有乌拉尔口音感到很高兴。库恩·贝拉也以能在匈牙利结识这个乌拉尔工人而喜出望外。他立即吸收弗拉索夫参加建党工作和组织出版《红色新闻报》。于是，弗拉索夫便同舍伊德勒一起开始筹建印刷厂。

报纸的第一期编辑完毕。排好的铅字已装上机器，电路突然被切断(显然不是出于偶然)。党的创建者们用双手转动印刷机的大轮子，使《红色新闻报》能如期问世。库恩·贝拉也参加转机轮（这个场面被鲍拉日·贝拉拍入他的影片《蒂萨河在燃烧》之中)。

弗拉索夫参加了新建立的匈牙利共产党的所有工作。库恩·贝拉后来恰恰派弗拉索夫与内迈蒂·拉约什一起去见列宁并非偶然。那是1918—1919年的事情，当时这两位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携带库恩·贝拉的信件越过前线去见列宁。

(弗拉索夫目前生活在莫斯科，已经七十多岁，每当他回忆

起匈牙利革命时期这段“生命里最美好的日子”，两眼就象年轻人一样闪烁着光芒。内迈蒂·拉约什如今生活在布达佩斯。他也已经年过七旬，但还总是爱兴奋地讲述对列宁、库恩·贝拉、俄国与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记忆，谈论他那次如何往返于布达佩斯与莫斯科之间的“伟大旅程”。）

我还结识了党的其他创始者，他们之中有桑托·贝拉①、桑托·贝拉妮、拉斯洛·耶诺②、鲁道什·拉斯洛③、克莱普科·埃代④ 等人。

库恩·贝拉不久还介绍我与他的老朋友奥尔帕里·久拉相识。此人是社会民主党内著名的反对派人物，1907 年曾与列宁一起出席过斯图加特代表大会⑤。列宁很了解奥尔帕里，后者也总是以最崇敬的心情谈到列宁。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于 1910 年以奥尔帕里持反对派态度为由将他开除出党。尽管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提出抗议，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还是于 1911 年批准了这一开除的决定。他被迫给资产阶级报纸当记者，维持全家的生计。当库恩·贝拉回国后与奥尔帕里取得了联系，发现他了解俄国革命的一切。奥尔帕里得知库恩·

---

① 桑托·贝拉(1881—1951)，社会民主党左派。苏维埃时期任国防人民委员。红军组织者之一。后在共产国际工作。解放后曾任驻波兰大使。——译者

② 拉斯洛·耶诺(1878—1919)，律师，社会民主党左派。为1912 年“血腥的星期四”大示威被捕的工人出庭辩护，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律师。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为布达佩斯革命法庭政治委员。共和国失败后被杀害。——译者

③ 鲁道什·拉斯洛(1885—1950)，苏维埃时期任《红色新闻报》主编。1922年去苏联。1945 年回国后任中央党校校长、经济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译者

④ 克莱普科·埃代(1883—1938)，苏维埃时期任布达佩斯红色警卫队政委。——译者

⑤ 指 1907 年 8 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译者

贝拉在苏俄内战期间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也感到非常高兴。

匈牙利共产党① 成立后不久，奥尔帕里也认识到创建这个党的必要性。他中止了先前的记者生涯，全力以赴地在匈牙利共产党内工作，贡献出他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知识。匈牙利公社② 失败以后，他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任以六种文字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③ 的主编达二十余年。全世界的警察局都通缉过他，最后落入德国法西斯之手，1944 年与他妻子一起被处决。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台尔曼。

几天之后，我又认识了萨鲍多什·山多尔，他是青年库恩·贝拉学《资本论》的启蒙老师。

我们每天都同这些同志见面。建立新党和办报的筹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我们仍旧秘密地住在旅馆里，然而已经人人皆知库恩·贝拉等已从俄国回来。大家还知道库恩·贝拉就在布达佩斯，再用化名住在旅馆已经意义不大。

库恩·贝拉用真名到警察局办了手续，我们又恢复了库恩·贝拉和库恩·贝拉妮的身分。

尽管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为我们找房子，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房子住。

库恩·贝拉的父亲不久就回家了，我准备在佩斯再逗留一段时间。

---

① 匈牙利文是 Kommunisták Magyarországi Pártja，我国有的出版物译作“匈牙利的共产党”，而1944年重建的叫做 Magyar Kommunista Párt 则译作“匈牙利共产党”，二者的原文名称是不同的。但考虑到我国绝大多数出版物在二者之间不加区别，都译作“匈牙利共产党”，而且本书在内容上也没有涉及1944年重建的党，因此我们也译作了“匈牙利共产党”。——译者

② 指 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译者

③ 第三国际的出版物，1912 年 10 月起在柏林出版。——译者

1926年，库恩·贝拉为莫斯科的匈牙利政治流亡者俱乐部的墙报写过一篇稿子，简短地介绍了匈牙利共产党是怎样创建的。我从这最可信的记载中摘引一段：

“……我们于11月17日抵达①。我们在莫斯科时就已决定立即建党。我们在莫斯科还决定这个党名叫匈牙利共产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党是世界上第二个共产党。在那个好不容易才租到房间的旅馆里，我开始浏览社会民主党出版的宣扬战争的刊物，特别是仔细地阅读《社会主义》杂志②。我一边饱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出版的宣扬战争的那些刊物中的各种“杰作”，一边派了一个信差到贝拉街的家里去找舍伊德勒·埃尔诺。除鹳鸟百货商店（一位从俄国回来的同志留给了我他的住处）外，这是我出发回匈牙利之前准确地记住的唯一的一个地址。舍伊德勒当时不在家，我只好在旅馆等候，一直等到晚上十点钟。舍伊德勒来了，告诉我社会民主党左翼想以萨波·埃尔文俱乐部的名义建立新的团体，他刚从成立大会上来。他说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桑托·贝拉、瓦戈·贝拉、③拉斯洛·耶诺、扬乔·卡罗伊和鲁道什·拉斯洛。我让舍伊德勒捎信给瓦戈、拉斯洛、桑托·贝拉和扬乔·卡罗伊，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当晚想见他们，至迟第二天。同时我们着手寻找那些已回国的莫斯科党校④学员。第二天清早，瓦戈·贝拉来到约瑟夫大街上的

---

① 根据1918年11月4日会议的决定，回国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从11月6日起开始分批地返回匈牙利。包括库恩·贝拉和万图什·卡罗伊在内的第一批人于11月17日抵达布达佩斯。

②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理论刊物。

③ 瓦戈·贝拉(1881—1939)，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红军指挥员。——译者

④ 即当时的“宣传员训练班”。——译者

绍沃伊旅馆。尽管我反对在咖啡馆里策划行动，但他还是把我带到宪法街的谢曼咖啡馆。拉斯洛·耶诺事先已在那里订下了座位。瓦戈和拉斯洛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匈牙利十月革命事件的经过，同时也介绍了一些人的过去和现状：谁在那里，属于哪派，谁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谁在战争当中持革命的和平主义态度。他们还说，除萨波·埃尔文俱乐部外，还有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党之类的组织正在筹建之中，号召书已经送进了印刷厂。原来由瓦戈、桑托和拉斯洛领导的这个组织与科尔文·奥托的革命的和平主义、工团主义小组有联系。它还同许多工厂有联系，其中包括切佩尔的兵工厂、沃尔福奈尔工厂和甘兹工厂以及马加什弗尔德、奥索德和奥尔拜尔特福尔沃（这些工厂和地方后来成为共产党在匈牙利的最初的立足点）。他们还谈及一个名叫海韦希—科姆亚特的小组，当时已在准备出版名叫《国际》的杂志。后来我们把这项工作接了过来。我们几个人简短地议论了一下形势，然后我介绍了建党计划。我们商定晚上与桑托和科尔文见面。拉斯洛·耶诺急忙跑遍全城，说服各个正在酝酿建立组织的负责人，在建党之事确定之前不要有任何举动。当时拉斯洛、瓦戈和科尔文、桑托都认为单独建党的条件尚未成熟。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想在匈牙利当时的情况下团结革命分子，就应该立即把共产党的旗帜打出去。直到傍晚我们还一直在辩论，后来瓦戈几乎完全赞同建党了，鲁道什也认识到建党的必要性。其他人对于究竟需不需要有一个单独的党还始终有些犹豫。夜里我出发去维也纳，向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转交列宁的信件。同阿德勒的谈话一开始我就确信：他当时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当天晚上我就从维也纳返回，随身带回一堆书。从20日起，开始就建党事宜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尽管我忌

讳在咖啡馆里议事，担心这场革命运动会重蹈社会民主党的覆辙，只会在咖啡馆里发议论当反对派，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在那里同各种进步派别的领导人进行磋商。据点在谢曼咖啡馆，这是拉斯洛、瓦戈和桑托常去喝咖啡的地方。瓦戈和科尔文同各工厂建立并保持着联系。舍伊德勒与军队、桑托和拉斯洛与工会保持联系。有不少工会领导人持坚定的革命立场，特别是在冶金行业中。他们都不赞成社会民主党中止阶级斗争的主张。我们还很快地同那些曾在莫斯科我们的党校中学习过的战俘接上了关系。我每天都要同二、三十人谈话，说服他们相信建党是势在必行，是继续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人们对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十分容易理解，大家也很快懂得只有工厂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堡垒。那是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磋商已见成效，只是对建党必要性的认识难以被人接受。一些早就参加了工人运动的人寄希望于把社会民主党争取过来，多数人则认为，由于工会的存在，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起一个另外的党来。在那些比较年轻和参加工人运动较晚的人当中，工团主义势力很大，普遍不懂党的必要性。我开始试着以迂回的办法说服大家。对于出版《红色新闻报》的事他们都同意。在哈尔科夫时《红色新闻报》是匈牙利共产党人的机关报①，我问大家现在报上怎么写，说这是谁出版的报纸？总不能写这是萨波·埃尔文俱乐部的报纸吧？……也不能说是什么联合会的刊物。有鉴于人们还十分犹豫，我们决定24日再开会，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比较正式的形式讨论建党问题。我

① 显然是指匈牙利战俘中的共产主义者在哈尔科夫出版的那分报纸，可惜一期也没保存下来。

们委托科尔文·奥托找开会的地方，他提议会议就在他哥哥凯伦·尤若夫① 的家里举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座房子是在布达的瓦洛什毛约尔街。召开这次会是桑托、瓦戈、拉斯洛、科尔文我们一起决定的。尽管大家还有些犹豫，然而就是那些还在犹豫的人也已经预感到和知道 24 日那天在瓦洛什毛约尔街将要举行的会将是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大会。党后来建立了，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遭受了失败，现在又在恢复，将来还会重新取得胜利。”

我也参加了建党大会。我记得日程上有两个主要问题：建党和出版报纸。建党大会是在科尔文·奥托的哥哥凯伦·尤若夫工程师的家里举行的。主人和他的妻子交出房门钥匙后离开了家。我清楚地记得，会议结束以后，科尔文·奥托收回钥匙，准备交还给主人。

共有三、四十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许多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是克莱普科·埃代、希卡代·奥劳达尔、扬奇克·费伦茨、萨通·雷热②、波尔·埃尔诺、凯尔奈尔·山多尔、舍伊德勒·埃尔诺、拉斯洛·耶诺、桑托·贝拉、菲埃德勒·雷热、雷考伊·亚诺什、莫肖伊戈·安道尔、费茨科·阿尔帕德、马图让·贝拉、万图什·卡罗伊、劳比诺维奇·尤若夫等人。在场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有科尔文·奥托、希波什·伊丽莎白、里瓦伊·尤若夫、绍洛伊·伊姆雷③ 等人。

---

① 凯伦·尤若夫(1892—1941)，伽利略俱乐部成员，匈共党员，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社会生产副人民委员。——译者

② 萨通·雷热(1888—1957)，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副福利人民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判徒刑，越狱后在国外。1946 年回匈担任民航局领导。——译者

两个问题都由库恩·贝拉首先发言，然后许多人发表意见；是不是已经需要有个新党？是否还为时过早？这个党是公开的还是在地下活动？它的名称是什么？由什么人组成报纸编辑部？

经过五十年之后，我已难以详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细节。总之，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参加过俄国革命的战俘，有一直在匈牙利生活和工作的工人运动老战士，还有一些不赞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政策、想建立一个以后能够领导革命的党的反对军国主义的青年。开完建党会回到家里我们又谈到清晨，因为库恩·贝拉对会上的每个发言和建议都发表了看法。

出席建党会的人大部分是工人，这使库恩·贝拉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对某些发言中流露出来的社会民主党思想残余感到担忧。然而他相信，工人们将在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得到改造。同志们充满革命的激情。我感觉到这些人马上就会投入工作，他们将创办《红色新闻报》会到工厂、兵营以及一切可以为新的党争取群众的地方去开展宣传工作。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有组织的活动开始了。党在维谢格拉德街有了一个活动地点。正如兰捷尔·尤若夫在他的书中④所写的，建党大会之后几天，在维谢格拉德街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已有八十至一百人。

---

③ 绍洛伊·伊姆雷（1897—1932），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1年回国领导地下工作，于次年被捕牺牲。 译者

④ 兰捷尔·尤若夫(1896—1975)，匈牙利著名作家。他的《维谢格拉德街》一书记述了建党初期的活动。——译者

我们仍然没有住的地方。不久我回科洛日瓦尔去了，为的是同父母和向我学钢琴的学生们告别，然后准备带着阿格奈丝搬到布达佩斯长住。

我到了科洛日瓦尔。由于库恩·贝拉没有与我一起回去，人们大失所望。不仅他的妈妈、弟兄和我们一家在盼望他，就连包括文采·山多尔在内的民族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也在期待着他。大家说，此举表明，他已不把埃尔代伊的工人运动放在心上。我向他们解释说，库恩·贝拉在为建党和出版报纸奔忙，一有时间就回科洛日瓦尔。这里的人对于建党的兴趣并不大。他们并不想有个共产党。文采·山多尔开始责骂起库恩·贝拉来："他把一切都毁了，本来是可以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解决的。党的分裂只对敌人有利。"最后，文采·山多尔决定去布达佩斯，把库恩·贝拉从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他深信自己将会胜利。

然而他错了，他没能说服库恩·贝拉。从此他们的友谊破裂了，并且变成了政敌。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从表面看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采·山多尔在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以后流亡到美国，并在那里与根德尔·费伦茨一起攻击共产党人和库恩·贝拉。

我在科洛日瓦尔住了两个星期左右。库恩·贝拉没有去，倒去了一个名叫蒙多克的同志，是库恩·贝拉派他去接我和阿格奈丝的。蒙多克说："他来不了，忙得很。他说让你们尽快去佩斯。"

我告别了父母，我很伤心，爸爸哭了起来说："女儿，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不幸而言中，一语竟成永诀。

我带着阿格奈丝到了布达佩斯，大家很高兴。库恩·贝拉瞧见阿格奈丝（他上前线时女儿才六个月）眼睛闪烁着光芒，想把孩子抱起来。然而阿格奈丝缩到了一边，不愿承认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尽管在科洛日瓦尔时她逢人就说自己的爸爸，甚至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地址。这可能是因为在她的想象里父亲是军人，应该穿军装，而出现在面前的却是个穿便服的男子。小姑娘一边嚷："他不是我爸爸"，一边扑在我身上。

我们还是没有地方住。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问库恩·贝拉。

"别担心，一切都会解决的。跟我来！"他这样回答。

我们来到拉科齐大街三十六号，登上六楼。那里没有电梯，但是在五十年前这能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几乎是跑上楼的，然后敲门。门开了之后，一对年轻夫妇热情地迎接我们，并把我们请进房里。我很喜欢这套房子，然而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是咱们的房子？"我问道。

库恩·贝拉介绍我们相识。原来这是他朋友、战友万图什·卡罗伊的家。当他们得知我的到来，并且知道我们还没地方住，立即要把这房子让给我们，说他们去瑙杰瓦劳德住一段时间，到那里探望亲友。

（我在前面已经写道，库恩·贝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作为新闻记者在瑙杰瓦劳德工作过，在那里他结识了万图什·卡罗伊。当时万图什是这个城市社会民主党的书记，后来是中央书记之一。不久他们的联系中断了，因为库恩·贝拉转到科洛日瓦尔活动，但在当战俘期间和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又走到了

一起。

我已记不清是谁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他们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时，库恩·贝拉竟然没有认出自己的老朋友，因为来自顿河盆地矿区的万图什·卡罗伊蓄起大胡子，衣衫褴褛不堪。匈牙利的国际主义战士们给他洗了澡并且刮掉他的胡须，库恩·贝拉这才相信站在他面前的果然是万图什·卡罗伊。库恩非常高兴，从此他们两人一道工作并且一道回到匈牙利。）

现在我虽然已记不准确，但是我想万图什夫妇的“蜜月旅行”至少进行了两、三周之久，其实为的是使我们能有地方住。

后来住房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搬到经纪人街（如今的克赖斯·盖扎街）居住。

我们立即通知万图什夫妇。他们很快就回来了，并且笑着说，幸而我们前些时候没地方住，“这样我们才能去度蜜月，”他们说，“经过多年分离，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旅行。”

我们每天在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就餐，一些年轻同志常到那里去。库恩·贝拉也多次在那里同他们约会。他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了乐观情绪。

在那几周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点什么“事件”。有一次有人想在街上殴打库恩·贝拉；在三十二号兵营里，有人甚至要动枪。库恩·贝拉总是在饭馆里笑嘻嘻地讲述刚发生的这类事情，说这是好兆头，越来越多的群众正在倒向共产主义者一边，所以反动派才采取了这种手段。

记得是在1月份，他的愉快情绪第一次被破坏。当时传来了奥第·安德烈去世的悲痛消息。

奥第没能见到“真正的革命”。这位身患重病、只处于半清醒状态的诗人甚至没有能够目睹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那些

斗争。

库恩·贝拉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以哽咽的声音吟出奥第的一首诗：

在忧愁穷困的匈牙利，
我们没有信仰，也没有面包。
但只要我们愿意，又有勇气，
我们将一切都能得到。

……卢卡奇·胡戈博士的妻子、女画家拜尔纳特·伊尔玛（几年前刚在布达佩斯去世）在11月还拜访过奥第·安德烈。在写给我的信中她这样讲述这次拜访情况，“我在一间摆满鲜花的小客厅里看到了奥第！（我丈夫这时还没有从前线回来）我对奥第说：‘惊雷响起的时候你的两眼为什么象猫一样地惊恐？你盼望已久的革命到来了！’奥第痛苦地咧着嘴说：‘这不是革命。匈牙利士兵正从俄国涌回来，库恩·贝拉让他们把传单和真正的革命藏在皮靴里带回国。要不了多久，一旦库恩·贝拉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回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午饭之后，库恩·贝拉总要和女儿一起在家里说说话。阿格奈丝很喜欢她的爸爸，特别欣赏库恩·贝拉的孩子不必事事听大人的这个看法。“解放了的孩子万岁！”这是库恩·贝拉的教育纲领。阿格奈丝对父亲崇拜得无以复加。

库恩·贝拉为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只是有些理论难以付诸实践，因为他没时间，从早到晚都要工作。

当他夜里回来，我见他精疲力尽，便劝他：时间久了这样的节奏是吃不消的。他说：“没关系，重要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们正在涌入党内，《红色新闻报》的数量总是满足不了需要。我们的

工会工作也取得了成就，许多知识分子对我们也产生了兴趣。”

旧总参谋部军官施泰因布吕克也回国了，他在俄国时就已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他尽管曾经是个现役军官，但却是个很忠诚的人。”库恩·贝拉说。施泰因布吕克没有使库恩·贝拉失望，无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期间还是在革命失败之后，他都总是兢兢业业地完成交给他的最危险的任务。①

这个时期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是《红色新闻报》第一期的出版。

“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报纸！”库恩·贝拉扬着报纸喊着走进家来，希望我们首先从他口中得知革命的工人运动的这件大事。

这个报纸的编辑有：库恩·贝拉、拉斯洛·耶诺、鲁道什·拉斯洛。工作人员有：豪伊杜·帕尔、博罗什·拉斯洛、兰捷尔·尤若夫、里瓦伊·尤若夫等。萨穆埃里·蒂博尔于1918年1月回国以后，也参加了报纸的工作。特别是在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任何一期的编辑工作库恩·贝拉没有参加。从重要文章的编写到零散消息的报道都事必躬亲。对于《红色新闻报》上刊登的每篇文章他都拍手称好，高兴得简直就象个小孩子一样。这个报纸实际上是匈牙利共产党人集体创造的结晶。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同志，每人都为这个报纸出谋划策或写文章。同志们在莫斯科流亡期间也时常回忆《红色新闻报》的这段众志成城的时期，这是匈牙利共产党最美好、最富于战斗性的日子。

组织工作也在展开。有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党中央的固定地址是在维谢格拉德街，共产党员们一清

---

① 施泰因布吕克·奥托与其他一些杰出的同志一样，于1937年成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牺牲品。

早就聚集到那里，听取有关当天工作的指示。然后，他们分头奔赴工厂、兵营、乡村和各地的工会，有时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些同志在各地召开大会，经常与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同时登台，通过互相辩论宣扬真理。

库恩·贝拉和匈牙利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经常出席这样的大会，而且总是欣喜而归。因为每次大会以后总有许多人站到共产党一边来。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气急败坏，不断咒骂，甚至要把共产党人从工厂和工会组织所在地赶出去。但是，他们阻挡不了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斗争。

我还记得党成立后不久，库恩·贝拉在一所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的讲演，听众多得大厅里挤不下，许多人只好站在门外。讲演结束之后，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小时之久的激烈辩论。直到第二天，这场争论还余波未平。讲演者库恩·贝拉在会上以最激烈的言辞批评了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但是在场的警察慑于群众的情绪，竟然未敢干涉会议。

布达佩斯房屋的墙壁上贴出了招贴画和传单，上面写着“共产党人想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来宣传自己的观点。

同志们运用了一切宣传鼓动形式，口号编得是那样灵活，连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都惊奇这些被他们称之为“不足挂齿”的共产党人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么多新办法。

不对，这不是什么“办法”，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问题。在短短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同群众建立了深刻和密切的联系，把工人、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的要求与希望视为自己的疾苦，也了解到群众希望变革的心情和这个国家的深重灾难。《红色新闻报》令人信服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出路，它指出：千

百万饱受世界大战之苦的匈牙利人和这个动荡的国家只能指望匈牙利共产党来结束眼前这日益悲惨的生活和匈牙利社会的危机。

仅仅是几周的时间，共产党就已成为匈牙利的一支巨大的力量。

第九章　维谢格拉德街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设在维谢格拉德街十五号。这条街和这个门牌号码当时在群众的心目中已经代表一种重要的力量。党中央所在地总是挤满了工人、士兵和青年。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人人都一定要同从俄国回来的同志谈谈，最好是同库恩·贝拉交谈。

库恩·贝拉早晨离开家时不说“我去党中央”，而是说“我去维谢格拉德街”。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既不回家吃午饭，也不会回家吃晚饭。在维谢格拉德街，随时需要他在那里。库恩·贝拉曾经说，“只要有些吃的东西，哪怕是只有一小块腊肉，就一切都解决了。”

最初，这种工作方式使我很不习惯，但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不再过问，因为我怕问多了，他会认为我有小资产阶级气味。库恩·贝拉往往深夜同两、三个同志一起回来，一进门就说：“请给我和同志们拿点什么吃的来，我们早就饿了。”于是，我就不声不响地端来点“什么”。我也坐下来，听他们讲述在工厂、矿山、街道和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开展的各种活动，有时一直听到天亮。

有时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一起登台演说，人们只欢迎共产党人。他们向从俄国归来的同志们欢呼。通过讲演人们也熟悉了列宁。从俄国归来的同志们对列宁的尊敬和爱戴感染了听众。在有些会议上，人们朝着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吹口哨。

……同志们吃过晚饭离开以后，库恩·贝拉还久久不能睡觉，需要考虑第二天的工作计划或者构思《红色新闻报》的社论。

提到《红色新闻报》，我想谈谈豪伊杜·帕尔的情况。他被很多人不公正地遗忘了。

豪伊杜·帕尔是匈牙利反战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匈牙利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后来成为库恩·贝拉的一个最忠实的同志。在莫斯科时，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后来任《镰刀与锤子》的编辑和第一部匈牙利文的列宁著作的编辑。他比库恩·贝拉年轻十岁，其性格特点是过于谦虚，有时甚至因此引起库恩·贝拉和其他同志的责怪。库恩·贝拉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这种过分的谦逊已经有害于工作，影响他的才能的发挥。于是豪伊杜·帕尔便满脸通红，着急地做着手势，表示他不相信自己有多大能力。当然，也有过另一种情况：库恩·贝拉同他发生争论并且气急败坏地吵嚷；豪伊杜也气愤了，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库恩·贝拉第二天会把他找回来，委派他去完成他感兴趣的任务，这样便重新和解了。但是豪伊杜·帕尔一直没变：别人夸奖他时总是满脸通红。

在所有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库恩·贝拉。

豪伊杜·帕尔的生活、工作和个性都堪称如今青年的楷模。这位优秀的革命家不该被埋没。

可惜，他也没能实现返回新生的匈牙利的宿愿。豪伊杜·帕尔也死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

如何在外地开展工作是个大问题。决定由万图什、扬奇克、克莱普科、西拉吉·德热、卡里卡什·弗里杰什和其他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来承担。同时还派明尼赫·费伦茨、施泰因布吕克·奥托到部队活动，他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任务

十分熟悉。青年工作的担子也很沉重，选择了豪伊杜·帕尔、博罗什·拉斯洛、兰捷尔·尤若夫、科莫尔·伊姆雷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来担任(其实这时库恩·贝拉自己也只有三十三岁)，同时还委派他们担负运动的其他任务。不久找到了一个极为理想的人——雷考伊·亚诺什① 来领导青年运动。他因为暗杀蒂萨·伊什特万总理而闻名，并受到青年工人们的尊敬。

库恩·贝拉很热爱青年人，与他们交往一向是他最喜爱的工作。1923 年在苏联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过党的各种工作，他只想做青年工人的工作，后来真的派他去了。在他以共产国际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身分领导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之前，一直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派驻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的代表，但和年轻人的联系并未因后来工作变动而中断。

这些热情、喜好争论和永不平静的青年男女还都象群孩子，但他们后来都手持武器保卫革命。后来也没有向任何人低头。这批青年的内心世界与库恩·贝拉息息相通。他们不承认任何“绝对正确”的权威，只有知识和逻辑的力量才能使他们折服，只有对革命的忠诚才能赢得他们的尊敬。

库恩·贝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以自豪的口吻谈论他们，“这些人将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我确信这一点。”他一边说，一边以热情的、探索的和严峻的目光打量着这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从战前的工人运动中就了解库恩·贝

---

① 后来雷考伊在青年共产国际担任执行委员。——译者

拉，其中有些人还同他有过联系，如韦尔特奈尔①、基什·阿道夫和加尔巴伊。库恩·贝拉回国以后，他们试图利用个人影响阻止他开展活动。他们装出伤感的腔调说要力图避免党的分裂和同室操戈。并且说库恩·贝拉在工人运动中抛弃了“久经考验”的工人运动老战士，想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无赖汉”共事。他们宣称，“匈牙利属于西方，因而匈牙利应该选择西方民主的道路。”他们满口赞扬俄国革命，尤其对列宁推崇备至。但当他们想到有朝一日匈牙利真的效法起俄国革命的榜样来，便就不寒而栗。

当这些老“朋友”看到自己说服不了库恩·贝拉时便破口大骂，并且开始同共产党和库恩·贝拉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他们诽谤、造谣，无所不用其极，与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人民之声报》以“俄国卢布”始，编造了各种他们认为可以把群众从共产党人身边吓跑的神话。

然而事与愿违，曾对匈牙利紫菀花革命抱过幻想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都热心地倾听库恩·贝拉和其他从俄国归来的战俘讲述有关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和列宁的事情。

布达佩斯一些最大工厂的工人群众加入到匈牙利共产党的行列。

匈牙利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为争取群众所进行的斗争，甚至当时置身局外的人如今也记得很清楚。

库恩·贝拉的演讲方式与社会民主党的演讲人不同。他学习列宁那种深入浅出、根据事实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的方法。

---

① 韦尔特奈尔·雅各布(1873—1936)，自1895至1905年为匈社会民主党中央书记，1918年任《人民之声报》责任编辑。两党合并后为中央领导人之一，干了许多破坏团结的事情。——译者

在他的演讲中没有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响亮的空话和华丽的词藻，他从不以高谈阔论、虚张声势追求廉价的效果。

这里，我不妨引用一位目击者所叙述的一段往事，也许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库恩·贝拉的作风和特点的吧。这位历史的见证人就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目前最年长的战士和歌手之一萨特马里·萨吉·山多尔。当我写这本书时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还在从事他当年的工作——教书。他写道：

“1918 年 12 月，我们正在玛利亚·特利莎兵营里。士兵们等待着共产党代表库恩·贝拉到来。军官们铁青着脸，发誓哪个颠覆者要是胆敢跨进这座以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的名字命名的兵营，他们就开枪打死他。库恩·贝拉来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兵营的大门口就提醒他这里有生命危险，可是他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然后便匆匆地走进兵营的大院（库恩·贝拉总是走得很快）。他站到讲台上，呼喊着‘士兵弟兄们！’一个大尉从近处朝他举起枪来瞄准。我们吓得手脚冰凉，眼看那个军官马上就要射击。库恩·贝拉在死一般的沉寂中说话了：‘大尉！您应该知道，要想开枪，应该先打开保险……’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大尉手中的枪被站在他身边的士兵夺走。我们还未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大尉已被丢盔卸甲地抛到大门外。库恩·贝拉于是开始讲话。‘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革命万岁！’兵营的院墙回荡着这个声音。

士兵们把库恩·贝拉举到自己的肩上。”

资产阶级政府的成员、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负责人都惶恐不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看到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深感自己将要失去权力。

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开始了。维谢格拉德街和经纪人街就好象刚被占领的地方一样，到处是警察和暗探。名声大的共产党人得时常变换住处。库恩·贝拉怕在住所里被抓走，经常在我正在就医的那个疗养院里过夜。

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加剧。2月20日，共产党人在维高多音乐厅召开大会，有许多失业者参加。会后，人们到维谢格拉德街游行，声援共产党。接着，他们又涌向《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抗议该报发表一篇攻击失业者的文章。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顿时枪声大作，有几个警察中弹倒下。实际上是武装部队相互交火，然而却被利用作为清除共产党领导人的借口。

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后来当了叛徒的纳纳西·久尔吉来到我们的住处。他叙说了外边所发生的事情，要库恩·贝拉快点离开，因为他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夜里将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回答说，他哪里也不去，因为工人们将无法理解自己遭到逮捕，而领导人为什么居然消失了？为了不因为他们入狱而使运动失去领导，库恩·贝拉指示纳纳西，快去通知几个共产党领导人隐藏起来。纳纳西走了，我们躺下休息，但是无法入睡。

十二点左右有人敲门，房东太太出去开了门。房里立即挤满警察和宪兵。库恩·贝拉迅速地穿上衣服走出卧室。我四岁的女儿阿格奈丝被惊醒，她问来的是些什么人。我说，“是同志们来找你爸爸，你躺下好好睡吧。”她不听我的话，跑出房间直奔“同志们”。她对他们说，“房东太太是财主。”警察头子纳纳西·拉斯洛（后来得知他就是纳纳西·久尔吉的伯父，是他后来让侄子当密探的）当即训斥我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教育孩子，而且立刻

去找房东太太，以为这样可以激怒房东，从而向他们提供不利于库恩·贝拉的材料。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因为房东太太直说我们好话，“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房客。我喜欢阿格奈丝，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一个四岁的孩子说些什么是不该当真的。”纳纳西失望地回来，继续同库恩·贝拉谈话。他说，“由于又要流血，人们的心都要碎了。”库恩·贝拉冷静地回答，“如果您的心肠这么好，那么它不应该是现在才碎，早在打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该碎了。”纳纳西被说得哑口无言，然而态度变得越来越严厉。在他进行盘问的同时，搜查也在进行。房间里的警察和宪兵越来越多，整座房子被团团围住。历时几小时的搜查结束以后，纳纳西才出示逮捕证。他让我清早去警察局找他，并要为库恩·贝拉带去枕头、毛巾、其他漱洗用品和一些食物。他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去之前先给他打电话。之后，他就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样，让库恩·贝拉跟着他们走。他临走假惺惺地叫我不要着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然后就同他带来的那些人一起往外走。在过厅里他又想起得看看厨房和储藏室。这时他发现有个小门，于是伸手把它打开。小屋里有个穿军装的当过战俘的人，正在床上和衣而眠。纳纳西当即把此人唤醒，尽管没有逮捕证，这个人也被带走了。

在库恩·贝拉写的关于萨穆埃里·蒂博尔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这个战俘同志是怎样到我们那里去的记载：

“……蒂博尔知道我的地址，从车站直接找到我在经纪人街的住处。他的头一句话是：你真麻痹大意！房子周围布下了四个暗探，他们只要愿意，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进来收拾你。你为什么不找两个莫斯科宣传员训练班的同志一起住呢？

“……几天之后，他派了一位从俄国回国的同志搬到我那套

房子旁边的一间小屋去住，目的是给我当‘警卫’，并且给他配备了两支手枪。”①

那个在小屋里睡觉、枕头下放两只手枪的人是科瓦奇·亚诺什，就是前面说到过的“基什科瓦奇”。第二天早晨，我照纳纳西留的号码给他打电话，可是对方说这不是他的电话号码，说完就放下了听筒。我又拨了一次那个号码，得到的仍是原来的回答。这件事当时使我很惊讶，其实这正好说明我自己是多么天真。对这种人即使在任何小事上都是不能相信的。

我苦思冥想，不知该做什么，四处打电话一无结果。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当律师的亲戚，他很快就弄清楚共产党员们被关押在临时监狱。我们决定赶到那里去。我们想乘电车，但是街上没有。因为有警察被杀，社会民主党正在举行示威游行。

座落在莫肖尼街的临时监狱离得很远，从经纪人街到那里需要一个小时。我当时身体虚弱，几天之前刚出疗养院，但是我们还是向那里走去。路上遇到了正在示威的屠宰工人，手里举着斧头。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工会组织也举行了游行。人人都在咒骂共产党。

忽然，一群报贩象报告什么喜讯似的在叫卖：“号外，号外，库恩·贝拉被打死了！号外，号外，库恩·贝拉被打死了！”

人们纷纷争购报纸，我们好不容易也得了一份。那是《晚报》的号外，上面刊登了记者陶尔扬·维尔莫什写的报道。这个记者以目睹者的身分描写了毒打共产党员们的情况：

“……警察们站在院里通向牢房的台阶上。库恩·贝拉象个演讲者一样站在台阶的最高一层。一个警察在一片刺耳的叫

---

① 萨穆埃里·蒂博尔是1919年1月18日从俄国回来的。库恩·贝拉在《回忆录》中谈了这件事的经过。

骂声中，用枪托击库恩·贝拉的头。另外十来个警察也一拥而上。

“后来他被送到医疗室。

“雅各布长官带着库恩·贝拉。他只穿着鞋和裤子，赤裸的上身到处流血。脑袋也被打破，头发在抹药时被剪掉。血从他身上滴到地板上慢慢流开去，……外面传来气势汹汹的喊叫声、皮靴声和武器碰撞声。医疗室外面的狭窄走廊上站着六十名警察。

“‘那个流氓在哪里？凶手在哪里？不能让他活着出来，打死他！’有人这样叫喊。

“警察们从肩上取下枪，把门砸开，涌进屋里。有个警察举起枪托，朝着在床上疼得翻来翻去的那个共产党人的脸打去，就象用锤子往墙上砸钉子一样。别人也从四周打他的肩膀、面孔和肚子。库恩·贝拉一声不响地忍受着殴打。床上的枕头被血浸透……他也许是个器官格外健全的人，如果是别人早被打死了……”

这时电车已经开始通行，我乘车奔向监狱，心里只是想，“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们找到了临时监狱，但是不准许我们进去。

当天文采·山多尔去看望我，转交给我一张库恩·贝拉的条子，让我们不要为他担心，他还活着。

由于关于打人的报道激起了巨大的愤怒，《人民之声报》在第二天刊登了与《晚报》迥然不同的报道，说《晚报》对殴打共产党人，特别是对殴打库恩·贝拉的报道夸大其词。还说虽然“警察同志们”想为无辜被害的同志们报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共产党人确实都安然无恙。库恩·贝拉的情况也很好，他的安全

完全有保障，他写给妻子的信可以证明这一点。

“信中写道：‘我们完全理解警察们的愤怒心情，我们同他们一样为那些在保护工人和《人民之声报》的过程中无辜被害的伙伴的死感到沉痛。警察们（就是曾经多次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开枪的那些人！——作者）组织起来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和与劳动的无产者站在一起，对此我们只能感到高兴’。”

哈谢克·费伦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那些“与无产者站在一起”的警察们的行为的：

“当有人向库恩·贝拉同志报告事情的责任已被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时我正在场。我在那里见到一位严肃和非常稳重的年轻人，他认真地听别人讲话，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对方。库恩·贝拉高声地对他说，如果党受到迫害，萨穆埃里要立即到科洛日瓦尔去，在那里秘密地进行地下领导。之后，那个年轻人叫我们把所有文件都转移到邻近一座房子的地下室去。

“我们有十至十五个人搬运文件，直到深夜十二点至一点左右才躺到椅子上和桌子上休息一下。警察们是在拂晓时闯进来的，他们多次检查我们的身分证。当我们走到街上时，立即被推上卡车，后面的一辆卡车上架着机关枪。我们被押到临时监狱底层的左翼。第一个房间是个小牢房，旁边是个大房间。我们进门后，前面提到的那个年轻同志也来了，他是科尔文·奥托。库恩·贝拉同志是同他一起被押进来的。他们叫库恩·贝拉进第一间小牢房。门没有上锁，也还没有派来看守。科尔文同志走近库恩同志说，他要举办训练班，让被关在这里的一些新同志了解党的纲领。库恩·贝拉同志同意他的计划。科尔文同志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说要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致同意科尔文的建议。

“忽然，我们听到街上有人高声喊叫，但是听不清在喊什么。我们把科尔文同志托到窗户上去，让他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这时连我们也能听清外面的声音了。警察在高喊‘应该杀死他们’等等。我们听到看守走过来的声音，我们在走廊上把库恩同志围在当中。科尔文同志建议库恩同志到大房间来，这样我们便可以保护他。库恩同志坚决反对这样做，说不同意由于他的原因让任何一个同志遭受警察的折磨，他将同警察去办交涉。我看到警察们从大门冲进院子，库恩同志也看到了。科尔文同志挽住库恩同志的胳膊叫他：‘库恩同志，不要出去！’但是库恩再次要我们从走廊上回到房间去！这一瞬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作友爱和关心。我们与科尔文同志一样，都看到警察想杀人，而库恩·贝拉同志当然首当其冲。我们不敢象科尔文同志那样拉他。此刻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位共产党领袖，这位勇敢、伟大的人物在最危险的时刻还在保护自己的同志。他是那样镇定和勇敢，只有英雄和豪杰在走向刑场时才能表现出这样的气概。就在这时，他还在命令科尔文同志和我们回到牢房去。库恩·贝拉同志走到楼梯中间，开始对警察讲话。他一开口，面前的警察就停住了脚步，但是警长在后面叫嚷：‘打他！’推着警察往前走。有个警察举起枪托朝库恩同志的头打去。我们这时已经走进牢房，只有科尔文同志站在门口。他的脸色苍白，等待着警察们也走过来打我们。这时外面死一般地寂静，只能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我痛苦地觉得：库恩·贝拉同志被打死了。”

哈谢克·费伦茨的简明的回忆录就是这样记载的。

库恩·贝拉被毒打的消息迅速传遍布达佩斯，同时也传到外地。

道比·伊什特万① 在他 1962 年出版的《证言与历史》一书中曾经谈到 1918 年的事。他写道："库恩·贝拉回国以后，我们那里（科马罗姆附近的瑟尼）也常有人说应该学他的样子搞真正的穷人革命……　当我们得知库恩·贝拉被监禁和遭到殴打，大家气得都跳了起来。连我那位历来百事不问的姐夫也暴跳如雷，似乎敢于打死库恩·贝拉的任何敌人……

"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每个人都面临抉择——对共产党提出的问题是同意还是反对……"

我认为，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象这次血腥行动之后失去这样多的忠诚党员，因为广大党员不能容忍党报竟然赞同警察的行为。

……短短两、三周的时间内，不仅布达佩斯的工人，就连外地的工人和贫苦农民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愤怒。

我举两件事为例：

匈牙利最大的工厂切佩尔厂的工人们在 1919 年 3 月 18 日举行的大会上要求立即释放共产党人。他们表示要用行动使自己的决议生效。他们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3 月 19 日，有两万人到城堡② 去游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派德尔面对愤怒的群众，通过一扇秘密的门仓皇逃走。

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和毒打库恩·贝拉，不仅在匈牙利工人

---

① 道比·伊什特万（1898—1968），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参加过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抵抗运动。解放后担任过匈牙利国务部长、农业部长、总理等职。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1967 年退休。——译者

② 即布达佩斯城堡山，当时是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所在地。——译者

阶级和贫苦农民当中引起强烈的愤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是这样。过去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久尔吉①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几周之前刚刚参加革命的工人运动，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客都说，他们是合法秩序、正义和真理的代表，而我们则与他们大相径庭地迷信于暴力和出于‘野兽的本能’…… 近来，连最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看穿了这种说法的虚伪本质。难道我们在库恩·贝拉的带领下，只会在《国际》② 上唤起不开化的人们‘野兽的本能’吗？……那些警察‘同志们’力图使库恩·贝拉相信，政府的那套做法就是合法秩序……然而事实却是：有人想借‘警察同志’之手杀死库恩·贝拉…… 想采用比谢德曼对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③ 更为简单的办法……”

《人民之声报》几个月来处心积虑一直在散布的“共产党人是左的反革命”的神话破产了。匈牙利的共产党和库恩·贝拉的威信日益提高。工人们在工厂集会并通过工会要求释放库恩·贝拉及其伙伴。示威和集会此起彼伏。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头子们慌了手脚，不得不放松对被捕的共产党人的看管。一些工人代表团到狱中看望库恩·贝拉，同他商谈事情。他们要求他制定匈牙利工人阶级联合斗争的纲领。1919年3月11日，库恩·贝拉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纲领。

---

① 卢卡奇·久尔吉(1892—1971)，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副教育人民委员。——译者

② 指由科姆亚特·奥劳达尔和海韦希·久拉编辑的《国际》杂志。卢卡奇的这篇文章登在这个刊物的第三期上。

③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派头子菲力浦·谢德曼当德国总理期间1919年残酷镇压工人武装起义，杀死工人阶级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事。——译者

“我在工人运动联合的问题上的立场是，只有名副其实，而非虚有其表的团结才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有益……有的坏事是不可避免的，是所谓必要的。我个人挨打从目前和今后来看都属于是这种必要的坏事，最后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却是好事！”（致博加尔·伊格纳茨的一封信）①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感到事情棘手。在朗德列尔·耶诺②的带领下赶到监狱。库恩·贝拉正躺在医疗室，不能动弹。他们问库恩·贝拉是谁打了他，说是要惩办罪犯。库恩·贝拉回答说（他在挨打时也这样说），“谁打的不重要，他们都是些上当受骗的人”！

他的这一回答使那位目睹过他挨毒打的资产阶级记者都感到震惊。

当天，瓦尔加·耶诺妮找到我，作过自我介绍以后建议说，她可以带我去找卡罗伊·米哈伊③求他立即把库恩·贝拉送进医院。我谢绝了瓦尔加妮的好意。我说，如果库恩·贝拉知道我向下令逮捕他的人求情，他会非常气愤的。

无论我怎样奔波，还是无法见到库恩·贝拉。所得到的答复总是：“上面不准见面！”我后来找了根德尔·费伦茨，他当时是《人报》主编。根德尔要我跟他去见警察局长帕尔·久尔吉，此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 140—141 页。

② 朗德列尔·耶诺（1875—1928），苏维埃共和国后期任红军总司令。共和国失败后在国外领导地下工作，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译者

③ 卡罗伊·米哈伊（1875—1955），当时是共和国总统，后流亡国外。第二次大战时任总部设于伦敦的“匈牙利反法西斯民主运动主席”。1945 年回国后出任匈牙利驻法国公使，后因不同意国内政策而辞职并长期留居法国，死于英国。——译者

人和根德尔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帕尔说他不能答应我去见库恩·贝拉，因为警察们反对共产党的情绪强烈到有可能对我也下毒手。我回答说，后果我自己负责，只要让我进去就行了。根德尔说他可以同我一起去，负责保护。帕尔·久尔吉不知往哪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同意了我的要求。为了证明一个身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警察局长如何善良，如何一直关心我的人身安全，特地让一位身高将近两米的名叫派泰尔申的警官陪同我们一起去。我们乘一辆汽车到了监狱。办完手续之后，我与陪同的人一起获准进门。

当时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监狱是什么样子。

我快步穿过阴森森的走廊，希望尽快见到库恩·贝拉，了解他的情况。

我们穿过几个房间，看到一些警官坐在办公桌旁边，显然他们早已得知我们是什么人。他们好奇地盯着我们。当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时，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说是他救了我丈夫。我表示了谢意之后，我们继续朝前走。我们走进一个象是警察头子的房间，他也说，“是我救了你丈夫”。我对他也表示了感谢。我们最后走进医生的房子，这位医生彬彬有礼地走到我们跟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详细地讲述库恩·贝拉挨打时他是怎样去“救”的，“救人时”他又挨了多少打。我对他也表示了感谢，然后迅速地走开，因为我对进一步的细节不感兴趣。医生不作声了，把我们领到诊室旁边的一间小屋，库恩·贝拉正躺在那里。根德尔与派泰尔申本来在我身边，几分钟之后他们就走开了。

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库恩·贝拉的两眼闪烁着泪花。从一大团药棉和绑带中，只露出嘴和两只红肿的眼睛。

他低声问，“运动情况怎么样？”我缺乏信心地回答说，“一切都完了！”他说，“等着瞧吧，看三、四个星期以后将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对这种乐观的说法不以为然，但也没再作声。他要我设法使他能被关进拘留所，同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在一起，因为他断定：之所以把他关在这个临时监狱是因为有人想杀害他。

我回到帕尔·久尔吉处，要求把库恩·贝拉转移到拘留所去。对方回答说，不可能，因为警方确切地知道工人们要把库恩·贝拉劫走。我问他能否对库恩·贝拉的人身安全负责，他不予回答。又过了一些日子，我接到通知说库恩·贝拉已被押解到拘留所。

之后，我带着阿格奈丝到拘留所的医院去，告诉女儿说她爸爸病了，正在住院，现在去看望他。但是，阿格奈丝是骗不了的。她一看到门前有持枪的警察就说，“这不是医院！你住过医院，那里没有拿枪的兵。这是监狱！”但当她看到爸爸时还是很高兴，尽管他整个人看上去就象个缠满纱布的棉花团。库恩·贝拉也很高兴。他说，“不久伤就能好，到时候我要求从医院转到同志们那里去。”我对他解释说，暂时还不能谈这些，伤要好久以后才能好，监狱里的条件同医院的条件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能多在医院呆些日子是件好事。我的这些话说服不了他。我只好作罢，反正他暂时还不能走动。

此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每当我问他身体情况怎么样时，他总是回答说，“我不久就能全好，别为我担心！同志们怎么样？家里情况怎么样？还有谁挨打了？他们现在怎么样，谁在照顾这些人？运动的情况如何，还有谁没被抓起来？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见分晓，我只是需要尽快出院。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和同志们在一起，我有这样的计划…… 伤口已经不疼了，您再来时

带点辣腊肉和面包来”。

他又想起自己的朋友奥尔帕里，并且问道，“他现在怎么样？如果他仍然还是自由的，你无论如何去找他一次，他会照顾你们的。那是一位很忠诚的同志。”

我给奥尔帕里捎了个信，他第二天就找来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早晨上班前都来一趟，我深感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他有一天不来，我就想念他，因为我很需要他的那些聪明、考虑周到的意见。

奥尔帕里和库恩两家人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友情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我们曾经一起同甘苦共患难。

库恩·贝拉脑子里充满各种想法和计划，对自己的全身，特别是脑袋上还净是伤口完全置之度外。在十一天当中，他从未叫过疼，而总是在思考。他咒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那些部长先生，对于我没为了自己和为了他去求这些人感到非常满意。出乎医生意料，他的伤口好得很快，当第十二天我去医院时没有遇到库恩·贝拉。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小监狱去了，同其他共产党员关在一起。”我赶紧要求到新地点去探望他。

当我被带进小监狱时，看见被抓去的共产党员们列队站在走廊上。我不明白他们站队是怎么回事，只是朝坏处想：难道要把他们押送到什么地方去？…… 我走近他们时才知道这是同志们在等待欢迎库恩·贝拉。此刻库恩在监狱办公室办理登记。我也参加了等待库恩·贝拉的行列，只是站在了他们那排队伍的对面。他过了不一会儿就来了，走路还很困难，头上包扎着纱布。然而同志们的欢迎使他忘记了疼痛，也忘记了这是在监狱里。他很感动地感谢大家欢迎他。他发现有不少人没在这里，

就问其他人在哪里。别人告诉他，有几个人还躺在床上，伤还没好。

监狱看守人赶来，把欢迎者驱散，分别赶进各间牢房。我又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库恩·贝拉谈到那几天的工作计划。他指示我去找外边的哪些同志，说些什么，还教我应该怎样行动，免得给别人和给自己招来麻烦。我告诉他奥尔帕里每天去看我们，还帮忙出了不少好主意，他听了十分感动。他放心了，因为别人没把他的家抛在一边，于是又把话题转到运动方面来，“你们要争取有更多的人来探监。如果当局不准许，你们就在报纸上呼吁”。他自信而愉快，甚至还开玩笑。

经过这么长时间，许多事情都忘记了，然而有一点我还记得，那就是我们没有害怕。我们这些妇女每次在 28 路电车站上会合一起去拘留所时，看上去就象个旅游团一样。尽管流传着各种消息，被捕的共产党员们的自信心也感染了我们。有人说要把共产党员们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运送到法属殖民地去，到了那里必死无疑。还有人说，由于共产党员们煽动屠杀，要被绞死。这些谣言都未把我们吓倒。

领导人被抓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然而工人们的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对运动也越来越支持。由转入地下的萨穆埃里·蒂博尔领导的新中央委员会与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一起继续开展工作。新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在同库恩·贝拉保持着联系。库恩·贝拉在狱中热情洋溢地工作着，就象在自由的环境里一样。他有书籍、报刊，甚至还有打字机。拘留所有时就象是国会一样热闹，往往由于同志们围着库恩·贝拉谈事情，我还未来得及同他说几句话探视的时间就过了。

工人们对狱中共产党员们的关心使人感动。他们送去食

品、衣服和书籍。尽管告诉他们不要花费这么多钱，然而工人们仍然坚持这样做。以至于连我们这些去探视的妇女也能分享到。被监禁的共产党员们选出科尔文·奥托分发食品和各种礼物。其余的一应事务由拉斯洛·耶诺负责，他当过律师，在被捕前不止一次地为政治犯出庭辩护。当然，和监狱方面的交涉由他一手承担。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监狱长和全体管理员都力求同共产党员们和平相处，他们也感到了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库恩·贝拉在监狱时曾组织人同列宁取得联系。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过的，有两位同志，即富有苏联国内战争经验的匈牙利人内迈蒂·拉约什和参加了匈牙利革命的俄国人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担负了这项使命。弗拉索夫在1918年12月就曾作为党的信使去见过列宁。他带去了库恩·贝拉写在绸子上的信件。内迈蒂是1919年2月启程去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

“……有人捎来急信，要内迈蒂·拉约什停下正在外地开展的党的工作，快点赶到关着被捕的党的领导的拘留所去。内迈蒂立即动身了，他怎能不去呢？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用指甲抠开砌在监狱墙上的石块。然而需要他干更多的事情，那就是需他穿过前线，从白匪军眼皮底下经过，去找列宁……

“他用了六天时间就从布达佩斯赶到了莫斯科。在他担负的这一使命中，最困难的不是偷越前线和睡在运煤的车皮里，而是负有同列宁谈话的这个重大责任。

“内迈蒂·拉约什说，‘我坐得离他很近，看得到他的眼神，听得到他的声音，看得见他正在记录革命士兵讲话的那只手，那

是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我坐在他的对面，原原本本地转述带来的口信。但是列宁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甚至对我个人的看法也感兴趣。使我非凡高兴的是他竟然同意我的意见……我掏出《红色新闻报》，他立即在上面寻找库恩·贝拉的文章……他对'年轻的匈牙利革命者们'(他这样称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我觉得透过他的眼睛整个人类都在注视着我……'"①

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也完成了任务。他转交了写在一小块绸子上的信件，然后也象内迈蒂·拉约什一样，带着列宁的使命越过边界和前线回到匈牙利，找到库恩·贝拉。

这位1906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是位经验丰富的战士，他的一套地下工作的经验是在乌拉尔时由斯维尔德洛夫教会的。他小心谨慎地返回，首先去祖格洛找到土耳其药店的库房，原先俄国战俘就住在这里，他推开库房的门，细声打听形势如何。

回答他的是一阵哄笑。

"干吗还这样小声细气的？昨天晚上已经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了！"

那天是1919年3月22日。

政府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得知共产党人在狱中指挥运动，知道这些囚犯享有了不该有的权利。还听说工人们准备以武力解救这些共产党员。

有一天，库恩·贝拉的好友西克劳·久拉来找我。他早年就参加工人运动，此刻是一个警卫队的负责人。

他建议用他的汽车把我送到拘留所去。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且在往常离家去探视的时间出发了。到监狱以后，西

---

① 1961年11月1日《人民自由报》。

克劳向门卫作了自我介绍，并要求向监狱长比罗通报。不清楚出于什么考虑，比罗很正式地接待我们。西克劳说，他想探望库恩·贝拉。比罗回答说此刻不是探视时间，除非上司特许。那天，我们没能见到库恩·贝拉。西克劳把我送回家，讲定过几天他弄到许可证再来接我。

（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西克劳被关进监狱，苏联政府根据和匈牙利当局达成的换囚协议把他同其他许多无产阶级革命者一起接到苏联。他在苏联入了党。他一贯严守党的纪律，忠心耿耿。每当西克劳的同事和上级称赞西克劳工作出色和在政治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时库恩·贝拉总是喜形于色。

个人迷信时期所发生的那些违反法制的行为没有使西克劳放弃共产主义的原则。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夏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劳动营里。当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毫不抱怨地等待着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同命运的到来，甚至为他也被列入在个人迷信时期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不愿其存在的列宁式的干部的行列感到自豪。）

第二天，我焦急地又赶往拘留所，不相信他们还不准我进去。我心里想，肯定是有了什么新规定。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二话没说就让我进去了。比罗异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并且责怪我前一天不该把西克劳带来。他说他怕因此倒霉，因为西克劳是受社会民主党委托来检查共产党员们在拘留所是否真的享有过多的自由。他还警告我以后要多加小心。

我答应了，但是没能信守诺言，因为第二天司法国务秘书拉道伊来见我，说他想去看库恩·贝拉，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慌张起来。他看出我神色不对，安慰我说不要怕。说他前去不是办公事，只是同库恩·贝拉谈谈。

拉道伊当然被顺利地放进去了，库恩·贝拉立即被叫了来。谈话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完全，也不记得当时是否还有别人在场。拉道伊说，他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些关于俄国的事和那里的形势。库恩·贝拉半信半疑，谨慎地同拉道伊谈了有关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一些情况，然后把话题转向匈牙利的形势。他愤愤不平地说，共产党员要在“人民共和国”里坐牢，而且没有经过起诉，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他敦请拉道伊，作为司法国务秘书要为解决这件事出力。拉道伊答应尽一切可能这样做，并且询问了狱中的情况和有什么要求。库恩·贝拉回答说，他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获得释放。

拉道伊走了，我仍然留在那里。那天库恩·贝拉忙着写文章、制定方针，他要为开庭写好辩护词。

在这一期间，政府四面楚歌。一些最大的工厂先后转而支持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人组织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江河日下，工人们对他们不满，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并未使自己的处境好一些。有人扬言要组织暴动，搭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对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不满有增无已。其间，俄国红军已向喀尔巴阡山——匈牙利边境方向挺进。根据巴黎和会的要求，协约国代表向匈牙利政府递交了所谓“威克斯照会”①，照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宣布了匈牙利新边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同共产党人谈判。

库恩·贝拉3月11日在监狱里就写信给博加尔·伊格纳

---

① 指3月20日协约国驻布达佩斯代表团团长法军中校威克斯向卡罗伊总统递交的一份照会。——译者

茨①，其中谈到以共产党的纲领为基础实行联合的条件。这份历史文献（《联合文件》—1919 年）肯定对社会民主党人下决心起了促进作用。

这封信的理论部分（其中一个根本观点是阐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何以没有采取孟什维克的立场）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研究。我在这里只引用可以表明库恩·贝拉个人特点的段落：

“……谁在匈牙利执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有些人对此大费心机作了种种猜测，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次要的。我认为不应该由某几个人掌权，而要由无产阶级群众和代表群众的有胆有识的人来承担这个任务。我在狱中可以诚恳地表示，我无意在分配权力的时候分享一杯羹，而是有如在俄国时那样，在匈牙利也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对革命者来说，行动是真正的试金石……”②

3 月 21 日中午，我去看望隐藏在根德尔家里并在那里从事共产党工作的万图什·卡罗伊。我一进门，万图什就走过来同我拥抱，并且说“现在再也不怕有人来抓我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根德尔走进房间，向我解释道：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决定同共产党实行合并，接管政权，并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忙问在什么基础上合并？根德尔回答说，“在共产党纲领的基础上合并。您要是不信，我们到拘留所去，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肯定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商定回头根德尔到家里去接我，然后一起走。根德尔不一会儿带了一位名叫福劳戈·米克洛什的记者去接我，然后一同去拘留所。

---

① 博加尔·伊格纳茨（1876—1933），当时任匈牙利印刷工会负责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译者

②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 148 页。

拘留所门前已经站了许多人，其中有韦尔特奈尔、波甘尼①、朗德列尔和孔菲。这时大门紧闭，人们吵吵嚷嚷，然而看来里面并不急于开门。我以前不认识的韦尔特奈尔向根德尔打听我是谁。当他弄清楚我的身分后走近我，友好地作自我介绍，挽着我的胳膊朝一边走一边说，“库恩夫人，咱们三个星期以后就会死，不过是一起死”。我为他这种自我介绍方式感到震惊，几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如果您认为我们会死，为什么还来找共产党人？”我这样反驳他。“我们不想在弟兄之间进行残杀……我们不想毁灭在相互手里。”他这样回答说。当时的话是诚恳的，然而他们的行为很快就证明了言行不一。后来恰恰是在社会民主党人韦尔特奈尔及其同伙（他们“不想在弟兄之间进行残杀”）的合作下，许多共产党“弟兄”死于绞刑架。

正如我所提到的，切佩尔工人和瓦茨街各工厂的工人于1919年3月18日举行了群众大会，通过决议站在共产党一边，并要求解救被羁押的共产党员们。他们还准备组织武装暴动。3月19日召开的失业者大会要求以武力解救这些共产党员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月20日，一位法国中校（这个不足挂齿的军官名叫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递交照会，根据尊重“小国人民国家主权”的原则为西方民主索取一份厚礼。（连德布勒森市也被划到分界线以外。）就在这一天，同情共产党人的印刷工们停产，全国报纸因而停刊。拥护共产党的士兵和水手把大炮运上盖莱特山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辞职，把政权交给了社

① 波甘尼·尤若夫（1886—1939），1918年10月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主席，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先后担任国防、外交、教育人民委员。后在共产国际工作。——译者

② 布达佩斯的制高点。——译者

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信赖匈牙利共产党，想接受它的领导和要求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因此，应该同共产党人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除几个十足的右派分子之外，以朗德列尔·耶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了库恩·贝拉制定的方针，并且来到监狱。两党起草了联合宣言。匈牙利共产党方面在宣言上签字的有：库恩·贝拉、扬奇克·费伦茨（钢铁工人）、克莱普科·埃代（钢铁工人）、桑托·贝拉和瓦戈·贝拉。与此同时，各厂工人占领了比较重要的公共建筑物。共产党领导人获得释放。

1919年3月21日，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没有经过流血就取得了胜利。

3月22日，通过设在切佩尔的一台电磁发报机给列宁发出电报：

“匈牙利无产阶级于昨天夜里取得了整个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向您——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致敬。请向俄国全体革命的无产阶级转达我们的敬意和问候……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要求与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结成军事同盟。我们将手持武器，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①

莫斯科于九点十分回电。

“（列宁在场）我衷心地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向库恩·贝拉同志祝贺。您的祝贺我已转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大家都很兴奋。……”②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A）第8页。

② 《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播送贺词》，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96页。

库恩·贝拉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宣布："我们向全世界工人宣布，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社会党，并以全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名义创建了没流一滴血就接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

"匈牙利全国无产者一致决定站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旗帜下，并且要同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及全世界一切认清只有工人、士兵和农民共同采取革命行动才能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者一道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两股力量促成的。一股力量是工人、贫苦农民和士兵矢志不再继续当资本奴役的愿望；另一股力量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想以肢解领土来剥夺匈牙利的一切食品、工业原料和全部生存条件的行为……

"……我们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工人呼吁，并且要求他们全力反对本国想以饥饿的绳索绞杀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本家。我们把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置于国际社会主义的保护之下，决心面对一切进攻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库恩·贝拉代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全体人民委员。1919年3月22日于布达佩斯。"①

实行成人工作八小时、童工工作六小时工作制，雇工工资和实物收入增加一倍；别墅和财主住宅归无产者使用，庄园归农民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A)第7页。

苏维埃所有；劳动人民子女免费入学并享有助学金；劳动者休假照发工资；工厂、银行收归无产阶级所有；解放妇女；国家独立；实行新的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切就是建立了苏维埃的匈牙利头几周的成就。

列宁在一生中共作过八次留声机演说。这八套留声机片为后人保存了列宁的声音。

在这八次演说中就有一次是谈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和库恩·贝拉的：

“当库恩·贝拉同志在俄国作战俘时，我就已经同他很熟悉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到我这里来谈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收到了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通报并且是库恩·贝拉同志签署的通报以后，我们很想同他谈谈，并想更确切地知道这一革命的情况。……库恩·贝拉同志的答复十分令人满意，消除了我们的一切疑虑……而库恩·贝拉由于他的声望，由于他相信广大群众都拥护自己，立刻实现了一项法令，把过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匈牙利全部工业企业转变为公共财产。两天过去了，我们完全相信，匈牙利革命已经极其迅速地一下子走上了共产主义轨道……”①

列宁于1919年4月3日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说：

“……老人们常说：‘孩子们长大成人了，可以死啦。’我们不打算死，我们正在走向胜利。但当我们看到成立了苏维埃的匈牙利这样的孩子，我们说，我们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能完成自己的事业……”②

---

① 《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12—213页。

② 同上书，第240页。

我再引用一段列宁1919年4月17日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会议上的讲话：

“……大家知道，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辞职，自愿把库恩·贝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的。库恩·贝拉同志是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军官，他在俄国被俘后，曾在俄国共产党队伍中积极工作，参加过去年7月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的斗争。这位备受迫害、诽谤和侮辱的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现在事实上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①

现在我再引用1919年3月27日乌克兰前线的司令部下达的命令：

“转发各军、各师及各连队：顷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并且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新建的匈牙利苏维埃提出与我结成军事同盟。库恩·贝拉同志……要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帮助，愿与我共同以武装反对无产阶级的敌人……”

两个工人党的负责人在狱中签署了那份旨在防止同室操戈、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文件。

一小堆一小堆的共产党员议论纷纷，猜测前景如何。他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此行的目的，因为他们了解库恩·贝拉致博加尔·伊格纳茨的信件的内容。

我一直站在监狱的走廊上等候着，时间过得好象特别慢。共产党员们就革命问题大声发表意见。有几个人丝毫不掩饰他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88页。

们的疑虑，对签订协议不抱热情。他们不相信那些一个月前曾指使屠宰场工人挥舞着砍骨大斧进行反共游行的人，那些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人委员会的人——韦尔特奈尔、豪布里奇①、伯姆② 及其一伙会真心实意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更不相信他们在可预见的困难时期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走了，库恩·贝拉从里面走出来。他看来很激动，他对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当我们俩独自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们也许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但是错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我说我也从人们的表情上，特别是从年轻人的脸上感觉到了不满的神态。他报以苦笑，然后说，“我也不满意，但是为今日计别无他法。”

他接着又谈起来，从他的话中我也感受到聚集在走廊上的某些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那种不安。我开玩笑似地说，“内部已经出现反对派了，有人对协议有异议。”

库恩·贝拉没有反驳，也没有责怪“内部反对派”。他知道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然而他对革命形势充满信心，对向前挺进的俄国红军寄托希望。（俄国红军当时已经抵达塔尔诺波尔。③）④ 他信任匈牙利共产党的忠诚党员，相信这种合并能使群众更加革命。极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退缩，动摇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将不得不和这个党的左派领导人一起支持苏维埃政

---

① 豪布里奇·尤若夫（1883—1939），在苏维埃政府中先后任商业、国防人民委员，布达佩斯卫戍司令。后在派德尔工会政府中任国防部长。——译者

② 伯姆·维尔莫什（1880—1949），卡罗伊政府中任国务秘书，苏维埃政府中任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45 年回国后任匈驻瑞典公使。——译者

③ 苏联乌克兰的蒂耶尔诺波尔市的旧名。——译者

④ 库恩·贝拉在一篇回忆萨穆埃里·蒂博尔的文章中写道：

权，否则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以后进程中将被淘汰。库恩·贝拉坚信，社会民主党的有些负责人是真心实意地努力实现共产党纲领的。

除主观上的积极因素以外，他还寄希望于客观的革命形势，设想俄国红军很快就能同刚建立的匈牙利红军会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防卫是有保障的！”他曾经这样说。他认为周围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效法匈牙利的榜样将是个不可低估的因素，因为电讯不断传来那里群众反抗和罢工的消息。在德国，内战正在进行；在捷克的克拉德诺矿区已燃起烽火；在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展开了革命斗争；罗马尼亚发生了罢工；法国军队的某些师团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在南斯拉夫、意大利……总而言之，欧洲革命或至少说中欧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库恩·贝拉说，“红军将越过喀尔巴阡山来，此时不夺取政权将铸成莫大的错误。”“政权已经在握，我们可以在行进过程中改进不足之处。何况国内的反革命正在集结力量，坐等反革命势力壮大是罪过，谁知道他们一旦发动进攻将造成什么结果！”

不管怎么说，事实毕竟是：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合并成为一个党，按照共产党人的纲领接管了政权。

两个工人党合并的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有无其他解决办法？总共刚刚建立起九十天的共产党

“蒂博尔对两党合并兴趣不大，表现出不安，然而他接受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现状。在实现专政的第一天，当我象对别的共产党人那样对他说，‘可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因为事情太顺利了’。但他也象我一样寄希望于未来，他也认为俄国红军已经开过来，我们可以很快同他们会师（3月18日曾有红军的一辆装甲列车到达塔尔诺波尔，从喀尔巴阡山方向不断有人报告说已听到从加利西亚传来的炮声）。他还希望一旦同苏维埃俄国建立了共同边界，那就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援助，而且在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支持。”

在不具备完整组织体系的情况下拒绝共同接管政权是否明智？（也许那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强共产党的力量——尽管迄今还没有人研究过这问题——但反革命力量也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且不说俄共是与孟什维克经过了十四年艰苦的斗争才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还有过1905年的“演习”），如果共产党拒绝了旨在避免“同室操戈”的合并建议，那么社会民主党会不会利用遭到共产党拒绝合并的借口而把失去的群众重新争取到自己一边？……

库恩·贝拉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特别是在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所撰写的文章和讲话中，从不掩饰而总是承认错误与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甚至认为他夸大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认为在革命的最初几周或最初几个月可以完美建设新的国家制度，那纯粹是天真的幻想。

“……只有不行动的人才不犯错误”，库恩·贝拉在匈牙利专政失败后被奥地利当局监禁起来的施泰因霍夫集中营中写道“袖手旁观的人，不肯为革命肝脑涂地的人，……逃避责任的人……，对革命及革命成败只在口头上表示赞成或反对的人是不犯错误的，然而他们却是在犯罪。”①

“……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渡过攻击的大海，越过诬蔑的高山。攻击的大海是由恶意的愚蠢行为的河流汇合而成，诬蔑的高山主要是由那些其视野的最远点不超过自己鼻子尖儿的近视者堆积而成……”②

“……我们履行了革命义务，没有吹毛求疵，没有怠工。我们不等待别人替我们搞无产阶级革命，在恶劣的条件下不回避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382页。

② 同上书，第384页。

责任。我们不仅赞同或不反对革命事件，而且作为革命者采取行动。我们在准备进行新的斗争时深知，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先锋和国际主义者，这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也见之于行动。虽然国际帝国主义的洪水淹没了世界革命中名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个小炉灶。然而在为世界革命的巨大熔炉苏维埃俄国同国际反革命浪潮搏斗中我们比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恰恰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建立时，反革命浪潮达到洪峰。”①

库恩·贝拉1929年1月在为伊雷什·贝拉的小说《蒂萨河在燃烧》写的序言中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个思想：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具有代表性，不仅仅是因为它犯了错误，也因为它有着许多崇高和美好的方面所发射出来的光芒……十年来的自我谴责已经足够了；现在该是我们向人们——特别是对那些在这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的青年——指出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正意义的时候了……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减轻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负担，而且，正当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际和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刻，它把国际的反革命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共和国红军的斗争，阻止了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要想实现通过比萨拉比亚入侵俄罗斯的企图，这一企图事先已经制定好了计划，由于把驻在萨罗尼奇的法国军队开始装上火车和运往罗马尼亚，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部分执行；而且，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在中欧和西欧，只有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和年轻的、刚刚诞生几个月的匈牙利共产党抱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勇气和决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382—383页。

心。……从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范例里，我们不但可以学习和接受过去的错误教训——本来我们就不断地对这些错误作无情的批判——，而且也学习到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同时也必须主动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而不必等待别人，也不必让别人鼓励说：

约歇雷，你的靴子大，

你在前面走……。”①

那些以反历史的轻率态度批评库恩·贝拉当年的努力目标和为完成当时的任务所进行的斗争的人，忘记了在伟大的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里，除了俄国自身实现了的变革以外，从当时的现实国际形势出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也在为同样的目标斗争。“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万岁！”② 列宁在 1919 年 5 月 1 日的讲话中说。“……全欧洲联合成为一个消灭全世界资本家统治的、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列宁，1919 年 6 月 15 日。)③

“……你们亲眼看到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巴伐利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④ (列宁，1919 年 4 月 16 日在莫斯科苏维埃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上的讲话。)

正如俄国革命所做的那样，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除实现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之外，还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

---

① 《蒂萨河在燃烧》，作家出版社 1962 年中文版。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294 页。

③ 同上书，第 470 页。列宁讲话日期应为 1919 年 7 月 15 日，原书有误。——译者

④ 同上书，第271页。列宁讲话日期应为1919年 4 月15日，原书有误。——译者

争，将本国革命视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库恩·贝拉于1919年4月22日给列宁写信道：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没有威克斯上校（原文如此。——译者）照会，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会爆发，然而我认为如果不利用这个事件无疑是坐失良机。概念化地思考问题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只把形式，而不是把精神实质视作马克思主义方法，他们当然难以理解在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流血革命以后，在匈牙利所发生的转折怎么会如此平和。很说明问题的是，正是这个事实使谢德曼之流感到痛苦。匈牙利革命无疑将要流血，而且会大量流血。反革命现在已经开始抬头，然而在他们的头抬起来之前我们将要砍掉它……

“……我们的情况是危急的。然而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的一切都要以世界革命为前提。我们没有任何为了国际革命的局部利益牺牲世界革命利益的念头。如果有布列斯特和约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也将抱着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抱的态度签署这样的条约……”

过分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人、匈牙利革命英雄的错误（在革命工人运动内部，在不同时期总有人醉心于鞭笞错误）只能对反革命有利，只能使那些几十年来对匈牙利历史上最光荣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和匈牙利共产党的英勇斗争泼污水和极尽污蔑能事的人拍手称快。

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库恩·贝拉一人的人也不公正，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风马牛不相及。不能武断地和抛开一切主客观因素把全部责任推到一个人身上。我认为，这是个人迷信思想的变种。

我有时曾经想，如果说库恩·贝拉在某些事情上做得不对，

那首先是在声明“我经受得住一切”的同时，把所有失败和未竟之业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他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又分开了。他留在监狱里，我回家等待。晚上有人来找我，要我到根德尔家里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与其间被释放的库恩·贝拉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在伊丽莎白弯路上的社会民主党书记处同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就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举行了联席会议，然后在根德尔家讨论建立人民委员会问题。当我和鲁道什·拉斯洛妮和塞凯伊·贝拉妮① 一起赶往根德尔家的时候，街道上已出现工人纠察队，在我们没有讲明自己的身分和说出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们不准我们通行。

人民从瓦戈·贝拉的讲话中得知事情的真相。瓦戈在党中央的窗口向群众宣布：卡罗伊政府已经倒台，工人、贫苦农民和士兵苏维埃接管了政权。

……我们来到根德尔家，在那里得知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并且宣布在共产党纲领的基础上两党实行合并。这时已经任命主持各方面工作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直到黎明才结束。

会议开完之后大家都回家了。我同库恩·贝拉一起也离开那里，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库恩·贝拉被捕以后，我搬出了在经纪人街的住处，因为暗探和记者不时去打扰。我们临时投奔一个亲戚，一间小屋里住我们四口人，再也容不下库恩·贝拉。我们站在街上考虑应该怎么办，有哪里可以去。正在我们在那里冥思苦想的时候，发现后面走过一个人来。他是文采·

① 塞凯伊·贝拉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曾任副财政人民委员。

山多尔，也正要回家。“你们去哪里？”他问我们。“我们自己也正想知道应该去哪里，”我们这样回答。我们告诉他无地容身。文采·山多尔好不容易才弄清是怎么回事，然后安慰我们说，“马上就会有地方，走吧！”

佩斯上空渐渐明亮的霞光预示着一个瑰丽的黎明即将到来。这时散步是惬意的，然而在经历过那样的重大事件之后最好还是休息一下。我们来到阿斯托里亚旅馆，走了进去。文采要租房间。“没有空房间！”看门房的人说。“应该有！”文采同他争辩。“什么叫应该有？要是没有呢？我不能把任何人从床上拉起来！先生们，请不要打破夜晚的宁静。”看门房的人想把我们搪塞出去。他显然以为我们刚过完一个放荡的夜晚，喝了过量的酒想到这里来休息。

文采·山道尔只是微笑着，然后把这个值班的人叫到旁边。告诉他是谁想借房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值班的人知道真相之后的表情。他似乎以为自己在做梦，他显然以为库恩·贝拉仍在监狱里。当他明白过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后，很快取来钥匙并叫来一个管事。管事的陪同我们上去租给我们两个房间（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住的是第几层），并祝“同志先生”们晚安。鞠了足有十个躬。

我们终于住了下来，我们两人又单独在一起。我们躺在床上感到疲备不堪，但又无法睡觉。我懂得在这种时候不该多问他什么。我闭上眼睛，终于入睡了。

当我一觉醒来时，库恩·贝拉已经穿好衣服，说让我不要等他回家，因为整天都将很忙。他说自己现在就动身去“维谢格拉德街”。“维谢格拉德街”的话音刚落，他早已走出房门，为的是不让我看到他提起这个街道时的面部表情……

第十章　苏维埃共和国

一

我记得是3月21日星期五傍晚，当几乎完全受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工人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匈牙利共产党也在原众议院大厅召集党员大会。大会正在进行的时候萨穆埃里进来了，宣布了两党合并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这消息引起了爆发般的欢乐，大会结束后与会者涌到街上举行了游行。第二天，在党的另一次会议上萨穆埃里·蒂博尔宣布：人民委员会主席由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加尔巴伊·山多尔担任。

宛如当头一瓢凉水，会议一片沉寂。

他接着宣布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名单。除两个人以外，人民委员全部是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得到的只是副职。

会议只是当萨穆埃里宣布处交人民委员由库恩·贝拉担任时才开始出现一点活跃气氛。萨穆埃里还说，库恩·贝拉以政府名义就匈牙利发生的事和建议成立军事同盟向列宁发了电报，会议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会议结束了，共产党员们以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会场。

不少共产党员会后来找库恩·贝拉，这几乎是一种习惯了。

库恩·贝拉一言不发地听着，最后他说："共产党员之所以

是共产党员，就是为了克服一切困难。”他举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例：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不止一次地面临困境，但最后终于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现在对我们来说，”他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党所指派的岗位上认真地工作。”

我记不住他的每一句话，但他讲的主要内容我是铭刻在心的。他热烈地、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

“匈牙利共产党只成立了九十天，这是多么短的时间啊。固然，我们拥有不少群众，可是应该看到，我们在组织上远远落后于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社会民主党和他们的工会，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时间是我们的同盟军。俄国红军正在向我们开来，同我们会合。我们周围的国家里无一不充斥着世界革命的风暴。旧的欧洲已经发生了动摇，中欧若干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联盟已指日可待。而我们，要为加强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而竭尽全力。我们现在不应该犹豫，而是应该工作、工作，以十倍的力量工作！这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绝非易事，而保持政权、建立不折不扣的苏维埃国家，更需要气壮山河的斗争，然而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一切都在变，要作好充分准备。今天无法实现的事，就让它明天实现。任何一个党员都不要成为将要出现的社会主义匈牙利的一粒飞尘，而应该是它的坚实支柱！”

我感觉到，尽管他侃侃而谈，而且对自己的目标深信不疑，但他的情绪并不象平日那样轻松。

当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但他默然不答。

我不禁为之后悔。

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回忆

罢了。

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他当时就是这样看的——光是问问题、提建议而没有行动是不能改变现实的。

二

有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研究匈牙利共产党的诞生和它的初期历史时，虽然他们力图揭露个人迷信时期对历史有意的歪曲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他们往往还是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他们在运用辩证法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方式。他们刚把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写成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但几页以后却以事后聪明人的口气把1919年在匈牙利发生的“世界意义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大张挞伐，说得一无是处。

遗憾的是我已既无时间，也无力量把一系列老的和新的违反历史的论断一一加以剖析。

幸而现在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不怀个人偏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增加，我相信那些混乱的和错误的看法终将被纠正。

我坚信不疑，有不少著作给了我这样的信念。

即使在困难的，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年月中，革命的乐观主义从没有背弃我。这应该感谢库恩·贝拉。

应该感谢他对我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使我在他逝世后二十五年的今天依然感到库恩·贝拉在我身边（但不光在我一个人身边），他在帮助我。我知道，他留给我们的记忆将随着时光的推移更显出晶莹的光芒，这光芒将伴随我们为实现他当年为之生活和战斗的目标奋勇前进。

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不久，一个明媚的春晨，我前往拘留所去取回库恩·贝拉3月21日因为忙乱而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东西。

他的东西大部分是书籍，还有一架打字机，当然，还有几件内衣。那时我们很需要打字机和内衣。

当我把东西收拾好向拘留所长官比罗“告别”。这位比罗先生“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他当时为共产党员特别是为库恩·贝拉做了多少好事（我想，他差不多想说“是为了优待才请库恩·贝拉进来的”了）。我一言不发地听着。我深知，此类人物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果然，他把本意递过来了：

“我很热爱自己的职业。我希望能够留在这里。我有专业知识……请您相信，在这方面我有不少经验。”

他希望我能在库恩·贝拉处为他说项。他用的措词是“您的丈夫。”

一个不很礼貌的回答滑到我的舌尖，但我还是把它咽下去了。我不愿听别人对我说不礼貌的话，自己也不愿说。

其实我是很想一吐为快的，因为当我在收拾库恩·贝拉的东西时，看到了一个场面：

一个看守带进一个男人。这位长官称他为“伯爵大人”，然后蹑手蹑脚、知趣地走开了，好让这位“伯爵大人”在角落里和前来看望的妻子谈话。（这个贵族因进行反革命煽动被拘捕。）

当悄悄话说完，两人的讲话声高了起来。我听见这位伯爵要桌布、床单、餐具和食物。伯爵夫人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伯爵要求每天送两次食物，并且“我不希望食物不新鲜”，咖啡要放在暖壶里送来，因为“咖啡不烫味道就差得多。”

我想起了库恩·贝拉在这里是怎样被打得昏迷不醒的，挨完打之后是怎样被浑身血污地扔在冰冷的地上。我想起了他们不肯送库恩·贝拉去治疗，最后虽然送了，但在狱医那里又把他毒打了一顿。后来之所以不再拳打脚踢，是因为这些警察“同志”以为他就要咽气了 。

而我别说不能给库恩·贝拉送衣服，就是给他写一行字也不允许。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谓平等。

伯爵的要求，拘留所长官的愿望都引起我的思索。我默默地和赛莱什·玛利什卡(关于她，我在后面还要说)两人收拾好库恩·贝拉的东西，带回了家。

拘留所长官鼓吹自己是专家，向一度被他手下的人打得半死的库恩·贝拉谄媚，……这种事当时曾经使我非常吃惊。

在旅馆里，一天早晨(也是在刚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头几天)我们被吵醒了。

库恩·贝拉走到窗口，想看看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口挤着一大群人，他们在进大门。

这些群众是找库恩·贝拉来的。

房间里挤进来了十几个人，我还躺在床上(那时还不到七点钟)，库恩·贝拉刚在穿衣服。

究竟是什么事使他们着急到连等库恩·贝拉穿完衣服都来不及？挤进来的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库恩同志！前天夜里我们小猪被偷了。请您行行好！我太穷了……”

“库恩同志！我也穷得要命，喂马的饲料也没有了。您能不能给我写张条子给饲料中心……？”

“我儿子得了痨病……劳驾您给我帮个忙，让他进疗养所，现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库恩同志，我的丈夫老揍我。您得给我作主，不是说男女平等了吗？”

“我结婚了，可是没有房子，也没有家具……”

“我住在小佩斯。楼板三年前就漏了，可是那混账房东不肯修……我忍啊忍……可是现在劳动人民掌权了，对吗，库恩同志？”

库恩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诉说。看得出来，他多么想把那得肺病的孩子送到疗养所，把坏了的楼板修好，把偷小猪的贼抓住……

他一面穿衣服，一面对这些人说，把要求写下来，送到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写清楚是送交库恩·贝拉的。只要要求合理，而且做得到，他一定尽力办。

……这样的会见每天都有，来访者中间出现了不少特别的人。他们往往满面堆笑，不声不响，四下看来看去，然后突然在某一个时候大声（大到每个人都听得见）提出事实上无法满足或是和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相干的要求——譬如：要钱。

看来要找比阿斯托里亚更合适的地方住了。要找能使首脑机关、人民委员等都在一起的地方，而主要负责人则能尽量住在同一层楼。所以我们迁到匈牙利大旅社，这旅社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要比阿斯托里亚旅馆合适得多。

匈牙利大旅社主要是外地来布达佩斯办事，又借机寻欢作乐的地主们憩息之所，当然也住着布达佩斯的工厂主、商人、富翁。匈牙利大旅社是他们的小行宫，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牌局、美女、呼么喝六，甚至世界大战和紫菀花革命也没有使

他们停下来。

旅社业管理局通知住在匈牙利大旅社的客人于规定时间内离开，这些拥有舒适住所和宅第的老爷先生们借口“侵犯人身自由”群起抗议，但他们终于看到，这次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不是紫菀花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只好一个个销声匿迹了。最后使用的办法是买通茶房，继续在这里谋求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但是管理部门事先也安排了对策。

3月底匈牙利大旅社腾出来了。机要、行政、军事和党务的领导机关及主要领导人、因急事到首都出差的地方政府成员以及一部分没有地方住的同志搬进了旅社。

我们在三楼分到一个两间住房的套间，住五个人：库恩·贝拉、我姐姐、我女儿、赛莱什·玛利什卡和我。

库恩·贝拉另外还有两间办公室。

赛莱什·玛利什卡在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家里每个人都工作，一应家务杂事、办公室清扫、照管四岁的阿格奈丝都由她一人负责。

赛莱什·玛利什卡的遭遇很有代表性，所以我提前说几句。

这个农村姑娘是个孤儿，为了寻找工作来到城里，先是在一家阔佬家当保姆（那时叫“女佣”），主人对她还不错，但使玛利什卡最不能忘记的却是在我家第一次发生了“主人”请她同桌吃饭那件事。第一天，当我们请她在桌旁坐下时，她满脸涨得通红，坐下以后便哭了起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玛利什卡第一次看电影也是我姐姐带她去的，还小声把银幕上的字幕说给她听。

（关于她这时候的照片也很少。由于各种原因照片差不多都丢了，说得准确些——被毁了。仅有的一张是她和阿格奈丝

在一起。）

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赛莱什·玛利什卡也被捕了，她被指控为库恩·贝拉的“同案犯”，关了两年监狱，获释后依然被置于警察的监护之下，这意味着她找不到正常的工作。而且每年“五一”劳动节以前几天以及每逢社会上有风吹草动，她总要被警方拘留若干天。

赛莱什·玛利什卡兴奋地迎接了解放，她以为终于自由了。但个人迷信年代她又被开除了公职，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领不到养老金。

她的“罪状”就是1919年在库恩·贝拉身边（其实只是做家务），但这“罪状”几乎使人以为是万劫不复的。

直到1957年，当开始清除个人迷信的时候玛利什卡总算得到平反。

1957年，阔别三十八年以后我们全家回到匈牙利，但那时只是短期作客，1959年才回国定居，一路上我一直想：玛利什卡怎样了？她还活着吗？

就在到达的第三天，还在打听的时候，已经当了祖母的玛利什卡前来找我，而我也已经是外祖母了。

共产党人以及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日以继夜地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操劳，尤其是苏维埃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更是这样。

人民委员会的各级机构都是初具雏形，因此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以及库恩·贝拉不仅需要起草大量规章、命令、通知，而且往往还要参与许多技术工作和具体事务。起草、口授文件，直到把决议、命令、通知分发到有关单位，几乎事必躬亲。白天由于

要出席苏维埃政府、工兵苏维埃(布达佩斯五〇〇委员会)以及各类大会、去外地视察、接见外交使团代表和记者等，因此这些工作都只能在晚上做。

库恩·贝拉除了上述工作外，还要参加外交和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从来也没有象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一百三十三天内那么少。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关于库恩·贝拉个人的回忆不多。一清早他匆匆离去(我也去上班)，晚上，当他回来时，我早已入睡。每天如此，他的工作量大得惊人。

库恩·贝拉估计到了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民委员会有些斗争，同时也估计到了某些左倾分子会把自己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划等号。错误地批判形势，越轨盲动。

有两个小插曲很说明问题：

有一次在城堡山上(但也许是在国会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们第一次（但也许是第二次）公开露面。

当工人们看见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委员——特别是某些前几个星期还咒骂共产党是凶手、是极左反革命、应该千刀万剐的那几位委员时，四处响起了嘘声，还有不少人高喊："快辞职！""滚开！"，但同时也有人喊："安静！不要乱叫！""维护团结！"

事态正向不愉快的方向发展。

这时库恩·贝拉在台上出现了，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宣布：将在保护团结的前提下改组苏维埃政府，同时向大会保证实现共产党人的目标。

大会顺利进行，但留下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

有一群自称“左派共产党”的人(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纠集了一部分出于种种不同原因而心怀不满的群众。

这些“左派共产党人”要求苏维埃政府辞职，而由清一色的共产党人接管政权。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中他们只“允许”库恩·贝拉和萨穆埃里留下。

库恩·贝拉把“左派共产党人”的领导人请来，请他们阐述自己的论点。

他们这样做了。

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实行他们的纲领，将会引起一场灾难。

库恩·贝拉对他们作了详尽的分析，用材料、事实、数字向他们说明此路不通。

但是毫无效果。固执的年轻人要求实行最最革命的红色恐怖，他们说：“与其这样前进，宁可立即灭亡！”

库恩·贝拉的每一句话都等于火上加一瓢油。

一个“左派”领袖终于吼叫起来了。一直是苦口婆心的库恩·贝拉也失去了自制，揪住这位领袖的领子拉到门口，顺手给了一个耳光，然后推出门外。其余的“左派”年轻人也一个个吃惊地走了。

库恩·贝拉并不认为这件事值得重视，因为这些叫嚷得很凶的人里面没有几个工人，主要只是些脱离实际的年轻知识分子。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不高兴。

匈牙利大旅社的客人变更了，但那习惯于侍候显宦富商、太太小姐、拿惯小费的茶房，除了一小部离开以外，大部分都留下了，他们认为眼下这些新贵远远不配得到他们的服务。

起初他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工作、打扫，如果有人要求，也可

以象从前那样把饭菜送到房间里。

饭菜在头几天还可以，但质量逐渐变坏。不仅饭菜，其他服务项目的质量也明显地下降。

怠工开始了。服务人员不来打扫了，水管被毁，连澡也洗不成。饭菜变得无法下咽，而且服务态度的恶劣程度与饭菜质量的下降好似在展开一场比赛。服务人员完全失去了约束。

我们了解到，他们给自己单做好的饭食，同志们提了意见，管理局派人前来检查时，他们不是把给人民委员、党的领袖及家属们吃的饭菜，而是把自己单做的拿出来供检查。

起初检查人员发现不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但最后还是发现了给我们准备的饭菜锅。在检查人员的追问下还查清：这样做除了他们自己得到美餐以外，还是一个反革命预谋。原来在布达佩斯不断有人宣传：老百姓只能按票领到最低的口粮，而政府领导人及家属却每日珍馐佳肴，美食无度。“不信？请到匈牙利大旅社来看看！”他们请各区的妇女到厨房里，摆出给自己准备的饭菜：“这就是人民委员和家属们吃的！”

不消说，这个“实物展览”收到了极大效果。当时首都供应确实很差。四年战争的结果是农村遭到破坏，运到首都的食品严重不足。

有组织的反革命宣传还威胁匈牙利大旅社里正派的服务人员：如果他们胆敢让共产党吃得舒服，那么一旦苏维埃政权垮台——这在当时是每天都可能实现的——他们将受到法律审判。

有一天——是在检查以后，已经不做两种饭菜了——中午时分，许多来自工人区的家庭妇女排着长队来到匈牙利大旅社门前，要求看看人民委员和家属吃的什么。

库恩·贝拉的女秘书蒂玛尔·赛蕾娜① 走到旅社门口，想把这些妇女们打发走，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闹得更厉害了，妇女们深信她们的怀疑是正确的。

听见吵闹声，库恩·贝拉下去了，当他了解争论的内容时便建议妇女们推选个代表团（几百个人不能都拥到旅社里面去），在里面爱看什么就看什么。

妇女们的代表进去了。先看住房，打开柜子，看看贮藏室，甚至还打开箱子，走进浴室和厨房，但没有任何东西可证明她们的怀疑哪怕有一点根据。

我当时正好从教育人民委员会下班回家，出于好奇，我尾随着这个“检查团”。在厨房里有一个妇女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吃得比我做给丈夫的还坏！”我不禁笑了起来。

显然，反革命分子选中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处和伙食进行恶意宣传不是偶然的，他们知道，用这种办法最能引起同情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感，甚至还能影响与小资产阶级持相同观点的那部分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后来在霍尔蒂时代这种办法也不止一次地用来诬蔑共产党人，说什么人民委员不但高官厚禄，还赤裸裸地把银行存款、金银首饰据为己有或私运出国等等，等等。伯爵、军官、御用文人都这么说，这么写。但是，抢劫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驻奥地利使馆的不正是他们吗？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打算用来购买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这一亿五千万克郎和外汇被劫后，伯爵们从来也

---

① 蒂玛尔·赛蕾娜是工人运动的老战士。早年是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直到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为止，一直担任库恩·贝拉的秘书。她和我们始终保持着如同家人的关系。我们都喜欢她的坦率、真诚。两党合并时，她怀着坚定的信念站到共产党人一边，并且作为共产党人于1946年死于斯大林的冤狱之中。

没有向国家交回过，虽然反对党直到1925年还敦促过他们这样做。）

因为大门口没有设警卫，到匈牙利大旅社里以找人为借口形迹可疑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大门入口处要检查了，但旅社的服务人员还是把他们的“客人”放了进去，因此，到后来在每个门口都设了岗。

列宁青年

警卫队员自称“列宁青年”，库恩·贝拉办公室门口也有几个值勤。

这个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于是走廊里许多陌生的脸消失了，冒充进来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接待”。一个貌似市民的人很可能是从维也纳或是塞格德① 派来的密探。反革命政府（当时有许多个反革命政府）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力量。有一次保卫人员还抓住了一个伯爵。（只抓住一个伯爵，没有第二个。因为伯爵们为了享受美食、肉欲，是不肯轻易以自己的肉体试一试无产阶级的警惕性的。不过不管怎么说，看来贵族们的胆子多少还是大些，因为被抓住的密探中连一个银行家或工厂主也没有。）

匈牙利大旅社对于反革命活动已经相当不方便了。但国内外反革命组织和他们的代理人又不甘寂寞，便转而采取大量寄送诬蔑、恐吓信给人民委员、给在匈牙利大旅社中工作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办法。

库恩·贝拉在收到恐吓信的数量方面一直是冠军。

---

① 受到法国支持的霍尔蒂·米克洛什的反革命势力在塞格德。——译者

他对反革命分子的这些手段嗤之以鼻。但是我却不由得恐慌起来。我不光担心库恩·贝拉的安全，还怕阿格奈丝和姐姐遭到不测。因为有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对你家中的每个人都要干掉！"

在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后没有几天，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建立匈牙利红军的命令。

当时没有战争，毫无战斗力的匈牙利军队宛如一盘散沙驻扎在1918年11月—12月由路易·费利克斯·马利·弗朗索瓦·弗朗歇·德斯佩里① 等人确定的分界线上。对于这位挂着一长串名字的法国贵族将军来说，别的国家和人民是分文不值的。他在中国和摩洛哥的殖民战争中取得的"珍贵"经验也用来对付匈牙利。但巴黎和会认为与匈牙利谈判用不着这么一个大将军。于是在1919年3月20日由一位姓氏短得多的无名小辈威克斯中校向匈牙利递交了一份早在2月26日就起草的臭名昭著的照会，通知匈牙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德布勒森、奥罗什哈札、霍德梅泽瓦沙尔海伊、塞格德等城市及其郊区割让出去。

这份照会是在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以前递交的。

后来，一些历史学家们当写到这段"罪恶的布达佩斯"时期的历史时居然把事情说成：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把匈牙利在巴黎和会上的"优势"弄毁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不少饱学的人持这个看法。

---

① 弗朗歇·德斯佩里（1856—1942），法国元帅。参加法国1900年的对华侵略战争及1912年对摩洛哥的侵略战争 1918年任巴尔干协约国军司令，1919年任驻匈的协约国军司令。——译者

是真的这样看，还是出于某种考虑？——我想，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紫菀花革命政府既不敢拒绝，也不敢接受威克斯照会。当年被视为楷模、有口皆碑的西方民主如今面临这个难题，实在使他们进退维谷。其实所谓难题也者只是对于紫菀花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

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坚决拒绝了威克斯照会。就象当年法国公社时的巴黎人一样，匈牙利无产阶级着手组建革命军队。

紫菀花革命的国防部长曾说："我再也不愿意看到军队了。"这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的口号，而是对革命化的武装士兵的恐惧心理。但是苏维埃政府是愿意看到军队的。

国防人员委员会建军部的负责人是明尼赫·费伦茨、施泰因布吕克·奥托等可靠的、大都经过俄国内战锻炼的共产党人。

建军工作开始了，对于某些急性子的人来说虽然缓慢、然而实际上红军却是以惊人的速度组建着。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五星期，布达佩斯一些大工厂的武装工人已经在安德拉斯大街①执勤了，他们受苏维埃政府领导。

"……人们看到的不再是打家劫舍的败兵，而是自觉的、朝气蓬勃的、纪律严明的工业无产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依靠这些队伍，因为他们必胜……"②

虽然有不少曾经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军官忠诚地在红军中工作，但还是深感专业军事人员的缺乏，要培养新的却又非一日之功。

---

① 布达佩斯的主要街道，今称"人民共和国路"。——译者

②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191页。

忠诚的旧军官的代表人物是斯特隆费尔德上校①，他是大家都熟悉的。此外还有沙劳伊—萨波、贲利奇等。这里我还想提出雅斯·德热同志。他是旧军官中第一个报名参加红军的，参加了组建第一〇一红色步兵团。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雅斯·德热几乎参加了每一个重大战役——蒂萨河以东地区及绍尔戈陶尔扬之战、参加了北征② 和解放考绍③ 为建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几次战斗以及强渡蒂萨河……都有他的身影。

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他没有失望。当他流亡到国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工人阶级而战。他先是在斯洛伐克的《考绍工人报》编辑部工作，后来在罗马尼亚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革命爆发后，他在那里战斗。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参加抵抗运动。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他逃脱了。谁也说不清这位在 1919 年变成了共产党员的旧军官还在哪里战斗过。不仅如此，他还写过不少历史论著，我记得其中一篇论文是谈法国的加尔文派活动的。

还应该提到，1919 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为周围国家锤炼了不少战士，而这点过去是谈得很少的。

……库恩·贝拉对北征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给予了很高评价。无怪在考绍解放后的第二天 1919 年 6 月 10 日，他在考绍市政大厅阳台上向欢呼的群众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红色战争的真理性：

---

① 斯特隆费尔德·欧列尔(1878—1927)，匈牙利红军总参谋长。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捕入狱。1925年参加共产党。1945年匈解放后被追认为上将。——译者

② 匈牙利红军对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军队的一次作战。其结果是成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译者

③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译者

“……考绍的无产者们，我们解放了你们……红军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象捷克帝国主义分子所做的那样来压迫你们，而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对我们说来，任何一个劳动者，不管他说什么语言，都是无产阶级兄弟。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也不管他们说什么语言……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专政……我们将赢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①

为对付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成立了“革命法庭”，由一名“老”党员拉科西·费伦茨博士担任首席法官。（拉科西·费伦茨是两党合并前参加共产党的。当时他的党龄为九十天。是个“老”党员。）

科尔文·奥托和绍洛伊·伊姆雷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两位主任，负责清查反革命。他们全力以赴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

为了革命，他们先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科尔文于1919年被反革命法庭处决。十三年后绍洛伊奉命从国外回国组织地下党被捕，被判死刑。他高喊“匈牙利第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库恩·贝拉万岁！”从容就义，追随战友于地下。

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级专政机构以及解决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的各项问题给共产党人带来了大量工作，这里还没有包括因两党合并而出现的一些困难。对于后者，共产党事先是有所准备的，但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袖虽然从口头到文字都信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227—228页。

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而奋斗，但苏维埃共和国刚呱呱堕地，他们立即就从背后向共产党发起了进攻，这实在是非始料所及。

韦尔特奈尔及其一伙迫于情势固然同意了发布革命的法令、指示，但一当执行，他们便多方掣肘直至加以阻挠。为制止反革命活动而制定的法令，右派和中派① 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在“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幌子下加以一笔勾消，甚至不惜为之与共产党人和与共产党人共同战斗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公开冲突。

每当参加这种会议回家，库恩·贝拉总是情绪很不好，除了骂韦尔特奈尔和几个帮凶以外，他最痛恨孔菲这个“小人”，说他永远动摇，但最后总是倒向剥削阶级一边。

这些人首先向《红色新闻报》发难，多方指责报社中的共产党人以及报上发表共产党观点的文章。

《红色新闻报》的文章都是态度严肃、充分说理的，（他们通常事先听取过库恩·贝拉的意见），旨在唤起工人反对反革命力量秘密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公开的活动以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对反革命的无声支持和包庇。

为了维护党内团结（这在当时是无产阶级专政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暂时还不能给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有害活动以应有的强有力反击，同时，为了让工会会员认清某些领导人的真面目也还需要一个过程。

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企图用各种口号

---

① 中派是第二国际内部以考茨基为首的政治力量。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要求保持“党的统一”，实现“党内和平”。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实际上和右派势力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译者

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指望一旦资产阶级复辟，对他们便可论功行赏，宽恕他们参加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罪过。

尽管有无产阶级专政必败论的煽动以及各类困难（原料缺乏、粮食供应不足等），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人是认真工作和劳动的，他们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准备保卫苏维埃共和国。

工人们认识到，革命的法律、法令——八小时工作、工资制度、学徒培训、住房和房租规定、休假制度、学校等等，都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

反革命分子恨不得把这些法律、法令一律推翻。

库恩·贝拉经常下工厂。在工人面前他从不掩饰困难。他告诉工人：苏维埃政权继承了一个在近四年的世界大战中经济上崩溃的国家，要将它恢复、按社会主义方式加以改造和发展是很不容易的，但和资产阶级政权把一切负担和困难都堆压在工人阶级和贫农肩上那样的情况来比，目前的困难就不算什么了。

农村土地问题，使他费了许多脑筋。

有的州在紫菀花革命时就占据并瓜分了大地主的土地，或者（如绍莫吉州）成立了生产合作社。但在更多的地方是紫菀花政府让警察和宪兵用武器和屠刀使分土地的人“恢复理智”。

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接管了农村和庄园的行政管理权。有的执行委员会中混进了一些富农，有的甚至还有被驱逐的大地主的代理人，这些人设法影响当地人民反对革命。

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做法有错误。大庄园的土地固然被没收了，但没有分给农民，而是没有任何过渡地立即建立了

许多国营农场。当年的管事、经理人被作为“必须依靠的专家”请来继续管理农场，其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不去研究一下当时的情况，要责怪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当然很容易。但不妨想一想，解决农业的生产问题直到如今——离那时几十年之后——还不算是轻而易举的事；加之当时不能从任何地方指望得到粮食援助；遭到世界大战破坏、又被当局横征暴敛而穷困不堪的匈牙利人民不但得不到外部支援，甚至在当解决自己的问题时还要以惴惴不安的心情提防着邻国。（我还想顺便提及，有一个情况是常常被遗忘了，那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中直到 1917 年秋还没有提出实现分配土地的问题。）

库恩·贝拉甚至在家里往往也为研究大庄园的土地，为城市、矿区和红军的粮食问题而深夜不眠。

如何评价在国营农场中留用当年庄园管事、经理人、农艺师一事始终是研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历史时期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群人的大多数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农场管理工作中多方进行破坏。当时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任命了三批生产委员，然而被任命的人政治上尽管可靠，却又不懂得现代化农业。

库恩·贝拉曾经说：大笔一挥，把那些老的管事、经理人、农艺师撵走，那很容易。可是从哪里去找既内行又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新专家呢？当然，在贫雇农中间会有不少聪明、有能力的人，一旦接触现代化农业就会领导好从大地主庄园改造的国营农场的。拉丁卡等在绍莫吉州就做到了这点。但是这样做需要时间。

立即分配大地主的庄园无疑会得到贫农的拥护。可是把土

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之后从哪里能迅速找来和小块经营相适应的农具(马、犁、耙……)呢?

这些考虑，就是说单纯地从经济上、从生产上的角度来考虑农民的问题，而没有首先从政治上着眼，于是铸成了错误。

譬如瓦尔加·耶诺① 大量列举了农业问题上的燃眉之急，明确表示他支持搞现代化农场；尼斯托·久尔吉② 字斟句酌，一句一歇，急得听者火冒三丈，他一会儿支持这个意见，一会儿支持另一个意见，但只要有人反驳，他就立即退缩回去，下意识地玩着手里的文件；汉布格尔·耶诺③ 这位认真的医生宛如在开药方，反复推敲，他总能受别人发言的启发，提出一些建议；万图什介绍了比豪里州的经验以及纳吉瓦拉迪的印象；但他说了一大堆，就是没有谈结论。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家绞尽脑汁，但我必须说，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从经济和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忽视了问题的政治部分。

而最根本的一点是：所有看法都源自世界革命胜利在望的这个设想。而这个设想并非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独创”，而是列宁和第三国际的看法。在会上，几乎所有看法和计划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思路：如果立即分配土地，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

---

① 瓦尔加·耶诺(1879—1964)，著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任财政人民委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以后在苏联定居。——译者

② 尼斯托·久尔吉(1869—1956)，社会民主党左派，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农业人民委员，后加入共产党。1922年根据苏匈换囚协议去苏联。1945年回匈。——译者

③ 汉布格尔·耶诺(1882—1936)，农业人民委员。死后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上，匈解放后运回国内。——译者

——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以及红军，将受到缺粮的威胁，甚至会断粮，从而导致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并将对邻近的国家为争取实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产生严重不良影响。这对于分到土地的农民会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如果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土地的新主人立即会被宪兵从分到的土地驱走。总之，需要争取时间，时间，时间，时间！争取到了时间就能解决土地问题。

我记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里还涉及象工农联盟等其他问题。

会上一致决定把收割短工、雇工的金钱和实物工资提高将近一倍。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

如果我一一叙述库恩·贝拉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曾经考虑过的问题，那么我的这个回忆录将是一个卷帙浩繁的巨著。他承担工作的能量以及对于克服困难的必胜信念给了他无限力量。

每天他只睡四、五个小时，即使是这四、五个小时也睡不好。白天的问题在睡梦中还纠缠着他，他往往能说好几句梦话，然后突然醒来，好象是听见了自己刚才的话。他问我，刚才说了什么，但没有听完我的回答，又重新入睡了。如果第二天早晨我告诉他夜里说了梦话，他怎么也不相信。

早晨七点，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当我们还在床上的时候，住在匈牙利大旅社的同志们就会来敲门，往往不等我们答应，就推门进来。“不要紧的”，看到我对这些不速之客表示惊讶，他就老说这句口头禅，一面说，一面请来客坐在床边上，就这么“就近”

谈起问题来。

来人走了以后他起床。如果来得及，就洗个澡，如果时间紧，他就只洗个脸、刮刮胡子。吃早饭的时候，一般桑托·贝拉都要来，还有瓦尔加·耶诺、兰捷尔·久拉①、拉斯洛·耶诺等住在匈牙利大旅社的人中间总有几位来和他简短地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然后他就匆匆地到城堡山上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上班去了。在那里有大量的会议、接见在等待着他。有的外国记者库恩·贝拉是和奥尔帕里·久拉一起接见的（库恩·贝拉本人会说德语和俄语，奥尔帕里会说的外语比他多）。接见一些外国驻匈使馆和代表团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些事他都尽量交给奥尔帕里和阿果斯顿·彼得②，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全国性的事务。

参加大会、视察工厂和兵营也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常说，我们固然可以对士兵产生影响，但是那些旧军官也在争取他们，而我们暂时又不能把旧军官都从军队中清除出去。时间，时间……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自己的军官队伍……而在做到这点以前，我们必须不断地视察兵营。

他日理万机，常常顾不上和我说话。

有时他白天也回到匈牙利大旅社来，是为了要从“新闻联络中心”得到些消息。这个新闻联络中心是政府、党中央、总参谋

---

① 兰捷尔·久拉（1888—1941），匈共创始人之一，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任财政人民委员，后在苏联经济部门工作。如今布达佩斯有一所财经中技校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

② 阿果斯顿·彼得（1877—1925），社会民主党人，副外交人民委员，多次背地和协约国使团接触讨论“制止”无产阶级政权。1919年任派德尔工会政府外交部长。死于巴黎——译者

部和红军前线指挥部以及电讯局之间的特殊电话联系网，它在匈牙利大旅社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外国新闻汇编处和切佩尔电报局也归它领导。

“新闻联络中心”的消息往往能决定他回家时的情绪，但不管消息是好是坏，回家后他总是坐下，埋头写起文章来。这些文章他不是写给《红色新闻报》便是交给《人民之声报》。“瞧，又给《人民之声报》而不给《红色新闻报》写！”不少共产党员不满地嘟囔着。实际上他们的不满不仅因为库恩·贝拉给原先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声报》写文章，而是因为见不到库恩·贝拉。他们觉得，两党合并后社会民主党在党的领导机构里有计划地排挤共产党人，他们对此很恼火。

两党合并后党中央的团结确实仅仅是形式上的。在中央委员会内部经常发生争吵和冲突。在布达佩斯的各区区委内部也是如此。此外，党的领导和政府的职能往往混在一起，以致共产党的党务干部常常弄不清他们应该以什么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我有时向库恩·贝拉反映同志们的意见，他常常说，他理解这点，希望问题很快会得到纠正，但同志们也应当理解，目前，维护党内团结是头等大事，团结的巩固与否将决定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别的他也不再多说，但看得出来，他对此也很头痛。

我想谈一谈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库恩·贝拉对于了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发挥他们的作用，改善他们的状况花了不少精力。

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站到了苏维埃政权一边，但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不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他们认为，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迭，因此采

取了观望态度。诚然，他们继续工作，但为的是保住饭碗。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能使他们惊惶一阵。事实上他们不久便发现，这个新政权和自己的愿望是两回事，于是便采取了消极的甚至是怠工的态度。

库恩·贝拉和知识分子的代表进行过多次谈话，还给不少人做过报告。他力图向知识分子说明，苏维埃政权不是他们的敌人，唯有苏维埃制度才能推动匈牙利不断前进，因此，支持苏维埃政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如果知识分子努力工作，那么他们将会得到比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更好的条件。就苏维埃政权来说，当然也会尽一切能力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苏维埃政府确实是这样做的，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定的工作环境，给艺术家、作家预支报酬。苏维埃时代书籍的发行工作是有口皆碑的，当然还做了许多别的工作。

但尽管如此，困难是越来越大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领域也不断进行破坏。他们指责举步维艰，和外国干涉军进行着搏斗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压制创作自由，造成国内的知识界和科学界死气沉沉。”

库恩·贝拉批判了他们的无端诋毁，他指出：“……知识界曾经死气沉沉，但那是当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的情况……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应当，也一定会产生新的精神产物和文化艺术。我深信，无产阶级将以自己的力量毁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创造出思想和文化上的真正繁荣。”

前面提到的技术知识分子的那部分，由于各种倒退力量作祟，当然也由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愿意，也不可能理解革命的进程。他们置自己狭小的、眼前的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们的大多数人没有工人阶级那样的献身精神。只有无产阶级

才着眼于全国来考虑问题，许多雇工也作出了良好榜样。

这些观点陈腐的工程师、医生、教师认为匈牙利这样“文明的西方国家”由没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来领导政权是不可思议的。象他们这样有教养的、学识丰富的人物怎能听命于也许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的、无论从手脚到头脑都是粗笨的工人和农民呢？（其实是要求和他们共同合作，哪里是“听命”！）

顺便说一句，除这些技术知识分子以外，银行职员、机关人员和律师、警官和宪兵警官及军官也都自封为“上等人”，和他们谋求共同语言同样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作家和艺术家，象莫里兹·日格蒙德、巴比奇·米哈伊、巴尔托克·贝拉、盖雷特·奥斯卡、布罗迪·山多尔、巴拉日·贝拉、乌伊兹·贝拉和波尔·贝尔道朗① 等却没有把自己当成“超凡入圣”的“上等人”，而是公开站出来支持苏维埃政权。当然，作家、艺术家中也有一些比较次要的人物企图阻止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不止一个记者咒骂无产阶级专政，这倒也不奇怪，因为象《佩斯新闻报》、《布达佩斯新闻报》、《晚报》被勒令停刊了。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支持雷格拉迪、拉科西·耶诺和米克洛什·安多尔的报纸。②

---

① 莫里兹、布罗迪是作家，盖雷特、巴比奇是诗人，巴尔托克是音乐家，巴拉日是电影艺术家，乌伊兹和波尔是美术家。这些人在匈牙利有很高声望，有的在国际上也很有名。——译者

② 雷格拉迪家族是匈牙利最大的报业资本家。这个家族办的《佩斯新闻报》(1878—1944)是匈牙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拉科西·耶诺(1842—1929)是反动记者，资本家。《布达佩斯新闻报》的老板。米克洛什·安多尔(1880—1933)是报业资本家。《晚报》是他的产业。——译者

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失业的记者安插到别的工作部门，在解决工作问题以前，“野蛮的”工农政权照付他们的工资。

从4月份开始，我到教育人民委员会音乐戏剧处工作。处长是赖伊尼茨·贝拉。

在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前赖伊尼茨·贝拉在布达佩斯工人保险公司当秘书。

大家谅必还记得，他为奥第的好几首诗谱过曲，在当时“奥第—赖伊尼茨歌曲”是很流行的。

赖伊尼茨本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他性情暴躁，不适宜做政治工作。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现象他总是激烈反对，但也只是停留在大发脾气上。遇事不满，他对同事们也是采取这个态度。

库恩·贝拉对于我到赖伊尼茨手下工作感到很高兴。虽然他俩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牴牾，但赖伊尼茨把奥第的诗谱成曲子使库恩·贝拉十分感激。库恩·贝拉事先提醒我：如果赖伊尼茨朝我大喊大叫，不要在意，他就是这个脾气，是改不了的。

我做好思想准备，以复杂的心情去向他报到，但他向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其实还在我当姑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见面是在奥第的朋友和私人医生卢卡奇·胡戈那里。

我们就从这个题目开始谈起来，当然也谈到了在科洛日瓦尔和埃尔代伊度过的日子。

至于我做什么，连他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目前还刚筹组。

但他还是发了个指示，叫人给我在他的隔壁房间搬张办公桌。“工作嘛……以后再说。”他不好意思地说。他实在想不出来叫我做什么事才好。

“他没有朝我大喊大叫，”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想，“有人对

他不满意，免不了要言过其实。”

第二天我去上班，办公桌已经安放在那里了，大而无当的办公室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厅堂。我在桌子旁坐下，等待着。

赖伊尼茨还没有来，同事们一一向我作了自我介绍，除了埃茂德·托马斯以外，别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每个人对我都很客气。当我打听工作时，大家都粲然一笑。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已经“干了”好几个星期了，但工作范围谁也不明确，在这里积极是白费力气，爱莫能助，无可奈何。当然工作挺繁重，但也只能走着瞧，因为反正船到桥头自会直。他们叫我稍安毋躁，然后给我讲了几个在社会上流行的笑话。

我的工作不寻自来。人们一听说我在音乐戏剧处工作，便纷至沓来，向我提出各类要求和问题，希望我给予帮助，也就是把这些愿望转给库恩·贝拉“同志先生”，因为“只有他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

“各位弄错了。”我告诉他们：“我不在库恩·贝拉手下，而是在赖伊尼茨·贝拉领导下工作。”他们大吃一惊，但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托词。

来访者大多与音乐、戏剧界无关的人。只是闻讯而来，听说库恩·贝拉的妻子在某某地方工作，人们便过来打听打听，试探试探，看看这个“夫人”怎么样，是不是“好说话”，因为毕竟塞麦莱街的音乐戏剧处大门比匈牙利大旅社好进。

当然，艺术界也有人来找，合理的，不合理的要求都有。有的事我当即就能解决，有的事需要找处长，但有的事使人啼笑皆非。

譬如，有个女演员向我提出：她和女儿两人住在一个套间里，女儿已经十二岁了，“这样我没法接待男客人，”她抱怨道。

“希望给我女儿一个单间屋子。”

还有一个女人对我说，希望库恩·贝拉行使权力，发还她的首饰，因为“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一个有身分的女人不能不戴首饰。”

要求向国外汇款或运出物件，要求释放被捕的人，谋求职业，申请出国护照等等，向我提出五花八门要求的人围着我的桌子，于是赖伊尼茨出现了，他大声问我：“这许多人在那里干什么？”我作了回答，于是他前来一一把他们打发走，并且向传达室下命令，只与音乐和戏剧有关的事才准许把人放进来找我。又对我说，如果还是有人溜进来了，可以交给他来办……

大规模的来访至此总算结束。

事后我了解到，有不少在我这里没有达到目的的人通过别的渠道——可惜有若干是苏维埃制度提拔的干部——满足了自己不合理的愿望。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赖伊尼茨。

他果然大喊大叫起来，但痛骂一阵以后也就消了怒气，事情算是完结了。

到4月底，国际、国内形势日趋严峻，库恩·贝拉日理万机，休息时间更少了，几乎不太在家里。

罗马尼亚贵族军队向苏维埃匈牙利发动攻势，捷克的反动军队也在另一个方面配合。这是在巴黎统一部署下进行的。罗马尼亚的军队直逼蒂萨河，捷克军队越过绍约河，威胁着米什科尔茨。在索尔诺克，反革命力量公开活动。红军由于没有进行改组，不少士兵采取了观望态度，大部分军官基本上和来犯的军队采取了配合行动，于是红军几乎全线溃败。

库恩·贝拉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府发出了和平倡议，他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和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要求尊重停战线以外的匈牙利族人的权利。

其间匈牙利工人阶级筹备“五一”庆祝活动。也许正是内忧外患促使人们希望在这个节日显示自己的力量，表示他们忠于无产阶级专政。

布达佩斯和外地城市的劳动者热火朝天地准备欢度无产阶级的这个节日，以至于把许多从来不参加活动的小资产阶级也吸引到游行队伍和庆祝活动中来了。

在美术家和建筑师的指导下工人们日以继夜地装饰主要街道和广场。游行的时候几乎倾城而出，达数十万人。

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俄国、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同志们都和我们一起游行，这次“五一”是真正的国际性的节日。

傍晚我沿着多瑙河散步，盖勒特山顶上的焰火腾空而起，在昔日王宫的窗上反射出明艳的光芒，多瑙河水在耀眼的红光中静静南流。四处传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国际歌的声音。

库恩·贝拉也参加了节日游行，然后回家工作，撰写文件，讨论问题。

前线传来使人吃惊的消息，但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活动也使我们同样吃惊。他们要求苏维埃政府于5月2日下台。

但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

5月2日，革命苏维埃政府举行会议。

库恩·贝拉在会上作了发言。

按照从列宁那里学习到的办法，他如实地、毫不掩饰地介绍

了情况。

我手头有当时会议的速记稿，那虽然语言简短然而使人触目惊心的记录至今似乎还可以感到记录者的惴惴不安的心情：

“红军不战而放弃索尔诺克。捷克人进驻米什科尔茨。作战力量不足。部队战斗价值等于零。大本营在格德勒①。伯姆已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并向三个交战国提出停战建议……

“……报告：苏维埃政府于当夜举行非常会议，一部分与会者建议政府辞职，将政权交给十二人组成的委员会；另一部人建议动员组织工人师团，说明情况之严重，若工人不能坚持，则布达佩斯即将陷落……”②

辩论开始了。

孔菲·日格蒙德建议苏维埃政府提出辞呈。韦尔特奈尔建议由一个委员会接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萨穆埃里质问：如果韦尔特奈尔仍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何必要求苏维埃政府辞职？桑托·贝拉认为交出权力是怯懦行动，是出卖工人阶级。朗德列尔·耶诺声明：他们——社会民主党左派——出于自己的信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无异痴人说梦。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不仅为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继续存在……

辩论激烈进行。最后，根据会议决议，于晚七时召集工人苏维埃，向会议介绍情况并要求决定：匈牙利工人能否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为保卫布达佩斯战斗到底？

苏维埃政府指定届时由库恩·贝拉代表发言。

会议进行到四点钟，一致同意：革命苏维埃政府在中央工人

---

① 格德勒在布达佩斯附近。——译者

②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A)第386页。

苏维埃会议后再次举行会议。

库恩·贝拉深夜开完会以后又于清早参加苏维埃政府会议。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休息一小时。准备再参加工人苏维埃会议。要准备一下。这个会上将要决定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他看起来情绪是镇定的，只是脸色苍白。吃了一点食物后躺下了，接着很快就入睡，好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还不是那么岌岌可危。

我决定让他多睡一会儿，但一个小时以后他准时醒来。"不要紧，一切都会解决的！"他一面说，一面穿衣服，还问了一些关于阿格奈丝和我姐姐的事，又问我怎么样，但并没有注意我的答复。"一切都会解决的！"他又说了一遍，好象在给自己壮胆，然后出去了。

窗外大雨滂沱。"五一"的艳阳天之后居然是这样有如预兆世界末日似的狂风暴雨，屋顶的瓦片被掀起来了，修理房屋的脚手架被刮倒了，……好象大自然也在警告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面临着危险。

参加中央工人苏维埃会议的代表近六百人。我没有听到库恩·贝拉的讲话。讲话和开会的内容事后他也没有告诉我。当时他实在太忙了。他讲话的内容摘要我是在《红色新闻报》上读到的。关于这次使人震惊的会议情况事后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意识到，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库恩·贝拉的威信和所受到的尊敬在那天达到了最高的程度。

同志们关于5月2日会议对我所作的语焉不详的叙述，事隔四十六年后已是极其模糊了，倒是可以从当时虽然文字粗糙

却是幸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中摘引若干段落：

“当人们不是被失望——因为人们从来不会失望——而是被不愿意看到的痛苦景象所控制时，往往向文明寻求躲避。这几天，在苏维埃匈牙利的所见所闻使我想起了高尔基的一篇文章。这是我在1906年读到的，那时，俄国的无产阶级和沙皇制度进行了第一次较量，法国帝国主义用金钱和武器支持沙皇。这篇文章说高尔基为了帮助俄国革命，到法国寻找革命思想，去寻找早年革命的巴黎。高尔基想寻找的是戴弗利基亚帽① 的法国。他找啊找，后来人们把他领到一个快要沦落为街妓的女人那里。高尔基请她不要把身子卖给沙皇，而是去帮助革命。可是这个蜕化为街妓的革命还是把身子卖给了沙皇。这时高尔基说，他真想把含血带脓的唾沫啐在这女人脸上……

“同志们！当我们看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向布达佩斯开来，大家都会想起高尔基的这篇文章。面对侵略者的是逃遁、懦夫的队伍，是一批堕落的坏蛋，他们善于烧杀掠夺，可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茫然不解，他们不是向罗马尼亚军队屈膝，而是向颓丧投降……同志们！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索尔诺克落入罗马尼亚人的手里已成定局。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桥炸了，……我们的部队……南线已经溃退了，不但自己逃跑，还影响了原来在舍伊德勒同志领导下坚持战斗的第一和第五师……从蒂萨河北部向布达佩斯后撤……我们的部队在米什科尔茨方向作过某些抵抗，但估计今天下午捷克人肯定是把这座城攻占了。也还有些部队在这里或那里出于无产阶级的本能试图作些什么……在布达佩斯这里有不少产业工人师团……兵营现在有足够装备十

---

① 弗里基亚帽是古代弗里基亚人戴的一种红色帽子，后来被当作自由的象征。十八世纪法国雅各宾党人戴这种帽子。——译者

五个营的装备，从武器开始，直到靴子，可以说一应俱全……我们究竟是放弃布达佩斯，还是保卫它？……（喊声：保卫它！）同志们……口头的话我已经不相信了（喊声：对！）……如果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今天不进行战斗，今后他们将为今天的消沉、今天的失望和今天的耻辱而付出六百倍的代价。……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建议暂时放弃专政，另一种是：只要血管里还有一滴血，脚下还有一寸土，就要继续战斗（喊声：对，对！热烈的掌声）别鼓掌……我们不要用鼓掌也不要用投票来解决问题。同志们，今天的例子，我们的这个例子说明了，只有用武器，用武器才能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能够放弃政权。放弃政权是我们的耻辱。

"……关于外交形势……革命苏维埃政府已经看到没有力量从军事上进行有效的抵抗，希望尽一切可能争取布列斯特式的和平，设法争取到一块土地，在那块土地上将能站住脚来反对资本主义，使它将来不但能成为在匈牙利摧毁资本主义的基地，而是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向西方进军的出发点……我们向邻国资产阶级政府……向威尔逊① ……向巴黎和会发出电报，绝非是为了消遣……我不能作任何轻松的预言。如果协约国想把我们打倒在地——他们肯定是打算这样做的，——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他们为此所付的代价会比对付俄国要小些。他们想永远在这块土地上铲除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我们认为他们只能暂时达到目的……当然，也可能由于帝国主义还不是那么强大，从而使我们真的达到了和平的目的……那就意味着——象我们多次引用列宁的话所说过的那样——我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没

---

① 当时的美国总统。——译者

有和平、没有喘息的机会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要花一切代价保卫布达佩斯，要保卫匈牙利的工人运动，保卫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支光荣的队伍……

“现在需要作出抉择的是：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认为应该怎样来保卫苏维埃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①

库恩·贝拉坦率、诚恳的讲话使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中派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工人（不光是共产党员）纷纷发言：

“回到工厂去！工会行动起来！”

“二十四小时以内实现动员！”

“请国防人民委员会把武器发到各区工人苏维埃，武装工人立即开进兵营……”

“革命不能畏首畏尾，不能反复推敲万全之计。搞革命不是开保险公司。过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国家的人，无论他过去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今天他就有责任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从巴黎公社学来的经验教训……”

“我久病以后第一次参加会议……我不相信今天那怕有一个钢铁工人会建议放弃战斗……我虽然疾病缠身，但是明天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战斗……我们的责任是保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我代表妇女发言……如果男人们不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妻子就反对他们……我们也有钢铁的意志和坚强的臂膀……”

“……不能停工的工厂继续生产，其余的人都来为保卫无产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A）第390—392页。

阶级专政而战斗！……①

下面是库恩·贝拉在大会上所作结束语的一部分：

“我们有粮食，我们有武器……我们不但有能力保卫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我们还有可能争取到光荣的和平……武装起来……每个有战斗能力的人都起来保卫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②

工人苏维埃会议结束了。

革命苏维埃政府举行会议。

深夜十一点半发出了第一份电报：

“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各线进行最强有力的抵抗。布达佩斯所有工人派赴前线……”③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壮丽、也是最困难、最蓬勃向上、同时也是险象环生的时刻开始了。

还在4月份的时候，在莱奥·罗特齐格尔④的率领下由一千多名奥地利人组成的部队开赴德布勒森。

“罗马尼亚贵族的帝国主义部队正在向我们靠拢”，罗特齐格尔在给匈牙利的一个国防人民委员、钢铁工人费埃德勒·雷热的信中写到：“我们明天就要交火。为了无产者的解放，我虽死心甘，并引以为荣。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为苏维埃匈牙利流血牺牲是我的幸福……我羡慕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A)第396—402页。

② 同上书，第404页。

③ 同上书，第405页。

④ 罗特齐格尔·莱奥(1892—1919)，奥共创建人之一。1919年4月初率领一千七百人赴匈，4月24日战死。——译者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领袖……希望给我送一点机关枪和纸烟来……”①

这位原来是钢铁工人的国防人民委员一定是送去了机关枪和纸烟，但是罗特齐格尔肯定没有收到，因为就是他的信发出的第二天德布勒森失守了。

5月2日，布达佩斯中央工人苏维埃动员首都的工人开赴前线，并决定中央工人苏维埃委员的一半也前往战场，就在当天夜里匈牙利贵族和白卫军官在维也纳袭击并抢劫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驻奥地利的使馆。公使和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被匪徒绑架，关禁在一个修道院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警方进行了“侦破”，释放了被绑架的匈牙利公民，但罪犯却“无法归案”，被劫走的财物再也没有归还原主，而是一部分被一些人据为己有，另一部分被用作了反革命的活动经费。

使馆被劫和匈牙利国内的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计划是相互配合的。右派社会党领袖同象英国弗里曼海军少校这样的外交官保持联系，打算在5月上旬颠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匈牙利工人阶级以他们未曾想到的坚决行动粉碎了这个罪恶阴谋。

足以说明这个计划的国内外联系的是：5月5日伯姆辞去红军总司令职务，(后来因为出卖的阴谋被粉碎，他推迟了辞职的日子)。就在同几天中罗马尼亚贵族军队提出了“停火条件”，他们所要“不多”，“只”要求蒂萨河以东地区的全部铁路车辆——七万二千辆机车、客车及货车车皮。

也就在这几天里，在基辅苏联红军中开始集中匈牙利战士，准备配合乌克兰红军支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红军在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A)第287—288页。

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同罗马尼亚军队展开了战斗。匈牙利战士则直接越过喀尔巴阡山准备和匈牙利军队会师。

作为对国内外反革命的回答，苏维埃政府把布达佩斯的伊丽莎白城区改名为“列宁城区”。我想，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列宁格勒。”①

在这些日子里，农民也行动起来了。希拉什博尔哈什乡送了二百六十六口猪、七头牛给工人，不久又运来了八十车皮玉米和四百五十五口猪。

布达佩斯一家最老的工厂——北方车辆器材厂的一个名叫佩雷尼·亚诺什的老工人在给国防人民委员的信中要求五十岁以上的工人也能到前线参战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保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他写道：“年老的工人往往能顶十个青年工人。我曾经当过骑兵，这次报名参加炮兵，可是人家说我太老，把我打发回来了。我好象被人家打了耳光似的。”

可是不光老工人被送了回来，就是当年的卫生员也未能幸免。这些卫生员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只有十七、八岁，瘦弱不堪，但哈布斯堡军队认为适于服役，可是如今当他们报名保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十分之九的人被淘汰了。

布达佩斯和外地工厂、矿山的工人和贫农纷纷走上前线。俄国、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国际主义者也参加匈牙利红军作战。曾经和苏联红军一起战斗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国际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榜样。由他们组成的匈牙利红军最英勇的队伍之一——第八十国际旅在北征中为保卫蒂萨河战线作了重大牺牲，在解放洛松茨之役中

---

① 苏联在1924年1月26日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译者

他们冲在最前面。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们中的不少名字：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尤斯图斯、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拉斐尔·米勒，波兰的约瑟夫·克拉斯尼、弗朗奇赛克·加林斯基、约瑟夫·拉平斯基，当然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奥地利部队的司令罗特齐格尔·莱奥以及后来世界知名的埃贡·埃尔温·基施①。在红军中作战的还有近三百个意大利人，他们的一份报告库恩·贝拉曾经给我看过，其中有一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也叫但丁。

他们来访库恩·贝拉时我也见过面，其中几位现在还活着。

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还不到两个月，已是烽烟四起——在战场、在后方、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之间。

……所有这些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回忆起那时的我们、我自己，看看今日的我们、我自己，我不禁想：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象我一样地衰老了吗？它也象我一样地永远需要提防各种指责吗？当然，这只是一掠而过的想法。

不，革命是永葆青春的，它的精神长存。个别人的偏激、执拗之见将会随着时光的推移而在伟大的业绩前更显得微不足道。说到底，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不仅仅是匈牙利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就象1514年和1848年事件的意义也远远超出匈牙利国界一样，1919年从布拉格到布加勒斯特，从华沙到贝尔格莱德，从慕尼黑到维也纳，从巴黎到华盛顿，从莫斯科到波洛尼亚，从伦敦到北京都可以感到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世界史和世界革命史的一章，世界人民将不断纪念这次革命，分析这次革命，并从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

---

① 埃贡·埃尔温·基施(1885—1948)，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记者。——译者

时间没有冲淡，反而加强了我们对以库恩·贝拉为首的震撼世界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记忆。

在这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最紧张的日子里，库恩·贝拉在做什么？

实在说，我个人在这段时间没有多少关于他的回忆。我几乎看不见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晚上十点、十一点钟，当我睡觉时，他常常还没有回家。早晨我七点醒来，库恩·贝拉已经在他的那个“第三间屋子”——新闻联络中心办公室里了。然后他去外交人民委员会，去党中央，接着是大本营（在格德勒）、前线和某一个外地城市、一两个工厂，最后又回到“第三间屋子”。我理解这点，但并不喜欢他这样做，因为他根本不和我或阿格奈丝在一起。

保卫苏维埃匈牙利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中派领导人致力于从内部削弱和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他们秘密集会，匆匆来往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上层领导和协约国外交官会晤。有时甚至通过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向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和巴黎递送他们的建议，不言而喻，这些建议也就到达了当时已是为数不止一个的匈牙利反革命政权那里。这些反革命政权中最强大的是受到法国南方军团支持的“塞格德政府”。（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首先向霍尔蒂·米克洛什① 伸出“长茧的手”的不是万察克·亚诺什②，而

---

① 霍尔蒂·米克洛什（1863—1957），原为奥匈帝国海军司令，1920年以“匈牙利王国摄政”名义建立独裁政权。二次大战后流亡葡萄牙。——译者

② 万察克·亚诺什（1870—1932），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之一。霍尔蒂上台后他在《人民之声报》发表文章，声称愿意伸出“工人阶级带茧的手”和他合作。——译者

是孔菲·日格蒙德、伯姆·维尔莫什、加拉米·埃尔诺、豪布里奇·尤若夫以及佩耶尔·卡罗伊① 和派德尔·久拉② 这些人。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霍尔蒂觉得握其中某些人“带茧的手”的时机还不成熟，曾引起了某几位的不满从而进行反击。其实，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当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万察克·亚诺什发表了他的这个声明，而伯姆·维尔莫什和加拉米·埃米诺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隐瞒了自己的勾当，只是在以后他们的《回忆录》中才进行丑表功，对于后来没有被“论功行赏”表示了不满。）

我不知道库恩·贝拉怎么在当时还能挤出时间来准备并且做了五个带原则性的报告。应该感谢这位有经验的速记员，这些报告的文字远远比工人苏维埃以及其他场合的发言和报告记录要详细和清楚得多。

第一个报告谈的自然是当时最大的问题——党的作用问题。他谈的是怎样组织一个新的、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两个党合并了，可是实际反而一个党也没有了。”他说的是真实的情况。

第二个报告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工业生产应该由工会负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苏维埃俄国也是这个情况，（苏联关于工会作用的那次大辩论是两年以后进行的）。但是历史的必然性起了作用，还就工会的作用进行讨论的时

---

① 佩耶尔·卡罗伊(1881—1916)，工会的右翼领导人，后在派德尔工会政府中任内务部长。——译者

② 派德尔·久拉(1873—1943)，右派社会民主党人，1909—1919为该党领袖之一。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辞去党内领导职务。共和国失败后出面组织工会政府，任总理。——译者

候，在库恩·贝拉的完全同意下苏维埃政府下令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制订计划和指挥生产。委员会主席是瓦尔加·耶诺。

关于工会，库恩·贝拉在报告中提出：应该停止迄今的作法（那时凡是工会会员，自动就也算是党员）。应该恢复原来在合并之前的原则：工人阶级应该建立自己的先锋队，成为先锋队的人不仅应该是劳动者，而且也应该能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先进分子。

（库恩·贝拉曾经想进行清党，他认为向喀尔巴阡山挺进的匈牙利红军当能和苏联红军会师，从而改变力量对比，为清党提供条件。）

这些报告我只听了第三个。报告在我身上产生了巨大作用，我好象觉得自己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懂得了：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个过渡状态，要摧毁旧的官僚机器，但也不能代之以新的官僚机器。库恩·贝拉说："我们不允许有一个阶层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并且用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政权。这是我们要力图避免的事，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能防止任何官僚阶层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新的官僚机器将是更大的危险……"①

库恩·贝拉接着说，国家机关干部可以选举，可以召回。他说，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这是防止出现野心家的保证，从而不再出现新的官僚阶层。

"我们要求的不是凌驾于无产者之上的专政，而是为无产者服务的专政！"库恩·贝拉说："同志们！官僚主义由于它掌握着政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297页。

权机构，从社会主义未来的角度看，必须严加扼制。之所以应该扼制，是因为我们想实现从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如果出现了高高在上的官僚阶级或阶层，那么我们应该用暴力从他们手里攫走权力。”

报告中也谈到了劳动纪律问题，生产的安排问题和提高产量问题，谈到了投资和农业，以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国营农场等等这类棘手的问题。

其间，匈牙利红军节节胜利。斯洛伐克居民地区得到解放，并于埃派列什① 宣布成立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结盟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② 。

士兵的服装不够。库恩·贝拉建议募捐。光是安焦尔福尔德城区一地就在短短的几天中为匈牙利红军募到一万一千件军服上衣、七千条军裤、六千顶军帽、四千件军大衣以及大量军靴、内衣裤和背包。

在这里我想引用伊亦什·久拉③ 回忆库恩·贝拉《深夜的演说家》一文中的一段话。（那时作者刚十六岁）。

“……我有一次听到他站在车厢顶上讲话……是对士兵讲话，给开赴前线的切佩尔钢铁工人做报告，当时还有骑兵，一共两列车。讲话结束的时候他问士兵们，还需要什么？……骑兵们什么都有了，可是钢铁工人却是衣服不够。那天寒风刺骨。有人喊了一句：有条毯子披披才好呢……他在车顶上对站上的

---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雷肖夫。——译者

② 前面多次提到的“北征”就是说的这次战役。为了推翻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捷、罗、南资产阶级政权向匈牙利发动进攻。匈牙利红军击退北部和东北部的敌军，在那里成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克雷孟梭要求匈牙利退出的也是这块地方。——译者

③ 伊亦什·久拉(1902—1984)，匈著名诗人、作家。——译者

值勤士兵发出指示，叫他们开卡车到附近那类声名狼藉的旅店收集毯子……”

匈牙利红军的胜利使社会民主党人放慢了阴谋活动的速度，但没有停止。总司令伯姆发出通知：没有他的批准，保安部门不得逮捕任何士兵。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发生类似的纠纷。

库恩·贝拉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萨穆埃里·蒂博尔奉命飞赴莫斯科——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去向列宁通报匈牙利的情况，并且和列宁探讨能在思想上和军事上给予匈牙利什么援助。

结合萨穆埃里去莫斯科一事，从库恩·贝拉的回忆里可以反映出当时国内的一些情况，他写道：

“5月底，我们商量让蒂博尔去莫斯科向列宁和苏联同志通报匈牙利的情况……蒂博尔想乘飞机越过这个横贯几个敌国和若干战场的两千公里路程。当蒂博尔正在筹备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放出空气，说他准备挟带金子逃跑了。

“蒂博尔笑着来到我在匈牙利大旅社的屋子，打开我的抽屉说：‘把金子拿出来吧，我好带着逃跑！安德拉希大街5号里（当时是党中央俱乐部，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们在那里一面打牌，一面炮制反革命活动。——作者）在散布说我要带着金子跑到俄国去了。马加什飞机厂里也在传播这个谣言。等我上飞机的时候我会请这个厂的工人苏维埃代表来搜我身的。’

“蒂博尔在首途前往莫斯科进行这次异常危险和艰苦的旅行时，果然请别人搜了身。”

萨穆埃里没有带回什么使人振奋的消息。苏维埃俄罗斯的军事情况也很险恶，两支（匈牙利和俄罗斯）红军队伍在东加里

西亚于近日内会师毫无可能。

还在萨穆埃里出发以前库恩·贝拉就给列宁发了电报。

（库恩·贝拉一反常规，请我用打字机复述他的电文。我的打字技术是很差的，甚至在好几年以后，当我在这方面已经有所长进时，库恩·贝拉还说我“只够免费打字水平。”）电报里库恩·贝拉对苏联方面驳斥了奥地利报刊攻击库恩·贝拉的诽谤向列宁表示感谢。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代表苏联政府向奥地利政府递交的照会中指出：“无论列宁，还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任何一个成员从来也没有象维也纳某些报纸所说的那样，在口头或文字声明中以谴责的口气议论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或库恩·贝拉。苏维埃俄国以最深切的友好感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它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深深地尊敬和赞扬库恩·贝拉同志。列宁和整个苏维埃俄国根据事物的实际意义来评价库恩·贝拉的工作……”

（自我认识库恩·贝拉开始，他总是不断遭到诽谤，几乎是习以为常了，可是我直到现在还不能习惯。）

库恩·贝拉在电报中要求列宁给匈牙利工人阶级写信，批判合并后匈牙利党内的右派分子。列宁很快满足了库恩·贝拉的要求，写了《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由萨穆埃里带回布达佩斯。

列宁在这封信里粉碎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谴责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背叛行径，并且分析了阶级消灭是长期的、困难的、坚韧不拔的阶级斗争的成绩，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无产阶级的专政……我现在只引用信的最后一段：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

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统一起来了，你们给世界作出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高尚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要无情地镇压……”①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对于库恩·贝拉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但要以此改变当时匈牙利的局面已是力不从心了。

匈牙利红军在前线取得了胜利，但——正因为如此——国内受到外来支持的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敌人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想走在克拉特诺的捷克矿工们、维也纳新城工人们的行动以前。反革命活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散布谣言。“你们听说了吗？……布达佩斯只够一天的口粮了……”“法国南方军团二十万人从萨洛尼卡出发打过来了……”“几天后白票② 就不值钱了……”“绍尔戈陶尔扬的矿工把矿炸了。所有工厂到月底全部都将停工……”“库恩·贝拉已经准备了专列。别的人民委员明天也都要逃跑……”“民族银行的金子库存有一半都装上他们的专列了。”“协约国的粮援已经到达奥匈边境，一俟苏维埃垮台，就运到布达佩斯来。”“有五千人被杀死在国会地下室，其中有不少是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红军瓦解，莫斯科陷落指日可待。”而在前线他们散布道：“红军家属没有领到士兵入伍时答应照付的津贴，他们在家挨饿。”“干吗老是让我们在前线？后方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353页。

就连这样的一封信，也被有些人用来攻击库恩·贝拉。——作者

②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行的一面印有图案和面值，另一面只有白地条纹的货币。——译者

工人应该来和我们换换!”在农村反革命造谣说:“就要共产共妻了……孩子集中管理。”诸如此类。

苏维埃政府组织人贴出标语进行反击:

“狠狠打击反革命谣言散布者!”

但收效不大。

从社会民主党右派、中派到贵族，从英国谍报人员(弗里曼少校)到巴黎和会（克雷孟梭照会）无不以极其卑鄙的手段从背后攻击红军。情况越来越严重。关于匈牙利红军和俄国红军会师的希望,由于1919年格里哥里也夫的叛变而日益渺茫。匈牙利红军有鉴于此，便将主攻方向自温瓦尔① 转向考绍—埃佩列什一线的捷克军队。格里哥里也夫是当年沙皇军官,彼得留拉反革命军队溃败后率部向红军投诚。他当时奉命向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白军进攻，扩大革命军队的战果。但他拒绝执行命令并将枪口转向苏联红军。俄国红军被迫放弃支援匈牙利转而对格里哥里也夫作战。其实列宁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曾指示红军，为了支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应在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采取攻势，并和匈牙利建立畅通的铁路运输。

列宁还在5月23日的电报中通知库恩·贝拉“昨天乌克兰军队战胜了罗马尼亚人,越过了德聂斯特尔河……”②

……6月24日当布达佩斯的中央工人苏维埃在紧张的气氛中讨论了各地的反革命活动情况的时候,我和姐姐、阿格奈丝和赛莱什·玛利什卡在家里等着,翻阅着下午出版的《红色新闻报》报纸要求实行戒严,并要求苏维埃政府授权萨穆埃里·蒂博

---

① 今苏联乌克兰境内的乌日格罗德。——译者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532页。电报日期应为5月13日，原书有误。——译者

尔，组织力量镇压反革命。

……门突然被推开了，有人喊道，多瑙河上从新佩斯方向开来了若干形迹可疑的快艇。看来，布达佩斯也出现了反革命活动。

我跳了起来，走到阳台上去看看究竟，但愿这又是谣言。

可是这回是真的！

不少插着各色旗帜的快艇慢慢地从玛尔基特桥那面开过来。

我走回屋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首先想到的是：应该立刻找到库恩·贝拉。可是此刻他在哪里？我走到走廊里，那里没有一个警卫，他们也获悉出了事，下去在匈牙利大旅社周围筑工事去了。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几分钟以后内务人民委员瓦戈·贝拉的妻子带着孩子跑到我家，她慌张地问怎么办？原来炮弹打到了她家墙上，阳台被打掉了。

又一声炮响，炮弹打中了匈牙利大旅社。

这里不能再呆了，走！

一个“列宁青年”走进屋子，建议我们到切佩尔他母亲那里去，他负责我们的安全。“从这里到切佩尔有十几公里，”瓦戈妮说：“不能冒这个险！要在附近找个地方。”我们就离开了家。赛莱什·玛利什卡说她要看家，说什么也不肯走。

街上一片混乱，有一具尸体躺在多瑙河边，是被警卫击毙的，此人向快艇扬白纱作信号。

在街上我们遇见了库恩·贝拉的秘书。他说“库恩·贝拉派我到旅社取文件，我一会儿就回来，请等我，我带你们走。”

我们等着，可是他没有回来。我们又走起来，可是到哪里去，不知道。

途中瓦戈妮说，附近有她的一个熟人，只有夫妻俩，不妨去找他们。男的是苏维埃政府建筑委员会主席。“肯定不会把我们推出来的。”她很有信心。

对于这个建议我兴趣不大，我只想找库恩·贝拉。可是库恩·贝拉找不到，比瓦戈妮好的主意又想不出来。

建筑师的家几星期前我去过，也是瓦戈妮带去的。主人那时很热情。

可是今天的态度却使人相当难堪。

瓦戈妮陈述了在匈牙利大旅社发生了什么事，希望暂时留在他们家，等“快艇事件”过去后再走。“请便！”他们很不情愿地把只有一张床的下房指给我们，然后自己离开了这所房子。

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走进了下房，听天由命。

我们等到傍晚，主人没有回来。瓦戈妮想给丈夫打电话，可是总机没有人接。（事后知道：电话局和其他重要建筑都被反革命分子占领了。）我们越来越忐忑不安。

突然门铃响了。“不会是主人，他们有门钥匙。”瓦戈妮说着把我隐蔽了起来。“主人不在。”传来瓦戈妮的声音。“那我就不进去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样说。可是瓦戈妮几乎象是发布命令似地说：“您不能走，得留下！哪里也不能去！”这时我也从隐蔽的地方走了出来。这男人耸耸肩，无可奈何地留下了。

我们默默地坐着，好大一阵工夫以后电话铃响了。

是瓦戈·贝拉打来的。他说：“我到处找你们，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我们控制了局势。你们休息吧。明天早晨回到匈牙利大旅社来！”

瓦戈妮放走了这个男子。我们就地休息。

深夜，主人回来了，把我们请到大房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

有发生过似的，非常客气地和我们说起话来："请好好休息！明天早晨不要走，就在这里呆几天，你们是贵客。"

我给赛莱什·玛利什卡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们在什么地方。然后躺下了——在大房间。

早晨，我们回到了匈牙利大旅社。

白天，库恩·贝拉来了，看得出来，他彻夜未眠。"反革命活动被镇压下去了。"他说："我看豪布里奇·尤若夫也……我们要调查一下……。"

往日如果整天没和家庭联系，库恩·贝拉总是表示歉意，可是今天他根本没想起来。

赖伊尼茨那里从反革命事件以后我就不再去上班。我的姐姐哈妮卡去工作了，单位是教育人民委员会儿童保卫处，她喜欢这工作，常到费伦茨城区、尤若夫城区和老布达这类"穷人区"访问和检查工作。苏维埃政府每组织孩子们去巴拉顿湖度假，哈妮卡总是到火车站去送，回家后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谈白天在车站上孩子们的情况和有趣的事。

7月底，一个管孩子们度假事务的工作人员到教育委员会找我姐姐说："加尔同志，事情没指望啦……您相信我，我会帮助您……如果出事，你们尽管到我那里去……我保证你们全家安全……您考虑考虑……"

姐姐把这件要"考虑考虑"的事告诉了库恩·贝拉。两天后库恩·贝拉对我姐姐说："这个人如果不是有意事先为某种目的做准备，也是不可靠的人。……不排除一旦有事，他可以拿库恩·贝拉的家属做晋见礼。"他斩钉截铁地说："别再理他！"

匈牙利红军的胜利迫使协约国迅速作出决定，这就是巴黎

和会主席克雷孟梭的电报（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只有一名中校同匈牙利政府打交道一比可算是殊荣）。克雷孟梭的电报先是在党的领导层进行讨论（可惜会议记录已经遗失了），之后交苏维埃政府讨论，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这个建议。① 克雷孟梭的电报如下：

布达佩斯，匈牙利政府

协约国政府拟邀请匈牙利政府参加和会，以便向其告知关于匈牙利公正边界之设想。匈牙利此刻正猛攻捷克，并且毫无理由地兼并斯洛伐克……兹敦请布达佩斯政府，立即停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否则，协约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激烈措施……巴黎和会主席　克雷孟梭

库恩·贝拉的复电如下：

巴黎，和平会议主席克雷孟梭先生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意，也没有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王国的军队利用协约国的威望……侵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并越来越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致使我国被迫拿起武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公正的和平，为促进互相谅解，为彻底结束流血而做好一切准备。

库恩·贝拉（1919 年 6 月 10 日）②

克雷孟梭第二封“特急提前”电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了和平与真理……各该国（指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及匈牙利——作者）军队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并于最短时间内撤

---

① 根据革命苏维埃政府 1919 年 7 月 29 日记录：“政府决定委托库恩·贝拉、瓦尔加·耶诺和兰捷尔·久拉为人民委员起草文件，向后撤的部队宣读。”

②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 6 卷（A）第 670—671 页。

退……”第二部分是:“根据上述原则,呼吁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作战之匈牙利军队撤退到划定的匈牙利国界以内……如协约国于6月14日中午开始之四天内未能从派出之代表处获悉上述要求确已得到实现,则将下令向前推进……罗马尼亚军队将于匈牙利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起立即后退……克雷孟梭”。(巴黎,1919年6月13日)①

库恩·贝拉并不相信克雷孟梭的诺言,但他想用谈判来争取时间,以等待苏联的军事形势得到改善,使两国红军之间的距离缩短——如能会师,那当然更好——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以阻止协约国继续侵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我记得6月的某一个很热的下午六点左右,库恩·贝拉精疲力尽地回来了。“我睡一会儿,晚上九点钟我还要去开会,”他说。他睡了约摸一个半小时就起来了,开始说起来。与其说是跟我说,还不如说在自言自语。这时我第一次听说布列斯特和约。他还说,他起初也反对和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后来列宁对他说:“您最好到前线去看看那里的情况,等您回来时我再告诉您一两点意见。”库恩·贝拉说:“我到前线去了,看到了列宁要说的那一两点东西。我认识到列宁是对的:要争取喘息的时间,否则苏维埃俄国就要灭亡……我们现在也需要争取时间……如果争取到了时间,我们就整顿党的队伍,……这是当务之急……如果争取到了时间,农民问题也应该再加讨论……红军中的反革命军官——至少是部分地要加以清理。”

克雷孟梭打算以多大力量来实现他的“激烈措施”呢?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B)第242—243页。

驻扎在靠匈牙利南部边境的法国侵略军总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里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当时除捷克的北方军团以外还有：

罗马尼亚王国军队　　八万六千人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军队

三万二千人

法国军队　　五万六千人

共计十七万四千人

加上捷克军队共二十五万人，而且这位法国元帅还要美国和英国也提供军队。

库恩·贝拉不指望克雷孟梭会实现诺言，但他相信会争取到时间。

关于这方面，列宁在给库恩·贝拉的电报上是这样说的：

“……您开始同协约国谈判当然是对的。应该开始进行谈判，必须利用一切哪怕可以争得暂时的停战或和平的可能性，以便使人民得到休息。但是一分钟也不要相信协约国，它在欺骗你们，它只是为了赢得时间好更有效地扼杀你们和我们。”①

巴黎的《人道报》6月12日，在克雷孟梭发出照会后两天这样写道：

“匈牙利的情况不明。昨天有一条消息说是邀请库恩·贝拉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但是克雷孟梭否认了。这否认也不奇怪。如果克雷孟梭先生真的同时承认高尔察克和库恩·贝拉，那才叫做滑天下之大稽呢。”

《人道报》还说：“同时‘四强’居然呼吁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

---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35页。

国‘停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另一条电文从另一方面报道：库恩·贝拉已经对克雷孟梭的呼吁作出了响应，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周密地考虑形势将是可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首领们要扼杀匈牙利革命这点已经不能有任何怀疑了。

“对付结盟资产阶级疯狂的怒火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革命力量的团结。”《人道报》1919 年 6 月 12 日这样写道①：

“革命力量的团结”是唯一的办法，这点库恩·贝拉是非常清楚的。至于革命力量也需要整顿，需要在前进过程中清除沉积下来的渣滓，这点他也清楚，但是这同样需要时间。后来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列宁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阐述的那个论点库恩·贝拉同样是认识到的。列宁说：

“大家知道，今年 3 月底以前，统治匈牙利的是十足的‘克伦斯基派’。到 3 月 21 日，在匈牙利突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那里的孟什维克同意支持这个政权，在这种时候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可是最近的事变向我们表明，社会党妥协分子毫无改变。看来，今天匈牙利发生的事变正是不久前发生的巴库事件的大规模的重演。

“列宁极其生动地追溯了巴库无产阶级的惨史，指出当时社会主义叛徒向英国指挥部求援，并且瞒着工人同西方帝国主义者订立了秘密协定……

“其次，列宁比较了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的处境……过去和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 6 卷(B)第 237 页。

现在，挽救我们的是广阔的领土，可是匈牙利太小了，不能抗击所有的敌人……”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在列宁讲话的头一天，1919年8月5日，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了号召：

“发生了一起可怕的叛卖。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社会民主党人卑鄙的叛卖，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了……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卑鄙行径暴露无遗。他们曾经信誓旦旦要忠于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和匈牙利共产党达成了协议，甚至实现了合并。他们在各种集会上，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党代表大会上一再声明，将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现在这个党的额头上刻着该隐②的印记，它出卖了无产阶级，出买了革命，出卖了光荣的匈牙利共产党，也出卖了共产国际。它和凡尔赛的杀人犯以及国内的反革命分子结成秘密同盟……就象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扼杀革命，就象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实际行动支持沙皇将军一样，……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叛徒就这样把国际无产阶级的骄傲——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断送了。”③

列宁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卑鄙行径和巴库的叛卖相提并论的正确性在十七年以后得到披露的一份美国外交文件又一次得到证明，（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还会有多少次！）

这是美国情报人员格雷高里大尉1919年7月25日给胡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3页。

② 《圣经旧约》记载：该隐出于忌妒杀死自己的兄弟，因而被在额头上打上印记，被罚苦役——译者

③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B)第561—562页。

佛① 的报告② 中的一部分：

“匈牙利驻维也纳公使伯姆（此人原为匈军队总司令）曾会见英国军事代表……协约国代表23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向伯姆递交一份旨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府倒台的计划，并向他透露，协约国可以支持一个临时政府。建议内容为：第一，成立一个具有政府职能的专政机构，可由豪布里奇、阿果斯顿和加拉米组成……第二，解散现任的库恩·贝拉共产党政府，取消共产主义，禁止共产党宣传。”③（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伯姆经过权衡……非正式地接受了这个方案。

我们也从这个文件中知道，参加巴黎和会的大国代表于1919年7月25日讨论了伯姆的关于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计划。

“怀特④ 先生说，在进行具体讨论之前，他想通报和伯姆将军在维也纳的会谈有关的若干情况。情况由胡佛先生介绍……他说，所谈的这个建议是匈牙利原布尔什维克军队司令伯姆将军向协约国代表提出的。伯姆将军说，如果盟国给他适当的支持，……他愿意筹组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并剥夺库恩·贝拉的一切权力……”

“贝尔福⑤ 说，他在头一天晚上和胡佛先生见过面。胡佛先

---

① 胡佛，赫伯特·克拉克(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1929—1933)。1917—1919年任美国粮食总署署长，在欧洲组织“救济委员会”，积极参加组织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译者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献》中的《1919年巴黎和会》部分，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第7卷 第310—311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献》第254—257页。

④ 怀特，亨利，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⑤ 贝尔福，阿瑟·詹姆斯（1848—1930）1902—1905年任英首国 相，1916—1919年任外交大臣。

生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他。胡佛先生还曾经就这事情和军事专家商量过，只是拿不准军事干涉是不是摆脱库恩·贝拉的最好办法。……在我们这几个国家里到处都有那种实际上并非布尔什维克，却是程度不同地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群众中的这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向布尔什维克们使用武力。但如果我们通过伯姆将军做点什么事，盟国在道义上支持这位将军，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些不愉快的事……

“克雷孟梭先生说，他想请福煦元帅参加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的会议，在会上可以讨论胡佛先生的建议。”

第二天继续开会：

“蒂托尼① 先生认为……任何反对匈牙利的举动都将在意大利引起总罢工……

“克雷孟梭先生说……他的情况虽然没有蒂托尼先生那么严重，但多少有些近似……他认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握在胡佛先生手中（同时也在伯姆及其一伙手中。——作者）……事情有些象俄国，但对付俄国不能用强制手段，而对付匈牙利却可以。只要加以包围就可以了……他打算同意贝尔福先生宣读的那份建议，……给伯姆以所需要的一个月时间……”②

切佩尔的无线电台和莫斯科（部分地也和彼得堡）电台有联系。有的日子里一天往返几次，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所限，电文往往有短缺。

库恩·贝拉尽一切可能把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报告给列宁，征求他的意见。库恩·贝拉不止一次为了等待列宁的

---

① 托马索·蒂托尼，意大利外交部长。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献》第7卷第259页。

答复而推迟作出决定。

列宁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也把苏俄和国际革命和反革命的情况通报库恩·贝拉。同时也多次要库恩·贝拉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帮助苏俄政府。

“……您所处的情况使您可以对针对我们的新闻攻势作许多事。”契切林这样在电报中对库恩·贝拉说。“请详细告诉我们在巴伐利亚发生的革命情况。除了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一封简单的电报以外，关于他们我们一无所知。请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事情的发展情况，他们那里全部地还是部分地实现了新制度……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的农业政策怎么样？”列宁问，“您把我的电报转给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了没有？如果还没有，请补上列宁的名字。”（库恩·贝拉在复电中告诉契切林，电报已经发走，他以列宁的名义再一次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意。）“请告诉每一个工人：对方在使用一种新的欺骗手段……6月初，好几家英国报纸刊登消息，造谣说列宁给库恩·贝拉的电报中承认彼得堡的陷落已无法避免……”库恩·贝拉问契切林：“请立即向我介绍红军军衔制度，我们这里急于解决这问题。”

契切林的复电是：“红军中没有军衔制度。唯一的标志是红星，军中毫无例外，每人都需佩戴。总司令的服装和列兵毫无二致……”“请告：列宁访问记的德文译稿你们看过没有？巴黎发的‘合众社’材料的准确性你们检查过没有？”（这里指的是列宁《答美国记者问》一文。——作者）① 库恩·贝拉在电报中答复：“列宁同志的访问记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准确的文字稿已发

---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71页。——译者

出。同时我们已设法让此文在欧洲报纸刊登。”（事后我在莫斯科了解到，列宁读到这份电报时是多么动情，因为那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失败了。）

从这些（特别是从契切林那里发来的约二百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库恩·贝拉除了无数国内事务外还要处理大量国际问题。当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确实是世界革命的前哨和变压器（契切林在电报中对库恩·贝拉说：匈牙利无产阶级第一个在中欧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它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有些电报的内容在报纸上得到披露，所以我也了解，但绝大多数我一无所知。因为库恩·贝拉除当事者以外从来不和任何人谈这些事情的。有时我对他说，某件事早已街谈巷议或是见诸报端了，他就会说：“发表了？那您去读读报纸吧！”

也许正因为如此，下面这件事才在我记忆中留得如此之深。

有一次他喜形于色地回到匈牙利大旅社的家里。“契切林来电报了，”看得出来，此刻他很愿意说话，我听着。“电文有三页。”我还是没有说话。“您知道电报说的是什么事吗？”我仍然没有出声。“电报说的是：有个城市里现在上学的孩子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当然，依然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

现在，从文件中知道，契切林给他发来的是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那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科斯特罗玛。

无论是谈革命的还是反革命事件的电报都要使人付出大量脑力，在这种情况下契切林发来这份报告，看来是想使库恩·贝拉兴奋一下，松弛一下神经。他达到了目的。

最后几天到来了。

1919 年 7 月 20 日，匈牙利红军向罗马尼亚王国军队发动

攻势，因为对方没有按照克雷孟梭的“承诺”从匈牙利土地上撤出。

匈牙利军队的作战计划被反革命分子送到了苏维埃匈牙利敌人的手中。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派和右派分子在这事件中和贡伯什·久拉① 进行了全面合作。贡伯什在 1919 年 7 月 11 日给匈牙利红军新任总参谋长尤利艾尔·费伦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弗朗奇！② ……把反革命势力控制起来！……准备好在你指定的日期和霍尔蒂会合……”③

那么福煦元帅在匈牙利红军向罗马尼亚部队发起攻势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如下报告就不足为奇了。这份报告说：

“……我们确信，匈牙利人的进攻一开始就会遭到失败……红军作战计划的副本科姆洛什先生已经送到我们这里……”

被出卖了的匈牙利红军在七次胜仗以后钻进了敌人的圈套，溃败了。

但影响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还有别的因素。

7 月 21 日共产国际号召世界工人阶级举行国际性罢工。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如今问题已经不是在俄国、在匈牙利、在乌克兰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如何，而是在乌拉尔、在红色彼得格勒、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畔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前途。如果帝国主义扑灭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最早火焰，那么他们就

---

① 贡伯什·久拉(1886—1936)亲法西斯的种族主义者，主张用暴力统治匈牙利。1932 年至 1936 年任匈牙利总理。——译者

② 费伦茨的昵称。——译者

③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 6 卷(B)第 437 页。

有可能把世界工人运动的进程后推几十年……为争夺猎物而进行的厮杀将导致更残酷、更血腥的战争，从而最后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穷困和上百年的奴隶主式的统治……”①

尽管维也纳的大多数工人于7月21日上街示威，柏林的大工厂停止了生产，埃尔富德、基尔、纽伦堡、迪塞多夫和哈雷的一些工厂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意大利、法国、英国也组织了行动，罗马尼亚首都以及被南斯拉夫军队控制的佩奇市也举行了罢工……但正象《红色新闻报》7月26日所写的那样：“……没有出现象本来预计那样的大规模行动……”这次世界大罢工没有达到两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和匈牙利所期待那样的程度。

7月27日库恩·贝拉在致捷克斯洛伐克图萨尔②总理的照会中驳斥了他对匈牙利红军的攻击，事实是捷克民族主义军队越过了苏维埃匈牙利的边境侵犯了匈牙利国土。

库恩·贝拉在电报中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没有一个东西比让我们去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这样的企图离我们更远的了。……您可以去问您的同事斯罗巴部长，问问鲁容贝罗克的赫林卡主教等我当年的难友，我会不会在任何那怕有一点压迫他人企图的政府中任职……”③

图萨尔总理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库恩·贝拉也许是出于企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B)第509页。

② 弗拉斯基米尔·图萨尔(1880—1924)，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右派，1919—1920年任总理。——译者

③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B)第540页。

图唤醒他国际主义的良知而在照会后面写上“官方的和同志的问候……”

7月29日库恩·贝拉通过切佩尔电报中心发出了如下呼吁：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者们！

“协约国资产阶级政府企图用武器和饥饿把资本主义的枷锁重新强加于我们……”①

在这最后的悲剧性的日子里列宁向库恩·贝拉发来了下述电报：

“亲爱的库恩·贝拉同志！请不要过分不安，别失望！……我们了解匈牙利局势的严重性和危急性。我们将尽力而为，可是迅速的援助有时在技术上做不到。请你们尽量坚持。每一个星期都是珍贵的……请接受我最深情的问候，紧紧地握您的手。胜利将是我们的。

您的列宁”

7月31日库恩·贝拉在炮火之中站在蒂萨河桥上，试图阻止溃败的红军。

毫无效果。

1919年8月1日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迫使苏维埃政府辞职，成立了由巴黎和会精心炮制的所谓“清一色”社会民主党政府。② 他们从内部颠覆了苏维埃政府，制订了把一切社会主义成果付诸东流的法令，开始了对“罪有应得者”的大逮捕。这些行动适合胡佛、贝尔福和克雷孟梭先生的口味。

这个“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六天之后又从“内部”被

---

① 《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6卷(B)第538页。

② 即由派德尔·久拉领导的“工会政府”。——译者

一个由牙科医生领导的十三名白卫军官颠覆了。①

匈牙利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府辞职后，在许多城市乡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在协约国使团的合作下使用了一切手段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从而为全面的白色恐怖扫清了道路。

当时关于库恩·贝拉有关的事我还记得很多，但本书的性质和篇幅都不允许我一一加以列举。不过我还是想记述一个小插曲，作为本章的结束。

事情发生在5、6月间。

有一天早晨库恩·贝拉问我："您愿意跟我到科马罗姆去一次吗？我要在那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图萨尔见面。"

我高兴地和他去了。

库恩·贝拉叫陪同的红军战士回到自己的驻地，只身驱车前往科马罗姆的边境桥头。

到了桥头库恩·贝拉下了车，对我说："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

说着他快步过桥，走到了多瑙河的彼岸，从我们这面可以见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边防军战士。

二十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也许是更长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库恩·贝拉一直没有回来。

---

① 即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政府。弗里德里希在美、英、意军事代表的默许下于1919年8月6日发动政变推翻"工会政府"，被自封"匈牙利执政"的约瑟夫·哈布斯堡奥地利亲王任命为匈牙利总理。这个政权的寿命共三个半月，并没有得到协约国政府的承认。——译者

我站在车旁等着，越来越着急："他怎么啦？还回来吗？"

终于我看见他过来了，从桥上快步向我走来，就象过去时那样。

当他走近我时只说了一句："别见怪，让您久等了……"当坐进车里以后他继续说："一切都是枉然，和这些'同志'打交道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有结果。"

第十一章　失　　败

在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资产阶级作家和记者写了不少书，但大多是为了耸人听闻诽谤革命和革命领导人的作品，共和国政府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伯姆、韦尔特奈尔等）也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力图洗刷自己和共产党人一无关系，当然也借机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袖。因此对于了解真正的历史，这些书籍无异是一堆废纸。

库恩·贝拉1920年在《白色恐怖下的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在谈到这些书籍时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下面一段话：

“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象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①

有的共产党人一流亡到外国，也就写起书来。某些人当革命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对一切赞扬备至，库恩·贝拉的一言一行都能使他们拍手叫好。匈牙利共产党在专政前和专政过程中的一切活动他们都积极参加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法令、条文总是举双手拥护。可是当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所有错误和没有发生过的错误，都被他们一股脑儿推给了库恩·贝拉。实际

---

① 《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

上这样做不仅玷辱了库恩，而是给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党带来耻辱。

这些书籍给匈牙利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亚于所犯错误带来的后果。

从共产党人的互相指责和诋毁中得益最多的是国际资产阶级。许多正直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离开了党。

所有这些，影响甚至阻碍了在霍尔蒂制度下共产党的活动。

我和我的姐姐、阿格奈丝以及画家凯恩斯托克的夫人于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前夕从聂尔盖什乌伊法鲁来到布达佩斯。他们给我们派了汽车，还有一个“列宁青年”。在半路，我们就感到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司机一会儿说汽油不够了，一会儿说车胎出了问题，一会儿又说车灯不亮，不住停车。只是当这位叫雷瓦伊（或者是加拉伊）的“列宁青年”警告他如果再停一次就给他一枪，汽车才有了汽油，车胎不再出问题，车灯也亮了。总算到了布达佩斯。

到家后我们正打算睡觉，电话铃响了，是桑托·贝拉打来的，他要我到他那里去，有要紧事。

疲劳顿时消失，我立即前往。

桑托躺在床上，他对于这样和我见面表示歉意，但他感到非常不舒服。桑托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着，但他力图显得很镇静。他扼要地告诉我：他刚从前线回来，罗马尼亚正在步步进逼。他和库恩·贝拉是在索尔诺克分手的。现在前线吃紧，我们的军队抵抗不住优势的敌军。士兵大量逃亡。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现在已经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和外国使团谈判成立工会政府。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已面临灾难性的前

景。库恩·贝拉不久将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回来研究对策。桑托说，他把一切如实告诉我是库恩·贝拉的意思，但希望我不要张扬出去。

我什么也没有问。在这种情况下探询枝节的事没有什么意义。

我回到自己屋里躺下了，但无法入睡。

快到凌晨的时候库恩·贝拉回来了。

他脸色苍白，看着我，知道我一切都已经了解。我不出声，等他说话。但他只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再流血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将采取另一种形式继续战斗。至于怎样进行，用什么方式进行，我还不知道。"

他出去了，召集苏维埃政府成员开会。

几小时以后他回来了，要我派人把负责地下工作的波尔·埃尔诺找来。过一会波尔到了，库恩·贝拉问："地下活动的房子准备得怎么样？"停了一会他接着说："恐怕我们要全部转入地下。"

这位和库恩·贝拉在俄国国内战争时结识的忠诚而勇敢的革命家失色了。

没有想到崩溃如此迅速地来到。

连一间供地下活动使用的房子也没有。

共产党人都清楚地知道，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便将出现全面白色恐怖。只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才寄希望于协约国，以为由协约国帮助，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重新坐上部长的交椅。

苏维埃政权即将崩溃的消息传开了。还当库恩·贝拉和波

尔·埃尔诺商量的时候加博尔·安多尔①(他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提出要把自己的住所供我们使用。他认为那肯定是个安全的去处。其实他弄错了,因为当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不久,他本人也遭到逮捕,至于他是如何逃脱白色恐怖魔掌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深为感激地接受了加博尔·安多尔的建议,正打算前往的时候,库恩·贝拉当年在科洛日瓦尔的好友彼得菲·伊斯特万医生也来了,提出把自己的整个住宅供我们全家使用。他说,他的房子比加博尔的更合适,因为他本人不过问政治,而加博尔·安多尔是无人不知的政治诗人。我们也认为彼得菲的意见对,便同意到他家去。加博尔·安多尔不高兴地走了,但后来还是承认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苏维埃政权失败以后,彼得菲因为藏匿我们而被逮捕,幸赖他的妻子,名歌剧演员芭西利德丝之功,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

库恩·贝拉还没有考虑自己的去向。分手的时候大家都装得很平静。我们三个人——我姐姐,阿格奈丝和我——直接去彼得菲家。这所房子看来确实非常理想,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全家都在某地方避暑。我们天真地想,在这里大概可以安全地度过一段时间。

我们到彼得菲家还不到两小时,蒂玛尔·赛蕾娜带着两个包袱来到了,(彼得菲事后就因为两个包袱受到牵连)。她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准备成立工会政府,并正在和奥地利政府就共产党人的政治避难权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那么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形势很险恶,因为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政府能维持多久,对每个人说来都是个问号,而白党分子则正磨刀霍霍

---

① 加博尔·安多尔(1884—1953),作家。为纪念他,匈牙利政府设立"加博尔·安多尔奖金"奖励青年作家。——译者

呢。她说，库恩·贝拉不打算离开匈牙利，但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逼他走，因为他们怕库恩·贝拉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听到这消息后我把姐姐和阿格奈丝留下，独自回到匈牙利大旅社找库恩·贝拉，他和同志们正在商量善后事宜，包括谁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

在匈牙利大旅社里人们忙碌地走来走去，表面上看来还是库恩·贝拉控制着局势，但这仅仅是表面而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企图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建立没有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是和共产党和平协商的结果。他们现在力争不但尽早摆脱共产党，也想尽早摆脱当时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人，所以他们和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着激烈的谈判。对方也认为此时此刻给共产党人以“政治避难权”是“最稳妥”的办法，当然维也纳也怕共产党人在那里进行秘密活动。

双方达成了协议，给共产党的人民委员、主要负责人及其家属以避难权，地区限于维也纳。但萨穆埃里·蒂博尔是例外，奥地利不承认他的政治避难身分。

（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不少谎言来渲染萨穆埃里的“残忍”和“严酷”，他们把萨穆埃里在击败反革命暴动中所持的忘我英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萨穆埃里本来也没有指望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会成为他热情的东道主，所以经与库恩·贝拉商量，还在专政失败的头一天就启程了，以便在公开化之前到达奥地利。然后从奥地利去俄国，向列宁汇报在匈牙利发生的事情。

萨穆埃里前来向我们告别。他偷偷告诉我，——一面把裹在手帕里的手枪给我看——如果无法越过边境，与其落入白党

魔掌，还不如自杀。告别时我们都感情冲动，不能自已。萨穆埃里和库恩·贝拉之间不但有着深厚的政治友谊，同时和我们整个家庭过从甚密。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到我家来小坐，当和库恩·贝拉谈完公事，总爱和阿格奈丝玩一会儿，对于阿格奈丝的稚气放声大笑。

在依依惜别的时候我只对他说了几句话："多多保重！快走！希望您尽早越过边境。再见！"我赶忙转过身去，不让他看到我的眼泪。他也立即转身，走了。一别竟成永诀。

奥地利宪兵在边境等着他。据目击者说，萨穆埃里发现了这情况，用裹在手帕里的手枪自杀了。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对于他们的一个大敌如此迅速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为高兴。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工人和所有了解和热爱萨穆埃里的人都为失去这位俄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无畏的领导人而痛哭。

库恩·贝拉1932年为萨穆埃里·蒂博尔的文集所写的前言(《警报》，科苏特出版社，1957年)中驳斥了那种所谓萨穆埃里·蒂博尔和他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分歧，而他依靠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把萨穆埃里的正确意见一一否决的谰言。

萨穆埃里之死给库恩·贝拉带来莫大悲痛，他失去了一位最亲密、最忠诚的战友。对于今后，当革命失败以后也需要进行的斗争也是重大的损失。在俄国共同度过的战斗岁月在他们两人中间建立起了超乎工作关系的友谊，而这友谊当回到匈牙利之后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所有问题上两人的意见永远是一致的。但友谊的本质并不在于某个问题各人持什么见解，而在于为了革命，为了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对各种不良倾向进行着共同的斗争。

所谓库恩和萨穆埃里之间的“对立”是历史的伪造者多年来不惜笔墨大肆渲染的一个老题目。

8月1日

我再一次和库恩·贝拉分手，我答应他，自己会保持镇定的。他又要求瓦尔加妮照料我，瓦尔加妮答应了，并且忠实地履行了诺言。

我回到彼得菲的住所，那里的人已焦急地等着我。我和姐姐以及阿格奈丝坐进汽车，由舒莱克① 陪同前往凯伦弗尔德车站。② 专列火车将把共产党人家属从那里运到奥地利。对于人员和所携带的物品进行了严格的检查，非直系亲属不得上火车。我们前往车站的路上已经有人向我们的汽车开枪，幸亏舒莱克还击，对方停了下来，才使我们安然到达车站。在我们前面坐着朗德列尔·耶诺妮及其女儿波丝珂的那辆车也遭到枪击，波丝珂的一条胳膊中弹，事后医治了好久。

我们到达火车站时，专列上已经坐着不少人。这次列车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代表负责，他给瓦尔加妮、她儿子邦迪、我姐姐、阿格奈丝和我腾了一个包间，旁边一个包间里是波甘尼妮和她的女儿，其他人就记不清了。当火车快要开动时汉布尔格妮神色惊惶地过来告诉我，说是有个铁路上的熟人要她千万不要走，因为有可靠的消息说有人半路要炸毁这列火车。“怎么办？”她问。我对她说：如果留在布达佩斯，我们必死无疑，至于火车是否会挨炸，不一定。甚至不挨炸的可能性还要大些。我们不

---

① 舒莱克·亚诺什，机器安装工，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布达佩斯工人苏维埃委员。

② 布达佩斯的一个火车站。——译者

打算下车，也建议她跟大家一起走。

火车直到深夜才开动，一路平安到了久尔，但在久尔站上我们被激烈的吵闹声惊醒了，原来白色分子雇来的一群人手持木棍、铁锹，声称要打死车上的人民委员和他们的家属。幸而跟车的意大利军官出面干涉，才制止了这场风波。

我们继续前进，在某个站上有人告诉我们，不远地方停着另一个专列，库恩·贝拉、朗德列尔·耶诺和波尔·埃尔诺就在上面，由武装人员保护。我们没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但得知他们还活着，而且也已经离开了布达佩斯，还是感到很欣慰。

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期望到达维也纳后将受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款待”，并且可以设法打听到未能和我们同行的亲属以及其他人的情况。

列车又停了。从走廊里传来说话的声音，有人在找我们的包间。说着进来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此人对瓦尔加妮象是熟人似地打了个招呼，然后转身向我自我介绍：“我叫伯姆，是伯姆·维尔莫什的弟弟。库恩·贝拉派我来取您们带着的钱。由我负责带越边境。”

他说的是党的经费。我们把带的钞票交给了伯姆。他告诉我，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经就给政治流亡的人以避难权一事与奥地利政府达成了协议。对方将在边境迎接库恩·贝拉、朗德列尔·耶诺和波尔·埃尔诺，连同担任警卫的武装人员一起送往安全的地方。“那么其他的同志们怎么办？”我们问伯姆。“他们不久也将到维也纳去。不要担心，一切都会解决的。”伯姆说，然后就向我们告别，祝我们一路平安，回到库恩·贝拉那里去了。（事后我们知道，他告诉库恩·贝拉，我们很好，钱已经取到了。）

但是谁也没有看到那笔钱。伯姆后来好久没有露面。在一段时间以后写了一封信，说是那笔钱在边境被查抄了，并说他此刻生活极其穷困。

我们继续向前进，不安地猜测在边境上会遇到什么麻烦。

边境到了，奥地利边防警察把整列火车仔细地搜查了一遍，他们想找到被人民委员的家属们携带出境的“金银财宝”，可是一无所获。当在波甘尼妮的包袱里发现几双旧皮靴时，奥地利警察不解地互相看来看去，警官还特意问了问。事后我也问波甘尼妮，为什么要带这些旧鞋时，她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提这问题，她说：“这些鞋该打掌了。不知道我们会被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钱买新鞋。”

我之所以写这件小事，是由于有不少人一直在散布说，人民委员们的妻子穿的不是绸缎便是丝绒，孩子们只穿外国买的服装。当然，如果只是资产阶级在散布这些蠢话，我也不会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一笔的。

……又检查我们的包间来了。这次轮到瓦尔加妮。几件外衣、贴身小褂，如此而已。我们事先得到通知，只准携带最必需的物品，每人都是按此办理的。轮到我了。他们一定在想：这是条大鱼，如果没带王国的皇冠，至少会有点什么细软吧。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有几张外国报纸曾经发过消息，说我每天戴皇冠消遣。所以此刻他们深信可以在我的行李中找出几斤金子。

但是同样是一无所获。

他们扫兴地离开了我们的包间，看来检查别人更不会有什么惊人发现，便走了。

不久上来几个外国新闻记者，打听到了我们的包间。对于他们的问题我只是说，我不打算跟他们谈私人的事。他们也扫

兴地走了，临走重新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后来他们在报上写道，我穿着朴素，长得象一位西班牙电影明星。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边境的凄惨情景。护送我们至此的“列宁青年”被解除了武装，交给了匈方，然后送回国内。这些护送人员获准与我们告别。“库恩妮同志，”其中一位对我说，“我们就会上绞刑架的，请您替我们向库恩同志转达我们共产主义者的问候。”我们都哭了，他们也流下了眼泪，大家都清楚，这是永别。护送库恩·贝拉那列火车的人员也是一样。他们被集中后交给了匈牙利当局。事后，一无例外地被判绞刑。在处死之前还施以毒刑，个个被折磨得宛如骷髅一般。但依然有人在绞刑台上高呼“第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库恩·贝拉万岁！”

列车继续前进，大家默不作声。每个人都心事重重，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还能不能和自己的亲人见面？自己将要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知道，要作最坏的准备。

到维也纳了。

火车开进月台，我们在车窗里急切地寻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事先说好来接我们的），可是连影子也没有。而是当列车站稳，在车前出现了一大群宪兵，用德语大声吆喝，把从车上下来的妇女和儿童团团围住，命令我们排好队，“Vorwärts!”① “到哪儿去？”我们吃惊地问。“你们会知道的。”但谁也不知道。孩子们吓得连哭都不敢，只是直擦眼泪。我们被紧紧地围住，除了走，没有任何选择。就这样，到了伊丽莎白大街的一个大监狱所在地。“奥地利人就把监禁叫成政治避难的，”我们心中想，却又不

① 德语：“前进！”——译者

知道下一步又是什么。不久，我们被遣往奥地利捷克边境的德罗森多夫集中营。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卡尔·伦纳早在5月3日（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刚露端倪之时）就发出指示："如苏维埃政府成员越境，应即使其知晓：出于其本人安全之考虑，应在公安部门之护送下前往德罗森多夫集中营（简而言之就是加以逮捕，然后送往集中营。——作者）……那些不被认为是死硬的共产党人民委员，可以安排在旅馆。应特别注意库恩、萨穆埃里及瓦戈三人不得与他人接触，而应安置于第三处。"

三个月以后伦纳总理"同志"感到连我们对他也是个威胁了，于是我们这批妇女和孩子就到了德罗森多夫集中营。

这是战时的一个兵营，没有经过任何打扫，其脏乱的程度是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或想象到过的。房屋硕大无朋，四壁残败，领到的床上用品腌臜不堪。（不久我们许多人都因此患了疥疮。一年以后到了意大利还没有痊愈。）

比较脆弱的妇女睹此情景不禁抽泣起来，孩子们一见母亲这样，莫不嚎啕大哭。后来大家终于慢慢安定下来，把路上剩下的食物喂了孩子，让他们躺下。我们要求对方派个人来，就这样的待遇进行交涉。后来来了个"Verwalter"（管理员）。我们尖锐地提出：这样的待遇是对我们的侮辱，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我们送回匈牙利去！至于那里会遇到什么事，由我们自己承担。我们受了欺骗，答应给予我们的是政治避难而不是监狱！

这位"Verwalter"当然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他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与此有关的人，所以我们的不满全部倾泻在他身上。Verwalter 设法让我们安静下来，同时还要求我们不要说匈牙利话，因为他一句也听不懂，最好找个会说德语的人和他谈。不

管怎么说，他去找上级请示去了。

Verwalter 刚一走，妇女们便因争床位而吵闹起来。诚然，床一无例外地既脏又破，但多少日子以来积郁于心中的辛酸、恼恨以及路途的疲劳使大家都变得急躁和易怒，想找机会发泄。

Verwalter不久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明天，至迟在两三天之内让我们转移到另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声称，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的处境是收容，而收容有它应有的规章。对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要是我们知道眼下匈牙利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感谢奥地利政府收容了我们。

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我们果然被转移到另一个原来的战地医院，这里一切都很干净，有间大屋子和几个小房间，甚至还有盥洗室和厕所，和原来的那地方一比无疑是天堂了。

于是开始了争论——谁住哪里？小房间分给谁？有的人说，小房间应该归她们，因为她们不是家属，而是有独立身分的政治家，她们要进行脑力劳动，不能和大家合住大屋子。波甘尼妮、瓦尔加妮、桑托妮、兰捷尔妮和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住小间的人满意地进去了，放稳床，摆好椅子，还找了木箱当写字台。其他人都住在大屋，每人分到一张床，两张床之间还有床头柜，放小东西。

Verwalter等大家基本就绪以后宣读了注意事项，然后要求我们推选一个德语说得好的人，以便他有事可以和此人直接联系，就他本人而言，他建议加尔太太（我的姐姐），因为她看来是个严肃、认真的人。

许多人对于这个选择并不满意，但是没有提出异议。

集中营的生活开始了。

每天早晨有人大喊一声："起床啦！"然后："唉，要是当年库恩奶奶不嫁人该多好！"瓦尔加妮一起床，便向大家道"早上好！"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听到她的问好谁都不由得会笑起来。

伙食头几天还可以，接着变得越来越无法下咽。妇女们尽量使环境变得干净些、整洁些。住小间的和大家来往不多，但制订了在营里开展活动的计划，要教大家速记和外语，并组织政治学习小组。这里能接触到的报纸通常是天主教社会党的《帝国邮报》，报纸说，在匈牙利充满着白色恐怖。从别的渠道我们还获悉：连那些从来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只是在机关里供过职的人，如果没有逃离匈牙利，也遭到了逮捕、毒打、挨刑、判罪。至于究竟谁逃离了，我们一无所知。由于担忧，我们的神经一天比一天紧张。

我们的神经由于过度紧张，有时就表现得非常可笑。晚上，按时躺下，入睡，有一次忽然传来几声尖叫。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大家也都喊叫起来。孩子们被惊醒了，也跟着嚷。每个人都坐了起来，都喊着。看守进来了，喊着："Um Gottes Willen, was ist los?""Hört auf zu brüllen!"① 可是谁也没有停止，谁都想把别人的声音压过去。喊叫一阵以后，象机器里上的发条走完了，这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终于慢慢过去，人们坐在床上，疲乏地看来看去，互相问，发生了什么事。看守以为有人溜了进来，检查了每一个角落，但什么人也没有找到。当大家都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窗上挂着兰捷尔妮的一件白衣服，某一个妇女梦中醒来，错以为是白色分子要越窗进来杀人，便喊了起来。恐惧象瘟疫一样地传染给了每一个人，以至于无法判断是

① 德语。意即"怎么回事？""不许喊叫！"

谁喊出了第一声。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的家属在集中营里已经度过了将近两个月。开始两三个星期，大家终日惶惶不安，不知道第二天将会发生什么事。但大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丈夫的命运，因为报纸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政府连一个星期也没有维持到，国内目前正进行着一场空前的白色恐怖，其规模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失败后必然出现的惩罚。受到迫害的不光是共产党人，只要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做过事的，一律成为恐怖行为的对象。世界的新闻报刊上充满了关于在匈牙利进行的搜捕、虐待、监禁和暴行的报道，所不同者只是一部分报刊对此欢呼，而另一部分则是谴责。

现在，当事过四十六年，人们后来经历了法西斯统治和第二次大战等重大事件，那时的一些情况在记忆中显得淡薄了。但在当时，当我们在奥地利天主教社会党的报纸上读到他们津津乐道的匈牙利血腥屠杀的报道时，真是忧心如焚。我们后来听说，匈牙利白色政权的军官曾经试图劫走逃到奥地利的共产党领导人以便在国内处死；我们也了解到：库恩·贝拉、朗德列尔·耶诺和波尔·埃尔诺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园林里，由人严加看管；后来还得到消息说在奥捷边境的一个十三世纪的城堡里，当年曾经住过阿尔巴尼亚军官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拘留营，收容流亡的匈牙利人。至于城堡里是谁，就无法得知了。

还当听到上述消息之前，我们曾经要求奥方派个委员会来听取我们的意见。Verwalter 起初多方推诿、拖延，但经不起我们再三交涉，他终把我们的书面要求递上去了。没想到，在一个

晴朗的秋日，我们正坐在院子里谈论局势的时候忽然传来瓦尔加妮的叫声："库恩妮，穿上好衣服，准备接待委员会！"我们都以为瓦尔加妮在开玩笑，因为她往往拿开玩笑、挖苦或是咒骂来减轻心中的愁闷。但今天她说的却是真事。

一个两人委员会乘着汽车来到，其中一个是小考茨基——本内狄克特，另一个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他们问：我们有什么愿望、意见，缺少什么，对什么不满意？瓦尔加妮立刻答复："我是瓦尔加·耶诺教授的妻子。我的愿望是请你们把我放出去与丈夫和孩子团聚。至于其他意见，那么——伙食坏到极点，没有过冬的衣服。当时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住在维也纳，不受任何约束，并将得到政府的一切照料。现在我们没有冬衣，也没有足够的内衣。如果长期把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和孩子们都会病倒的。"其他人也发表了意见，大体上都是同样内容。

小考茨基虽然有礼貌地耐心听完了我们的陈述，但并不掩饰他没有时间，说还要去处理更重要的事务。他说，他将把这一切转告给内务部长（此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相信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至于对我们的监护，他认为我们应该引以为喜才对，这完全是出于对我们安全的考虑。设想如果分散居住，奥地利政府尽管怀有善意，也将无法保证大家的安全。小考茨基还扼要地介绍了匈牙利的白色恐怖的情况。我们问：我们的丈夫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他们给了一个使我们宽心的答复。委员会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他们还看了看我们的住地，尝了尝我们一见就想作呕的丸子。看来他们对丸子的印象也不很好，因为我看他们直撇嘴。后来他们说："这里空气很好，阳光充足。"然后走了。

应该说，他们的诺言大部分还是兑现了。伙食暂时得到了

改善，还送来了厚内衣——十五条女棉毛裤和若干童服，——供我们过冬。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找来的。大概是从住在伊丽莎白大街监狱的难友那里扣下来转给我们的吧。

第一个提出要棉毛裤的是一个“脑力劳动”，因为没有棉毛裤她“不能很好地进行思考”。

住在德罗森多夫的妇女们无可奈何地慢慢安于这里一成不变的生活了。尤其是当小考茨基他们许诺我们快要和丈夫们团圆之后，大家开始设法使生活有点变化，找些事做做。有的绣花，有的做别的手工。组织了速记学习小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外语小组，经常读报。如果天气好，在所谓的午餐以后还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小坐或信步走走。当时著名的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德① 的妻子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也在德罗森多夫集中营。对她的控制比对我们要严厉得多了。她不能和任何人接触，但却了解我们。后来当我们迁到卡尔斯泰因之后，她住在我们楼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也就有了联系。她帮过我们的忙。有一次她从维也纳收到一些东西，还把其中的一件大衣送给了我。

在这环境中孩子们是再兴奋不过了，可以成天玩耍，他们还不懂得生活的严酷。

又过了两星期，一个看守递给我一张纸条，是库恩·贝拉写来的。他打听到了我们的住址，纸条上写道，他们都很健康，还说很快就要和我们在一起，问大家好，别的他不能再写了。他们要我也简短地写一些情况交给这个看守。妇女们也都很高兴，

---

①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17 年逃亡国外。——译者

因为大家感到不再是孤单的了，而且很快就会团聚。

后来他又托人带来几封信。又过了一个月，这个看守偷偷地告诉我，几天内就要把我们送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几乎掩饰不住兴奋的情绪，但又不能流露出来，怕给那位看守带来麻烦。我们对于秘密工作是很不熟悉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必须严加注意。大家都着手准备，同时紧张地猜测——我们可能会被带到哪里去？说不定去维也纳，做自由人？说不定从此之后一切太平？我们就这样东猜西猜。有的人甚至天真地想：会不会报上写的匈牙利那些可怕的事都只是谣传，有没有可能过几天重新回到那可爱的布达佩斯去？等等。人们脸上和眼睛里抑止不住地流露出幸福的神情。

与此同时，在集中营中建立起来的“家”也开始解体了——床头墙上的照片、小手工、旧布缝的小壁毯一一从墙上取了下来，敝帚千金，一点东西也不放弃。孩子们也兴奋地参加进来了，仔细地收起碎纸破画。学习小组正式解散，负责人宣布：尽管时间短促，但成绩斐然。今后如果再在一起，应该再继续学下去。因为谁也不知道，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中会遇到什么情况，说不定有朝一日需要靠速记或外语来糊口呢。我们当然对老师的辛劳表示了感谢。于是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启程了。

农民的大车把我们从德罗森多夫拉向新的地点。我说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时间，但记得沿路经过不少风景优美的奥地利村庄，这些村庄与其说是农村还不如说是市镇。村里的居民成群结队前来观看坐满匈牙利女人和孩子的大车，就象看吉卜赛人的车队一样，并且指手划脚地议论着，但辚辚的车声压过了他们的声音。

然后，我们上了公路。

虽然奥地利天主教社会党报极夸大之能事，说匈牙利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干尽了坏事，以至于以奥地利，甚至以整个欧洲的名义要求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境，但从奥地利人民群众那里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敌对情绪。德罗森多夫集中营固然由宪兵严加防范，但还是常有人走到铁栏杆边上来和我们谈天，问长问短——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共产共妻，是不是这样？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如何如何……是不是这样？他们说，其实他们原来也不很相信那些话，现在更明白事实的真相了。他们说，他们不懂为什么要把妇女和儿童拘留起来，也不明白神甫为什么把我们说得这么坏？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还是常会拿些东西来送给我们。当然，我们不能白要，总是也回赠一点东西。他们说：真可惜，我们要走了，其实这样聊聊挺有意思。

第十二章　卡尔斯泰因—施托克劳—斯泰因霍夫

几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新的居地——卡尔斯泰因城堡。说得确切些，是来到了关押着库恩·贝拉等人的监狱。

卡尔斯泰因也和德罗森多夫一样位处奥捷边境，只是在另一个方向。如果这座建于十三世纪的城堡不是羁押我们的牢笼，而是一个旅游项目，说不定现在我会叙述得详细一点。但由于在这里度过的八个月心绪不宁，所以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这个古建筑和领略周围的风光。作为住处，这里是坏透了——阴暗、破败、肮脏的房间里放着几张难看的黑铁床，再加上几张不象样的桌子和椅子。一个公用的餐室，楼上楼下都住人，楼下还住着看守。

“……十五个奥地利宪兵日夜监视着这个阴森森的古堡……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就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城堡的入口处是四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和一个军官……”在许多记者的努力宣告失败以后美国报纸《解放者》记者弗雷德里克·库1920年12月21日第一个进入了这个古堡，他写道：

“……他们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证件和奥地利内务部出具的许可证，同意我和库恩·贝拉在看守在场的情况下用德语进行谈话……”①

1919年10月在卡尔斯泰因城堡里有五六十名被押者，他们中间有库恩·贝拉、朗德列尔·耶诺、鲁道什·拉斯洛、波尔·埃尔诺、瓦戈·贝拉、波甘尼·尤若夫、瓦尔加·耶诺、兰捷尔·久拉、拉科西·马加什② 和拉科什·费伦茨。

库恩·贝拉不断向奥地利当局申诉，向维也纳工人委员会执行局接二连三地写信。几个月以后瓦尔加·耶诺、兰捷尔·久拉、鲁道什·拉斯洛、拉科什·费伦茨得到释放，并迁往维也纳。卢卡奇·久尔吉则更早得到了奥地利的居住许可，在维也纳住下了。

我们比在德罗森多夫较快地习惯了卡尔斯泰因的生活。这是因为这种集中营生活已经不是第一次，同时更因为全家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世隔绝而带来的痛苦。在这段时间里，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粮食的供应相当紧张。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在供应问题上抱怨。被拘留的人决定实行“粮食自治”，责成拉科西负责。他欣然同意。看守城堡的军官允许拉科西自由前往附近农村采购，这样，拉科西结识了村庄里的“巨头”，这位积极的年轻人成了被押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给养官。”应该承认，拉科西的采购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他本人也乐此不疲。

阿尔巴尼亚军官用过的毯子因为未经消毒，几乎使所有在押的人都染上了疥疮。拉科西给库恩·贝拉搽疥疮药膏，痒得难受的库恩·贝拉鼓励拉科西：“搽得越厚越好，别怕！”拉科西这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305页。——作者

② 拉科西·马加什（1892—1971），苏维埃共和国时任副商业人民委员，1921—1924年任共产国际书记，解放后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因违反法制，于1962年被开除出党。——译者

样做了，可是过量的药几分钟以后就使库恩·贝拉疼痛得大叫大嚷起来，又是拉科西给他把药洗掉。

在卡尔斯泰因的居民之间常常因为细碎小事产生矛盾——谁的床放在哪里，谁分什么烟，面包怎样分，为什么有人用电炉，弄得灯光减弱使别人看书受影响，等等。于是爆发激烈的争吵，但很快也烟消云散了。在拥挤的牢房里这是极为常见的病态心理现象。后来，当大家都获得自由以后，每当忆及，绝大多数人往往赧然一笑。

起初，除了这里提到的某些小摩擦以外（主要是合住大间房的人之间），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都还相当融洽。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晚上聚集在库恩·贝拉的屋里分析俄国红军的战局。这时红军的形势并不好，大家不免为之担心。也讨论过如何递个文函，争取让妇女得到释放。库恩·贝拉主动承担了起草工作。在这份函件里，他猛烈地抨击了奥地利内务部长埃尔德施、总理卡尔·伦纳和外交部长奥托·鲍威尔。为了起草这些争取正常政治避难权的文件，库恩·贝拉费了许多时间。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本分析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兴起、活动及失败，并勾勒出未来任务的小册子，题目叫做《从革命走向革命》。

库恩·贝拉只用短短几天就把小册子写成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20年才得以用科洛日瓦里·巴拉日的化名出版。库恩·贝拉在小册子里所阐述的观点，当时在卡尔斯泰因的领导人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后来，和库恩·贝拉其他著作一样，这本小册子也遭到了他们的攻击。

到 1919 年底已经可以感到，在卡尔斯泰因生活的人们逐渐分化。譬如朗德列尔·耶诺和波甘尼·尤若夫往往能在一起散

步好几小时。瓦尔加·耶诺一家离群索居，只和兰捷尔·久拉往来。在库恩·贝拉周围的是所谓“维谢格拉德街”的共产党人——瓦戈·贝拉、鲁道什·拉斯格、波尔·埃尔诺以及拉科西·马加什等人。

在卡尔斯泰因的生活就是这样。如果天气好，妇女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谈些出去后的打算。孩子啃着从树上偷摘来的水果玩耍。而在城堡外面，世界上、奥地利的反动报刊却在极尽污蔑我们（人民委员们）之能事。匈牙利反革命政府一再向奥方提出把我们引渡过去，并得到了奥地利《帝国邮报》等报刊舆论的支持。

前面我已经提到，当时维也纳的供应情况很差。（尽管协约国也答应给维也纳以充足的粮食。但这诺言和对布达佩斯的许愿同样没有兑现。协约国当时答应匈牙利的是：“如果你们打倒了无产阶级专政、驱逐了库恩·贝拉政府，我们就给你们运来应有尽有的东西。”）

我们在卡尔斯泰因当然因粮食供应不足而备遭折磨，然而天主教社会党的报纸居然无端地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他们说：“匈牙利流亡者把奥地利人的东西都吃光了……当年的人民委员们在卡尔斯泰因日食万金犹感不足，……仍醉心于在匈牙利策划发动一次新的暴动……应该把他们撵出去，把他们交给匈牙利人！”（当然他们不会说，生活在卡尔斯泰因的匈牙利人实际上个个饿得形销骨立，而且浑身疥疮。）

我想，会有那么一天，当年奥地利当局和匈牙利反革命政府对我们这批被拘留的人采取了什么手段的有关文件会公诸于世。

奥地利警方接连派人来察看被关在堡里的人做些什么，和

谁发生接触等。他们把密探打扮成“政治流亡者”派到卡尔斯泰因，在堡里几天后突然“病倒”，被“送进医院”，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当然，很难判断谁是真正的密探，但通常经过共同的努力，我们是能分析得出来的，到头来他们便会看到还是销声匿迹的好。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警方后来派“工人”来了。有时派个“鞋匠”来修鞋，有时则是来个“裁缝”给我们修补衣服。我们的人把他们请到楼下小屋子，当弄清楚来人确实不是鞋匠或是裁缝，便给他几下耳光，轰走了。

于是一段时间以后密探就不再光临了。

接着，有人唆使老百姓来和我们过不去。一当夜深，便在外面高唱“小夜曲”齐声呼喊：“Da, da, da! der Bela Kun ist da!”① 吵得我们无法入睡。但看守也因此无法入睡，后来，把他们撵走了。

下一个行动是挑动村民“了解”我们吃些什么。受蒙蔽的老百姓把整个城堡团团围住，直到弄清楚我们吃什么、吃多少才放粮食进堡。这个“围困”持续了好几天。后来我们进行强烈抗议，村民的“自发行动”也没有再重演。

在库恩·贝拉的多次书面交涉下埃尔德施内务部长亲自前来卡尔斯泰因检查我们的情况。他一来到就遭到大家的激烈责问，以致他不满意地问：“Um Gottes Willen, was wollt ihr von mir?”② 人们告诉他，并请他转达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府这里需要什么。埃尔德施一一答应，但要我们稍安毋躁。

内务部长答应先释放妇女出去。但几星期过去了，一切依然故我。堡里人们的情绪越来越坏，往往为细微末节争执得脸

---

① 德语，意为：“在这里，在这里，库恩·贝拉在这里！”

② 德语。意即：“天哪，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译者

红耳赤。但这种常见的“监狱纠纷”和此后的政治分歧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眼下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这个监狱何时才能开始减员。在这问题上大家的态度是一致的。

终于，第一个妇女离开了。是霍迪·埃米尔妮，她即将临盆，大家为她的走而高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情绪又把所有在押者团结在一起了。接着鲁道什妮、波甘尼妮带着孩子，还有我，都被释放了。不久，所有妇女逐一离开了城堡。我记得瓦尔加夫妇也和我同时获释。妇女中间唯有波尔妮留下在城堡里，无论怎样劝说，她都不愿意离开丈夫。

之后，当年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放出去了。后来，奥地利政府认为再在这里保留个小监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便作出决定，单独把库恩·贝拉遣送到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地方，其余被押的人转移到同样也是维也纳附近的施泰因霍夫疯人院。

波尔妮也只好和丈夫分手了，因为人家不承认她是精神病患者。她和我们以及瓦戈家一起住在一个维也纳的膳宿公寓里。

男爵普罗瑙伊·帕尔上校是一个白色恐怖行动队的负责人。还当我们在卡尔斯泰因时就曾企图带领他的部下把共产党人民委员们(首先是库恩·贝拉)劫走，如不果，则就地杀害。普罗瑙伊后来是这样说的：

“维也纳警察总监朔贝尔先生在匈牙利驻奥地利使馆失窃一案中所持的友好态度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多次与他密谈，向他陈述了我的……关于逃往奥地利的共产党人的计划。他采取了极为理解的态度。

“我们在11月一个有雾的日子启程……城堡的地形位置与

我的部下调查所得大体相符。我认为用智取和突袭的办法可以奏效……

“……完成对卡尔斯泰因的突袭行动我认为需要如下条件：黑暗、钱、十二个得力的汉子和三辆状态良好、适合于此行目的的汽车，每辆至少可容纳六个人。我设想，如果在深夜十二点之前，我们可以不发一弹悄悄地解除看守人员的武装，那么就可以把最罪孽深重的三个或者四个人民委员（库恩·贝拉、汉布尔格、朗德列尔和波甘尼）麻醉后塞进汽车，沿捷径运回匈牙利。其余的人民委员就在堡里的电线杆上或树上吊死。在汽车到达匈牙利边境之前，一个行动小组将留在堡里监视其余活着的人，至少到凌晨五点。此后即可撤离越过奥捷边境回国。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普罗布斯还推荐了格拉茨的一位乐于和我合作的精通用哥罗仿进行麻醉的医生。

“从卡尔斯泰因到达匈牙利的这一百五十公里路程，无论穿过布鲁克还是维也纳帕辛格，我都计划用三小时完成。第一辆车为前导，人民委员装在第二辆车里，第三辆作为殿后或备用。我事先命令：如越过边境时产生困难，可将人民委员们就地处死。

“可是命运作出了有利于流亡者，而不利于匈牙利真理的安排。”

普罗瑙伊还说，霍尔蒂·米克洛什也同意了他的计划。

但这场集体屠杀没有实现，因为被关在堡里的人获悉了这个阴谋，并立即通知了奥方。这对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府是件很尴尬的事。他们立即撤换了被贿赂的看守，换上三十名新的警察。普罗瑙伊等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但却是两手空空回到匈牙利，其实他们在科马罗姆树林里已经为库恩·贝拉准备

好处死前折磨他的刑具了。

奥地利当局没有对普罗瑙伊等歹徒采取任何惩罚，(按理是应该加以监禁的)，他们逍遥自在地回到了匈牙利，几个星期之后这伙人谋杀了《人民之声》报的编辑绍莫吉和巴恰。

我在获释后和姐姐以及女儿住在维也纳的一家膳宿公寓里。这里的伙食坏极了，但是女房东对我们很好。她知道我们是匈牙利政治流亡者，只是当时还不知道我们是库恩·贝拉的家属。因为警察局用我未嫁时的名字开具居住证明。他们说，如果用"库恩·贝拉妮"这名字，我随时可能受到暴徒的袭击。

事后我了解到，政治警察的负责人普雷塞尔顾问曾经召见过我的这位女房东，并且告诉她我们是什么人，但严令她不得泄露，并且指示她及时就我们和谁接触、谁来看望我们等情向顾问本人报告。这是后来女主人亲自告诉我的。

这样的指示对这位房东说来是非常不舒服的，她本想解除这个合同。因为尽管她喜欢我们这样规距的房客，但是卷进政治问题里面去她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的。晚上，两个儿子回家了，一个是反共军官，另一个的职业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持社会民主党观点。那个军官当然反对我们住这里，他说，正派人家不应当接受共产党，要母亲立刻驱逐我们。他说，如果人家知道这里住着共产党，那今后还有谁再肯来租房子啊?! 但另一个儿子却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他说，对于政治流亡者要妥为照顾。女房东考虑再三，还是没有解除合同。

当我的房东告诉我，普雷塞尔顾问官要发展她为密探这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去意大利了。话别的时候这位好心的女

人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再来维也纳，需要房子，尽管去找她。她家是安全的。我感谢了她的好意，虽然后来我又去维也纳，但一直没有和她再见面。

住在疯人院的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处境很满意。屋子里有暖气，离维也纳也不远，和享受“行动自由”的政治流亡者联系很方便。

但是奥地利当局没有把库恩·贝拉也安排在疯人院，而是把他送到离维也纳约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施托克劳城医院一个单独小楼里。和他同去的除六个警察、一个警官以外，另有一个警察局派的官员。这个官员住在隔壁屋里，注意并记载库恩·贝拉的每一个行动，然后详细汇报。这八人组成的武装扈从据说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确保”的目的，因此我每次从维也纳前去看望库恩·贝拉时，那警察局的官员总是轻轻撩开一点窗帘，偷看屋里发生的一切，直到库恩·贝拉向他大喝一声为止。然后我们就可以随便聊天了。我把报纸、杂志和维也纳的同志们托交的其他东西一一交给库恩·贝拉。

后来经过维也纳工人委员会的协助，——他们提出：用不到由于保护库恩·贝拉而对我进行防范——警方开给我一张长期有效的探望证。

普雷塞尔顾问一面给我开证明，一面摇头。他说，他了解过我父母的情况，都是很正派的人，真没想到我会嫁给一个颠覆分子，给我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奇怪的是我居然至今毫无悔意。普雷塞尔顾问大人说，其实如果我有意回到埃尔代伊我父母身边的话，他倒可以助一臂之力。

对此我不屑理睬，我默默接过探望证。因为我清楚警察局

“善意”的目的。

那天，我一见到库恩·贝拉，就把普雷塞尔顾问的话对他学了一遍，库恩·贝拉说：“您不理他，这做得很好。以后也别和这个坏蛋说话！”

库恩·贝拉的屋子没有被锁上，可是如果要到花园里散步，却必须由那个官员跟着。两个人一起散步，后面不到三步之遥跟着密探，可不是什么好滋味。

我回去的时候带上库恩·贝拉要寄的信和文章。（警察局官员和警官都没有对我搜身的许可。）

有一天，我刚到施托克劳医院，发现警察局的那个官员在院里等我，一见我到达，便快步向我走来，兴奋地告诉我：昨夜来了“客人”。什么客人？我担心地问。“匈牙利军官想把贝拉·库恩先生抢走，可是被我们制止了。”官员骄傲地说。接着便详细叙述了夜间发生的事。原来夜里医院附近开来一辆汽车，里面坐着四个军官，其中一个走到看门的看守那里，塞给他一把钱，让他把汽车放进院里去。看守收下了钱，但报告了警官，警察于是向“客人”开起枪来。匈牙利人便开汽车跑了。

我慌张地跑进库恩·贝拉的屋子。他对我微笑着，还是那句老话：“别为我担心！”但他还是利用了这次事件，向埃尔德施内务部长写了一封信，指出在施托克劳不安全，要求把他也迁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信送去后不久，库恩·贝拉便被送到第三个“避难所”——施泰因霍夫疯人院。

（普罗瑙伊在他我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日记中写道，维也纳警方把他们这几个人抓住了，但后来又放了，因为“未发现不良企图。”）

库恩·贝拉很满意达到了目的。对他说来，到这种地方来

已经不是新鲜事。他曾经告诉过我，在俄国托木斯克当战俘的时候他病了，医院里没有地方，他也住了疯人院。“在那里我觉得挺好，那些精神病患者清醒的时候对政治问题和沙皇统治能够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施泰因霍夫疯人院的共产党人一见库恩·贝拉回到他们中间都很兴奋，又可以和他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同时，由于红军击退了白匪的进攻，俄国战局有了好转，也增加了人们的乐观情绪。现在可以考虑考虑如何和俄国、和列宁、和共产国际以及和在俄国的匈牙利战俘取得联系了。

要做的事是很多的。

要做的事中间包括把政治流亡者组织起来，建立中央领导机构，创办流亡者报纸，撰写并给报刊寄送稿件等等。

精神病人很快就知道来了一批新住户。匈牙利共产党人虽然单独住，但毕竟是在同一个医院里。迄今为止，到这里来的都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充其量偶尔来一两个高贵的人物。这些高贵的人物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或言论妨害了他们的同样是高贵的亲属或亲友，才被送进来的。

但是，把一群政治流亡者放在疯子中间，来处理政治避难问题却是亘古未有的做法。

我们好象在演悲喜剧。

病情轻重不等、状况各异的精神病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共产党人。有的病人在清醒的时候对他们表示好感，还给他们写信，举行支持他们的示威，当我们家属前去探望的时候这些人会向我们微笑，挥手致意。那些有敌对情绪的人则组织反对共产党人的示威，大声咒骂，喧闹。但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幸而

这里的精神病患者和别的地方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只顾自己。

库恩·贝拉在施泰因霍夫也不放弃为解救共产党人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倦地向内务部长、其他单位和人士投去一发又一发的“炮弹”。每当他写完一份新的呈文，总是念给其他人听，然后放声大笑，说：“只要我们不自由，他们就休想得到安宁！”

时间一天一天在过去。共产党人等待着释放，同时边界那面的白军军官却因奥方未将共产党人引渡过去而焦躁。

他们又一次决定对人民委员们动手了。

5月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到疯人院探望，男人们的情绪都很好。很快我们就弄明白原因了。“在维也纳的同志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艰苦，却还这么想着我们，寄来了东西……”瓦戈·贝拉说。“请看，还附着一封多么热情的一封信！”

寄来的盒子早就打开了，里面的食品也已经拿出来放在桌上，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带着孩子们的到达，以便共享美食。几个月的监禁中每日都是粗粝淡饭，今日一见蛋糕、巧克力以及桔子，在每个人身上引起什么反应是不难想象的。

大家出神地望着变得如此陌生的高级食品。

“你们是自由人，不分给你们……”某个被监禁的人说。“可以给他们一个橙子，让他们回去以后分着吃，”另一个人这么说。“把巧克力给孩子们吃！”库恩·贝拉建议。大家同意了。巧克力送给了警察局官员的孩子和阿格奈丝（别的孩子今天没有来）。“请你们把橙子分了，你们吃得香，我们也高兴。”“别说了，吃吧！”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把蛋糕切开。刚才还对同志们的盛情

和共产党员的友爱欢呼不已的瓦戈·贝拉忽然说了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下了毒，怎么办？""您也得精神病了，瓦戈？"大家异口同声地讥笑他。"懦夫！"库恩·贝拉说。但是瓦戈不让步，把分给他的那份蛋糕放在桌上说："我不吃！你们最好也别吃！"

其间我和姐姐两人分了一个橙子，水淋淋的瓤子特别诱人。我们很快吃完了，孩子们拿到巧克力以后跑到院子里去玩了。

男人们把我们打发走了，为的是不让我们看见他们吃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分到。

我们向他们告别以后就走了。刚到院子门口，我姐姐说她头痛、发晕。"快走几步，乘上电车回家服一片阿司匹林就会好的。"瓦戈妮说。等乘上电车以后瓦戈妮说，她也头痛。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起瓦戈刚才的警告。

一到家，我姐姐快支持不住了。幸好公寓里有医生。医生当即诊断出病因——阿托品中毒。

当时我们的惊惶是不难想象的。医生立刻给我姐姐灌肠。接着又给阿格奈丝作了检查，但没有任何异常。当我们把当时的情况以及吃了什么告诉医生，医生说："看来巧克力里没有下毒。"

我飞跑去打电话，想告诉施泰因霍夫——千万别动蛋糕了，因为那肯定也是下了毒的。施泰因霍夫的电话一直占着线，原来吃了有毒的蛋糕，他们也病了，正在给我们打电话发警告呢。最后电话终于打通了，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好久。

我跑到瓦戈妮和波尔妮那里，两个人全躺在床上。医生给她们灌了肠。当我下楼梯的时候感到自己也头晕，从楼梯上摔

了下去，伤了髁骨。人们把我抬进屋子，躺下。医生安慰我说，看来橙子里的阿托品不多，而且已经溶开，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们观察橙子的皮，果然发现好几个针眼，阿托品是注射进去的。

在我们睡觉以前又给施泰因霍夫打了好几次电话，了解到那里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是瓦戈接的电话。他当然什么问题也没有。

深夜，有人按门铃，进来三个男人，一面自我介绍，一面道歉。弗里茨·阿德勒和与他同来的人说，他们刚从施泰因霍夫看望过那里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

他们要我们放心，说已经采取了应有的措施。医生诊断认为在食品里下的毒其量不足以致命。

第二天，我拖着红肿的腿去看望库恩·贝拉，他正在为我们着急，怕别人告诉他的不是真话。直到看到我和阿格奈丝时才算放下心来了。尽管大家都还没有恢复过来，但都因平安无事而高兴。可就是波尔·埃尔诺不停地笑，好久以后人家还担心毒药进了他的脑子。

库恩·贝拉坚强地忍受了中毒的痛苦。还是象他常常做的那样，盘腿坐在床上，两手使劲攥住床单，咬着牙告诉别人应该注意什么。

至于在这件事情中奥地利警方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普罗瑙伊在他的《日记》中也谈到了这段“英雄业迹”。他说，他们雇了一个叫科利尼的意大利人干这件事，后来此人被奥地利当局查获，本人也作了交待。当然，奥地利把他释放了。

报界简单地报道了这件事。我记得奥地利警方当时悬赏四千克朗捉拿投毒者。这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只相当于一个人一星期的伙食费。奥方给了捉住科利尼的人四千克朗，于是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下毒一案就算了结了。

或者说还有一点余波，那就是：获释后的科利尼在匈牙利被普罗瑙伊的人抓住了，本来打算将他处死泄愤，但三思之后还是放了他，叫他再伺机对库恩·贝拉下毒手。

普罗瑙伊当库恩·贝拉到苏联以后还派了三个人去追踪他的下落。

第十三章　在意大利

1920年4月两位意大利议员到施泰因霍夫访问库恩·贝拉，代表圣马力诺社会党政府建议向他提供政治避难。

这个邀请使库恩·贝拉很为难——如果谢绝这个建议，那就意味着继续无限期地和家庭分开，何况在这里的同伴也已逐渐离去，只剩下两三个人了。此外，由于我待产在即，物质上的问题也不小。所以他没有给肯定的回答，想先和我谈谈。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情绪忧郁。“他怎么啦?”我问自己。

他大概觉得难于启齿，先是沉默了一阵子，后来问阿格奈丝怎么没有来？接着又问了些别的事，最后才把意大利议员的邀请告诉我，探询我的意见。

我断然反对。不论什么原因，我不愿意和他分开，我提出种种理由，库恩·贝拉难过地说：“其实早晚还是要分离的。我不久要到俄国去。”

库恩·贝拉不久要到俄国去，这点我是知道的。

还在3月23日，两位奥地利共产党人——托曼和施泰因哈特（后者是奥共主席，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45年任维也纳副市长）得到准许前来施泰因霍夫造访被拘留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和库恩·贝拉。

奥地利国家警察局顾问普雷塞尔坐在一旁听着。

库恩·贝拉介绍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这个地方的使人难以忍

受的情况，八个月来为争取明确他们身分的努力没有得到结果。他说，如果不允许他们离开奥地利，或获得在维也纳可以自由行动的政治避难权，他们将进行绝食斗争。“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其他人在维也纳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有的——如孔菲·日格蒙德——还能为《工人日报》写文章，而我们依然被关在疯人院里，这样做不行。”

托曼和施泰因哈特通知库恩·贝拉说，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驻柏林外交代表已经致函奥地利帝国总理，表示愿意负责安排库恩·贝拉等取道德国前往苏维埃俄国。奥地利总理已答应就此事和政府磋商。

库恩·贝拉同意前往俄国。奥共的这两位代表还答应：奥地利工人中央委员会将为争取被拘留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的获释而努力。库恩·贝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委员会的保护。

其间，奥地利内务部长埃尔德施在电话里要求他们把绝食推迟一星期，但是遭到匈牙利领导人的拒绝。库恩·贝拉敦促奥地利工人中央委员会把他们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普雷塞尔顾问前来谈判，库恩·贝拉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普雷塞尔指责库恩·贝拉干涉奥地利内政。“毫无事实根据！”库恩·贝拉回答道：“普雷塞尔先生，我禁止您给我加上这个罪名！”“您没有权利向我发号施令！”普雷塞尔说。

到了4月份，俄国之行看来快要成为事实了，但库恩·贝拉等几个人又等了三个月才从施泰因霍夫城堡释放出来离开了奥地利。

尤德凯维奇同志到施泰因霍夫来看望库恩·贝拉，说将由他陪同前往俄国。

“……我对奥地利同志的印象不算好。在一间空荡荡的大

屋子里我看到了库恩·贝拉和另外两个也是前来探望的同志。”尤德凯维奇这样回忆那次见面。“可是我们刚说了几句问好的话，就被传进来的粗野喊叫声打断了：‘Kommunisten! …Die fressen alles auf! Uns lasst man hier hungern; die bekommen alles was Sie Wollen!’（“这些共产党什么都被他们吃了！让我们在这里挨饿，可是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是司空见惯的日常问好。’库恩微笑着对我解释：‘一个可怜的病人受了坏人的怂恿，拿咒骂我们开始他一天的生活。我早习惯了。’

“幸好喊叫持续的时间不长，我们就继续谈话……库恩把我送到医院门口，一个病人一见库恩就破口大骂。

“‘他早先是一个匈牙利军官，’库恩对我说，‘他见我就骂。’”

“家眷暂时不能到俄国去。”库恩·贝拉告诉我。他接着说，对他说来，知道自己的家属已经得到了妥善安排，那怕只是暂时的，心中就比较好受些。他又说：“一等有机会，我就来接你们，或者我再回来搞运动。这样，全家又可以在一起了。”

事实上不能有别的选择，我同意了。不久我们便启程了。我们拿的是化名的捷克护照，因为用库恩·贝拉妮的名字旅行是行不通的。要求奥地利政府允许我们出境也有困难，只能悄悄地，几乎是非法地离开奥地利。一年之后，当我们被意大利当局驱逐出境的时候，为了这份捷克护照被奥地利警方课以罚金，幸而没有发生别的事，而捷克方面却大大惩罚了我们一下，这是后话。

我们又要分手了，库恩·贝拉很镇静，而我却有些失去控制

了——他又是一个人了，何时才能再相见呢？瓦戈妮和波尔妮答应会好好照顾他，会经常去看望他。她们后来也是这样做了的。我羡慕她们，她们不用走，我设想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不懂当地语言，举目无亲的情景，不禁不寒而栗。我们究竟将会怎样？可又没有别的办法。

旅行的一切手续办完了，我们坐上一辆汽车，到了火车站。车上是一个专门的包间，没人陪同。

当火车开动，意大利议员布科带着一个侍者走进包间，送来了我们久违的白面包，还有一大堆可可、巧克力和水果。

这一切都象是梦境，但我们的情绪并没有因此好起来。一想起就要和库恩·贝拉分开以及行将身处异域的凄凉之感，我就不能平静。意大利议员和我用法语交谈起来，多方劝慰我，但我什么也听不进去。

突然，走廊里一阵骚乱——是查护照的来了，但我们包间里却没人进来。

到了威尼斯，我们下去参观了一下市容，此情此景，连活泼的鸽子和古色古香的街道也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波洛尼亚。

已是傍晚时分，陪来的人把我们安排在一家很豪华的旅馆的套间里。他们请我们休息，说明天再商量别的事。

路途劳顿使我们很快就入睡了。只是在卡尔斯泰因传染上的疥疮还在折磨我们，可是我们不敢说，在这豪华的地方实在使人羞于启齿。

第二天上午科姆亚特·奥劳达尔① 夫妇来找我们，他们在

---

① 科姆亚特·奥劳达尔(1891—1937)，诗人。《国际》杂志的创办人。该杂志后来成为匈共的理论刊物。——译者

意大利已经好几个月了，和许多别的政治流亡者一样，他们也是意大利党的客人。几个月来，他们的意大利语已经说得不错。刚开始谈话，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来到了。他们向我们打听库恩·贝拉的情况，并且郑重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他们还介绍了一位律师，说将由这位律师来办理我们的一切事情。

这一切都使我很诧异，因为迄今所知，我们只是路过这里，目的地是圣马力诺。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布科手里捏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兴冲冲地进来了，向我们——意大利的新客人们问好。

报上说的是在布科议员的陪同下库恩·贝拉的家眷到了意大利。布科议员在今日清早拜会了本省政府，说明我们业已得到圣马力诺政府的同意，前往政治避难，路过此地。但由于我即将分娩，希望本省政府给予我们在意大利以政治避难权。省政府未呈请上级批准同意我们在波洛尼亚居住，条件是不准干预意大利内部事务，不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我答应了这个条件，并且确实也是遵守了。可是意大利警方后来还是通过接受他们影响的报纸，散布我们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中心，并经常召集共产党人开会。（在十个月以后他们以这个罪名拘留了在波洛尼亚的全体匈牙利政治流亡者，并驱逐出境。）

对于不再需要长途跋涉这个消息使我们很高兴，但是我很不喜欢这篇报道。因为关于我们沿途情况写了许多纯粹是画蛇添足的东西，包括我们拿的是捷克护照这个情节。（前面已经提到，这使捷方很恼怒。）

我当时就对科姆亚特夫妇说，我不喜欢在报纸上抛头露面，我最希望的是在公众面前销声匿迹。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但是

科姆亚特意味深长地一笑说:“你自然不喜欢这样做，可是布科‘同志’喜欢。”

尽管是盛情款待，可是有不少引起我们反感的事物。早晨醒来，我在墙上看到一张价目表，我们这房间的价格几乎是维也纳膳宿公寓的十倍。当律师前来的时候我当即向他提出：这样贵的房间对我们不适合。律师说:“这钱不需要您来付，库恩·贝拉太太。”“那就更不适合了，”我这样回答他。但显然我的论据不足以说服他，于是又加了一句:“一般说来，我们在这样豪华的旅馆里住，自我感觉很不好。这里只有资产阶级住得起。”夏西同志(这是律师的名字)虽然不同意我的看法，但一两天之后还是给我们在小得多的“罗马旅社”找了一个单间。

我们在一个工人合作的食堂里吃饭，那里离旅社不远，有好几个政治流亡者在那里入伙。我们很爱吃意大利风味的面条汤。食堂里的气氛也使人感到亲切。每张餐桌上都放着红葡萄酒，工人们一面吃饭，一面愉快地大声交谈，不时有人过来向我们致意，打听库恩·贝拉为什么不到意大利来？他们说，意大利很民主，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当强大，库恩·贝拉如果来到这里，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他。尽管他们的话并没有实际意义，但听来确是使人高兴的。

还在第一天，科姆亚特·奥劳达尔就告诉我们:坐在我们对面那张桌子上戴宽沿帽的小个子是警察局的密探，此人的任务就是注意政治流亡者。他向科姆亚特和我们象熟人一样地含笑问好。科姆亚特提醒我们：不要过分相信有些意大利同志的热烈言词。虽然他们说这些话都是好意，但往往言过其实，而且一热情就会忘了生活的现实。我当时不同意科姆亚特的这个观点，可是当意大利党发生分裂之后我看到科姆亚特是正确的，正

是那些说话最激进、态度最热情的人最早抛弃我们。

我们在城里走了一周，参观了几个博物馆，有的房屋墙上写着“Evviva Lenin!”，使我们很感动。有的地方还看到“Evviva Bela Kun!”① 的标语。商店里货物琳瑯满目，我们给阿格奈丝买了一件粉红的绸衬衣。这件衣服阿格奈丝后来一直没有穿，所以算是个纪念品。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只是积蓄力量，在暗中为夺取政权作准备，所以表面上还是太平盛世，但十个月以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天之内“库恩·贝拉妮带着孩子在这里居住”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波洛尼亚。所到之处人们总是好奇地看着我们。不少人向我们表示欢迎，第一个问题总是关于库恩·贝拉的——他在哪里？他好吗？为什么没有到这里来？

我们在农村也受到欢迎，人们围着我们问长问短，虽然不懂他们的话，但从闪烁的眼神中深深地可以感到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友情。

到达后不久给我介绍了一个叫做比多内的妇科教授。教授热情地告诉我，他在波洛尼亚市郊有个私人医院，我可以在那里住院。可是教授看出了我在犹豫——因为离开市区太远，和姐姐以及阿格奈丝联系不方便——接着又说，在市区他为被遗弃的妇女办了一个收容所，设备还不错，他是这个收容所的主任，白天在那里上班，他可以在那里给我安排一个屋子，家属白天也可以和我在一起。他诙谐地加了一句：“您不也是被遗弃了吗？”

几天后我住进了收容所，从教授到每个工作人员都对我很好，可怜的教授后来为此吃了不少苦。当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

---

① 意大利语“列宁万岁”和“库恩·贝拉万岁”。——译者

后，教授遭到逮捕。这个意大利最有名的妇科教授由于对我的关心被指控同情共产党。比多内教授确实是竭尽所能来安慰我远离故土的痛苦。但教授不但对我，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和霭可亲的，他救死扶伤，助人为乐。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个讲人道主义的好医生，他受法西斯分子的惩罚原因就在于此。法西斯分子把他关进监狱，听说获释后老教授去美国定居了。

我在这个“被遗弃妇女收容所”里住了一个月，这个收容所和一个养老院合在一起，原先是一个修道院。我住了一个单间，我姐姐和阿格奈丝白天可以过来和我作伴，到晚上由一位叫做山多尔的医生照看我，所以我一点也不寂寞。

有一天晚上，山多尔医生被请到一个村庄去会诊了。他是个有名的医生，又是个好心人，有求必应，得到大家的尊敬。

他出门时对我说，可别在他不在的时候分娩。

约模十一点钟的时候——“命令”没有起作用——我开始阵痛，到凌晨，山多尔医生回来时，我身边已经多了一个黑发的小男孩。

山多尔医生不满意地摇摇头，但当他知道有两位医生给我助产，而且教授本人也来过的时候，他放心地回家睡觉去了。

“西纽拉贝拉·库恩① 生了个小男孩”这消息很快在波洛尼亚传开了。许多工人举着旗帜在产院门口举行游行，高呼口号向库恩·贝拉致敬，向“库尼诺”②致敬。工人派出代表团，向我献花。

别的访问被教授禁止了，因为我当时发着烧。

我们把这事发电报告诉库恩·贝拉，那时他还在施泰因霍

---

① 意大利语。意为“库恩·贝拉太太”。——译者

② 意大利语。意为“小库恩”。——译者

夫。几小时后我们收到回电，库恩·贝拉希望孩子叫“米克洛什”，可是根据意大利习惯，一个名字不够，为了纪念萨穆埃里·蒂博尔，我们在户口登记册上给孩子起的名字是库恩·米克洛什·蒂博尔。

孩子刚出世一两天，教授给我带来一份报纸，写的是库恩·贝拉在乘火车赴俄国途中被扣留，如今下落不明。我当时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总算没有让我焦急很久，晚报的消息说，库恩·贝拉安然无恙，在办了某些手续以后继续前往俄国。

关于这插曲的细节我只是后来到了俄国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库恩·贝拉等一行数人是取道德国前往的。当火车到达斯德丁①，他们在站上受到一群白俄的围攻，（虽然他们的旅行是极端秘密的，但还是被德国当局知道了）。这事极可能是叛徒纳纳西·久尔吉告的密或是被他认出了库恩·贝拉，反正整个事件是在他指挥下进行的。

陪同库恩·贝拉的官员对此漠然置之，直等到这群白俄流氓出够了气才虚张声势派人赶，然后把库恩·贝拉等送上轮船。

我在这里不妨引用老党员（他也是这次旅行中的一分子）尤德凯维奇·加博尔·摩西的回忆录中的一段：

“……充满革命气氛的1920年夏天，在挫败波兰地主的进攻以后，红军大举反击，几个星期以后就直逼波兰首都华沙。

“如果攻陷华沙，将可能改变从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政治格局。

“我就在这个时候受党的派遣取道摩尔曼斯克、挪威、瑞典、丹麦和德国前往维也纳。几个星期后到达那里，在一个货运火

---

① 斯德丁，今波兰的什切青，当时属德国。——译者

车站上和库恩·贝拉、瓦尔加·耶诺以及其他两个曾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战斗的俄国共产党人见面，并一同立即前往俄国。

“库恩·贝拉等混在一个为此目的临时组成的一百二十名‘战俘遣返队’中间。可是尽管精心挑选了‘战俘’，工作做得极为秘密，在火车站上我们还是遇到了一大群维也纳的以及不少大通讯社的记者，所以当我们的火车到达捷克斯洛伐克时（由于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① 巴伐利亚到处是反革命恐怖，我们无法路过那里，只能取道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无数群众正在那里示威，有的人表示声援，有的人则是反对我们。我们五个人单坐在一个包间里，虽然这是一列坐满人的客运火车，群众还是很清楚库恩·贝拉和我们在哪里。

“我们好不容易从这群被资产阶级报纸刺激起来的群众中脱身出去，直到过了边境进入德国土地，紧张的心情才算慢慢平息下来。在德国我们没有受到干扰，悄悄地来到了斯德丁。在这里的货运车站的一条偏僻轨道上，战俘们等待着把他们运往俄国的轮船。几天以后我们上了船，这条载着绝大部分是俄国战俘的船就这样启碇回国。

“离施维纳谬德② 不远，轮船突然停住了，挂着一面黄旗的巡逻艇迅速向我们靠拢，几个警官，登上了我们这条船，在和船长进行了简短交谈后宣布拘留我们五个人，并关进了一个小船舱里。

“在这以后发生的事只是事后才知道。当我们被关进小

---

① 亦称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13日在慕尼黑宣布成立，5月1日被社会民主党政府镇压。——译者

② 今波兰的什维诺乌伊什切。——译者

舱以后战俘们不允许把我们带走，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舱门半开着，战俘们在门口站岗值班。

“第二天三艘驱逐舰在我们附近出现，其中一艘上的扩音器用俄语向我们喊话：如果库恩·贝拉以及与他一起从维也纳来的人在十分钟之内不下船，三艘驱逐艇将立即向这条船开火。库恩·贝拉用俄语要求来自维也纳的旅客(战俘)和我们一起下船，请其余旅客安定。

“驱逐舰在几小时内把我们送回斯德丁。我们五人被关在驱逐舰的机舱里，患有哮喘病的库恩·贝拉无法待在这充满煤气的地方，经要求已经把他带到上面的舱里，而我们四个和看守却全部被煤气熏倒了，只是在皮靴的猛踢下才醒过来。

“从斯德丁又用专车整整花了两天工夫把我们在德国运来运去，摆脱了记者和协约国情报人员的追踪，最后到达奥佩恩附近的小城市尼斯，把我们关在一个旧战俘营中。

“管理人员声称要把‘非战俘’从战俘队中挑出去，经过商量，库恩·贝拉和我主动走了出来。瓦尔加·耶诺和两位俄国同志继续留在战俘队中。在我们站出来以后原来声称对战俘要进行的审讯也就不再进行。因为事实很清楚，使对方感兴趣的只是库恩·贝拉。但又不能让库恩·贝拉独自交给他们，所以我也一起站了出来。

“从纳索又用火车把我们拉到柏林，住在一个警官的私人住宅里——事后知道——住宿费由苏联使馆支付。

“在这地方住了约模两星期。

“其间匈牙利政府发电报给德国当局，要求把我们引渡过去，理由是我们在匈牙利犯有刑事罪，法庭要对此进行审理。有一天我们看见柏林的报纸上报道德国外交部长在国会回答议员

质询时表示：由于匈牙利政府未能在规定的八天之内用书面提出引渡我们的要求和支持这个要求的证据，德国政府无法继续扣留我们，因此将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永远驱逐出境。

“就这样，先是库恩·贝拉，几天后是我各随着遣返的战俘相继回到了苏维埃俄国。

“但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红军在波兰的挺进已告结束，因此原先拟议要我们参与付诸实现的计划也已就不再现实了。”

上面所说的情况我在意大利当然不可能知道。当时我所能引以自慰的是库恩·贝拉不久将到达俄国，而在那里，他是安全的。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一直没有和我联系，关于他的情况我只能在报上了解，而这些消息往往又是极不真实，但不管怎么说，他活着，在工作，是无可置疑的。

不难想象历经艰险之后重新来到苏联土地时库恩·贝拉兴奋和激动的心情。

他在彼得格勒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报上发表了他到达的报道。

“向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领袖致敬！”这是彼得格勒《消息报》文章的第一句话。文章接着写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代表昨天会见了库恩·贝拉。库恩·贝拉是国际无产阶级最崇敬、世界资产阶级最痛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因为他领导了匈牙利革命，在中欧点燃了共产主义的火焰。库恩·贝拉同志站在最早起来仿效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行动的人民最前列。

“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匈牙利无产阶级战斗了一百三十三天……俄国工人欢迎库恩·贝拉来到苏维埃俄罗斯，还因为在1918年他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起在乌克兰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正象他回答彼得格勒工人致意的

时候所说的那样，他在这里只打算停留一个短的时间，他想尽早回去……”

当然，库恩·贝拉的确是这样想的。

还在 1919 年 12 月 7 日他在卡尔斯泰因给列宁写信道：

“……我很可能由于第三国际的事务要前去俄国，但——自然——我打算很快回来，以便继续做在这里的事……眼下我还处在被拘留状态，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工作。匈牙利无产阶级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中得到的好处是：它有了革命的过去，而这在从前是没有的……”

那时候并非库恩·贝拉一个抱着这样乐观的态度。彼得格勒《消息报》写道：

“……整个欧洲到处孕育着革命的风暴……工农匈牙利将沿着匈牙利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

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都是这样想的。库恩·贝拉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在短时期以后他将回到匈牙利——至少是靠近匈牙利的地方——为实现第二个匈牙利苏维埃而战斗。

但此刻他要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去，和列宁以及别的同志见面，投身于共产国际的工作。

不久，他果然离开莫斯科了，但他不是回国，而是前去南方战线作为那里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参加对弗兰格尔① 白匪军的作战。

我的意大利语进步得很快，已经能够读报，而且也说几句

---

① 彼得·尼古拉也维奇·弗兰格尔(1878—1928)，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南俄反革命头子之一。1920 年纠集邓尼金残部自任白卫军总司令，配合波兰地主武装向苏维埃俄国进攻。11 月兵败逃亡国外。——译者

了。

儿子出世以后我病了好久。意大利同志们决定让我们到一个海滨小城市渡过这里炎热的夏天。他们在卡托利卡一位在银行供职的同志那里给我找了地方，并且由这位同志和他夫人陪同我们前往。

但是到佩萨罗(也是一个海滨小城市)的时候我由于乳腺炎发作，只好在那里动手术，然后再继续前往目的地。卡托利卡风光宜人，可是我一直发烧，根本没有能领略其什一。

我在卡托利卡的三个月期间在意大利的匈牙利政治流亡者的处境每况愈下，由于党的分裂①，社会党停止了给匈牙利政治流亡者的援助，而意大利共产党在物质上又很难支援我们。但当时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得还很不够。

格拉齐亚迪② 同志到卡托利卡来找我们，把拉科西·马加什的一笔钱交给我们。格拉齐亚迪刚从俄国来，在边境遇到拉科西，把我们的经济情况以及意大利两党分裂后的局势告诉给他。拉科西把身上所带的全部款项都交给了格拉齐亚迪，自己只留下了回去的路费。

当时拉科西是这样对待库恩·贝拉和他的家眷的。

9 月初，我好多了，就回到了波洛尼亚。

刚到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市里给我们拨了一个住所，不用再住旅社了。给我们的房子非常合适，在一所漂亮的楼房的二层，有三间屋子。在这层楼的另一头住着一位名叫阿尔维西的社会党教授。尽管两党分裂，阿尔维西夫妇对我们表现

---

① 这里是指左派社会党人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译者

② 大学教授，社会民主党人，后为共产主义者，二十年代中期脱离共产主义运动。——译者

了由衷的热情，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孩子，后来当我们被驱逐出境的时候，他们还提议把小尼科利诺（他们这样叫米克洛什）放在他们家。

那时我们家增加了一个成员，除了三个月的米克洛什外，瓦戈·贝拉九岁的男孩子邦迪也由我照管。在意大利的整个时间里邦迪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和阿格奈丝同上小学，他们很快学会了意大利话，两人在一起时只说意大利语。

我们开始习惯意大利的流亡生活了，除了匈牙利同志，这里几乎没有别人来。意大利社会党的人不再理睬我们，而意共的人由于受到迫害，不太露面。

有一天晚上，我们已经躺下了，听到有人轻轻敲门。来者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自我介绍：一个叫博尔迪加，还有一个叫马兰戈迪。

博尔迪加向我们表示谦意，不该这么前来打扰。他说，他们是前来告诉我们：今后由意共负责照料我们。博尔迪加说他处在地下状态，所以不能常来联系，但马兰戈迪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行动不受到限制。此外，他的职业是教师，所以还可以帮助孩子们。博尔迪加说，过一段时间打算把我们迁到那不勒斯去，他的家也在那里，那样我们就不会寂寞了。

我感谢了博尔迪加的帮助，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而马兰戈迪则每天都来，就象家庭成员一样，不但自己教孩子学习，后来还找来了一位女教师教阿格奈丝意大利文。这样亲密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法西斯分子公开向共产党发动进攻。有一天马兰戈迪突然没有来，而且后来也没有能再见到他。

直到我们去了俄国之后才从意大利同志那里了解到：马兰戈迪是最早起来支持法西斯党出卖共产党的人物之一。看来那

时和我们在一起就是个密探了。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法西斯分子正在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共产党员往往在街上无端遭到毒打。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被法西斯分子利用来扩大自己的队伍。社会党的成员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职员和手工业者，他们感到法西斯党可能获胜，便纷纷投靠过去。

我们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几个月。法西斯党的活动日益猖獗，使人们越来越不安。自由党本身就软弱无力，对于法西斯分子无可奈何，后来干脆转过身来攻击共产党是社会的敌人。法西斯分子于是更有恃无恐，殴打的对象从共产党员扩大到了社会党党员。

有一次阿尔维西教授带着小女儿出去散步，突然有人从背后给他一下猛击，接着好几个人对他拳足交加，打倒在地。尽管小姑娘高声呼救，但警察置若罔闻，直到一个熟人路过这里，听到小姑娘的喊声冲过去，才解救了已被打得半死的教授。

这种事在意大利已是司空见惯了。法西斯分子明确地意识到没人敢制止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以更猖狂的气焰向工人进攻。一天晚上他们袭击了“意大利工商会”，工商会的负责人就是那位布科议员，但布科一筹莫展，只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当局派来了一队警察，驱散了肇事者，但查封了工商会，并带走了全部党的文件、材料和金钱。第二天工人举行罢工，上街游行，这又给当局镇压工人提供了借口。大规模的逮捕开始了，市里充满着压抑的气氛。法西斯分子撕下电车上的工人领袖像，挂上了他们首领的照片，而工人则拒绝开挂有法西斯分子头像的电车。最后法西斯便派了自己的电车司机。

在反共运动的恶浪中，法西斯分子当然不会放过我们。他

们起初在我们窗下唱反共歌曲，后来又在报上发表毫无根据的报道。说是我佩戴布尔什维克的徽章和米西亚诺在一家茶座喝咖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上来扯掉了我胸前的徽章，批评我在意大利居然佩戴这种徽章而不以为耻。这篇文章说，这个法西斯分子激愤得动了手，可是我的“骑士”不但没有保护我，反而一溜烟逃跑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买牛奶，奶店老板仔细地打量着我，看我的伤势。后来什么也没发现，虽然放心了，但他叹气说：“虽然没有发生这事，可是这类事是可能发生的。这群恶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深深地思索：该怎么办？

邻居大学教授劝我们尽早离开意大利，他认为接着来的肯定会更可怕，现在的政府只是在形式上行使权力，法西斯分子公开夺取政权的时候已是指日可待。墨索里尼后面站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中不但有西西里地主，更有意大利全国的大资本家。

有一天，一个医生来找我。这位医生曾经到我家来给阿格奈丝看过病。他带来墨索里尼的一个口信，希望我们尽速离开意大利。因为法西斯党将不会允许库恩·贝拉的家眷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我们没有合适的地方，那么可以到圣马力诺。墨索里尼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把自己的汽车提供给我们使用。

我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他的汽车，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自己乘火车走。

第二天我前往一位社会党的律师处（我们刚到意大利时经常联系的夏西律师早已不知去向了），我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委托他代我们向意大利政府申请出境签证。律师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我们待在那里对社会党也变得很不舒服起来。

同时我给在维也纳的朗德列尔·耶诺写信请他设法谋求奥地利的入境签证。不久回信到了，可是只有在维也纳的居住许可而没有奥地利的入境签证。

其间意大利警方多方对匈牙利政治流亡者寻衅。有一天，有几个自称是居住在这个楼里的“马志尼派”① 学生来找我，说他们那里警察正在搜索，希望我能允许他们在我家阁楼里藏几支枪。我正准备同意他们的要求，不料科姆亚特·奥劳达正好来访，见状问是怎么回事，学生们把愿望重复了一遍。科姆亚特严厉地把学生申斥了一顿，并且把他们哄走了。科姆亚特警告我说，再也别理这种学生，他们中间肯定有警察局的密探。幸好被科姆亚特碰上了，否则谁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

两三天以后警察在我家也进行了搜查，把一切都翻遍了，连八个月的米克洛什的小床也没有放过，然后把阁楼也仔细查了一遍。

搜查时阿格奈丝也在场。看了一会她拿出一个打火机挖苦搜查的人说：也去搜搜她的口袋，因为她也有武器。五岁孩子的讥讽使带队的人很尴尬，只得讪讪地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临走，这个带队的说：如果他有这样一套屋子他就很满意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的楼被警察和便衣监视起来了。看门的人前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请他前去科姆亚特·奥劳达家，通知他们这几天别来我家。看门人不肯去，他说，他如果外出，一定有人盯梢，那样对谁都不好。

---

①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人，宣传在劳资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解决工人问题。——译者

很快我发现看门人的意见是对的，我连去买牛奶也有两个人跟踪，而且还明目张胆地一直跟到店里面。我只好回家，静待事态的发展。

下午有几位匈牙利同志来访。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就有人敲门。来者是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他们询问了一位同志的姓名，然后请这位同志跟他们走。不久这几个警察回来了，询问另一位同志的姓名，然后又把他带走。就这样重复了几次。晚上警察又来了，这时屋里没有客人，我问：是不是要我跟他们走。他们答称：意大利不逮捕妇女，然后在屋里又搜查了一遍，走了。

第二天我又找那位律师，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请他催问办理护照事宜，他答应了。

很快来了答复：通知我和我的姐姐于某日某时前往当地警察局。

我们不知道在那里可能发生什么事。尽量设想了种种可能，以及能够做得到的对策。把孩子托给了阿尔维西教授夫人，她痛哭失声地答应会全力照管孩子。

一位社会党议员的儿子陪我们前往警察局。他被阻挡在门外，我们被带到一间屋子坐下。不久进来好几个人，从各个角度给我们拍照“不好！”我心中想，但没有说出来。等了好久以后，进来三、四个人，其中一个煞有介事地向我们宣读一项决定，通知我们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意大利国境。

我们没有护照。没有护照能到哪里去？脑子象是顿然空了，一时什么方案也想不出来。我强打精神说：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这里，我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对方同意了，但声称：二十四小时以后我在意大利就不再是个自由人，所到之处必需有人监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要监视就监视吧！

我们回家去，大家见我们回来都欣喜万分。但当我说三天后就要被驱逐出境，每个人几乎呆若木鸡。阿尔维西夫人建议我们在某一地方安顿下来以前把米克洛什放在她们家。我衷心感谢她的好意，但当然不能那样做。下一步做什么，我委实想不出来。

第二天科姆亚特·奥劳达来了。他虽然还没有被宣布驱逐出境，但也时刻准备着，别的匈牙利政治流亡者也不例外。在任何困难时刻科姆亚特总能给我提出很好的意见，一见他的到来，我喜出望外。

我把在警察局发生的事告诉了科姆亚特，他则告诉我：那天在我家被抓走的同志们被捆绑送上火车运到边境。他还说卡罗伊·米哈伊全家好象在米兰也被拘留了，而且被关进监狱，后来也送到边境。科姆亚特说他自己也每天有可能被捕，因为意大利全国对匈牙利政治流亡者都采取这个做法。

科姆亚特建议我去找马拉比尼同志，(他仍然还是议员)，请他派个人陪我们一起去边境，恐怕能使我们的处境好一些。于是我们前往马拉比尼所在的伊莫拉市。尽管还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但我们背后一直盯着一个便衣。我们没有能直接和马拉比尼联系上，因为他不在家。他的家属一见是我们，吓得惊惶失态。见此状况我们把愿望简单谈了一下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有位叫贝蒂的意共党员前来我家，说是党派他来陪同我们前去边境的。

贝蒂是个好同志，这点我深信不疑，但我们要求于马拉比尼的是希望争取个国会议员来陪我们前往，因为议员有豁免权，不能任意拘捕。贝蒂请我们放心，一切都准备好了，不会发生任何差池。但他的话并不能使我们安定下来，可是我们自己又想不

出任何办法。

我们跟科姆亚特话别时不胜凄凉，不知道此生是否再能相见。我们深深地爱这位正直、高尚的同志，他急人之所急，同时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提出切实、周密的建议。

在三天限期之中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辞行显然已可不必，因为同志们个个都如惊弓之鸟。每当有人被捕，我前去慰问此人的家眷，所得到的接待总是寥寥数语，有时甚至不请我们进屋，就暗示我们最好还是离开。前不久还帮我们办事每天来访的明凯蒂也被捕了。后来听说他不久得到了释放出来，条件是保证不再从事政治活动。总而言之，十个月前的欢呼声依然在耳，如今却不得不黯然离去。

三天过去了，第四天清晨门口停着一辆汽车，两个警官走上楼来，说是陪我们前往火车站。“我们的护照在哪里？”我问。“回头在汽车上给你们。”他们这样回答。

我们向阿尔维西夫妇告别，他们哭了，再一次提出要我们把小米克洛什放在他们那里，他们说，我们连前往何处都不清楚，带着这样小的孩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没有同意。贝蒂已经在车旁等着，我们就这样走了。

在火车站我再一次索要护照，警官说，只能在火车启动时才给。我们买了车票——要自己花钱——上了火车，我最后又提出要护照。他们说，只能在边境交给我们，反正他们和我们一起走。我知道这纯粹是欺骗，但却奈何他们不得。不走吧，光凭这一条就可以把我们送进监狱。

我们在车厢坐定。只能全仗贝蒂同志一人了。大家都沉默不语，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显然，贝蒂对于能否陪同我们到达边境这点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虽然他没有流露

出来。

我们到达乌迪内的时候车厢走廊里传来高声说话的声音，有个男人探头进包间里，把贝蒂叫走了。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好，果然如此，他们把贝蒂拉下火车，由两个警察押走。贝蒂只来得及向我们喊一句："再见，向库恩·贝拉致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对方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但我也不想向警察问个究竟，何况他们只站在走廊里，根本不想理我们，偶尔只以讥讽的眼光看看我们。

事后知道，贝蒂被押回波洛尼亚，在警察局拘留几天以后获得释放。法西斯正式上台以后贝蒂很快又被逮捕，在严刑拷打之下贝蒂疯了。他的妻子也被投下狱，他们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儿由同志们送到了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托儿所里。孩子在苏联健康地成长，但可惜后来得了腥红热夭折了。这些事都是贝蒂后来告诉我的。他虽然精神遭到摧残，但当了解到我在苏联的地址以后就给我写信，请我设法把孩子的骨灰寄给他。

我们通过国际红色救济会①把孩子的骨灰交给了贝蒂同志，后来联系又断了。直到不久前几个月听说他仍在波洛尼亚，精神得到恢复，还在工作。

……从乌迪内继续前进，傍晚到达边境。我们下了火车。警官过来通知我：现在我们自由了。至于护照在哪里，我没法问，因为他悄悄地溜走了。

我们没有护照，带着三个孩子，一个大箱子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塔尔维西奥站着。象一切边境站一样，人声嘈杂，但孩

---

① 国际红色救济会，即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于1922年12月6日成立。是专门救济遭受政治迫害的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译者

子们吓得噤若寒蝉，我们也束手无策。我们想在火车开车以前找个旅馆歇歇脚，果然也在附近小山上找到了一个。但当他们一见到孩子，便给我们吃了个闭门羹。我们无奈又走回车站，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我独自前去找站长，陈述了我们的困难。站长是个好人，他建议我们现在就上火车，如果出示我们在维也纳的居住许可证，说不定会允许过境的。我们的箱子他可以代寄，因为火车就要开动，办托运手续已经来不及了。他替我们买好车票，把我们安置在一个二等车的包间里。箱子不久以后果然寄到了我们指定的地点。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遇见过这位站长，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但他的好心我永远铭记在心。

我们事先说好，谁也不说匈牙利话，孩子们也只说意大利语。但是车刚开动，包间的门打开了，一个青年男子用匈牙利话问我们有没有香烟。

“我们不吸烟！”我突然以近乎喊叫的声音用匈牙利话回答，那青年吃惊地道歉，走开了。我们关上门，但那种使人惶惶然的情绪，那种不可名状的危险感并没有因关上门而有所减轻。此人一定是匈牙利密探……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匈牙利去的……到那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

这事并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但仅此一端，也足见当时我们的神经紧张到了什么地步。

查票和查护照开始了。我拿出车票和维也纳居住许可证。列车员疑惑不解地看看我们，手持我们的证件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带来一个人。来人说，我们的这个证件不是护照，不能乘坐这列车。这时又过来一个穿军服的人，大喊大叫，说意大利人真不是东西，不断地把政治流亡者送到奥地利来。早晚他们将会看

到这办法行不通，奥地利会把所有政治流亡者都送回意大利去。

这时我脑中突然闪过那位好心站长的话：最重要的是设法进入奥地利。只要不离开意大利，等待着我们的只有监狱。我感到自己的神经快支持不住了。我把证件交给姐姐，告诉她，把那个穿军服的人叫到一边，把我们的身分透露给他，因为证件上写的是我姑娘时的名字——加尔·伊琳。事到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了，听凭奥地利当局怎样摆布我们都可以，反正意大利是无论如何不能回去了。

姐姐这样做了。我只看到那个穿军服的人脸色开始缓和，听到他说，为什么不早点把这告诉他。他向我们走来，但我来不及和他说话就晕倒了。他立刻派人找来医生，医生诊断认为我不宜继续旅行。我渐渐恢复过来，但其间火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在车站静待着奥方对我们的处置。姐姐带着邦迪前去邮电局给朗德列尔·耶诺发电报，请他办理入境手续。阿格奈丝和医生守着我。当我醒来时，医生问我："您为什么吓成那样？您想，库恩·贝拉在苏联当了克里米亚州长，在奥地利人们能随意欺凌你们吗？"

库恩·贝拉其实从来也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但这位天主教社会党医生也并非捕风捉影。库恩·贝拉那时确实在克里米亚，是在战场上，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不过我想，医生给库恩·贝拉升官的目的是为了想多得些报酬。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医生对我精心照料，就象我真的是一位州长夫人似的。

不大工夫政府官员来了，他们说，既然医生认为我不宜继续旅行，他们可以在铁路附近为我提供一间屋子，屋子前面——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他们将安排一个人，负责照管我们的生

活杂事等等。他们说，他们不建议我们在这里接待客人，因为谁也没法保证来的是什么人，怀着什么目的。否则如果因此产生什么不愉快，将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认为，我们给维也纳发电报催办入境许可是正确的，并说他们也同上级作了报告，相信等“Gnädige Frau”① 身体较好时，答复也一定来到了。

我们住进了那间屋子，医生每天都来。除了看病之外显然也想谈些政治，但我回避了。

第二天象是来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对我进行询问，记载入册，同时表示：库恩·贝拉的家眷在奥地利将受到充分保护。他们说：卡罗伊一家也是从这里路过的，说卡罗伊夫人比她丈夫坚强。卡罗伊当时显得心力交瘁，但比起我来他还是要沉着些，尽管卡罗伊一家在路上的情况比我们更差。这些奥地利人骂意大利当局以这么恶劣的方式对待政治流亡者，真是骇人听闻。后来我还听说，卡罗伊是被捆着送到边境的。

他们关于我沉着与否的议论我并不感兴趣，事实上如果我当时身体情况好一些，恐怕已经被他们送回意大利去了。

三、四天以后入境许可从维也纳送来了。边境官员把我们送上火车，有礼貌地告别。医生也来了。我们对他们的善意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总算是个好结局。但前几天的苦难在神经中留下的刺激一时难以消除，以致隔壁包间上来两个男旅客我也疑心是密探，一路上总觉得是在监视我们，一到维也纳就会把我们关起来。

我们到维也纳了。我伸头到车窗外叫脚夫。脚夫没有叫到，却发现瓦戈·贝拉向我们跑来。他高兴地把我们一个一个从车

---

① 德语，意即“尊贵的夫人”。——译者

上扶下，当他向他的儿子邦迪问长问短的时候，我一直注意着隔壁那两个我认为是密探的旅客。然而他们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向出站口走去。

第十四章　维也纳—斯德丁—彼得格勒—莫斯科

一

1921年4月底我在维也纳政治流亡生活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现在的情况已和一年前大不相同。为逃避霍尔蒂白色恐怖来到维也纳的相当一部分匈牙利流亡者已经离开这里走向天涯海角。日益恶化的物质条件和变得更为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他们作出这一抉择。此外，他们在这里很难找到职业，奥地利警方又不断进行迫害，经常受到被驱逐出境或被投下狱的威胁。这时匈牙利的白色分子虽然已不象苏维埃共和国刚失败时的狂捕滥杀，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把一些流亡者劫回匈牙利的尝试，也是构成这些人离开的因素。

我乍回维也纳时向瓦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库恩·贝拉究竟怎么样。因为虽然那位天主教社会党人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但我并不相信。

瓦戈的答复是：

“库恩·贝拉眼下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和国际的其他领导人在巴库参加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便加强东方人民的反

帝斗争。”

库恩·贝拉后来告诉我，他在苏联不少城市做过鼓动报告，关于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有不少照片和电影记录片。在代表大会上库恩·贝拉做了题为《关于在东方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报告。

库恩·贝拉1920年9月17日在向彼得格勒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是这样谈巴库的代表大会的：

“……同志们，当我们刚建立第三国际的时候，孟什维克老爷和整个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这样笑我们道：‘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在闹着玩呢！’同时也有一些——比如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而现在，同志们！当我们筹备东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又有一些共产党人说：把东方人民组织起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那里还只处在民族运动的阶段，我们还不能指望东方人民可以对西方作出某些支援。现在，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宣布：西方的无产阶级和苏维埃俄国不但可以指望国际上的革命运动，同样也可以指望得到东方人民的有力支援。”

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0年10月1日任命库恩·贝拉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于是库恩·贝拉前往克里米亚和南方战线司令伏龙芝以及老布尔什维克古谢夫一起领导消灭弗兰格尔的战争。

下面我引用现存在军事档案局的若干原始电文，从其中也可以看出库恩·贝拉的活动和当时的时局。

“呈总司令部

第十六旅已用俄制步枪装备完毕。

除原已获准的五百骑鞍外，尚需一千个骑鞍。

南方战线司令　伏龙芝

军事委员会委员　库恩·贝拉

1920年10月4日”

“致南方战线各部队：

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和谈代表团已就各重要问题在里加达成协议，于10月5日决定，最迟在10月8日签订停火协议及草签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和平条约。这一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和平终于即将到来，无疑将受到俄国劳动者的欢迎。同时，这个消息必将使白卫军，尤其是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巢穴陷入惊慌的境地。弗兰格尔由于深感他的反革命计划面临崩溃，必将——而且已经着手——使用一切手段来破坏我们和波兰之间的和平，并力图向南方战线发动进攻。他将力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促使波兰地主向我们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从而延长战争。决战的钟声在南部战线各部队上方敲响了。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们！胜利与和平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在这决定劳动和资本谁胜谁负的最后时刻，全俄罗斯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你们。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都响彻‘给南方战线以一切支援！’的口号。而且这支援已经到来。全国的幸福和美好生活将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毅力。每个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要把尽一切力量争取胜利视为责无旁贷的神圣义务。你们要在每天、每时向自己提出问题：‘我是否已经为胜利贡献了一切？’社会主义祖国将会看到我们的行动，将会对每个人论功行赏。

“同志们，为实现和平和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向最后的决战

奋进!

“勇敢前进! 我们的口号是‘不胜利则献身!’

本通知向每个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及一切连队宣读。

南方战线司令　米哈伊尔·伏龙芝-

米哈伊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库恩·贝拉

1920 年 10 月 9 日”

“发给南方战线各部队的第五〇五号命令：

今年 8 月中旬，西部战线的红军部队进逼华沙城下正准备一举摧毁波兰地主军队的老巢保护祖国的安全与和平的时候，受法国雇佣的弗兰格尔军队从南方不断袭击驻守克里米亚的我军部队，并取得了重要胜利。其进攻的目的显系利用我军兵力被牵制于西部，各个击破其正面的部队，然后企图依靠西欧掠夺者的援助，把俄国置于贵族的枷锁之下。

“10 月初当其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试图乘机击溃我第聂伯河以西地区战斗的精锐部队。10 月 8 日凌晨弗兰格尔的精锐部队在多处渡过第聂伯河对我军发动猛攻，在七天的浴血战斗之后胜负决定了，在我军持久的压力下，10 月 14 日敌人遭受毁灭性的失败而狼狈逃窜。这一天是对弗兰格尔作战的转折。感谢南部战线各部队的英雄气概，彻底消灭在克里米亚反革命势力的战斗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第四十六师及其所辖第八十五旅、第三师、独立骑兵旅及士官生旅的英雄行为。这些部队在第四十六师师长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军的计划。他们以协同的攻势击溃了马尔科夫师，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敌军在亚历山

德罗夫斯克(即今日的扎波罗日。——原编者)的所有渡口形成威胁。这些部队并牵制住了敌人企图在尼科波尔—格鲁谢夫卡一线展开攻势的那部分力量。

“我们还应该提出第二集团军那些年轻的骑兵团,在和敌人强大的骑兵对阵中他们进行了出色的战斗。

“在敌人突然袭击造成的初期混乱中他们组织了迅速的反击，并和第六集团军左翼的部队一起给了失算的敌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并把渡到右岸的敌人驱回到了第聂伯尔。

“同时还应指出第六集团军所有部队的重大战绩,他们的左翼在左岸大量杀伤敌军，在战线的中段则击退了对方向卡霍夫卡地区的猛攻。

“在上述地段第六集团军不但击退了得到十四辆战车和十五辆装甲车支持的敌军攻势，同时还转入反攻，彻底粉碎了敌人,并攻克了对方的全部阵地,缴获了十辆战车、五辆装甲车、七十挺机关枪和大量军用物资。

“最后需要指出塔甘罗格集团军群的第十三集团军全体人员的杰出英雄气概,他们从东面牵制住了敌军,从而使我军在右翼取得了辉煌战果。

“这一段时间的作战使我们扭转了整个战局,把主动权抓在手里,重创敌军。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敌人的崩溃已经开始,我们将要加速这个进程,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予以实现。

“我们以共和国的名义向南方战线的各部队致敬,并对他们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表示祝贺。我们深信,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将消灭弗兰格尔，使红旗在反革命的最后巢穴——克里米亚上空飘扬。

“勇敢、坚定地前进！

“给敌人以最后的毁灭性打击！

“伟大、光荣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

“南方战线的各部队万岁！祝你们成功！

“本命令向每个步兵连、骑兵连及一切建制宣读。

战线司令

米哈伊尔·伏龙芝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库恩·贝拉、谢尔盖·古谢夫

1920年10月19日”

“致第六、第十三及第二骑兵集团军军事委员会：

为了清除本战线内的反革命分子，请将曾在各（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及米列尔等）白匪军内服役之军官、文书、志愿参加者重新列表上报……

伏龙芝、库恩·贝拉

1920年10月7日”

二

“加急，机密

致第六、第十三及第二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据里加今日通知：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团长越飞同志和波兰代表团团长扬·东布罗夫斯基至迟将于10月8日就停战协定和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约协议签字。

“然而实际上战斗行动不可能在10月15日以前停止，因波兰方面声称必需向华沙报告并获得批准。

“波方此举可能出于法国要求，以便为弗兰格尔争取于近日内向我军发动重大进攻之可能性。

伏龙芝、库恩·贝拉

1920年10月7日”

“呈总司令部：

第一骑兵集团军① 将抵达前线。请示任务及位置。

伏龙芝、库恩·贝拉

1920年10月14日”

“致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并巴什科维奇同志：

感谢你们的祝贺。我深信，您将出色地领导派往前线的国际纵队和完成世界无产阶级所交给您的任务。

库恩·贝拉

1920年10月12日”

“发往南方战线的电报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

请告伏龙芝同志：第二西伯利亚步兵师已整装待命。我们已收到四千件大衣，尚需四千件。九千名战士情绪高涨……第二十三师装备不足……我们已要求马赫诺遣回向其投诚的武装人员，如不服从，可解除彼等武装，并押送至我方邻近部队。我已抵达马赫诺部队之参谋长处，并将于明日自巴甫洛格勒前往马赫诺司令部所在地乌里扬诺夫卡站。

---

① 集团军司令为布琼尼。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库恩·贝拉

1920年10月21日”

（这里我认为应该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的队伍主要由富农组成，前往他的司令部是相当危险的。此行的目的是争取与马赫诺联合对付弗兰格尔。谈判成败难以预料。

库恩·贝拉认为只身前往，并且是赤手空拳会对马赫诺及其一伙产生较好效果。事实也果然如此。）

关于这段时间，布琼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我和库恩·贝拉是1920年深秋在解放克里米亚之战时认识的。我当时是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集团军奉列宁之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战线。我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一同前去会见战线司令米·瓦·伏龙芝。我们刚到达阿波斯托洛沃，听说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库恩·贝拉去处理一件重要事务去了。事后知道，他是前去和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富农武装力量的头目马赫诺谈判争取和他们联合对抗弗兰格尔。库恩·贝拉主动承担了这个非常危险的任务。马赫诺狡诈险恶，是个亡命之徒。库恩·贝拉此行不但需要胆量，还要能言善辩。而库恩·贝拉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争取马赫诺参加了反对弗兰格尔的战斗……”

库恩·贝拉敢只身前往已使马赫诺等吃惊不小，及到对方总部，搜身时发现他竟然连一支手枪也没带，更使马赫诺敬佩不已。经过谈判，双方订立协议，共同对付弗兰格尔。但不久马赫诺又“重操旧业”，烧杀掳掠，残害百姓，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很快把他们镇压下去了。

库恩·贝拉在一次谈话中曾经承认：在马赫诺总部渡过的

光阴是不太令人愉快的，因为稍一不慎或略被误会，即有可能受到杀害。“一命呜呼倒也罢了，”他笑着说，“但是争取他们共同对付弗兰格尔的可能性也就断送了，并且我们的南方战线将背腹受敌。”

关于库恩·贝拉在南方战线的活动我们还能知道些什么呢？太少了。当参加那次战役的人在世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写回忆的文章，因此当我看到奥泽罗夫同志的《沿着革命英雄们的足迹》一书时心中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这本书概述了克里米亚的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并收有退役将军斯米尔诺夫和霍罗希洛夫的回忆录。

请读者允许我引用该书的若干章节，因为在这本书里叙述和描写的库恩·贝拉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可以看到，库恩·贝拉来到南方战线以后，依然保护着他的一贯作风。尽管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性事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刚刚过去，但他仍然以革命家的本色，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的利益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斯米尔诺夫和霍罗希洛夫将军说：库恩·贝拉作为苏联红军的战士同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中同样地勇敢、坚强。斯米尔诺夫写道：

“……争夺琼加尔（克里米亚）之战的时候，库恩·贝拉作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来到我们旅。11月3日晚，他和我逐一检查了各营和各连的情况，他鼓励红军战士们为夺取胜利而战斗。应该承认，我当时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最著名领袖之一，而我们旅位处前沿，我怕他在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前牺牲在我们这里。可是我怎么也拦不住。在战斗的间隙里他和士兵们谈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形势，直到那仗打

胜了他才离开我们旅。11月7日他又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家一起庆祝伟大十月革命三周年。他宣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令，并亲自为受奖者挂上奖章，和他们热烈握手以示祝贺。”

霍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在琼加尔之战前夕，库恩·贝拉来到我们这里，我奉命陪同他前往第三十和第九步兵旅。半路上汽车抛锚了，我们只好改乘马车，最后步行。库恩·贝拉不厌其详地了解战士们的给养、服装、乃至鞋袜。他特别注意渡河的工具——船只、跳板等等。他的一些意见在出击敌人时都是非常正确的。

“走到第九步兵旅的一个连队，库恩·贝拉说，他想察看一下前沿阵地，和那里的红军战士谈谈话。他有时纵身跳过一条沟，有时匍伏前进。库恩·贝拉身体微胖，正是对方狙击手理想的目标，有一次飞来一弹，把他的军大衣穿了个窟窿，但他全然不理。这人身上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下面是突破敌军克里米亚战线以后的一道命令：

“致南方战线各部队：

美利托波尔火车站

“红军战士们！光荣的我军部队在突破敌人的筑垒地域后已攻入克里米亚半岛。

“只要再给以一个打击，那么克里米亚的白卫军就将被全部歼灭。红军的英雄气概击溃了弗兰格尔的顽抗。

“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不是嗜血成性的匪徒。我们之流血牺牲，是敌人逼得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我们也多次向敌人提出过和平倡议，现在我们也在这样做。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用无线电广播向弗兰格尔、向

他的部下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投降。投降者将可得到宽恕，愿意到国外去的也可以得到允许。但如果我们的条件被拒绝，那么流血的责任将由白卫军承担。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每一个红军战士：优待俘虏和主动投降的人。红军只对顽抗的敌人残酷无情，对被战败者却是宽宏大量的。每个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工人员都应切实理解这点，并向红军战士进行宣传。

“本命令向每个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及所有独立支队宣读。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

伏龙芝、斯米尔加、弗拉基米罗夫

库恩·贝拉

1920年11月11日”

下面是同一天的对敌广播喊话：

“……白军军官们，士兵们！哥萨克们！水兵们！

“在国家的南方，战争很快将要以苏维埃武装力量的胜利宣告结束了。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已经垮台，弗兰格尔被消灭也指日可待。一切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伟大的革命胜利了，伟大的祖国保卫了自己领土的独立。

“白军军官们！你们应该认真考虑我方的建议。如果你们继续负隅顽抗，那么你们要对俄罗斯人民无谓的流血承担全部责任。红军消灭克里米亚地区的反革命势力这一决心是丝毫不会动摇的。我们不打算报复，放下武器的人将会得到以正直的劳动向人民赎罪的机会。如果弗兰格尔一意孤行，拒绝我方的

建议，你们的责任是抛弃他，自己放下手中的武器。你们可以自己组织革命委员会，向我们投降。要记住，成千上万的人被你们推上了和苏维埃俄国作战的道路，你们应该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我们已经命令苏维埃部队，要他们优待投降的敌人，但我们对继续和红军顽抗的人绝不宽容。

“你们再也不要扮演外国帝国主义走狗这可耻的角色了。我们号召你们，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站到俄罗斯祖国和人民一边来！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

伏龙芝、斯米尔加、库恩·贝拉、

弗拉基米罗夫”

这些命令充满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可惜我不清楚，当时在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而战的紧张日子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有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各人秉性、素质、看法各异，争论自然在所难免，特别是，那时人们还生活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年代。

争论什么我虽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无论他们争论什么，无论是给红军部队的作战命令还是号召书，都突出“红军只是在战斗中毫不留情，但从不事后报复”、“我们是被迫作战”、“红军只是对顽抗的敌人残酷无情，对战败者却是宽宏大量的。”这样的精神。

在浴血的战斗以后，他们总是立刻坐下来研讨命令的得失。

我不知道这些命令和号召出于谁之手，但库恩·贝拉无疑是参与了的。看到这些文件，我似乎又听到了库恩·贝拉的声音。就是在布达佩斯的监狱里，当他被打得半死的时候，他也只

是说："你们这些受了蒙骗的可怜人！"

1920年11月16日，克里米亚全部解放的那一天，南方战线各部队得到通知："在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库恩·贝拉的主持下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和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罗莎莉亚·泽姆娅奇卡等一起，库恩·贝拉也被选入地区党委会。

当天，从辛菲罗波尔给莫斯科发了一份电报：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以获得解放的无产者的名义向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致以热烈的敬意。

"俄罗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弗兰格尔的匪帮被粉碎了。

"英、法资本家想把俄国工农重新扼杀的企图已经化为一场春梦。坚强的红军以无畏的英雄气概消灭了反动分子的复辟行动。

"在这世界无产阶级的节日里，克里米亚的劳动者再次发出誓言：坚决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实现而战斗到底！

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主席

库恩·贝拉

1920年11月16日于辛菲罗波尔"

这些是发自肺腑的誓言。

但是，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面临着艰巨而亟待解决的任务。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估计在克里米亚大约有三十万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将来投机倒把、间谍活动以及给资本家各种帮助的根源。但是，我们并

不怕他们。我们说，我们要掌握他们，分配他们工作，要他们服从，要他们改造。”①

列宁的话是对麇集在克里米亚的反革命分子的警告和向革命者提出的行动纲领。这些反革命分子果然依旧用武器以及政治和经济手段破坏革命。

对于反革命分子说来，克里米亚半岛（原编者按：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的活动环境不错。在这片充满饥饿和寒冷的土地上，弗兰格尔的残部以及其他匪徒猖狂肆虐。杀人、抢劫成为家常便饭。无政府主义分子打着苏维埃政权的旗号为非作歹，骚扰百姓并妄图歪曲人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形象。

1920年11月18日，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公告：

“……不少匪徒以‘特别委员会’的名称，以各种借口进行违法活动，打家劫舍，任意拘捕，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特公告：未持有当局书面命令之搜查及拘捕必须立即停止……”

为了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成立了由库恩·贝拉、泽姆娅奇卡和古谢夫组成的三人委员会。

与这严峻的斗争同时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必须在克里米亚把生活恢复起来。

前面提到的《沿着革命英雄们的足迹》一书的作者奥泽罗夫写道：

“……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新经济法案，把工厂、矿山以及森林收归国有。

“在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原料、燃料以及其他重要设备登记造册，并着手对工业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5页。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资产阶级从别墅和庄园中赶出来，让病人、受伤的红军战士以及需要接受治疗的工人和农民住进去。

“此刻，摆在革命委员会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和饥饿作斗争以及如何能设法使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有个温暖的住处。克里米亚半岛革命委员会认真地研究了来自各地的电报和信件，吃惊地发现：塞瓦斯托波尔的存粮只能维持数天，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发来紧急呼吁。库恩·贝拉当即亲自前往，采取有力措施，从耶夫帕托里亚调去粮食，使问题得到缓和。

“库恩·贝拉回到辛菲罗波尔以后向革命委员会报告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情况，满意地指出：这个港口城市的船员、工人都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支持各级苏维埃政权。库恩·贝拉同时还强调：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和工人们保持联系，听取并研究他们的意见和愿望。

“库恩·贝拉后来不止一次地去过塞瓦斯托波尔，那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了。当然他也去了其他不少地方。他和泽姆娅奇卡一起去雅尔塔的时候视察了当年曾是贵族庄园、别墅的疗养所。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遇见了保健人民委员谢马施科……谢马施科回到莫斯科后向列宁汇报了雅尔塔的所见所闻，并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把一切适合改建为浴场的庄园都收归国有。列宁还提议在这个草案里增加一条：克里米亚疗养所为那些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战争中健康受到影响的外国革命家提供休养的条件。

“革命委员会为工人得到较好的居住条件，为失业人员解决就业，为流浪的儿童安排住处而进行了大量多方面的工作，库恩·贝拉从不考虑时间和个人健康，他经常下乡、下厂，和工人、

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分子等谈话。

“保卫克里米亚苏维埃政权的英雄，退役将军霍罗希洛夫关于库恩·贝拉在克里米亚的工作也了解得很多。弗兰格尔溃败以后霍罗希洛夫在红军第四集团军工程处工作。他和其他不少老战士都记得库恩·贝拉住在陈设简陋的办公室里工作，屋里经常挤满了从各地革命委员会、工厂或农村的人，前来要求指示和帮助。

“他在办公室里支上一个屏风，屏风后面是一张铺着军毯的床。

“库恩·贝拉办公室兼卧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不少同志看到灯还亮着，常常很晚还去找他。库恩·贝拉把客人请到桌旁坐下，桌上总是放着一把茶壶，但壶里没有真正的茶叶和糖。他常常沏一点代用茶，然后放一点糖精来请客人。

“霍罗希洛夫说：‘工程处离革命委员会不远，所以我是库恩·贝拉的常客，有时是作为老战友随便聊几句，有时是为了找他处理一件急事。白天他要接见大量来访者，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比较安静地谈一会儿。我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有时是回忆一些共同的战斗，有时是谈谈对未来的设想。库恩·贝拉很健谈，还不时用些生动的成语和谚语。有时他在重音上出了问题，一当发觉，自己就先笑起来。谈问题深入浅出，加上他为人随和、谦逊，让人觉得他随时都愿意帮助别人。但如果有人向他提出与国民经济利益相矛盾的要求时，他就会非常干脆地加以拒绝。我如果有工作要和这位革命委员会主席谈话，希望他帮我弄运输工具，帮助我在海滨植树，他总是很痛快地满口答应。库恩·贝拉是一个精明的当家人，他特别爱惜树木，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白卫军滥肆砍伐，毁了数百公顷计的树林。库恩·贝拉劝我

们把普列科普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碉堡拆了，把材料拿去修建堤岸碉堡。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办了。

“库恩·贝拉十分重视培养军事人才和政工干部。当他还在南方战线的时候，每当攻克一个城市或农村，他总是帮助当地积极分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在选举产生地方苏维埃之前行使工农政权的职责。

“党的干部在弗兰格尔时期遭受了很大损失。由于白匪军的屠杀和折磨，几千地下共产党员牺牲了生命，或变成残废。因此，当克里米亚解放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干部问题。我们选择了忠于苏维埃的人充实地方政权，但只是杯水车薪。幸亏库恩·贝拉的帮助，许多军队干部从部队转业来到了地方。”

请读者原谅我从奥泽罗夫同志的书中引了这么长的段落，但我想，这些章节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库恩·贝拉在克里米亚所做的事，正好是在匈牙利因为1919年8月初的悲剧而中断的事业的继续。

他这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不会把接力棒丢掉的，他要握着它继续前进，在匈牙利没有成功的事业他要以同样的热情和意志在克里米亚半岛加以实现。

1920年12月中库恩·贝拉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的记录本上记载着加里宁是这样向与会代表介绍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库恩·贝拉的：

“……现在请遭受苦难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代表、刚从南方战线回来的库恩·贝拉同志发言……”

这位“遭受苦难的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代表说：

“……红军已经在克里米亚清除了白军残余……我向大会转达克里米亚的致意……”

消灭弗兰格尔部队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反响。弗兰格尔是反革命的最后一支部队，红军的胜利，把国际反革命力量在俄国实现复辟的最后一线希望扑灭了。

在克里米亚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库恩·贝拉于1921年3月与明尼赫·费伦茨、利普希茨·埃尔诺、西拉基·德若、波甘尼·尤若夫、波拉切克·拉斯洛、施坦因布吕克·奥托、多恩布施·里哈德等前去德国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德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这次革命就是大家熟悉的“三月发动。”①

但“三月发动”由于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在政治上分散了起义力量遭受失败，同时也由于机会主义分子保尔·列维②等不但没有建立起义的中央领导机构，没有发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甚至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还把整个起义叫做政变，并号召工人放下武器。

保尔·列维被开除出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即使保尔·列维在三月发动中有十分之九是对的，他也应该被开除出党，因为他居然令人不能容忍地违反了纪律，从背后攻击了党。”（《共产国际》杂志1921年第17期第296页。——作者）

“三月发动”及其失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以后来成为叛徒的保尔·列维为首，不少人大肆挞

---

① 指1921年3月22日—4月1日中部德国工人的武装自卫战斗。——译者

② 保尔·列维，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人。——译者

伐起义的领导人，其中当然包括库恩·贝拉。列宁以他素有的客观态度，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对于这次起义的真知灼见，指出了行动中的失误，也批评了库恩·贝拉。

克拉拉·蔡特金（她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是反对所谓“进攻理论”的）在她的《回忆列宁》一文中说列宁是这样批评的：

“那是一种幻想，那是浪漫主义，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所以它是在‘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度里发明出来的，还有我那亲爱的贝拉的帮助，而贝拉也是属于天赋有诗才的民族的，并且他觉得自己应该永远比左派更左些。我们却不可以赋诗做梦。……目前我们还应多听听马克思的，而不是听塔尔海麦① 和贝拉，虽然塔尔海麦学识渊博，理论精通，贝拉是个优秀的忠诚的革命者。”②

关于“三月发动”列宁是这样写的：

“三月发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数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假如有几十万人同社会党叛徒的卑鄙挑衅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末，这是真正前进了一步。”③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关于三月发动的教训》写道：

“中部德国的无产阶级——统一共产党的三月之举是政府的进攻逼出来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三月发动是进步的。三月

---

① 奥古斯特·塔尔海麦是德国共产党理论家，后来脱离了运动。

② 参阅《回忆列宁》中文版第5卷第17—18页。——译者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0页。

发动是无产阶级群众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英雄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站在中德工人的前列，以行动表明，它是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

……瓦戈·贝拉告诉我：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争论主要围绕着对这次失败的责任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情况。

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深深地思索着他的话。

瓦戈走了，临走给女房东留下话：“加尔太太”那里谁也不要放进去。瓦戈说的“加尔太太”就是我。因为警察局签发的居住许可证上和一年前一样，写的是我做姑娘时的名字。连楼里的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分。尽管如此，警察局还是建议我们尽量少会客，因为否则他们将无法对我们的安全负责。

第二天瓦戈·贝拉妮陪了一位医生前来。医生要求我绝对保持平静，卧床休息。因此我不能亲自前去办理居住许可证的手续，而由我的姐姐哈妮卡代表。警察局并没有忘记一年前我们是用捷克护照去意大利的，他们把对我的处罚通知我姐姐，要她转告：一俟我痊可，立即前去警察局在处罚书上签字。

两星期以后我前往警察局，普雷塞尔顾问递给我一张罚款通知，并对我大大发作了一通。他的这些怨气，与其说是对我的，不如说是对所有在这里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给我们奥地利警察部门不知道带来了多少麻烦！他们辜负了奥地利政府的善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是我们的政府。自己做护照，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总有一天奥地利政府将不再容忍匈牙利共产党人无法无天的行为，而对他们采取和别的国家所采取的那种强有力措施。”他说，他希望我能够遵

守奥地利法律，然后询问了我的地址，客气地和我握别。

当然，我家的地址他知道得比我本人要早，同时他又警告房东：要搬来的将是一家危险的房客，要求他们注意什么人常到我家来，并及时向警方报告。

所有这些，和上次的房东一样，这里的新房东在我们去俄国时都一五一十告诉我了。

这里的房东是波兰流亡者，打一见面就和我们关系很好，他们从来也不监视我们。在我们去苏联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有机会再到维也纳来，务必来我们家。"对房东的热情我们深表感谢，但我们没有机会再次领受他们的好意，因为从 1921 年 9 月直到今天，我们一直没有再去奥地利。

我们在维也纳的这段时间里深居简出，除了瓦戈夫妇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波尔已经不在维也纳，奥尔帕里在柏林。只有加博尔·安多尔夫妇偶尔前来看望。尽管这样，只要我们一出门，在后面总是尾随着一辆汽车。看来，警察局对我们的安全很"关心。"

我们乍到维也纳，瓦戈妮就告诉我：奥地利警方在匈牙利有关方面的配合下在匈牙利流亡者中间进行着旨在破坏党组织的活动。

共产党人清楚地知道，警方正在力图破坏他们的团结，并把密探派到他们中间来，所以也进行了相应的斗争，可是直到大多数人到苏联去以后这危险才算基本消除。当然，对方也派了一些人到苏联去活动，但他们很快被清除掉了。

瓦戈妮还告诉我，在维也纳有个叫帕塔基妮的女人开了家匈牙利餐厅。此人是个寡妇，丈夫生前是个医生，据说餐厅价廉物美。瓦戈妮说她认识这个女老板，可是有点使人怀疑，我最好

别去。有不少匈牙利流亡者常在那里用餐，不断发生争论、争吵，有时甚至动武。

引起争吵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当然是资产阶级报纸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诋毁共产党，但另一方面在共产党人之间在对对方进行指责时，所用的言词其凶狠的程度往往连资产阶级也望尘莫及。

我听从瓦戈妮的劝告，从来也没有去过这家餐厅。即使和流亡者，也只是与相知有素的人才发生接触。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5月底、6月初，我们迁到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叫做珀茨莱因斯多夫的小镇一家膳宿公寓和波甘尼他们一起居住了。这里的伙食可以说坏到极点，房东是个动辄出言不逊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但是珀茨莱因斯多夫风光秀丽，空气新鲜，抵销了这些不愉快。加之瓦戈妮每天带着孩子来访，所以这些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很愉快的。我们静静地等着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每天读《红旗报》① 上关于大会的报道。

倒是那些反对库恩·贝拉的匈牙利流亡者以焦急的心情注视大会的进程："现在要和库恩·贝拉算专政时期以及德国的三月发动中所犯错误的账了。"

代表大会闭幕了，可是所有决议中没有一句话是要和库恩·贝拉"算账"的。《红旗报》还报道库恩·贝拉不但被选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还是人数不多的政治局（相当于日后的主席团）成员。

对于等待库恩·贝拉垮台的人说来，这消息当然是非常扫

---

① 先是斯巴达克联盟的报纸，德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机关报。——译者

兴的，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纠集各种力量变本加厉地对匈牙利共产党、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及其领袖——首先是库恩·贝拉大肆挞伐。但毕竟事情刚刚过去，许多参加者和目击者都清楚地记得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党所进行的革命工作，因此，他们要想一手遮天是枉费心机。

1921年8月，俄国驻奥地利公使勃隆斯基请我前去使馆，通知我：库恩·贝拉病了，莫斯科根据列宁的指示，请我们尽快启程去苏联。

这个通知使我很意外，同时也很吃惊，因为我从意大利回来以后不久就要求前往俄国，可是同志们告诉我：库恩·贝拉不久就要秘密前来西方，住处与家庭不会相隔很远，会有机会见面。

“护照得请您们自己想办法，我爱莫能助。”勃隆斯基说，“一俟有确定日子，请通知我。”

我把苏联使馆的通知告诉了同志们，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和奥地利党的施克莱因律师（匈牙利流亡者的许多事务委托他出面办理）一同前去警察局找普雷塞尔顾问，请他给我和全家发给来回签证。

对于我的离开，普雷塞尔毫不掩饰他的欣喜之情。他问：可是为什么还要回奥地利的签证？我们为什么不留在俄国？因为据说库恩·贝拉在颠沛流离之后想在俄国定居了。显然，普雷塞尔是想了解库恩·贝拉还会不会来西方？我说：“我怕不习惯俄国的气候，所以还是想在维也纳落户。”普雷塞尔相信我的话了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从他的脸上什么反应也看不出来。接着，他又对我的坎坷生涯表示了“由衷”的同情，他又说，我的双亲一定因为我远离他们膝下而又过着不安定的生活而痛苦。

他良久打量着我，等我作出反应，可是我一言不发。

于是他的声调变了，冷淡地说，由于我们不是奥地利公民，他不能给我们签发护照。但是他可以给我们一张出境证明。持此可以单程前往德国，在那里再办一次手续，可以继续旅行。

这办法显然不理想，但我不能拒绝，因为舍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在警方办理这个证明的过程中，同志们多方设法想为我办一张正式的护照，但没有如愿以偿。到了约定的那天，我前往普雷塞尔顾问处领取出境证明。顾问客气地接见了我，并说："你们无论什么时候想回奥地利，尽管来信，我们一定会发给入境许可的。"我没有回答，深知欺骗是他的惯技。

我们做好旅行的准备。几天之后，库恩·贝拉的一个亲戚以及波拉切克·拉斯洛陪同我们前往柏林。在柏林又得到艺术史家肯茨勒·胡果的帮助，他甚至还亲自动手捆箱子。到苏联以后我们打开行李，发现有四十个酒精炉，看来肯茨勒很为我们在俄国过冬而担心。

三

波拉切克·拉斯洛在匈牙利革命中所起过的作用比现在大家所知的要大得多。当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是伽利略俱乐部的成员，参加反战活动。还在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就和戈瓦·贝拉以及其他一些日后成为党员的人有联系。库恩·贝拉回国的时候国内同志把他作为可以信赖的人介绍给了库恩·贝拉。经过一段了解，库恩·贝拉把管理党的文件和财务的任务交给了这位年轻的医生。

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他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革命失败后来到维也纳，和舍伊德勒·埃尔诺等一起是党的地下机关

的负责人之一，之后在考绍① 和洛松茨② 活动。再以后和明尼赫·费伦茨、伊雷什·贝拉③、西蒙·摩西一起建立了外喀尔巴阡地区共产党。据我所知，1920 年 3 月 21 日是他带来并在建党大会上宣读了库恩·贝拉的书面发言。发言中库恩·贝拉号召外喀尔巴阡的城市和林业工人加强团结，注意开展工农联合的斗争，重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乌克兰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注意防止民族主义倾向。

后来波拉切克又来到维也纳担任地下机关内的领导工作。不久他潜入匈牙利，与欧罗斯·南多尔、米勒·埃尔诺等一起做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于 1922 年被捕。后来被交换到苏联，一直在那里行医。 1929 年再度潜回匈牙利开展地下工作，并负责筹备匈共二大的召开。不久又回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担任耳鼻喉科主任。我们在苏联期间波拉切克是我家的常客，他是库恩·贝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在“个人迷信”年代他也因诬陷被监禁了十五年。现在他生活在匈牙利。

……我们到了柏林，住在一家高级旅馆。尽管那里有不少匈牙利政治流亡者，但我们只和明尼赫·费伦茨以及波甘尼·尤若夫取得联系，因为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力求谨慎。我们在柏林没有多事逗留，一等护照到手立即离开。当然，我们没有按照奥地利警方建议的那样到德国当局那里申请正式护照，因为那样做

---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译者

②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卢切内茨。——译者

③ 伊雷什·贝拉（1895—1974），作家，《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和《蒂萨河在燃烧》的作者。——译者

耽误时日，夜长梦多。但即使这样，还是在那里住了几乎半个月。

从柏林我们取道斯德丁，作为遣返战俘的家属乘芬兰莱吉那号轮船前往烈韦里（即今日的塔林）。轮船遇到了风暴，我和姐姐都病倒了，波拉切克悉心照顾我们以及两个孩子。直到今日两个孩子在惊惶中叫喊“拉洛！拉洛！”的声音依然清晰在耳（他们这样称呼波拉切克·拉斯洛）。

“如果这唯一的支柱也倾折了怎么办？”我一面受着晕船的折磨，一面不无担忧地想。

可惜，不幸而言中，波拉切克果然也病倒了，现在只有依靠六岁的阿格奈丝往来为医药和其他事奔走了。

但波拉切克仍然带病来给我们量体温、诊脉搏。他脸色蜡黄、走路摇摇晃晃。我们在船上举目无亲，也不宜和陌生人接触。在这几天里谁给孩子们找食物，照料他们，我全然不知，但肯定是波拉切克，除了他再也不可能有别人。

四、五天以后船终于在烈韦里靠岸了。我们穿上衣服，向船长告别。船长也向我们道别，但他全然不清楚我们是谁的家属，他所知道的只是：负责我们的安全。直到此时 我才明白了我们启程时的一个场面：当时我问给我船票的那位同志，我们算是哪个战俘的家属？因为说不定会有人要问起。这位同志只是笑笑说：“谁也不会问的，波拉切克一切都安排好了。”就是说，在船上的时候，我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一上岸，好象从恶梦中醒来了，只是觉得疲乏和没有精神。

俄国代表机构的负责人在烈韦里码头上等我们，陪我们去旅馆。这是一个雨濛濛的坏天气，我们的情绪也很低沉，什么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在维也纳和柏林之后这里有如一个地方小城市。时间很紧，也没有条件去看看这个爱沙尼亚首都的古建

筑，何况这天气，这陌生的一切都使我们兴致索然。

波拉切克办理我们继续旅行的手续去了。我们离开了恼人的轮船，满以为可以安定下来了，但我们却觉得恐惧。楼下餐厅里传来醉汉的喊叫声更增加一分怵然之感。可我又不敢跟姐姐说，在这寒冷阴暗的屋子里，她的情绪本来就够坏的了。显然，她也想找人说说，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幸而孩子们冲淡了这不愉快的气氛，不久波拉切克也带来了明天就可动身去彼得堡的好消息。

从烈韦里到彼得格勒路程不远，一路上也没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但我踏上苏维埃土地、见到第一位红军边防战士的那个感觉是永远也不可能从记忆中抹掉的。我不写了，在事隔四十年之后，似乎已经难于形诸笔端。总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块土地上我不再需要回头窥视是不是有人在跟踪，是不是会有人在欺侮孩子来发泄他们对库恩·贝拉的怒气。我还因为可以重新叫做库恩·贝拉妮而感到幸福。

四

我们到了彼得格勒。火车到达的时候是雾气重重的深秋傍晚，又暗又冷。阿格奈丝紧紧地拉住波拉切克的手。我们不安而疲乏地等待有人来接。终于，波拉切克带来了两位俄国同志。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只好用点头和微笑来互相招呼。他们又是打手势，又是做表情，示意我们上汽车。波拉切克正想去拿行李，但是阿格奈丝说，她不跟陌生人走。要拉洛留下，请俄国叔叔去拿行李。我们只好依她，一起来到汽车旁边等他们把行李拿来。街上一片漆黑，只是偶尔有一盏灯在眨着眼睛，但我们是愉快的。

很快来到阿斯托里亚旅馆，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旅馆既整洁又漂亮，看不出任何一点破坏的痕迹，只是照明很差，而且相当冷。我们住进两间布置得很好的房间。洗过脸，吃过晚饭，正想就寝的时候，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一位年轻的说德语的女子。她说她是金基赛普① 夫人利莉娜同志的秘书。她说，利莉娜同志想见我们，可是有病，过不来。“请不要见怪，我太累了，”我对她说，“现在连谈话也没有精神。是不是明天早晨再说？”这位女同志问了几句我们旅行的情况走了，我们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得很晚，早饭以后出去散散步，看了看市容。

那时候彼得格勒几乎是个死寂的城市。旧制度的统治者绝大部分离开了，商店都关着门，橱窗玻璃都打碎了，疮痍满目。我们巴不得立刻动身去莫斯科。满脑子的问题想从库恩·贝拉那里得到回答。

金基赛普夫人送我们上火车站，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彼得格勒。

记不清路上走了多少时间，脑子里剩下的只是：几小时以后火车停了，男旅客下车到树林里砍木头背到车上交给司炉，然后继续前进。就这样走三、五十公里停一下，直到莫斯科。

五

到莫斯科下车时库恩·贝拉笑嘻嘻地站在我们面前，就好象只是小别重逢似的。就象 1918 年，当分别三年之后他回到布达佩斯时候的情景。他略显苍白，但不象有病，我就放心了。他

---

① 维克多·金基赛普(1882—1922)是爱沙尼亚地下党的负责人。

把前来欢迎的同志逐一向我们介绍。在汽车上他让我和阿格奈丝分别坐在他两旁。这时小米克洛什还只有十三个月，好象还不怎么能引起他的兴趣。上车之前库恩·贝拉和哈妮卡互相热烈问候，还拥抱了波拉切克，感谢由于他的努力使分离了两年的家庭重新团聚在一起。接着库恩·贝拉把波拉切克拉到一边，详细询问了维也纳的党组织和流亡者的情况，然后我们离开了车站。

库恩·贝拉让我们乘车看看莫斯科几条街。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东方风格的城市，觉得很特别。战争和革命的痕迹还没有清除，除了几辆汽车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大部分商店都还关着，破坏了的橱窗钉上木板，幸存的上面则是厚厚的尘土。满街垃圾，房屋破损，到处是无家可归的孩子。内战、外国侵略军毁坏了他们的家庭。这一切使人感到难过，我脑子里的革命首都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当时没有想到，在几十年之后，莫斯科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工业生产增加了四十倍，成了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当年狭窄的小街被通衢大道所代替。仅存的几条，也只是为了保存历史，让人们回忆沙俄的黑暗而落后的年代罢了。

库恩·贝拉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说："回去吧！"

不久我们在一所房屋前面停车了。使我吃惊不小的是院子的一角是一个教堂。有一位同志笑着向我解释，原来这所房子革命前是一个德国路德教信徒的产业。院子里还有一所学校，学生是说德语的孩子。旁边还有个非常精致的小花园。眼下拨给我们住的房屋原先是一个主教住的。

当年的学校变成了名叫"第三国际"的军医院，住着国内战争中受伤或患病的外国国际主义战士。院长是一个叫做孟戴尔

的匈牙利人，此人一度也是战俘。他精通业务，并罗致了大量卓越的教授、医生和护理人员。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我家里人有病都前来这个医院就诊。

我们住在四间设备很好的屋子里。一切都使我们很满意，但最使我们满意的是一个可爱的俄罗斯少妇，她以亲切的笑容欢迎我们。库恩·贝拉每逢在家，就充当我们和亚历山德拉（这是她的名字）之间的翻译。库恩·贝拉的女秘书奇尔契·克里斯蒂娜有时也能帮助沟通我们和亚历山德拉之间的语言困难。没有他们俩的时候，我们就互相做手势。我的第一批俄语单词就是亚历山德拉教我的。几个月以后阿格奈丝学会了俄语，家里就再也没有语言上的困难了。

在我们来到之前，库恩·贝拉的内衣都由军医院的护士长波利扬斯卡娅洗，我们到达的当天她来了，一面打开衣柜，一面用德语说："别误会，这里有几件衬衫和其他衣服。原来要多些，可是库恩·贝拉同志一见客人没有内衣，老是把自己的送给人家。"

库恩·贝拉把屋子安排得细致周到，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当看到我迷惑的神情时他解释道："都是同志们帮我干的。"他还骄傲地补充道："我还托人做了张孩子的小床。"可是这张粗制滥造的白坯木床和当年属于一位名歌唱家的洛可可式家具完全不相协调。库恩·贝拉看到我对这张床评价不高，便泄气地转过身去。

库恩·贝拉的秘书佐尔格·伊格纳茨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库恩·贝拉叫他泽尔盖）

（佐尔格不仅是库恩·贝拉的秘书，也是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他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就成为战俘，在那里成

了国际主义战士。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在许多战场作战。这位受过多方面良好教育的人当接受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后，成为了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直到五十年代，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中精神失常去世为止。有一段时间，佐尔格以他渊博的外语知识成为库恩·贝拉的得力助手。佐尔格除通晓不少欧洲语言外，还掌握若干东方语言，翻译迅速、忠实。空暇时爱读文学作品，甚至吃饭时也捧着书。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吃饭时从来不说一句话。如果有人向他发问，他就答个“是”或“不是”。库恩·贝拉特别欣赏佐尔格办事准确、迅速、可靠。他生活俭朴，好象除了眼下正在看的那本书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引得起他兴趣的东西。但是他只是外表上处世淡漠。当我逐渐了解他以后才深感在我的流亡生涯中象他这样的好同志是为数不多的。只要有人相求，他无不全力以赴，但事后从来不提起一个字。1946 年我最后见到他时，好象已不如当年那样沉默寡言，甚至可以说话语多于常人了，而且常常流露出一种激动的情绪，看来那时精神病已露端倪了。）

刚开始时，家庭生活、孩子的吵闹以及家务杂事使库恩·贝拉有点不习惯。可是他总是说，总算和大家在一起了，觉得很幸福。几天后他和米克洛什也熟了。小家伙开始不肯承认他是爸爸，只肯叫“叔叔”，但很快两人成了好朋友，一清早就把爸爸叫醒，爬到他身边躺着，不让他再睡。库恩·贝拉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爸爸的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我说，把孩子放回小床去好了，可是他怕孩子不高兴，宁可一起躺着。他说：“不要紧，回头他自己会睡着的。”

看来，孩子们果然没有影响他工作。当库恩·贝拉写东西时，小米克洛什常常爬到他身上，搂着他脖子。当我把孩子抱走

时，他总是说："没关系，这样我反而更写得出来。"

和阿格奈丝他可严肃得多了，特别一当谈起在学校里应该如何如何时，尤其如此。他没有意识到，对方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根本听不懂他在谈话中发挥的旧制度和新制度学校之间的区别。阿格奈丝耐心地听着，其实早已急着要上学去了。阿格奈丝还没有到达上学的年龄（苏联孩子是八岁开始上学），可是为让她早日掌握俄语，提前让她上学了。

沃兹涅先斯卡亚街上的这所学校正好在我们的住所的对门，名叫拉迪切夫实验模范学校，（一般人都叫它拉迪切夫卡）当年颇负盛名。

革命以前这里是所贵族女子学校，苏维埃政权诞生后进行了改造。

学校的高年级学生还大多是贵族小姐，其中包括科夫男爵和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女儿。

这几位贵族姑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和自己家族的历史决裂，投身于新生活，变成了年轻的女工人。

别的上等人家的姑娘或是在"dortoir"① 里黯然神伤，或是以仇恨的眼光瞪着"野蛮人"的孩子挤进这当年的"圣殿"里来。

学校的中、低班级里几乎都是工人的子女了，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课，兴奋地在宽敞的走廊里奔跑，在高大的室内体育场锻炼，在美丽的花园里玩耍。这些多半是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孩子。

教员队伍同样很复杂。奇怪的是班主任大多是瘦高的妇女。不少教员很年轻，他们热情地根据苏维埃教学原则进行着教育

---

① 法语，意即"宿舍"，沙俄时以懂法文为高贵。——译者

实践。学校的校长叫巴琼金，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一度曾是战俘的匈牙利演员塞克萨迪。

塞克萨迪热情地完成委任给他的工作。就他本人而言，既没有学历，也没有教学经验。但是这个忠诚的革命者热爱孩子，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想方设法把这些出身不同，水平、天赋各异的孩子教育成德智兼备的有用的人才。

尽管塞克萨迪本人的俄语说得很糟，但他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绩。学校冬天很冷，孩子们的伙食也不好，甚至常常吃不饱，费好大力气才能张罗到一些练习本，但是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事物一样，奋发的热情，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他们出色地完成学业。

阿格奈丝非常热爱她的学校，尽管那里的条令、规章都很不完善，但孩子们一个个都很自觉、很守纪律。

当然，这所实验模范学校也有它的问题。前面我说的教员队伍很复杂。那些老教员既不愿摧毁旧的教育制度，更不愿参与建立新制度。他们消极怠工撒手不管。其结果是孩子们参加社会活动、少先队活动的时间大大多于学习上的时间。

这样教员在孩子们面前失去了威信，唯一能得到孩子们尊敬的只有塞克萨迪，噢，当然还有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应该指出，虽然教学本身由于种种原因，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但那时的革命气氛，对于独立能力的培养，在孩子们身上诱发了许多好的品质，在那些优秀生中间尤其如此。

我不止一次地和库恩·贝拉谈起学校的这个状况。我告诉他：教室该修缮了，宿舍太脏了，纪律太松弛了，孩子们不象过去那样尊敬老师了。我还给他说过好几件具体事件。库恩·贝拉对这些不很理会，只是笼统地说些严厉、死板、培养小大人式学

生的旧教育制度和造就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新型苏维埃式学校之间的差别。有一次我又和他说起，如果长此以往，这一代年青人怎么办？不料他说，党此刻最关心的是“新经济政策”，事关革命存亡。其他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只能在此以后逐步处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能把一切困难逐个克服掉的。

当说起列宁的时候，他转过身去，为的是不让我看到他为列宁健康担心的神情。列宁在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库恩·贝拉想解脱这个折磨人的思绪，但每当他从列宁居住的哥尔克村回来，情绪总是很坏。当我问及列宁的健康情况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还好”，然后就进了另一间屋子，免得我再提问题。

六

要习惯莫斯科的生活并不困难。

全家都在一起了，家庭生活走上了轨道。

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水土不服，患了胸膜炎和支气管炎，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疗养所住了六个星期才痊愈。

由于不懂俄语，刚开始时对周围没有很多感性的了解。库恩·贝拉尽管不爱说话，但还是向我介绍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工厂和机关的改革以及红军和别的有关情况。他没有隐瞒困难，但充满了乐观。

阿格奈丝每天从学校里回来也总能带回来一些关于学校、同学和老师的新闻。短短几个月她就会了俄语，开始给我当翻译，一度说得非常流利的意大利语反而慢慢忘掉了。

我们很喜欢听当过战俘的匈牙利人谈他们参加苏联国内战争的一些经历。他们对于能亲身参加保卫十月革命的战斗而骄傲，并且总是充满激情地谈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差不

多都是党员了)。他们最爱谈的题目是和库恩·贝拉一起战斗的经历。等自己的题目谈完了，便絮絮询问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一个“为什么”接着另一个“为什么”直到深夜，等告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匈牙利还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到那时候我们跟着库恩·贝拉同志回去战斗。”

在这段时间里库恩·贝拉正在考虑如何把被关禁在霍尔蒂监牢里的革命者交换出来的问题。

苏联政府想和匈牙利方面达成一项协议，把在押的被俘匈牙利军官交换被霍尔蒂关押着的有的已被判死刑的匈牙利革命者。为此目的而举行的谈判在里加进行。

这些是使人神经紧张的日子。库恩·贝拉清楚地知道，匈牙利政府将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迫使苏联让步，因此谈判有可能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苏联政府决心要拯救那些因参加苏维埃共和国而被霍尔蒂投进监狱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

不久前去世的加博尔·尤若夫当年受库恩·贝拉委托率领代表团与对方进行了谈判，在他材料丰富的《回忆录》中记叙了苏联政府的态度和做法。这本回忆录可惜只有一部分在《党史汇编》上得到发表。加博尔·尤若夫同志在去世前不久，把回忆录的一份复写稿(共七十八页很密的打字材料)送给了我。

列宁也很关心在匈牙利监牢中受苦的革命者，他在 1920 年 4 月 29 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也谈到了这问题：

“英国要我们对被赶到海边的邓尼金军队表现出人道精神，我们回答说，如果协约国对战败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表现出人道精神，让他们到苏维埃俄国来，那我们也准备给克里木的白卫分子一条生路……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英国政府对我们照会的复

文……”①

1920年7月5日匈牙利开始审理“库恩·贝拉及其同伙案”，即“人民委员案”，于11月24日结束，共庭审九十七天，记录达一万九千五百八十页。

霍尔蒂政权满以为在绞刑架的阴影下所进行的长达数月的审讯会摧毁被告席上革命者的意志，但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考验。

博卡尼·德若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就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庭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慷慨陈词，表明自己仍然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副社会生产人民委员凯伦·尤若夫昂首面对法庭，声明对自己行动负责，当庭长污蔑苏维埃俄国时，他严词驳斥，使庭长狼狈不堪。萨巴多什·山多尔揭露了起诉书中大量伪造的材料——包括库恩·贝拉起草的政治纲领，并指出：“如果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举行全民投票的话，我党将以数百万票的优势获胜。”萨巴多什揭露说：“胡萨尔·卡罗伊② 谅来不会忘记，当我被任命为人民委员时，他在新闻工作者协会把我热烈拥抱。”

关于交换监禁人员的谈判一直拖了两年。匈牙利驻柏林公使克里斯托菲1921年8月5日在写给内政部长班菲男爵的信中诬蔑：“由于受到库恩·贝拉一伙的破坏，俄国政府违背了关于交换战俘的哥本哈根协定，继续扣留匈牙利军官……”

匈牙利反革命政府贼喊捉贼，反咬一口。在国会开会时大

---

① 《在全俄玻璃磁器业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99—100页。——译者

② 反革命政府总理。早年标榜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译者

肆攻击，说什么“苏维埃俄国为了罪恶滔天的人民委员及其帮凶的利益，居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无辜的、正直的匈牙利军官扣留不放。”

谁是这些无辜的、正直的军官呢？请看！他们是：赛千尼伯爵、卡罗伊伯爵、桑塞伊伯爵、普罗瑙伊男爵（他是匈牙利白色恐怖中最杀人不眨眼的人物之一普罗瑙伊·帕尔的族人）、沙拉茨少校（霍尔蒂·米克洛什的亲戚）、海约什上尉（白色恐怖中大屠杀的刽子手海约什·伊万的兄弟）等等。

可能因交换得到去苏联机会的有五百个革命者，其中包括五十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

匈牙利政府之所以多方拖延谈判主要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拖延能使苏维埃俄国就范。但一年半的谈判证明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便达成了协议，商定了遣送第一批人员的日期。

七

苏维埃政府把当年奥匈帝国使馆这座美丽的建筑安顿来苏的匈牙利革命者。这座建筑位于沃隆佐沃街（今奥布街）。

布尔什维克党指定加拉辛同志负责处理匈牙利流亡者的生活问题。库恩·贝拉还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认识加拉辛了，虽然两人并不是在同一地区作战。加拉辛不光是个好的组织者，他在各方面的人事关系也使他适合做这工作。

交换政治犯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不光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就是进步资产阶级人士也注意到霍尔蒂是被迫把已被自己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和组织者交给了苏维埃俄罗斯的。

此举使苏维埃俄国威名大振，因为国际反动势力曾经使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交换政治犯的实现；但苏俄还是取得了对霍尔蒂政权的胜利。

当然，反动报刊对库恩·贝拉的污蔑和讨伐又再度兴起，因为他们知道库恩·贝拉在这事中起了很大作用。

接待来苏匈牙利革命者的准备工作逐一落实。库恩·贝拉几乎走遍了这所位于沃隆佐沃街建筑的每个角落，检查了取暖的燃料（俄罗斯的冬天非同寻常）；察看了粮食的库存。苏联政府和列宁本人以最大的努力为从匈牙利监狱来到新苏维埃土地的匈牙利共产党人提供被褥、衣服、食物和其他用品。

“库恩·贝拉同志！”列宁在1921年12月29日的信中写道：“我已收到您的来信。我的秘书告诉我说，您在信中要我快些写完关于塞拉蒂的文章。很遗憾，由于生病，我至今未能完成这篇文章……请您给福齐也娃（列宁的秘书。——作者）写个便条，讲讲工作进展情况，您在写什么，到这里来的四百名匈牙利共产党员是怎么安置的。”①（所有这些都是在俄国人民自己也生活在极为困难的日子里发生的。）

房间按家庭情况一一分好，还布置了一个俱乐部。后来在这个俱乐部里还举行过多次演出和集会。

1921年秋天，那盼望已久的第一批监禁人员交换终于在里加实现了。从匈牙利监狱里出来的同志们由里加启程前来莫斯科。

“十一点整，来自里加的火车驶进文达夫斯基火车站。阴沉的秋天似乎和挤满旅客的候车室气氛不相协调。突然，在拥挤

---

① 《致库恩·贝拉》，载《列宁文稿》第9卷第780页。

的人群中出现了一群对莫斯科人说来衣着特殊的人们，背着背包和行李。他们是白色恐怖里解放出来的我们的同志。他们一见人群，便如饥似渴地询问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牢笼生活使他们对一切都不了解。他们还好奇地打听生活在苏维埃俄罗斯的人们如何生活。突然爆发了一声‘乌拉’，压过了一切嘈杂声，大家都拥向月台的入口——库恩·贝拉同志来了。他想和刚到达的人说话，但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满含泪水，逐一和到达的人握手，终于他开口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以纯洁的感情把他们自己仅有的东西和你们分享。’”《国际新闻记者通信》杂志是这样报道第一批匈牙利革命者到达莫斯科时的情况的。

我们前去车站，许多外国同志也去了。列车正点到达。劫后相逢，欣喜之情自非笔墨所能形容，见到同志们被监牢生活折磨得骨瘦如柴，我不禁潸然泪下。

欢迎仪式一结束，人们四散奔跑，流着热泪互相拥抱，大家涌向库恩·贝拉，向他提出大堆问题，探询他的健康状况。“我们带来了一点匈牙利腊肉，还有塞格德出的萨拉米香肠，这是您最爱吃的。库恩·贝拉同志。”“列宁同志好吗？听说他累病了。为什么让他累成这样？”妇女们围住我，说：“只要给我们一杯茶，一块黑面包，我们就会高高兴兴地和俄国人民一起工作。”

“有汤，也有菜，虽然不多，但也有。”我这样告诉她们。

大家一起来到沃隆佐沃街住地，等他们都安顿下了我们才离开。

被霍尔蒂政权判决、监禁过的政治犯一批一批地来到，从1922年直到1925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民委员有：博卡尼·德若、凯伦·尤若夫、汉布尔格·耶诺、尼斯托·久尔吉、瓦里亚什·山多尔等。此外还有莫绍伊戈·安道尔、豪伊杜·帕尔、

巴洛格·亚诺什、博格尔·伊格纳茨、迪奥西·帕尔、帕克西·尤若夫、马扎尔·拉约什、西波什·伊丽莎白、蒂玛尔·赛蕾娜、基什米克洛什、基什·拉约什、恰尔达什大叔、劳比诺维奇·尤若夫、扬奇克·费伦茨、博罗什·拉斯洛、西克劳·久拉、福纽·莎丽、贝尔泽维茨·吉赛尔、贝莱娜·安娜、巴亚基·费伦茨、别尔曼·伊斯特万、马图让、马塔伊卡·亚诺什、罗哈尼·玛尔基特、扬科维奇、卓贝尔·埃尔诺、希卡代·奥劳达尔、朗德列尔·埃尔诺、博格丹·西蒙、西蒙妮、萝齐、维泰兹、纳吉·山多尔、帕林卡什·伊丽莎白、帕林卡什·阿尔巴德、卡托纳·久尔吉等共五百余匈牙利革命者。

他们得到两个月的假期，有病的进了疗养院。

“国际红色救济会”就是在总结交换匈牙利革命者这一行动的基础上成立的。

前来苏联的绝大部分匈牙利流亡者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于这新的祖国的忠诚。无论被分配到哪里，他们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忘我工作，他们的名字记入了许多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工厂的历史。他们在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赢得了苏联同志和工人的赞扬和友情。

库恩·贝拉熟悉许多外国的政治流亡者，比起来，匈牙利的共产党员的表现使他自豪。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了厂长，每当谈完生产问题，当库恩·贝拉把他们送到楼梯口，常常是深情地说：“我们的人民是好样的。”

第十五章　在乌拉尔

一

二十年代初布尔什维克党以全力推行并宣传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生活之能否恢复、工厂能否开工、工农联盟是否能得到巩固，城市能否得到充足的粮食，都取决于列宁计划的能否正确和迅速地得到贯彻。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后，带有不同程度灵活性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家的生活中是个转折点，当然，这个政策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每个人所理解。甚至在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一种做法。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党派人到工厂、俱乐部、军事单位、农村，宣传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让人们明白，这政策并非是放弃革命原则。相反，对个体所有制的某些让步，正是为了促进革命迅速前进。

库恩·贝拉也全力投入这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任务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他写了许多文章，但他更大的兴趣却是给工人做报告。他的性格就是爱和群众在一起。不同的意见和怀疑从来也不使他吃惊，相反，他喜欢别人和他辩论。

我也参加了几次会，库恩·贝拉热情地演讲、详尽地发挥。他满脸通红，有时还冒着汗，走下讲台继续讲，他喜欢从近处看着听众。他从会场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边走边说。当热烈的讨论结束，他感到自己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与会者接受，就慢慢平静

下来，走回讲台，再点上一支烟。

有时会后有人提出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问题——两党合并、土地政策、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坚持不到苏联红军可以提供援助的时候？西方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支持？等等。结果是答复问题等于做了第二个报告。当这“补充内容”也讲完了，人们疲倦地散开回家，但总还会有一些人不肯走，他们围住库恩·贝拉，问这问那，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你们的工资是多少？住房好吗？家里有谁？……这种细小的问题往往能使库恩·贝拉和工人建立起同志的、朋友的联系，他们说：“库恩·贝拉同志是我们的！”

苏联普通工人对库恩·贝拉的友情使他深受感动，特别当有些人把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全部归于自己，把失败的原因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是否确实一古脑儿都推到他身上时更是这样。对于国际资产阶级报界的攻击，库恩·贝拉不但心平气和，甚至心安理得地对待，他把这种攻击看作是对方对革命者惯有的“褒奖”。可是对于流亡者团体中间出现的故意歪曲（库恩·贝拉认为这是某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致）却使他很伤脑筋甚至很痛心。他知道，某些流亡者团体内思想水平上的不平衡状态对今后的工作将会造成困难。

当时，不单是德国的考茨基和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意大利的菲力浦·屠拉梯撰文认为匈牙利无产阶级在 1919 年拿起武器是得不偿失，连象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瓦尔加·耶诺也持这看法：“……在事过三年以后我们可以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从历史上看是成立过早……虽然我们并不是说夺取政权和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错误的行动，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说。……可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

人应当认识到，那只能是一个过渡现象。”

这种结论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在俄国1905年那次革命以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辩论时就是这个观点。

“列宁一分钟也没有考虑去同意当时的德共领袖保尔·列维和其他不少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政权的崩溃来夺取政权。……他们想让工人相信，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只是资产阶级对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种手法，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历史错误……这种观点……只对那种企图把整个革命说成是错误的人们有利。这种观点只对那种企图抹杀在1919年3月21日以前匈牙利共产党在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英勇、模范的斗争的意义有利。……”库恩·贝拉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何以能取得胜利?》这本小册子① 中是这样写的。

他刚到苏联后不久，1920年8月12日在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将就革命工作做出完整的报告。同志们，我们希望将能够改正在匈牙利第一次革命中所犯的错误……”②

谈到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不能不想起列宁1920年11月4日的那段话：

“我们在俄国犯了几千次错误，遭到了几千次的破产和损失等等。我们相信，其他比较文明的国家会少犯一些这样的错误。但是，尽管我们犯了这些错误，我们却获得了主要的东西：

---

① 库恩·贝拉：《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575—576页。

② 同上书，第438页。

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①

当我们谈到匈牙利共产党的斗争、党内争论，特别涉及库恩·贝拉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不但要仔细阅读而且要好好思考列宁在1921年8月1日那封信里面的话：

“当我在流亡的时候（有十五年以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不少次也是‘过左’的……当然，流亡者往往‘过左’。（引号是我加的——作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因为这个缘故去埋怨受到我们大家、受到整个共产国际尊重的、优秀、忘我、忠诚的匈牙利流亡者们……”②

当然，任何人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历史学家具有列宁那样的水平，但我们有理由希望他们——事隔几乎半个世纪之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而不是以违背历史的狭隘眼光歪曲匈牙利无产阶级、贫农和革命知识分子与库恩·贝拉这个名字结合在一起的光荣的过去，因为这样做对眼前和未来都是有害的。

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在当时的环境中，当库恩·贝拉遭受不公正的攻击时，俄国同志和工人的爱护对他说来是意味着多么可贵的援助和支持了。

二

库恩·贝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不断增加的匈牙利流亡者身上了。

帮他们习惯苏联的生活方式，解决工作和住房，特别是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大部分由库恩·贝拉负责。这是件相当困难

---

① 《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46页。

② 匈牙利《党史档案资料》，BN5591/1965。

的工作，因为和其他地方的政治流亡者一样，莫斯科的匈牙利流亡者的政治观点也并不一致。

就是在工人队伍中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初期——坚持几十年以来的而且常常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对于在俄罗斯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十分理解。

此外也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当年只是事出偶然，或是为了投机，参加了革命的行列，所以一当交换成功，他们便前去西方，并且忘恩负义地对俄国和匈牙利共产党人大肆诬蔑（凯里·帕尔、罗伯特·奥斯卡、多弗恰克·安道尔等）。

除去变节者和异己分子以外，工人和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他们在对流亡者的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都自觉地、努力地工作着，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不但帮助了俄国的工厂和机关的劳动者，同时也间接地支持了在国内困难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人民。

对于匈牙利流亡者能把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这里运用，库恩·贝拉深感高兴。他不时访问有匈牙利人工作的工厂和机关，每当那里的负责人赞扬某一个匈牙利工人或者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和勤奋时他总是笑容满面。

通常在访问以后的第二天，库恩·贝拉就会请他们来我家作客，和他们谈那个厂的生产情况、计划和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问题。如果有人提到工厂设备落后或是俄国工人专业能力差，库恩·贝拉就会提醒他们不要充当“救世主”，因为俄罗斯工人阶级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也会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进行工作的。

曾经有一个流亡者提出：在匈牙利人中有不少经过严格训练的专门技术人员，他们肯定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工厂管理得更

好些。库恩·贝拉回答道：一个好的技术人员把经验传授给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不当领导，同样可以对生产作出贡献。（事实上后来不止一个匈牙利流亡者当了托拉斯经理和工厂厂长，如：卡里卡什·弗里杰什、波尔·埃尔诺、别尔曼·伊斯特万等。）来人接受了他的忠告，绝大部分人赢得了周围人们的赞扬。

流亡者大部分一到达莫斯科就住在沃隆佐沃街的“国际流亡者之家”。后来当他们有了工作单位，自然也有了房子，但还是把这里当作家，下班后不时过来看看，参加一些学习。

流亡者中的学习热情很高。年龄上虽然有差别，但学习政治、科学和语言的积极性都很高。他们说，没有这些学习，他们不能充分理解苏联发生的事。参加学俄语的人最多，所以到后来，差不多每人都学会用俄语说话了——当然，满口匈牙利腔。

组织政治和科学学习特别在初期有些困难。因为缺乏能开课的人员，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俄文资料译成匈文也有困难。库恩·贝拉设法解决了这个困难。被物色开课的人——桑托·雷热、豪伊杜·帕尔、马扎尔·拉约什、西克劳·久拉、别尔曼·伊斯特万等常在晚上聚集到他那里研究讲课事宜。如果需要从俄文翻译资料，库恩·贝拉便会自告奋勇，因为在那时，他的俄文已经相当过得去了。

来苏联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办理参加俄共(布)的问题也并不容易。

俄共党员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外国党员参加俄共时对于党龄何时开始都要逐一研究，俄共以 1918 年和 1919 年为界承认匈牙利党员的党籍，当然，还需说明该党员何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在第一批流亡者到达莫斯科以后的数月内其余几批也陆续到达了。对于新到的人，“老”同志们总是前往车站热烈欢迎，并帮助他们安置以及处理其他一切事情。他们总是一面和新来的人拥抱，一面说：“我们已经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了，有什么事尽管说。”

日常生活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水土不服、伙食不习惯，不同的家庭合住出现了摩擦……但这些在流亡者中间是常事，别国的流亡者也莫不如此。库恩·贝拉耐心地、以充分理解的态度做同志们的工作，力求尽快消除不和。他总是宣传那些最能使大家团结起来的因素——要大家回忆是什么促使自己参加了党的斗争，考虑匈牙利的前途，以及如何推动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他使大家相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被彻底摧毁，要准备参加一次新的革命斗争。

他们同意库恩·贝拉的看法：为了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苏维埃俄国是一所好学校，在这里可以取得 1918—1919 年革命中自己不熟悉的经验。他们努力向俄罗斯工人阶级学习如何在战斗中取得并维护政权，那怕困难再大，条件再艰苦，也值得。

为了让匈牙利流亡者熟悉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情况，把他们派到了工厂、机关、领导部门、科研单位、报刊编辑部、学校以及农业、军事等部门。到处有匈牙利人。

譬如 1920 年在巴库和彼得格勒举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把没有回匈牙利的战俘军官中的佼佼者进行培训。库恩·贝拉和学员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去看望过他们好几次，并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曾被霍尔蒂监禁，得到交换前来苏联的匈牙利人中也选了几个参加军事训练班。

当年的战俘中有不少人在最高军事学院完成了学业（瓦尔

加、加弗罗、基达伊什、凯比丹等)。这几位同志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战功卓著。虽然他们未能在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中作战，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威名赫赫的国际主义战士视为匈牙利工农军队的第一批战士。

“……你们的学业结束了。”库恩·贝拉在给巴库红色军事指挥员训练班的学员们信中写道，“你们是第一批说匈牙利话的无产阶级指挥员……希望你们保持革命军人的品质，提高军事指挥能力，锻炼身体，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克服一切动摇和犹豫。”①

三

1922年，在德国的三月发动之后一年多，有一天，列宁请库恩·贝拉到他那里去，问有没有兴趣到乌拉尔做一个时期党的工作。促使列宁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一些流亡者在国外一直没有停止对库恩·贝拉的攻击，而且其趋势有增无已。列宁深信，如果让库恩·贝拉在俄国的党内担任一个时期的领导工作，可以使他不至于在这无端的造谣中伤中费很多脑筋，使他的情绪可以得到安定，同时，党的工作也将是回答这些攻击的最好武器。

有一个小插曲非常可以说明列宁在处理这类问题上丰富的经验。这件事是一位老同志经常对他的熟人说起的。大概是1921年，但也许是1922年，列宁和一批匈牙利同志们见面时问：“怎么样，还在争论谁要负责、谁有错误、谁是罪魁祸首吗？还在争论着吗？”“还在争论。”匈牙利同志们回答。“分几派？”“嗯，

---

① 1920年12月31日《莫斯科红色新闻报》。

三、四派意见。”“就这么少?”列宁笑着说:“我们在1905—1906年那次革命失败后至少有十几派互相把责任推来推去。”

当库恩·贝拉到乌拉尔去担任党的工作这一消息刚一传出,一些在国外流亡的造谣专家立刻散布说:库恩·贝拉被流放了。这当然是一个低级的诬蔑,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更何况把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更不要说领导人了)加以流亡,和列宁的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在俄国革命中库恩·贝拉总是被派到最困难的战场上去,这是对他的充分肯定。1918年他带了一支队伍去乌拉尔和高尔察克作战,1920年他和伏龙芝一起击败了最后一个白匪首领——弗兰格尔,并于当年任克里米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当时乌拉尔是俄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可是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多问题。新经济政策在这里推行得不十分顺利。社会革命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利用眼前的困难兴风作浪,甚至还想在军队里寻找同盟军。

党当然力争把受蒙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党中央为此作了好几个决议,并成立了乌拉尔局,成员中包括库恩·贝拉。

库恩·贝拉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几乎是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莫斯科。当时流亡者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一般的问题没有他也能解决,何况他还物色了合适的人接替他的工作。在他离开之前还到处奔走,为匈牙利流亡者争取到了一个休养所。

凡是去过这个休养所的人都怀念这个地方。俄国党认为应该让这些在霍尔蒂狱中备受折磨的匈牙利同志得到较好的待遇。

库恩·贝拉要去乌拉尔，使我们这个刚团圆几个月的家庭又一分为二了。我当然很难过，但我们计划等他在乌拉尔工作有点头绪以后，我带了小米克洛什也去乌拉尔，让姐姐和阿格奈丝留在莫斯科。

不久从叶卡捷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了一位同志，库恩·贝拉托他给孩子们带来了几个雕刻精美的木制玩具，还有一封信。信中要我耐心等待，过不多久又可以重新见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到了春天，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前往叶卡捷琳堡，票和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可是只让我一个人去。

路上用了七、八十个小时。

库恩·贝拉到车站来接我，说："暂时只能住临时房屋。叶卡捷琳堡比莫斯科要差多了。可是苏联工业大部分在乌拉尔，这地方很重要。"他话里的"临时房屋"显然是想让我对居住条件有个思想准备。"您得自己做饭，因为如果请人料理家务，连住的地方也不够，而到外面吃，您知道，我不习惯。"

住房条件我并不十分在乎，倒是做饭这任务有点使我感到棘手。因为当姑娘的时候我只学了弹钢琴，对烹调很少涉猎。库恩·贝拉看出了我的心事，安慰道："不碍事，我会教您的。"他很有把握地说："我当兵的时候学会了做一手好菜。"他当兵的时候能做些什么好菜我不难想象，但又不愿让他扫兴，只是哈哈一笑。他感到，我对他的烹调技术不甚恭维，赌气不说话了。

住处只是一间单一的屋子，简单的陈设——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沙发。屋里相当冷，这位主人显然很少在家。但四十三年之前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它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情绪，甚至可以说，反而使生活增加了不少浪漫色彩。

四

库恩·贝拉早在1918年在乌拉尔作战的时候就熟悉这一带地方并且结识了不少朋友。他喜欢和熟人联系，尽管这里的坏天气使他的气喘病又复发了，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每当从外地回来，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谈所见所闻和工人的劳动精神。

在乌拉尔，有些工厂已经年逾百岁，有的甚至到了三百岁，是在沙俄最野蛮的封建年代造的。当年是农奴在这里劳动，现在在工厂里的工人就是这些农奴的后代。他们粗犷、豪爽，勤快、保守，象孩子一样单纯。工人贵族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习气没有能影响他们。

有一次我们来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工人俱乐部，把两岁的米克洛什也带上了(我来后不久他也来到了乌拉尔)。起初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身上穿的还是在柏林买的衣服和鞋子。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坦然了，因为乌拉尔妇女并不在乎我穿什么，她们对我都很亲切、热情。她们对于我虽然穿得比她们好，却没有摆出贵夫人派头感到很满意。

这些乌拉尔妇女交口称赞库恩·贝拉，我感到，她们把库恩·贝拉当作自己人，大家都认识他，他也认识大家。看得出来，乌拉尔人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大人物而疏远他。相反，大家以认识他为荣："瞧，什么人在我们这里！"在当地人心目中，库恩·贝拉是土生土长的乌拉尔人，是可信赖的乌拉尔布尔什维克。

下面是1923年5月1日《乌拉尔工人报》一篇文章的一段话：

"今天，在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五一节里，我们必须提

到乌拉尔劳动者中间的一位同志，他就是库恩·贝拉。在西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库恩·贝拉是最高评价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以及最早运用列宁的教导和策略的人物之一。库恩·贝拉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家，为了被压迫者求得新生，他可以前往世界任何地方和敌人展开白刃战。”

应该指出，在当时有许多人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之所以有威信，并不是因为身居高位。一个领导人如果作风正派，努力工作，说话有理，有想象力，那么他就有威信。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拥护他。但如果——用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脱离群众，只会做报告，发表空洞的演讲，用一大堆群众听不懂的政治术语炫耀学问，那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会和他辩论。

所以，昔日的光荣并不能成为今日的本钱。工人们非常精明地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同时，如果他们肯定了某人的品质和能力，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妄加诬蔑。

这使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次，我家来了几位叶卡捷琳堡的工人。有一个夸小米克洛什长得漂亮。我说：“他象我。”“哪里！他象他的爸爸！”客人认真起来：“您难道以为自己长得比库恩·贝拉漂亮吗？”

做饭实在是个大问题。

有一次库恩·贝拉兴冲冲地买回来一大块冻肉。——那年头，冬天只能买到冻肉，夏天有鲜肉、覆盆子、牛奶，但别的东西也不多，冬天就不在话下了。商店还没有恢复正常营业，在工厂和机关按星期凭票证向劳动者发放需要的东西。

“可以做盆好汤。”他指着冻得硬梆梆的肉说。他爱吃面条汤。

我把肉放在一只大锅里，把肉煮烂要费很多时间，这我清楚，可是不知道要续水，所以等揭开锅盖的时候在锅底只剩下的少量棕色的象佐料一样的液体，肉不少地方煳了。“嗯……嗯……”库恩·贝拉看着这块焦黑的肉无可奈何地叹着气。

五

库恩·贝拉是乌拉尔局的宣传部长，他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改组党的新闻机构——首先是乌拉尔地区的党报。他给《乌拉尔工人报》配备了新的负责人和编辑，他自己和跟他一起从莫斯科前来的博恩布什·里哈德都经常为这张报纸撰稿。改组后的党报介绍国际局势，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谈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人们关心的各类问题，谈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的设想……诚恳的态度很快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发行量猛增。

（我想借此机会谈几句博恩布什·里哈德。在匈牙利极少有人知道他，但他是苏联国内战争期间一个出色的战士。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是库恩·贝拉信赖的助手，两人一起在共产国际工作。博恩布什收集了匈牙利战俘的大量材料，汇编成册。他也死于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

由于乌拉尔局的工作成绩，当地经济和政治情况都日益改善，但即使如此，问题还是很多。敌对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互相配合，不断破坏苏维埃政权。他们收效最大的方法是制造谣言，编造使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使居民惶惶不安。

在叶卡捷琳堡当时确实还残留着国内战争的余孽，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匪徒，因此谣言有它的基础。但如果这大堆的谣言中哪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那么实际生活恐怕早就瘫痪了。

而生活奋勇向前，战争的残迹日益减少，人们开始娱乐——

看演出、上影院、去俱乐部。叶卡捷琳堡的歌剧院是挺有名的，演出以后人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但只要头一天有演出，第二天就一定有谣言，说是某地某时，看完演出的人遭到匪徒的袭击，衣服被剥光，若干人被杀死云云。

下面是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很足以说明当时人们的神经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夏天的某一日，警察局接到一个报告，说当天夜里有人将对我们这所房子发动袭击，除了我们以外，楼里还住着党校校长和他的母亲，还有党校的一位教员和他的妻子。有鉴于这个行动带有政治色彩，安全部门高度重视。一个干事前来拜访党校校长，向他透露了夜里可能发生的事，并告诉了安全部门的计划，同时向楼里的男人布置了任务，（当时库恩·贝拉在外地，楼里只有三个男的）。妇女们集中在一间屋子里，不许开灯，不许出屋。

时间一到，各就各位。党校校长的母亲和我躲进一间临院子的屋子，关上了电灯，等待即将发生的事。老太太很快就睡着了，我站在窗边看着。

我一夜没有躺下，神经紧张得想睡也睡不着，但老太太却放心地鼾声大作。

天边开始出现鱼肚色，我还站在窗边上等待匪徒的到来，但心情开始比较平静了

天亮了，谁也没有来。

一个看法是：匪徒们获悉有人洩露了秘密，改变了计划；另一个看法：纯属谣言。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除了紧张一夜以外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有几个警察在整夜的守候中喝了不少酒，喝得太多了，于是受到了处分，不久都被解除了职务，

是这件事带来的使人遗憾的后果。

第二天库恩·贝拉回来了，当我们把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放声大笑，说连我们也未能幸免谣言的威胁。

六

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悲惨后果之一是在街上流浪的孤儿，俄国把他们叫做“无监护”的孩子。苏联政府设法把他们安排到孤儿院里，但因为数量实在太多，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街上总有这样的孩子。孤儿们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等待着有人给他们一块面包或是一口剩饭。直到今天我的耳朵里还会出现这些可怜的孩子在我们窗下，喝着乞食的那首歌谣：“我会很快死去，人们就把我埋葬，于是把我遗忘，不知道我的尸骨将在何方。”当我把食物给他们，立即就飞跑离开，过一会儿另一群孩子又来了。

今天的苏联青年只能从书本和大人口中了解一些当年这些“无监护”孩子的情况了，而我的熟人中间有好几个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当年也是这样的孩子。

再说几句知识分子工作：

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和文学、艺术家在青年人中间大肆散布陈腐的甚至是反动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往往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因为：一方面多数大学生也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另一方面与党对立的政治力量也在使用一切办法在青年学生中扩大自己的影响。

那时乌拉尔有位名教授，在学生中很有威望，但他每逢讲课从来也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旧社会，贬低苏维埃政权。

库恩·贝拉给这位教授打电话，希望在机关里见到他，要和

他交谈。起初这位教授推诿说事情多，不克分身，但后来终于同意前来了。

他们就大学里的各类问题交换了意见，教授初沉默寡言，要说也是言不及义，甚至还抱着相当敌视的态度。但后来发现这个“共产党宣传家”对所谈问题很有见地，不免有些松动起来，可是始终搞不明白这位和他面对面坐着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和叶卡捷琳堡大学的内部事务有什么关系。

库恩·贝拉理解教授的心情，知道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目的亮出来，只是进行了亲切的谈天。后来库恩·贝拉对教授表示了感谢，和他作了一次愉快的交谈，并且希望有机会再聊聊。教授微笑着表示了同意。库恩·贝拉这时才说出请教授前来的动机。他说：“教授同志，我希望您总是象今天这样和我开诚布公，对事物有任何怀疑，或者新的社会制度中有什么使您不愉快，尽管前来找我，欢迎您。但请您对我讲，不要对学生讲。我可以向您保征，您的坦率绝不会带来任何麻烦。但如果您继续向青年灌输反苏维埃观点，那确实会带来不愉快后果的。”

后来教授找过几次库恩·贝拉，虽然不能说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但无论如何，在大学里再也不发表反苏维埃言论了。

这种谈话不但对教授是有用的，对库恩·贝拉来说也得益非浅。因为这种谈话有助于他去感受和理解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高等学府里的问题不能用教条主义式的空喊欢呼“乌拉”来解决，而是同样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取得成绩，达到目的。

库恩·贝拉在《给大学以帮助》一文中写道：“……工人群众

应该看到：大学对他们来说再也不是昔日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与己无关的地方了。大学眼下虽然还没有全部变成，但已逐步在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他写道：“……当我们在改善大学和大学生的条件的同时，同样不要忘记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不能设想，在目前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大学的教师能作出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成绩。……但如果有人以为苏维埃政权会作某种政治上的让步来换取他们支持，那他们是错了。……他们应该看到，正是苏维埃政权把改善教师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待遇视为自己的职责。”（1923年2月28日《乌拉尔工人报》）

仅此数句就足可以证明库恩·贝拉既没有患“共产党员骄傲症”（因为确实是有这种传染病的），也没有得“鄙视知识分子症”（有这毛病的人不在少数！）库恩·贝拉是受过多方面锻炼的列宁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步，但认为应该和他们商量事情，在理论上弄清楚问题。双方的争论通常是布尔什维克获胜，这并不奇怪，因为列宁的队伍是经过锻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熟悉历史、自然科学、哲学、经济，以及它们的沿革。因此他们不怕进入对方的理论领域，并且不止一次地接过对方的武器取得胜利。

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多么大。因此他们总是创造各种条件争取知识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深切地了解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该争取每一个有用的人，发动这些人参加到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中来。

所有这些需要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素养，需要有“向明天进军”的气概，跟上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步伐，并且有能力对新的事物勇敢地作出结论。

直到今日，当阅读各届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以及列宁著作的最后几卷时才真正体会到，要做到这些，尤其是当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来说无论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意味着多大的困难。

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诗里不止一次地赞扬了这样的共产党人。

无怪在所有同时代的诗人中库恩·贝拉最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虽然在那时许多人并不承认马雅可夫斯基的杰出之处。

每当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受到攻击，库恩·贝拉总是怒气冲冲地说："小资产阶级不高兴了。"他说："党员队伍中也有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在家里他也能为捍卫马雅可夫斯基而弄得大家神经紧张。

女儿十四岁了，不理解也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库恩·贝拉让女儿在身边坐下，请她高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库恩·贝拉深信采用这办法女儿一定会改变看法的。殊不知这"方法"并不奏效，他的分析也打不动女儿。库恩·贝拉于是大发脾气，向阿格奈丝抛出"小资产阶级"、"公主"、"反动"等形容词。

在库恩·贝拉心目中，马雅可夫斯基是革命的诗人，是最能正确地讴歌革命的巨匠。对此当时我并不十分理解，但现在我懂得了，正是马雅可夫斯基说出了使库恩·贝拉不安的却因堆积如山的日常政务而不得不暂时放在一边的那些问题。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奔放的革命激情，以及辛辣的讽刺吸引着库恩·贝拉。我记得，当他读到马雅可夫斯基揭露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时常常会笑出声来。库恩·贝拉特别欣赏马雅可夫斯基讽刺鼠目寸光的小资产阶级的诗歌。他认为马

雅可夫斯基几乎在每一首诗里都在探索和追求新的东西，读来使他鼓舞。在匈牙利诗人中他最推崇奥第。库恩·贝拉还在青年时代就支持奥第进行大胆创新，反对对方营垒向奥第射来的冷箭。库恩·贝拉对于社会民主党对奥第的批评也嗤之以鼻。社会民主党的诗人和批评家自己才疏学浅，死抱教条，却说奥第的诗晦涩难懂，说什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懂、因此更不可能理解它们。

看来，库恩·贝拉一直保持着青年时代的那股朝气，所以全心全意地和年轻人一起向马雅可夫斯基欢呼。

我想，尽管不一定是原话，但库恩·贝拉 1937 年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里谈到裴多菲诗歌的时候所写的意思就是此刻他所想的。“……他的诗同仅仅仿效民间文学皮毛的资产阶级民粹派毫无共同之处……”“当然，裴多菲的诗也具有民间诗歌的形式，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只是为了在文学中推广这个形式，是为了使人民在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裴多非是以革命的精神来对待民间诗歌的……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追求形式的痕迹，他把所见所闻形诸笔端，描写意境的时候一点也不是故作质朴……”

这些话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库恩·贝拉对现代诗歌发展方向的看法。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爱不释手，可惜一直没有写一篇论文，同样他也没有来得及写关于布莱希特以及某些欧洲文艺界著名人物的论文，也没有对希达什·安道尔发表意见，因为他认为希达什也是匈牙利诗歌的创新者。当然，最大的遗憾是他没有写一篇关于奥第的评价文章。总的是：他尽管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文学中各种创新的尝试，但形成文字的意见实在太少。他对文学涉猎很广，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阅读，了解时代的问

题。可惜只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其时他已基本上被剥夺了政治活动的可能)，才写了两篇文学评论：一篇关于希达什·安道尔的长篇小说《费策克先生》，另一篇是评价裴多菲的。

我之所以写这些段落，是想说明：库恩·贝拉(但不光是他，当时列宁近卫军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也莫不如此，)以多么大的注意力来研究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尽管，人们看来，工作几乎占据了他们的每一分钟。

有一份库恩·贝拉在乌拉尔时填的表格，现在看来虽然有点使人发笑，但是很说明问题。

1922年俄国党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时发了一张表，其中有“近年来经常阅读何种报纸、杂志”这个问题，库恩·贝拉的回答是：“俄国、匈牙利和德国党的出版物。”下面的问题是：“在何地？”库恩·贝拉的回答是“在一切地方。”

这个“一切地方”说明了他何以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不断扩充、丰富他的知识。库恩·贝拉确实是“在一切地方”——我还想加上“总是在”——读书的。

在家里，他一面吃早点一面读书，吃午饭和晚饭时也一样，临睡、休息时、和孩子说着话、在汽车上、在火车上、甚至在会议过程中他总是在读书……那些不了解库恩·贝拉同时能注意三件事的人往往因此觉得他不礼貌，其实我无数次的亲身经历都证明库恩·贝拉是具有这个能力的。阿格奈丝和米克洛什有时向他提出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是发觉父亲全神灌注地在看书或是读报，孩子们往往很不高兴，抗议道：“爸爸，你听见了没有？”但是爸爸此时总能给他们准确的回答。

孩子们认为爸爸不注意他们是不公正的。库恩·贝拉是注意了的，只是他同时还在看书而已。看来，他没有别的解决办

法，他只能这样做，他锻炼得可以“心有二用”了，何况他从少年时代开始，看书就是他最大的嗜好。

七

库恩·贝拉在乌拉尔工作快一年了。他愉快地工作着，成绩也逐渐显示出来。

前面我曾谈到，我们经常到“共产党人俱乐部”去，库恩·贝拉常在那里做报告。俱乐部里冬天暖气烧得很好，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有了单元住房，有时也做些匈牙利菜吃，虽然由于原料不同，味道总不是那么地道，但这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是不错的。

在我的要求下，我们有时还上叶卡捷琳堡歌剧院，库恩·贝拉也很喜欢音乐。《奥涅金》这个歌剧第一次我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可惜我们往往不能终场，因为库恩·贝拉老是因为有事要处理，只好匆匆离去。

每逢星期日我们两人总是出去小事远足。当地风光宜人，有许多适于郊游的去处。特别是离叶卡捷琳堡不远有一片森林，林木葱郁，湖水清澈，常吸引我们在那里度过假日。我们一面走，库恩·贝拉就一面把草木花卉的拉丁文和匈牙利的名称告诉我。他很喜欢植物学，年轻时一度还想长大了成为植物学家。我们两人在湖里划船或林间漫步。他那时不到三十七岁，我不到三十二岁。如果有人担心我们遇上匪徒，想派人陪我们，库恩·贝拉总是坚决谢绝。他什么东西也不怕，什么人也不怕。他开玩笑说，如果说怕，他倒是有点怕我。

有一天得到通知，要库恩·贝拉准备前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克拉拉·蔡特金和库恩·贝拉要就列宁

的总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作补充发言。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光荣的任务使他非常兴奋，他计划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前往莫斯科准备讲稿。他依然认真地完成乌拉尔的工作，但他的脑子里已经在考虑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匈牙利的共产党的问题了。

代表大会以后他在叶卡捷琳堡共产党人俱乐部做传达报告。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关于列宁的健康情况库恩·贝拉会带来什么消息。这一段时间里关于列宁的病情谣言纷起，人们的紧张之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心情反映了群众对工人阶级伟大领袖的爱戴，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忧虑。

库恩·贝拉到了。他从与会者的表情中立刻知道人们最关心什么问题，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一切关于列宁因为健康不佳已经辞职的消息都是敌人的造谣。最近一次人民委员会议就是列宁主持的。”

他说，他见到了列宁，身体很好。

库恩·贝拉接着说，列宁很关心乌拉尔地区的经济情况，列宁对于在乌拉尔发生的一切事情、这里各区、各工厂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还了解哪个区里有多少外国工人工作，列宁说，要好好学习外国工人的经验。

列宁还关心乌拉尔附近农村的情况，他要求库恩·贝拉多送些这方面的报告给党中央。

当时的乌拉尔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面积，七百万人口。

库恩·贝拉在乌拉尔地区所完成工作的多样性只有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那段时间堪与比拟。

谈到他在乌拉尔的工作，几乎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我想，早晚会有人写的）。

此刻在我面前有乌拉尔局书记处的若干本会议记录，可以顺手摘录几条：

1922年3月31日

乌拉尔局中央委员会会议

议程：1、粮贷问题（报告人：库恩·贝拉同志）

决议：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制订发放粮贷细则并负责执行。由库恩·贝拉同志负责，并任委员会主席。

1922年9月9日

俄共（布）叶卡捷琳堡区委主席团会议

议程：讨论召开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叶卡捷琳堡区代表大会。（报告人：库恩·贝拉）

1922年11月30日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决议：批准库恩·贝拉同志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议，建立共青团乌拉尔局。

1923年2月16日

乌拉尔局书记处会议

为制订青年工作细则，乌拉尔局建议选举乌拉尔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库恩·贝拉同志参加叶卡捷琳堡区委为此目的建立的委员会。

1923年3月2日

乌拉尔局中央委员会会议

批准库恩·贝拉同志任委员会主任(这里所说的委员会是指为庆祝党的诞辰在叶卡捷琳堡筹备建立斯维尔德洛夫塑像的委员会。叶卡捷琳堡即今斯维尔德洛夫。——作者)

这些文字简短的会议记录只是他工作的片段，因为库恩·贝拉的主要工作是出入工厂，听取工人意见，和他们商讨问题，而这些是没有记录的。

库恩·贝拉的政论活动从《乌拉尔工人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可见一斑。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他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他进行了多么广泛的、多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认为，在乌拉尔这段时间里库恩·贝拉所撰写的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即使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也紧紧抓住当地的特点来讨论。

在他的文章里和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有：新经济政策、发挥当地经济特点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租让问题、红军指挥员的培养问题、动员力量打击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等不法经济活动、反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反对派活动、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某些让步措施的说明、税收的意义、财政平衡问题、节约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精简机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问题、乌拉尔的民族问题、新闻工作、出版工作、远东的解放问题、培养技术人员队伍、广播及电影工作、党校工作、非党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改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从下而上的团结问题、德国反革命问题、1848年和1918年的德国革命问题、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等等。

总之，库恩·贝拉，这个匈牙利革命家，全心全意地研究乌拉尔、乌拉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问题。考虑这些事对他说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是个国际主义战士。

我想引用库恩·贝拉发表于1922年（当时鼓吹使用新纪年的报纸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第五年”）9月21日题为《列宁重新工作了》那篇同样是相当重要文章的部分章节：

“在长期患病之后列宁第一次发言了。（这里是指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刊登于《真理报》1922年9月19日。——作者）很难说得清楚，是身体备受痛苦而暂时无法工作的列宁同志本人，还是由于列宁患病而暂时失去领袖的工人阶级感到这段时间长得使人难耐？

“对于摧毁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工人阶级来说，伟大人物的引导具有极端重大的意义。列宁的历史作用已经被每个共产党人、世界上每个正直的工人、农民对他的热爱所肯定了。

“他的伟大是革命的客观存在。

“……所以从革命的发展角度来看，列宁的康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又回到了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来了。

“世界历史上的所有事情，世界劳动者为之奋斗的一切又重新在伟大的领袖列宁的头脑中显现了，形成了，明确了，发展成体系了。

“认识到自己有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向世界准确地指出社会关系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奋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能给正在创造历史的阶级以巨大力量。”

布尔什维克们是这样想的，人民是这样想的，所以哪怕只是

在脑子里一掠而过，“列宁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想法也能使人震惊。

八

1923年3月我们前往莫斯科，受到在那里的匈牙利流亡者的热烈欢迎。每个人都有话想告诉库恩·贝拉，但第一个问题总是：他什么时候彻底回来。绝大部分人的真挚感情是感人的。

库恩·贝拉在筹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准备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发言稿里也谈匈牙利问题。他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中央一部分委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工作，同时也讨论共产国际的纲领、工会工作中共产党员的任务以及共产国际新的组织形式。

库恩·贝拉在他的报告中说：

“……我们应该总结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以便通过周密的考虑和根据各自国家的情况在革命斗争中加以运用。我们每个参加过俄国革命的人，根据俄国革命经验在西方领导过斗争的人，或多或少制定过不正确的、不成熟的和一般化的理论。可以说，我们谁也没有能避免犯这个错误。我认为：俄国革命的意义正在于让我们学习它的方向，避免今后工作中（类似）的错误。我们应该排除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应该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经过分析，在西欧去推广。在西欧，应该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力求制订出现实的政策。俄共过去是，现在也是这样做的。”（摘自

1922年10月19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库恩·贝拉在莫斯科病了，稍微好转后他就想开始工作。但是共产国际的负责人来到我们家，说受列宁的委托，请我们全家到高加索去作一次旅行，让库恩·贝拉洗洗那里的矿泉水，进行温泉治疗。“一切都准备好了，连火车票和治疗所需费用也带来了。在目的地有人等你们。”

库恩·贝拉并不想作这次旅行，但他并没有反对。“命令就是命令”，何况它来自列宁。

在这里我想提一句：库恩·贝拉一直和列宁有联系，列宁总是很关心他的。

我认为，列宁的秘书莉·亚·福齐也娃的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下面是从她给我的信中摘录的几句话：

“……我记得列宁总是以非常亲切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库恩·贝拉的。列宁也不可能以另外的态度来对待匈牙利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

“大家知道，当库恩·贝拉就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困难情况和新的一次外国武装干涉告诉列宁的时候，列宁给他写了多么热情洋溢的回信。后来，1922年，当库恩·贝拉在乌拉尔负责党和苏维埃工作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设法为他在斯德哥尔摩安排休息和治疗。列宁在1922年4月13日同一天内给不同的人写了三封信，请他们帮助库恩·贝拉同志及其家属。

“下面是其中的一封：

“‘凯尔仁策夫① 同志！务请您充分信任库恩·贝拉同志及

① 普·米·凯尔仁策夫，1921—1923年任苏联驻瑞典全权代表。——译者

其家属，并在他们就居斯德哥尔摩、休息和治疗（他非常需要）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给予大力协助。

致衷心的敬礼

您的列宁’

“虽然由于瑞典当局拒发签证，库恩·贝拉未能成行，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列宁想帮助库恩·贝拉的真诚感情。”

福齐也娃是这样写的。

我还想引用一个文件。文件的日期是1921年7月19日。

“……请简单告诉我库恩·贝拉同志的健康状况，他需要多长的治疗时间，以及你们准备进行何种治疗。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①

可惜库恩·贝拉没有把他对列宁的回忆和与列宁的会见和谈话形诸文字。他大概把这些看成是个人的事，由此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业已无法补救的错误，他把列宁亲手写给他的几封信都严严地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甚至在列宁去世后也没有交给列宁研究院。每忆及此总是使人感到痛心。因为列宁给库恩·贝拉写的亲笔信和便条共七件在1937年6月永远地消失了。

当库恩·贝拉被带走后，办公桌归了守门人。守门人出于无知，把列宁的函件连同对他说来毫无关系的文件作为废纸一起扔掉了。

让我重新回到1923年夏天！

---

①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9卷第189页。

我们要去的日列兹诺沃斯克是高加索最美丽的浴场之一。这里的疗养所里住着不少胃病和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景物如画、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使人一扫烦恼。刚一安顿下，库恩·贝拉的情绪就变得非常轻松，他说，他一踏上这块土地就觉得没有病了。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不用住疗养所，我们单独有房子住，只要按时去医生那里以及去矿疗接受治疗就行了。

我们还发现，邻居是我们的老朋友、好同志伏龙芝同志。

我们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了六个星期，库恩·贝拉一天比一天高兴。我们和伏龙芝家在一起。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子铁木耳刚生不久，女儿塔尼娅三岁，常和阿格奈丝玩。伏龙芝也喜欢小米克洛什。

有一次，两家一起在山径漫步，迎面过来一个吉卜赛女人，要给我们看手相。伏龙芝和库恩·贝拉不肯，是这女人坚持说她相法灵验，如果不信，可以当场指出我们谁和谁是夫妻以资证明，说着看着我指指伏龙芝，“您是他的妻子。”我们轰地笑了起来。但库恩·贝拉还是给了她一点钱，条件是免开尊口。

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和伏龙芝一家一起前往基斯洛沃茨克，从那里上火车，高高兴兴地回到莫斯科，身体好了许多。

此后库恩·贝拉在乌拉尔没有工作多久就被调回莫斯科，被派往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他的任务主要是克服一些青年人中间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但一般青年中有，甚至共青团中央的某些领导人中间也有。要制止这种倾向非一日所能奏效，大家都认为库恩·贝拉在青年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个适当的人选。他担任这个职务以后虽然没有立竿见影，但逐步纠正了这个青年组织中的托派

倾向。

年轻人都很喜欢库恩·贝拉，因为他从来不摆老资格、带着优越感说话。他对于年轻人的糊涂认识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不惜时间，不怕疲劳。库恩·贝拉认为青年教育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工作得兴致勃勃。

这时我们已经迁到沃兹特维仁斯卡街10号。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也在这里，这对库恩·贝拉方便不少，他任何时候——包括深夜——都可以去办公室。

而共青团中央的人也随时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家变成了俱乐部，差不多可以专门安排个传达室了。年轻人一敲门、一按铃，走了进来，嘴里含糊地说了一句问好的话，就径直走向库恩·贝拉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好象被他们看成了自己的领地，而库恩·贝拉则变成了他们共有的财产，他们骄傲地宣称："他现在是我们的了！"

那时的共青团员对革命是满脑子的浪漫主义。他们的大多数恨不得把心中的美好幻想立刻变为现实。

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有一部分是旧的甚至是假的革命家，但主要还是当年曾被沙皇政权投进监牢、流放到边疆、后来又在国内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是质量很差的几乎是灰色纸张印刷的青年读物。党史研究所出版的《历史——革命》丛书中登载的俄国革命人物是他们追求的英雄。（我的孩子当时还很年幼，但也是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

显然，库恩·贝拉的不寻常的生涯也吸引着年轻人，他们敬佩他四海为家，到处为被压迫者的利益而战斗。

不久前——本书俄译本第一版问世后不久——有人给我寄来一本当年共青团的领导人之一米利恰科夫的一本回忆录。看

到这书使我思绪万千，慢慢读来，当年情景历历在目。作者在书中回忆了当年以何等幸福的心情与库恩·贝拉一起工作的情景：

“……1920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库恩·贝拉，是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库恩·贝拉坐在主席台上，专心致志地听着代表们的发言，看得出来，他很理解发言的内容。

“大会主席显然是回答一张传递到主席台的纸条说：‘是的，库恩·贝拉在这里。’我们以长时间的鼓掌来表达对匈牙利共产党人和他们领袖的热烈敬意。

“1923年和1924年共青团中央的成员和库恩·贝拉一起工作，根据他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叫作‘青年’。

“当时，俄共除了一般的联系方式外，认为有必要再派一个代表到共产主义青年团里来，直接参与团中央的工作。这是共青团运动中的一个特有现象。

“我手头有一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1923年10月2日的会议记录，上面写道：增选库恩·贝拉同志为书记处书记。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尽管已事隔多年，我记得犹如发生在今天一样的清晰。库恩·贝拉的屋子里有两张桌子，我坐在他对面。他很注意谈话方式。与其说是谈话，还不如说他更多地是提问题——用提问题来启发我们的谈话。我们当时是二十来岁，在我们心目中库恩·贝拉是个‘老家伙’。事实上，这位‘老家伙’当时只有三十七岁……

“当时，向共青团中央派一位年长的、而且还是一位特命、全权的外国同志来工作，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把我们过分激烈的争论引上正常的轨道，使我们不要失去控制，这一意图在我

们心中不免引起忧虑：他会不会来包办代替，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但我们的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库恩·贝拉非常理解我们，他对青年的问题理解得非常透彻，意见非常精辟。

“……在1924年1月悲痛的日子里，库恩·贝拉和我们一起参加共青团中央的特别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名前冠以列宁的名字。我们和他一起起草了共青团中央告全体团员和青年工人、农民书。

“库恩·贝拉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听说外国代表在发言中把库恩·贝拉叫做共青团员，他开心地笑了。

“……我于1924年底作为苏联共青团代表团团长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行前和库恩·贝拉详细地研究了自己的任务，库恩·贝拉向我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在青年运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库恩·贝拉属于我们永远尊敬和爱戴的党的工作者之列……库恩·贝拉是我们的共产党人，是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是和我们休戚相关的朋友和同志。

“……老一代革命家对年轻一代所寄托的希望，库恩·贝拉于1919年6月20日在布达佩斯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

“……‘你们这些年轻的无产者的灵魂深处将要发生变化，将要形成坚强的团结，使你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值得你们去斗争，去献身……希望你们为此奋斗，为此学习，为此建立新的道德观念，把自己锻炼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那样的人，使自己无愧地生活于这个时代，

享受着时代创造的成果。”

米利恰科夫同志引用了库恩·贝拉1919年精采的发言，在几十年之后重新回忆这些话并不是多余的。

库恩·贝拉在1923年也号召苏联共青团发扬团结精神、建立新的道德观念。苏联青年接受了库恩·贝拉的号召，米利恰科夫的回忆录就是明证。

1923年过去了，1924年1月到来了。列宁离开了人间。我们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

苏联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第十六章　“博士先生”……

一

1923 年底，库恩·贝拉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长。

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很快就将召开，它向各党提出许多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各党布尔什维克化、建立以夺取政权为纲领的政党……为实现这些斗争目标，便需要共产国际成为全世界共产党统一的、在实际工作中和理论上进行领导的中心。

宣传鼓动部的工作是很繁重的。库恩·贝拉虽然常说，他不擅长写纲领、定方针、信函往来等这些案头工作，他愿意回到乌拉尔去吸工厂区的空气，可是还是做得很认真，不管他擅长不擅长，一天有很多时间都在伏案疾书。

白天他要花很多时间与各国党的代表谈话，所以写东西只能挤到晚上。他往往和同事一起工作到很晚，除我们睡觉的屋子外把所有地方都占了。如果有的打字员累得受不了（库恩·贝拉和同事们都口授文件），就把我叫去帮忙。我虽然不是职业打字员，但自问技术还过得去，同时也乐于帮助他们做些事。可是每次打字总是不欢而散。因为库恩·贝拉一指出我打的有错误，我就脸上挂不住，一面往外走，一面发誓再也不打字了。可是我的决定只持续到他们下次再叫我帮忙为止。

除领导宣传鼓动部外，库恩·贝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担任工作。此外，他作为匈牙利的共产党代表，要做的事情也不少。库恩·贝拉对匈牙利流亡者的工作历来是抓得很紧的，参加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协助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就这些人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来看，照顾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库恩·贝拉却认为他主要的任务是把这些人培养为合格的布尔什维克，以便能负担起匈牙利今后革命斗争的任务。

1924年。

库恩·贝拉和在莫斯科的匈牙利流亡者都热切地希望直接参加匈牙利的国内斗争。

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运用到匈牙利革命的实践，对国内的党在思想上和物质上进行支持这一认识在匈牙利大多数流亡者中间得到热烈的响应。他们这时在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有了工作，有了房子。如何支持国内的斗争，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建立一个政治俱乐部是最合适的形式，但建立俱乐部要有场所。

库恩·贝拉向莫斯科市党委提出，希望能给匈牙利人拨一所房子进行政治活动。立陶宛流亡者在莫斯科也有一个这样的俱乐部。

莫斯科市委把列昂节夫斯基街18号的房子拨给匈牙利人。这所房子以当年的市委书记扎戈尔斯基命名。扎戈尔斯基于1917年秋天在这所房子里被社会革命党炸死。

但是这所房子需要修缮，在修好以前他们暂时在新巴斯曼纳亚街活动。成立政治学习小组、棋艺小组等组织。也做了几个报告，但是一种临时感干扰了活动的开展，直到搬进列昂节夫

斯基街那所房子后工作才深入起来。

组织匈牙利俱乐部大大调动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全体流亡人员差不多都参加了。每个人都觉得参加俱乐部的组织工作是自己的荣誉。

选举了一个临时领导机构，领导人的全部名单我记不得了，但博卡尼·德若、巴亚基·费伦茨、扬奇克·费伦茨、克莱普科·埃代、纳吉·费伦茨肯定是领导机构的成员，桑托·雷热当选为秘书。

桑托·雷热当时属于匈牙利共产党的年轻一代，现在也七十多岁了。他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就参加革命运动，卡罗伊政府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几乎一直在战场上。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以后他被反动法庭判十五年徒刑。1923年根据苏匈换囚协议来到苏联。库恩·贝拉还在国内就认识这个可靠的共产党人了。桑托·雷热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筹备俱乐部的工作，并积极参加俱乐部的一切活动。1936年他志愿参加国际纵队去西班牙，在扎尔卡·马泰(卢卡奇将军)麾下作战。共和西班牙失败后他回到莫斯科，一直工作到归国。

二

俱乐部由于受物质条件限制，工作规模不很大。做报告、各类小组和讨论会的负责人、会计、图书馆管理员等工作人员都不提取报酬，那些必需的经费从会员费中开支。

财务是波格丹·西蒙同志负责，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干了多年。他不光负责会计工作，同时还认真检查各人是不是按时如数交纳会员费（后来还有党费）。匈牙利党员给匈牙利党交纳的党费和交给联共的一样多。如果谁不交或是迟交了，波

格丹就会请库恩·贝拉“管教管教”这个人。而库恩·贝拉总是请他“别着急”，向他解释道：匈共党费是自愿的，可能这个同志这几天有困难。可是波格丹·西蒙不同意库恩·贝拉的看法，常常在俱乐部晚会上编一段小节目来挖苦这些人。后来波格丹调任报纸推销工作，财务便由当年的红军骑兵、一度任布达佩斯卫戍司令的基什·米克洛什负责。

俱乐部初期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活报纸”，主要是向听众介绍苏联和国际时事。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许多人的俄语水平还不高。这节目主持得最成功的要推马扎尔·拉约什，只要他登台宣讲，总是座无虚席。

俱乐部每月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告会，库恩·贝拉也参加，他主讲国际形势、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等。他的讲话当时有速记记录，但这些记录今日大多已经散失。

博卡尼·德若、明尼赫·费伦茨、桑托·雷热、豪伊杜·帕尔、海韦西·久拉等都做过报告。由于与会者争相发言，所以报告会常常开到深夜。在当时，莫斯科的匈牙利流亡者中政治生活是很活跃的。

俱乐部活动中还有青少年工作和妇女工作，每 隔一段时间向大会汇报。青少年还经常组织合唱、诗歌朗诵和话剧、音乐表演，还参加筹备图书馆。

各种专业活动小组——如歌咏组、朗诵组、演剧组的活动受到匈牙利作家的帮助。在匈牙利流亡者的文化生活中作家起了很大作用。伊雷什·贝拉、希达什·安道尔、马达拉斯·埃米尔、马泰伊卡·亚诺什、巴尔塔·山多尔、拉妮·莎萝尔塔、卡里卡什·弗里杰什、基什·拉约什等都乐于承担创作剧本、写朗诵诗，并负责辅导。伊雷什有一段时间担任墙报编辑，在墙报上对

某些不积极的会员“猛烈开火”。希达什·安道尔是1925年到达莫斯科的。一到就抓演剧组和青少年活动组。他写的某些剧本、诗歌不光受到匈牙利人的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电台也不止一次广播过。当然，在莫斯科生活的匈牙利作家其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俱乐部这个舞台，经过党的批准，他们建立了“匈牙利作家、艺术家协会”，成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匈牙利作家、艺术家的组织(成员约五十人)。

莫斯科匈牙利作家的主要创作内容是描写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就和失败、匈牙利工人运动、匈牙利的共产党的斗争等。库恩·贝拉非常重视文学，他支持作家的工作。尽管他公务繁忙，但常常和作家彻夜长谈。如果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出版了，库恩·贝拉可能会比作家本人还兴奋。他有时还为作品写前言，虽然往往不乏针砭之词，但更多的却是鼓励(包括批评本身)。

“工人通讯组”也成立了，由青年的《红色新闻》编辑豪伊杜·帕尔负责。这个通讯组在活动的十年中向维也纳、考绍、纽约等地的共产党报纸寄过不少稿件。

俱乐部不光组织晚会，也还组织郊游，妇女们也参加。她们负责准备食物，做的食物有时还能出售，所得收入交给党组织，其数量常常是可观的。

俱乐部的成员还积极推销《劳动与知识》、《新三月》和《镰刀与锤子》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还承担了《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明尼赫·费伦茨、桑托·雷热、马扎尔·拉约什、豪伊杜·帕尔、福妮奥·莎莉、佐尔格、还有我以及其他不少人都参加了。

俱乐部的工作，无论老幼都乐于参加，看到十来岁的孩子也到俱乐部来要工作时那认真的神气是非常感人的。他们积极外出推销演出的票、卖书、卖报……把卖来的钱投到一个箱子里。

孩子们互相比赛，看谁为党作的贡献大。

俱乐部还参加苏联一些大的节日活动。俄国革命第十周年有五百个匈牙利人参加红场游行，他们身穿便衣，但携带武器，高举红旗，还打着一块大标语牌，上写："第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莫斯科的匈牙利俱乐部还把活动扩大到外地，把各地的匈牙利人、流亡者、战俘组织起来，办俱乐部或者活动小组。莫斯科的总俱乐部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给他们寄文学、政治书籍，把他们组织到党的活动中来。

在列宁格勒有好几百个当年的匈牙利战俘和流亡者，他们当然也组织了俱乐部。俱乐部冠以库恩·贝拉的名字。这个俱乐部的任务和莫斯科的一样，他们在政治教育、文化生活以及对党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不比莫斯科的逊色。两个俱乐部多次互派文艺演出队，并进行了友好竞赛。

库恩·贝拉和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的俱乐部以及若干外地活动小组保持直接联系。他经常前往列宁格勒在匈牙利俱乐部或苏联工厂做报告。在列宁格勒有一个毛纺织厂和一条船以库恩·贝拉的名字命名。

在列宁格勒有许多好同志，他们也努力工作，不使自己落后于革命形势。

这些俱乐部、活动小组在使匈牙利的革命者不至于重蹈过去很多流亡革命者的覆辙、避免队伍分崩离析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组织的政治、文化教育使在苏联的匈牙利革命者及时了解匈牙利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使他们尽管身处异域依然能和祖国息息相通。这就使匈牙利革命者即使在苏联身居要职，生活在苏联人之中，他们也从不忘记回到匈牙利参加党的革

命斗争。

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实际上也不断回国参加地下党的工作。监狱、刑具、死亡并没有使他们动摇，为了新的匈牙利的诞生，他们甘愿承担一切牺牲。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匈牙利的流亡者中没有任何消极因素。不满、争吵、二十年代的派别斗争曾不止一次地干挠过俱乐部的工作、阻碍过革命者之间的合作。但当共产国际作出决议后，派别斗争停止了，充其量只是以隐蔽的形式出现罢了。

三

1924 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全国劳动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列宁的健康情况严重恶化了，只有最接近他的人才知道，要全愈几乎已经没有可能。

在许多年以后，每当回忆及此，依然还是心情沉重。

同志们忧心忡忡地互相询问，总希望能听到一些使人振奋的消息，希望听到列宁已经转危为安，希望是医生作了错误的诊断——虽然大家明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不大容易弄错的。1918 年社会革命党人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列宁，从而决定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但是列宁以坚强的意志使他在繁重、困难和紧张的工作中战胜了枪伤造成的痛苦。

共产党员们的脸上笼罩着同样的忧虑，使得大家变得那么相象——是的，在这巨大的痛苦中，大家都变成了兄弟姐妹。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人们也没有团结得象这时候那样紧密。

在无边的忧虑之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想：如果那一天真的

到来了，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和全国人民真的失去衷心爱戴的列宁，失去了集苏联和国际工人解放运动经验于一身的领袖怎么办？

1924年1月24日，列宁逝世了。

不光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哀悼他，向他诀别，他过早的离去震动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每个人都深深感到：列宁的逝世不仅是他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的亲属和朋友的重大损失，同样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整个进步人类、世界上每一个想革新、想大踏步前进的人的无可比拟的损失。

库恩·贝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悲痛，还在列宁逝世前好几天他就神情忧郁，事情发生之后，他更是终日不语，只有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痛苦。

当他知道他已被列入列宁治丧委员会时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离开了家。

我和列宁只见过一次，那是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那是终生难忘的一次经历。我当时和库恩·贝拉从楼梯上往下走，列宁正好迎面上来，看见了库恩·贝拉站住了，和库恩·贝拉握握手，问："这是您的夫人吗？""是的。"库恩·贝拉回答。列宁微笑着向我伸过手来道："我是列宁。"他问我在乌拉尔生活得怎么样，最近有些什么打算，他说："您得学会俄语，而且要学得好！""恢复健康了吗？""你们需要什么帮助？"等等。那样亲切、诚恳、热情，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和我说完话以后又对库恩·贝拉说了几句关于报告的事就匆匆走了。他忙着去准备发言。

现在，再也聆听不到列宁的声音了。

列宁的遗体安放在工会大厅。

莫斯科那时是零下三十五度，但严寒没有能阻止人们来最后看一眼列宁。男人、女人、孩子们排成长长的队在逼人的寒气中静静地等待着。

库恩·贝拉夜里派人来叫我向列宁遗体告别。

巨大的大厅里乐队奏着哀乐，人群中不断传来哭声，人们低着头，擦着眼泪。我跟着队伍慢慢向前走。到了灵柩旁边，我看见克鲁普斯卡娅低头站着。

当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了库恩·贝拉，他正领着守灵的人往里走——守灵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每五分钟换一次。

我在一间小房间里等着库恩·贝拉。他出来时告诉我不要等他，他要到清早才能回家，而且也只能停留一会儿。稍睡片刻就回来。

我独自回家，可是睡不着，库恩·贝拉对我讲过的关于列宁——作为人、作为革命家的话逐一在我耳边掠过。

我记得 1918 年，那时战俘已开始回国，他们说起了俄国革命和列宁。当时在人们印象中的列宁似乎是位天神，他以魔术般的力量把俄罗斯几百年来受尽压迫的人民引向战斗，引向胜利。

1918年当库恩·贝拉从俄国回来的时候，对我说了不少关于列宁的事，那时我开始明确地看到：列宁不是神，而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真正的人，他通过艰苦的斗争，建立了一个唤醒受压迫人民群众的党，用革命夺取了政权。库恩·贝拉说，列宁虽然是一个大国的领袖，但依然保持朴素的本色，从而赢得了并保持着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仰与爱戴。他的政治活动和私生活与他所宣传的和为之奋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库恩·贝拉谈到列宁的时候声音里充满骄傲和感激。他以列宁关心他，以自己能成为列宁的学生而骄傲，他感激列宁，因

为列宁不断纠正他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列宁说服力很强的批评使库恩·贝拉认识了许多问题。后来，每当库恩·贝拉要就什么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地想：如果是列宁，可能会怎样处理？

……列宁安葬了。在一天里，十万工人参加了党，他们要补上列宁逝世带来的损失。

1925年来了。

在这段时间里，库恩·贝拉的工作之一是组织列宁著作的外文翻译。

四

我的俄语说得使人不敢恭维，可是阿格奈丝却说得好极了。不过她学俄语的方式特别奇怪。刚来时，她尽管在苏联孩子的学校，却一连三个月不说一句俄语，人家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在家里只说匈语或意大利语（后者后来全忘光了）有一天，没有任何过渡，她突然说起俄语来，而且无懈可击。

我在国际工人援助局① 工作，负责管理法文和德文报纸，后来被调到管理电影的科。任务是把制片得来的收入捐赠在资本主义国家狱中的同志。

国际工人援助局里问题很多。上级派人前来检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茨维特科夫斯基的老党员。有一个人因有问题被开除了，茨维特科夫斯基把我叫去，通知道："这个科今后由您来领导。"我坚决谢绝这个任命，对他解释道，我的能力远远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多方对我说服，但没有效果。我回家对库

---

① 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译者

恩·贝拉说起这个“科长事件”，他哈哈大笑说：“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坦率地说出自己什么方面有、什么方面没有能力，那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1925年底我到“北方木材公司”工作。公司总经理是波尔·埃尔诺。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向英国出口木材。后来波尔·埃尔诺被苏联政府派往伦敦任外交官，我就到苏联总工会。

这工作没有什么意思，我想找点别的事情做。这时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卓贝尔·埃尔诺① 提出让我到他的研究院去。

院长梁赞诺夫是这研究院的奠基人，在我向他报到时声震屋宇地高声吼叫道：“库恩·贝拉夫人？那又怎么样？我这里是什么单位？是国际红色救济会，什么人都得收留？”

我大为伤心，可以说是哭着回到家里。半小时以后卓贝尔打电话来了：

“来吧，安排好了。”

“我不去！”我回答他。

“请一定来！”

我在研究院工作了十一年。梁赞诺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您勤勤恳恳，热爱工作。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别生我的气！您谅必知道，有的人就是靠着丈夫的地位混日子、拿工资……我衷心希望您不要生我的气。”

1924年6月17日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

① 关于卓贝尔·埃尔诺我将在回忆录的第2卷里详细写他。因为虽然我从1919年以来就认识他，但真正的了解却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在那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每天见面，他不光帮助我，我看到他对每个人都帮助。在那实在不能叫作轻松的日子里，卓贝尔·埃尔诺所给予的帮助无异是拯救生命。

大会结束以后，红色普列斯纳区在我们夏天曾经居住过的赛列勃兰尼森林为德共代表团举行盛大联欢会。台尔曼、皮克等都参加了，我们在树林里玩老鹰捉小鸡，库恩·贝拉象个小学生一样地跑来跑去，高兴极了。

尽兴的游戏之后我们到一间小屋坐下。突然我感到不适，接着就晕倒了。体温上升到四十度，人们起初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最后诊断是疟疾。我被送进医院，彻夜高烧，不停地唱歌。人们给我冷敷、服奎宁。库恩·贝拉从蔡特金那里（她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每隔十五分钟就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我的情况。

几天以后我好多了。

克拉拉·蔡特金那时已经很老了。

我前面曾写到，蔡特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1921年的“三月发动”以及那次革命的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库恩·贝拉。后来他们关系变得很好，她曾多次来我家吃匈牙利菜。库恩·贝拉喜欢并尊重“克拉拉”（她周围的同志都这么叫蔡特金）。她去世时由库恩·贝拉代表共产国际致悼词。

有一次我曾经送一份机密文件到蔡特金住所。那时她的视力已经很弱，差不多快失明了。住处很小，前厅很暗，出来一个女人准备接过文件。“我要亲手交给她。”我对这个女人说。这时克拉拉·蔡特金出来了。我们说的是德语，她从口音中听出我是匈牙利人，便问：

“您认识库恩·贝拉妮吗？”

“认识。”我含糊地说。

“她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克拉拉·蔡特金说，“您如见到她，请代我向她问好。”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转身告别就走了。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但我从来也没有提起这次见面，为的是不让她因为我知道了她的缺陷而难堪。

五

1925年6月的一天，库恩·贝拉告诉我：他很快要到维也纳去。因为决定在维也纳举行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他主持。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决定。五年前库恩·贝拉在奥地利坐监狱、住疯人院，两次被毒打，几乎被劫……都历历在目，如今又要到那里去了，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

可是我不能有任何异议。因为我清楚，共产党员首先是属于党的，属于共产国际的。他的妻子、他的家属最好不要插嘴，不要给他本来就不轻松的工作增加困难。

我们相互告别。出于保密的原因，我没有到车站去。时值夏令，我们单独住在林间木屋里，俱乐部活动是“淡季”。所以人们没有立刻注意到库恩·贝拉已经离开莫斯科了。

我一生中许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又在等他了——他能回来吗？他会不会又被抓起来？谁知道他的情况？……总算有孩子，有工作，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而我也尽量多做事，减轻思念，打发时间。时间是打发过去了，但是那种不安的情绪太折磨人了——没有准确的归期、没有规定的期限。可能一个月以后就回来，但也可能是两个月，当然也可能是更长的时间，也可能……

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库恩·贝拉做了政治形势和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另一个是农民问题的报告。（有一位匈牙利画家在个人迷信的顶峰时期作了一幅匈共一大与会者的人

物画，这幅作品印行数十万份，可是画上却没有这次大会的主要报告人，那些人命令画家这样做的时候不知道脸红了没有？这些“伟人”未免太近视了。此举除了损坏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外，不可能有其他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只有短短的十来年，历史就嘲讽了他们的“健忘”。）

……库恩·贝拉总算安全地开完一大回来了。他历来如此，就象从外地短期出差回家一样，笑嘻嘻地从外面走进屋来。他向家里的人（当然也包括保姆玛露夏）一一问好，然后开口说：

“我早就说了，别为我担心，我不会出问题的。”

现在我也笑了。

他一到就分礼品。第一件是送给玛露夏的，是一件美丽的针织衬衫。玛露夏不好意思地喃喃说着：“这多不好，这多不好！”说着就跑出屋子去了。玛露夏是从最贫穷的奥廖尔省来到莫斯科的。在我家工作了三十七年，后来到希达什和阿格奈丝家去了。她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直到今天我还遗憾她没有跟我们到布达佩斯来。今年已经六十八岁的玛露夏（她一直没有结婚）因为怕来异国，和我分开了。这分离是令人痛苦的，我的儿子米克洛什由她一手照料长大，阿格奈丝也基本上是这样。孩子们听从她的管教，其他人也没有一个人不听从她的。记得她初来时不爱喝匈牙利式的浓咖啡，不爱吃匈牙利菜，可是现在?!她只烧匈牙利菜，也最爱吃匈牙利菜。至于浓咖啡，她根本就离不开它了。

玛露夏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我们当年楼里的一间屋子里。

……我的姐姐哈妮卡得了一身衣服。库恩·贝拉一面把衣服递过去，一面开玩笑地说：“也许您会喜欢，您是位注意穿着的女性。”“您老爱挖苦我。”我姐姐高兴地接过礼品，反过来开玩笑

说，“我从来也没想到您在审美观和在购买女性服装方面这么有经验，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学来的？”

库恩·贝拉给孩子们也带来了礼品。阿格奈丝把衣服试了试说，她不穿，因为同学一定会因这件外国货讥笑她的。小米克洛什得到的是一套“建筑玩具”。他又装又拆，玩具很快就寿终正寝了。殊不知这位父亲以为五岁的米克洛什会搭一个工厂给他看的。

库恩·贝拉总是象嫌孩子们成长得慢。他和孩子们谈话的内容和给孩子们买的书总是要超过他们的实际年龄四、五岁。

当屋里只有我们两人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用红黑两色装饰的不大的书，向我扬扬说：“伊琳！我发现了一位匈牙利无产阶级诗人！”他兴奋地一面说话，一会儿把书打开，一会儿合上。

我伸手过去说，既然如此，我来读一段给他听。

“不，不！”他高声说，“我来读！”接着就朗诵起来：

“谁能相信，谁能相信，谁能相信，

在瓦茨路和切佩尔发生的事情？①

如果有人向我们举起屠刀，

他就将自取灭亡，

因为每个饥饿的早晨

都在向革命输送力量。”

当结束这本小诗集的朗诵时他问：

“怎么样？”

库恩·贝拉用那样的神情看着我，以致即使我有不同意见，

---

① 瓦茨路有关押革命者的监狱。切佩尔是工业区。——译者

也不敢说个“不”字，何况这些诗听来也使我很受感染。我把我的看法说了。

“仅此一端也可以看到，匈牙利人民心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记忆并没有消失。”他说，“手稿是两年前就完成了。佩斯的一个资本家太太把它们藏起来了。因为这位诗人参加革命运动，万一警察去抄他的家时发现了这个手稿，就有可能被霍尔蒂法院判他十年来作为稿酬。”

接着他把出版这个诗集的过程告诉我：

库恩·贝拉和朗德列尔·耶诺等一起凑够了钱。它们在柏林认识了诗人本人。诗人叫做希达什·安道尔，他应科姆亚特·奥劳达尔之约来到秘密聚会的地方。

库恩·贝拉对希达什说，如果他能到莫斯科生活一段时间，他的才华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希达什的诗集《在反革命的土地上》于1925年寄达莫斯科，有好几百本。大部分匈牙利流亡者都很喜欢，并且在俱乐部的晚会上进行了朗诵。这时阿格奈丝还不满十一岁，她也参加了朗诵，谁也没有想到，日后她成了希达什的妻子。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后来的困难的岁月里，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不堪设想，如果没有他，我们可能会是什么情况。

……在读完诗以后，库恩·贝拉一反过去的习惯，没有向我提什么问题，而是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立刻意识到，大概又有什么重要的事了。果然，他告诉我，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委员会已作出决定，把他从共产国际调回，负责在维也纳开展匈牙利党的工作，并且视情况需要，可能还要兼管匈牙利国内的地下工作。因为，目前在匈牙利附近开展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库恩·贝拉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克服地下工作的一些困难，打开工作的

局面。他说，他感到同志们真心实意地希望他在国外委员会里担任职务。就他本人而言，能够做“匈牙利工作”，是他最大的愿望。如果共产国际不在这问题上设置障碍，同意匈牙利党的决定，他准备很快就启程前往。

“现在您不要发表意见！”库恩·贝拉看到我脸色的变化，结束了谈话，“我们明天再继续谈。”

我理解他，也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他所谈的一切我都表示了同意。但是对这事情所包含危险性的认识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安情绪我无论如何也隐瞒不住。我认为，他长期在国外工作本身就容易产生眼下无法预测的后果，因为如果被捕，他很可能被引渡给霍尔蒂政权，更何况他的计划中就有匈牙利之行。如果在匈牙利被捕……。

可是对于这一切，库恩·贝拉连想一想也不愿意。

他是对的。如果顾虑有危险就取消这打算，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同时，我也慢慢地看清：在派别斗争结束之后只有当库恩·贝拉也参加领导，特别是在邻近匈牙利的地方，甚至是在匈牙利国内工作才会有真正的成绩。

我们第二天没有谈，第三天也没有谈，显然，库恩·贝拉等待我自己找到思想上的平衡。

又要重新习惯漫长的分离了。

库恩·贝拉乐观地等待共产国际的同意。不久，愿望实现了，于是我们便着手具体准备。几个月以后，维也纳那边说，一切安排就绪，可以成行了。在此期间库恩·贝拉依然在共产国际工作，写了好几篇讨论革命工人运动以及其他问题的文章。

他不在的时间里，匈牙利流亡者中间的领导有待于加强。在

共产国际作出上述决定之后，匈牙利党的国外委员会确实想认真解决内部的团结问题，但是流亡者的队伍中（莫斯科的匈牙利俱乐部也不能例外），总是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摩擦。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工人。遗憾的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小团体斗争，以致于无法进行和平合作。他们总是寻找——并且总能找到——引起争论的题目。

……库恩·贝拉离开莫斯科了，去到接近匈牙利的地方做党的工作去了。

库恩·贝拉的突然离去使匈牙利人都感到意外。起初他们以为库恩·贝拉去疗养院了，可是慢慢地，他们觉得这个“疗程”有点太长，便开始猜测起来：库恩·贝拉到哪里去了？什么地方都猜了，唯独没有猜到就在匈牙利附近。（譬如库恩·贝拉1927年在洛松茨① 参加一次党代表会议，据我所知，他还写了一份传单，题目叫做《炼钢工人，不要退缩！》。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一谈到库恩·贝拉，匈牙利流亡者就神秘地笑着。起初，当人们以为他在疗养院，便惋惜他又生病了。后来又自以为自己猜到库恩·贝拉到哪里去了，便又缄口不言起来。第二天，消息又变了。总之，从德国到中国，库恩·贝拉似乎无处不去，无处不在。但“新鲜不过三天”，人们慢慢地又接受了这个现实——库恩·贝拉暂时不在这里，也不需要去打听，因为……不需要。看到人们严守秘密的神情是使人感动的，尽管他们并没有知道真正的秘密。

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月，一切早就恢复了常态，匈牙利俱乐部依然积极地组织活动，有一天晚上，库恩·贝拉突然意想不到

---

① 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卢切内茨。——译者

地出现了。但谁也没有问他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他神采奕奕，精神十足地给大家做报告，就好象前几天刚来过俱乐部似的。做完报告，他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说话。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事情办得不错。但什么事办得不错，他当然没有说。他的兴奋情绪也感染了别人。当活动结束，我们漫步回家，就象大会散场一样，人们把库恩·贝拉一直送到家门口。

六

1926年春，我接到通知，要我到共产国际去一次。万万没有想到在那里，一位同志告诉我，收拾一下，不几天我将要到柏林去——到库恩·贝拉那里去。

这消息使我非常意外。因为据我所知，库恩·贝拉应该回莫斯科来。既然要我去找他，那么为什么不是去维也纳，而是去柏林？但由于这位同志对我讲得很简短，又是正式通知，我也就不便追问，也就同样简短而正式地向他表示了感谢他通知我，便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不住地想：什么时候走？和谁一起走？库恩·贝拉为什么不来？等等。总算在约定的那天波尔·埃尔诺陪我上火车站，我的位置在一节国际卧车上，同行的是个陌生人。波尔·埃尔诺看出来我对这位旅伴抱有怀疑，便把我叫到车厢走廊上，告诉我：这位年轻人是自己人。我总算放心了一大半。波尔还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钱，要我向库恩·贝拉以及其他同志问好。我回身进车厢，这位青年和我暂时谁也没有出声，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但后来我们终于还是开口了，就象通常乘火车时候那样谈了起来。但我的原则是：少说为佳，所以只找些最简单、最日常的事做题目。这位年轻人是保加利亚党的党员，后

来在共产国际一次代表大会上还见过他。

第三天早晨火车到达柏林。旅伴把我的行李拿下来，然后告了别，很快在人群中消失了。我独自在月台上站着，考虑是等着人来接，还是独自前往奥尔帕里·久拉的住处。我心中忽然一阵伤感袭来——异乡他国、孤身只影。正当我在考虑：是乘公共汽车还是乘马车前往的时候，我在莫斯科认识的朋友奥古斯特·克莱奇来了，向我问好，提起行李，只说了一句德语——“走吧！”

我严格遵守保密条例，什么也不问。两人默默走出车站，我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街上车水马龙的景象，突然被一个人拉进了一辆小卧车。原来车里是库恩·贝拉。车开了。

柏林我没有逛过，但此刻也没有小事观光的兴趣。使我聊以自慰的只是：尽管不久又将别离，但此刻毕竟又是在一起了。长途旅行和不安的情绪使我很疲劳，只想尽快到达住处。但这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库恩·贝拉要去出席一个紧急的会议。他建议我乘这时候到附近一个理发馆整理一下，然后雇辆出租汽车到奥尔帕里家。“等开完会，我也到那里去，我们都在他家吃饭。克莱奇会把行李送到家里去的。”库恩·贝拉这么说。

在这个熙攘往来的大城市里起初我有一种非常古怪的自我感觉，但很快便忘了自己是在柏林，是地下状态，而且还是单独一个人。德语给了我自信心。我走进一家理发店，一小时以后就象一个老柏林似的找到了奥尔帕里的家，受到热烈欢迎。

不久库恩·贝拉也来了。我们一面品尝着奥尔帕里岳母烧的午饭，同时也就研究好了头几天的日程。可惜库恩·贝拉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陪我。因为首先，他不宜过多在公开场合露面，其次，——他说——白天总有事。当然，我也知道，除了这两个

原因外，还有第三个，那就是他不喜欢结伴游玩。他宁可坐在屋里研究某个城市的历史、名胜，而不愿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他从小就喜欢在树林里漫游，采植物标本，直到后来还是保持着这个爱好。从前如果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在城市里散散步，他就会说："穷人不散步，如果有事，他就赶路。"所以柏林的名胜、古迹我是在奥尔帕里·久拉的儿子帕尔（当时大约十三、四岁）和侄子埃代的陪同下参观的。两个孩子都很愿意跟着我。

库恩·贝拉住在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工人家里。此人把一间屋子租给了地下共产党人，对于谁住在里面，从来也不过问。

主人一家都很热情。女主人对我说："Herr Doktor"①（指库恩·贝拉）是个正派人，晚上从来不出去，在家工作。

我在柏林住了不到两星期，过得非常愉快。库恩·贝拉每天上午都有事，下午我们老在一起，出去看看柏林郊外的景色，有时就在一个小旅店过夜，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城里。我们常常乘胶轮马车来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那时候朗德列尔·耶诺也在柏林，他想见见我，我们便约好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当我和库恩·贝拉一同前往时，已经有好几个同志等着了。我们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听着朗德列尔·耶诺风趣的谈话。

但是朗德列尔的谈话忽然停止了，朝对着我的一张桌子看，那里坐着一个年轻人，正看着我们。这个年轻人发现了有人注意他，就站起来走了，朗德列尔也跟着走了出去（朗德列尔在维也纳和柏林都是地下状态。）

我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回来，便出去找他。可是既没有朗

---

① 德语，意为"博士先生"。——译者

德列尔，也没有年轻小伙子。我们不免担心起来。一会儿只见他笑呵呵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刚才发生的事。

原来朗德列尔在一个拐弯角上追上了这个年轻人，把他叫住，问他："是不是那位女士引起了您的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她。"年轻人起初怔怔地说不出话来，但他一定神，还是承认了："是，她很可爱。"朗德列尔便朝他大喊大叫起来，然后把他扔在一边回来了。

朗德列尔转脸对我说："这个密探算是打发走了，可是我跟您再也不在咖啡馆见面了。"

我一直好几天摆脱不了这件事在我情绪上造成的影响，在柏林的这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到公共场所去。但这事直到如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有一天，库恩·贝拉告诉我，很快又要分开了，最好在离别前一起到什么地方游玩一次。

我当然欣然同意，于是一起到柏林近郊的一个地方玩了一天，晚上才回到城里。等我们在一家餐厅吃完饭时，已经很晚了。餐厅离我们的住处不远，两人便信步回家。当我们走到住所对面，正想穿马路时，库恩·贝拉发现门口站了一个人。"向后转，"他轻轻地说："朝来的方向走！"当我们走出好长距离以后他把我带进一个院子，院里角落里有个酒店，我们就进去了。这是一个低级酒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人声嘈杂，醉熏熏的男男女女互相喊叫、谩骂，烟气迷漫，空气是不能再混浊了。我们找地方坐下，吵闹声稍微小了一点，但这地方并没有因此变得使人愉快一点。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各自在想：这愉快一天的结尾可能是什么样子？库恩·贝拉没等咖啡送来突然站了起来，只对我说了一声"等着"，便独自出去了。我等着，但

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如果他被捕了，怎么办？如果我被捕了，怎么办？在慌乱之中我忘了自己的德文名字，身上又没有任何证件。我别无他法，只是坐着，等着。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一抬头，库恩·贝拉站在我面前。

“您害怕了？可以走了。”

他告诉我，他先是躲了一会，然后到住处附近看了看，门口已经没有人了。我于是站起来跟他回家，果然谁也没有遇见。“做地下工作什么事情都得提防。”库恩·贝拉说，他解释道，他之所以从酒店溜走，是因为考虑到万一他被捕，对他、对同志们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他一直躲在隐蔽处，直到确信没有人盯他梢时才出来。

第二天早晨克莱奇来了，一听库恩·贝拉对他说起头天晚上的历险记，便说，其实站在门口的是一个自己人，是在等我们回家后才离开。可是此人发现我们刚一露头便又消失了，觉得奇怪，最后才领悟到是不是因为他站在门口使得我们不敢回家了？便离开了那地方。

库恩·贝拉不久就回维也纳了，我搬到了奥尔帕里家又住了几天。等回苏联的手续办完，便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

七

我又在火车上了。

此刻我的身分是一个在莫斯科工作的匈牙利工程师的妻子，一个人舒舒服服、安安静静地坐在卧车包间里。可是这安静不一会就被打破了。上来一个高高的衣着入时的女人，向我用德语问好，打听我到哪里去。我回答以后她用俄语和我谈起来，说她是德国记者舍费尔的妻子，舍费尔先生长期以来就是《新自

由评论》驻莫斯科的记者。

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交谈数句后两人都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舍费尔夫人从架上拿下她精致的皮箱换衣服，箱子的标签上写着舍费尔－沃尔孔斯卡娅·纳塔莉娅，原来她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后裔。（舍费尔夫人后来告诉我，她是公爵的直系后代。）

在谈话中她表示急不可待地想早些到达莫斯科。她说她只在俄罗斯土地上才感到愉快，她爱吃俄国菜肴。尽管她不喜欢苏维埃制度，但她不愿意离开祖国。

我问她，当时把沃尔孔斯卡娅这个名字换成舍费尔是不是感到有点困难？她看看我说：“火车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的丈夫要到车站来接我，如果您不反对，我想把他介绍给您，那时您会相信，我嫁给他是个正确的选择。”

舍费尔夫人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起自己的丈夫来。

我们又说了一阵话，她多些，我少些。我需要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尤其不能暴露我是谁的妻子。就这样到了波兰边境。

车站上一片忙乱。我们从卧车车厢被转移到一个四个座位的包间。舍费尔夫人（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显得焦急不安，好象在作秘密旅行的是她而不是我。她说，她怕有新的旅客上来打扰我们“惬意的交谈”。被她说着了，果然上来了个极不安静的青年妇女，还带着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把另外两个座位占了。在火车停着的时候，年青女人没有开口，但当火车启动，她的嘴也就放连珠炮似地说开了。她首先问我们干吗要到俄国去，然后深表同情地看着我们说，看来，倒霉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瞧，我们不也只好到俄国去吗?!她抱怨道，此番从巴黎到俄国来是事出无奈，因为他的丈夫在那里，否则她当初何必为了躲避布尔

什维克而逃到法国去。

然后她大肆鼓吹巴黎。她说，在巴黎她对一切都满意，她随身带的那些衣服那叫是真正的时装，回头她可以穿给我们这两位“太太”看看。她不停地说着，说着，但主要对象是舍费尔夫人，因为我和她的女儿玩，孩子对于她母亲的口若悬河明显地也不感兴趣，宁可和我玩。

漫长的白天过去了，空话使我感到厌烦，总算到了睡觉的时间。从巴黎回来的年轻女人把小姑娘的衣服脱掉，给她穿上各种不同种类的走私绸缎衣服。小姑娘起初没有出声，但她还是意识到了什么，因此她最后不无担心地对她的母亲说：“你把窗帘拉得严些，别让共产党看见你干的事。”“天哪！”年轻的女人惊呼一声，拉严了窗帘。

说实话，我对走私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只想睡觉。

我们到达莫斯科了，波尔·埃尔诺带着我的姐姐和阿格奈丝来接我。我“忘了”给旅伴们留地址。

……几天后我带着阿格奈丝走进一家理发店，不料那位白俄女人和她的女儿也在。小姑娘笑嘻嘻向我问好，而我（因为不愿意伤害孩子）只好装着没有看见，拖着阿格奈丝从店里退了出来。

这个白俄女人大概不明白她什么事情使我这么讨厌她，以至于连朝她的女儿也不愿笑一笑。

第十七章　维也纳诬陷案

库恩·贝拉在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已经三年了。在维也纳，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按规定，隔一段时间就离开奥地利，在莫斯科度过一两个月，其间就如过去一样地做他的工作，就象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似的。他照常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就匈牙利和国际形势以及工人运动发表文章，参加俱乐部活动，做报告，然后又去奥地利。

紧张的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我逐渐习惯了库恩·贝拉只是偶尔和我们在一起，而且时间都是很短。每当他精神焕发地站在我面前说："我早就说过，别为我担心"时，我就会如释重负，觉得果然多余担心。于是共同度过几天、几星期，努力不去想他很快又将离开我们，到时候我又将担惊受怕。

我们——除了库恩·贝拉本人以外——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到来了。

1928年4月，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早晨，我和姐姐以及孩子们正在谈论快该有他的消息了。我们通信的机会很少，我们深知，通信多会影响他的安全。但是这次谈话被电话铃打断了，是共产国际打来的，电话里说，库恩·贝拉在维也纳被捕了。

"库恩妮同志，请不要担心，"来电话的同志用德语说，"被捕的细节眼下还不清楚。最重要的情况是他活着。我们会用一切办法争取他得到释放。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可以和我们联

系。”

没有等我答复对方就把电话挂上了。可是，我能回答什么？我机械地把事情告诉了姐姐和孩子们，脑子里不断出现“他被捕了……他可能被引渡给霍尔蒂政权……他会被送上绞刑架的”这几句话。

还不满八岁的儿子米克洛什伤心地哭了起来，阿格奈丝批评道：“你不害羞吗？为什么要哭？你象个革命家的孩子吗？”

米克洛什不哭了，一面抽泣，一面回答阿格奈丝，他再也不哭了，他知道，爸爸是革命家，可是他不愿爸爸坐监牢。

两个孩子走到我身边来安慰我。阿格奈丝还告诉弟弟：“别怕，爸爸不会出问题的。会把他救出来的。”我转过身去，我知道，阿格奈丝不光是说给弟弟听，同时也是说给我听的。

我提起精神，给匈牙利同志打电话。过了一会我到马恩研究院，把消息告诉了梁赞诺夫院长和其他同事。经过一阵思考以后梁赞诺夫说：“无疑，霍尔蒂他们会要求引渡库恩·贝拉的。此刻最紧急的是设法阻止引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力求争取其实现的。库恩妮同志，您应该立刻到维也纳去，把两个孩子也带上，这样效果会更好些……这样，新闻界就会有反应，可以使奥地利警方无法偷偷把库恩·贝拉交给匈牙利。”

当我回到住处时，屋里挤满了匈牙利同志。气氛越来越紧张，每个人都担心库恩·贝拉会被霍尔蒂政权要走。人们提出各种办法：

“应该把在监狱里的匈牙利人组织起来保护库恩·贝拉，否则他会被打死的。”卡里卡什·弗里杰什同志说，“监狱门口也要组织人，不能让奥方把他交给霍尔蒂！”

“应该发动国际声援运动！”有人主张。

“库恩妮同志应该立即到维也纳去和库恩·贝拉取得联系！别的任何人都做不到这点。”

“还要找律师！”

“匈牙利人首先要积极参加！”

人们提出许多建议，有不少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每个建议里都能感到深切的同志的友爱。

我当天还去了共产国际，要求他们协助我去维也纳。负责的同志倾听了我的想法，经过短短的思考后说，我的想法不实际，因为库恩·贝拉被捕不是家庭事件。我在维也纳一露面，反而会增加营救库恩·贝拉运动的困难。他要我耐心等待。如果我的前往于事有补，他们会通知我的。他看我脸色阴沉，加了一句：如果我坚持要去，那就请自行设法，共产国际不打算支持这个行动。

这对我是个打击。我情绪消沉地回到家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几天以后马恩研究院梁赞诺夫院长把我叫去，给我看了外国报纸关于库恩·贝拉被捕的大篇消息，其中不乏耸人听闻的关于被捕时的花絮。库恩·贝拉个人情况、他的目的、颠覆计划以及霍尔蒂政权已经提出希望奥方引渡库恩·贝拉。敌人的报纸声称已经得到可靠消息：奥地利政府将库恩·贝拉作为普通罪犯交给匈牙利，“共产党魁首此番将难逃应得的惩罚。”

《佩斯日报》4月28日的社论“红魔”写道：“消失了的红色恐怖头目在维也纳出现了。”……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毛骨悚然。《新闻报》写道：“全世界对于这位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魔王又试图在中欧放起布尔什维克之火而大为吃惊。”《布达佩斯新闻报》说：“这件事不但在匈牙利引起理所当然的激愤，在世界

的任何地方也不例外。……因为库恩·贝拉不光是欧洲平民社会的恶魔，而且是整个世界的灾星……”

“把库恩·贝拉交给刽子手处理！”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共同口号，法国的《晨报》、《时代报》、英国的《泰晤士报》、《每日邮报》、《每日快报》等大小不同的资产阶级喉舌和匈牙利报纸都是一个腔调。

社会民主党右翼也不甘落后，《人民之声报》4月29日在社论《维也纳冒险记》中谈到共产党人的活动时说：“他们加于匈牙利工人的是比当年鞑靼之灾更大的危险……”，是“……无耻之尤”，是“冒险家”，使用“……卑鄙的方式……”“……最使人厌恶的手段……”是群“头脑发昏、受人雇佣的幻想者……”

匈牙利司法部长佩什蒂5月10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公开向社会民主党号召：“我向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呼吁，请你们和我携起手来共同合作，阻止共产党的破坏活动，共同把共产党的政变企图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我将把这个要求送交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每个成员以及社会民主党全党，我愿在此重申：我将尽全力和他们进行合作。”（全体热烈鼓掌）

“您看，”马恩研究院院长说：“不能在这里坐等了。事不宜迟，必需立即行动了，越早去维也纳越好！”院长了解共产国际的态度，和他们进行了谈话。谈话的结果是：如果他负责安排我去维也纳，共产国际将不设置障碍。

那年夏天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莫斯科，他也到马恩研究院来了，握住我的手，用他重浊的男低音对我说：“喏……别害怕！我们将会尽一切力量去营救库恩·贝拉的！尽一切力量！……”

按照梁赞诺夫的建议，我于第二天前去奥地利使馆，要求去奥地利的签证。

我在使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他们安慰我："库恩·贝拉健康情况非常好。奥地利政府甚至不阻止每天前去探望的匈牙利流亡者给他送东西，以及打听他的健康情况。"至于入境签证，接见我的官员说，在这件事情上使馆不能擅自作主，他们将用电报请示维也纳，几天以后就给我答复。

几天后答复果然来了，但我的要求遭到拒绝。我又作了几个尝试，但都没有结果，最后我前往外交人民委员部，请求他们设法为我解决前往奥地利的签证问题。一直没有答复，我开始想：说不定交涉得有希望了。但是真正的答复却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努力没有得到效果。

其间匈牙利共产党发出了呼吁：

《新三月》杂志① 写道："匈牙利共产党又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次不是匈牙利警察对我们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发动袭击，而是奥地利警察根据几个秘探的报告逮捕了库恩·贝拉同志。库恩·贝拉在维也纳！他到维也纳来做什么？国际资产阶级报纸热烈欢呼库恩·贝拉身陷囹圄，同时信口开河地说他到维也纳来是为了发动政变，是为了实现把巴尔干、小亚细亚、中欧直到月球一统在内的'布尔什维克中心'。如同国际警察以及一切反布尔什维克人们混乱的脑子中的恶梦那样，库恩·贝拉到维也纳来是为了策动在匈牙利的'武装暴动'，重建苏维埃共和国。当然，在匈牙利的资产阶级还有许多别的猜想，他们觉得库恩·贝拉到维也纳来是和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突然在法国出现一样。为的是让整个匈牙利骚动起来。

"……你们说，匈牙利已经出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要怕一个人的出现？如果说，一个人的出现能使

① 《新三月》，匈牙利共产党1925年在维也纳创刊的机关刊物。——译者

这个稳定的局面动荡起来，那么这个稳定值多少钱？

“对于匈牙利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匈牙利共产党的惊恐之情在库恩·贝拉被捕一事所引起的慌乱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匈牙利资产阶级要求处死库恩·贝拉同志的疯狂叫嚣不光是针对1919年光荣的工人政权以及对这个专政的第一名战士、1919年革命时期的英勇和忘我的领袖，不光针对昔日，也针对今日。由于库恩·贝拉的被捕，匈牙利共产党再次成为匈牙利和国际资产阶级攻击的目标。”

我还可以从另一份声明中转引几段：

“全世界的工人们！

匈牙利革命工人阶级遭受迫害、转入地下的政党——匈牙利共产党向你们呼吁，请你们给予迅速的援助，采取坚决的行动！行动起来！制止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府把我们党的领袖库恩·贝拉同志交给匈牙利刽子手！

“……世界资产阶级渴望对库恩·贝拉同志进行报复。因为我们党在俄罗斯兄弟以后，于1919年第一个在欧洲中心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而库恩·贝拉在战斗中站在我们党的最前列。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把他处死的原因。

“……行动起来！阻止引渡库恩·贝拉！国际工人阶级不允许把库恩·贝拉交给刽子手！

“……不要让匈牙利的伯爵、神甫、银行家和工厂主得逞！

“保卫匈牙利革命者的政治避难权！

“保卫国际革命的英勇战士——库恩·贝拉！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28年5月17日于布达佩斯”

库恩·贝拉从狱中写出来的信函表明他相信国际工人阶级将会把他营救出来，重新为第二匈牙利苏维埃的诞生而斗争。他的每一封信都要我们把眼光放远些，不要为他担心，否则只会增加他处境的困难。他说，他的自我感觉很好，他深信，他为之战斗的事业尽管困难重重，最终必将取得胜利。

他研究了双方的报刊，对于资产阶级对他的仇恨极表满意，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声援深为感动。在维也纳流亡的匈牙利革命者虽然物质条件很困难，但却对库恩·贝拉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记得什芭迪·阿黛尔为了不让库恩·贝拉枕在草上，特意做了个枕头送给他。）

三个月以后，对库恩·贝拉等的调查结束了。宣布了开庭日期。

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紧张的日子。霍尔蒂政权要求把库恩·贝拉作为普通罪犯由匈牙利法庭进行审判，事先组织好的舆论工具也大肆鼓噪以资配合，罗列无数莫须有的“罪状”，歪曲事实、百般诽谤。把库恩·贝拉的革命经历、参加俄国国内战争、在匈牙利党内、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活动以及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的工作进行了恶毒的诬蔑，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务求达到使奥地利当局把库恩·贝拉交给匈牙利方面的目的。

《新三月》杂志写道：

“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保卫匈牙利革命的领袖和他的难友。全世界无产者口中都传诵着两句话：

不准伤害我们的排头兵！

不准伤害库恩·贝拉！①

---

① 这两句是希达什·安道尔的诗。

“俄国工人不但把库恩·贝拉看作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同时也因他是俄国国内战争的英勇战士而尊敬他。俄国工人为了反对奥地利把库恩·贝拉交给匈牙利刽子手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工人、顿涅茨的矿工，从哈尔科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整个俄国工人阶级举行大量的集会要求释放库恩·贝拉。”

在莫斯科，有一个集会是在一家大剧院里由卢那察尔斯基主持的。当时在莫斯科的迭戈·里维拉① 画了库恩·贝拉的像，苏联把这幅画印成明信片。

卢那察尔斯基把希达什为大会写的诗译成俄文，并亲自在大会上朗诵。

在苏联生活的匈牙利人也积极行动，他们组织集会要求释放库恩·贝拉。记得有一次集会是博卡尼·德若主持的，会上八岁的米克洛什说他也要讲话，他走到主席台前说：“希望你们要世界无产阶级出来救库恩·贝拉，我的爸爸……”

“俄国无产阶级不满足于只举行大量的抗议集会，他们要求为保卫我们被监禁的同志采取其他形式。”《新三月》杂志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通电，号召所有兄弟党起来声援，红色工会国际也采取了同样步骤。俄国科学家代表大会和俄国医务工作者代表大会不但发出电报抗议拘捕库恩·贝拉，还向全世界科学家和知识界号召采取行动阻止奥地利向匈牙利当局引渡库恩·贝拉。他们尖锐地驳斥国际上那些进行恶意诽谤的人：‘俄罗斯科学家深信，世界上的一切知识分子将谴责对库恩·贝拉所采取的可耻的指控，陷害库恩·贝拉，只因为他是革命无产阶

---

①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进步画家。——译者

级的领袖之一'。”

《新三月》还写道：“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布达佩斯，柏林还是维也纳，没有任何地方不要求释放库恩·贝拉和他的同伴。声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兄弟的奥共在事情发生的第一分钟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争取释放我们的同志，他们和奥地利国际红色救济会联合会举行了二十几次大会和无数次小型集会。德国共产党也把这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德国许多工厂向奥地利政府发出了抗议电报。捷克的兄弟党也全力支持声援运动。”

《工人报》写道：“库恩·贝拉的命运和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的前途对于斯洛伐克劳动者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将站在行动的前列。”法国同志也参加了战斗，亨利·巴比塞①同志在电报中尖锐地谴责了匈牙利政府的可耻行径。《巴黎工人报》正确地指出：逮捕库恩·贝拉将被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因此保卫库恩·贝拉同志，也就是保卫苏联，唯一的对策只能是“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美国无产阶级也在纽约、费城和布里奇波特等地举行大会声援。他们发出电报，严厉谴责匈牙利政府的卑劣手段，同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为“拯救匈牙利无产阶级领袖而战斗。”

那年夏天，库恩·贝拉的父亲在莫斯科去世了。他是1925年来到我们这里的。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他和妻子以及女儿逃离了布达佩斯。路上正当匈牙利白卫军要带走他们的时候被罗马尼亚

---

①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共党员，著名作家，诗人。——译者

士兵解救了，从而幸免一死。这样，他们回到了埃尔代伊。库恩·贝拉的母亲因惊恐过度而病倒，在备受疾病的折磨后于当地的一家医院病逝，那时她还不到六十岁。

库恩·贝拉的妹妹库恩·伊琳被罗马尼亚人投入监狱后不久得到释放。父亲在一个小村庄当了个办事员，但在马纽① 政权的统治下他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不难想象的。后来，就象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库恩·贝拉父亲和妹妹于1925年来到了苏联。

“库恩大叔”(匈牙利流亡者们都这么称呼他)很快在俱乐部里受到大家的欢迎。他按时交纳俱乐部会员费和党费(尽管他不是党员)，从不放过一个报告，对于俱乐部里的党员不请他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老人家很有意见，每逢有人前来找库恩·贝拉谈话而他又不得入内时同样很恼火。“难道我还不可靠?”他老是提这个问题，说罢就不解地摇摇头。在俱乐部里他最爱听国际形势报告。他很健谈，爱下棋、打牌。有病他只相信汉布尔格，别的医生他从来不找，但只要一服汉布尔格开的药，当时就会感到病好了一半。他还特别喜欢打牌，如果能赢上二十个戈比他就会高兴半天。顺便提一句：很多人也总是让他赢牌，因为老头儿只要输牌，就会发脾气。大家乐意花一点零钱让这位业已重病缠身的老爷子高兴高兴。“库恩大叔”同希卡代的关系也很好。老人家喜欢说他儿子童年的事。这些谈话中虽然免不了有些夸张之处，但同志们还是很乐意听他讲，因为老人家说得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不过，一般说来，他对生活还算满意，就是不能忘情于老伴。

---

① 尤利乌·马纽(1873—1953)，曾于1928—1930年以及1932—1933年两度任罗马尼亚首相。——译者

他常说："可惜她看不到我在苏联生活得这样舒服。"直到离开人世，有一件事一直使他不高兴，就是不让他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向同志们抱怨："我从来不躺在别人身上，我总是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现在我也不愿意成为儿子的包袱，何况他也不是阔人。"

"库恩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了，度着安适的晚年，有时给心爱的小孙子米克洛什买点小礼品。但一想到这买礼品的钱不是自己挣的，便又不高兴起来。

有一次他忽然想起：罗马尼亚政府应该给他发退休金，便对儿子说，给罗马尼亚首相马纽写个申请，请马纽把他的那份村长退休金转到苏联来。库恩·贝拉对他解释道，他享受不到罗马尼亚的退休金，因为他不在罗马尼亚，而是在苏联；同时他是库恩·贝拉的父亲，不能接受罗马尼亚政府的钱。老人家表示不同意儿子的看法："退休了就得有退休金，这和政治没有关系。"他枉然听了无数次政治报告，这一点就是弄不明白。

为了不成为别人的"包袱"，老人家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找了几位同志，请大家帮他找个事情做，因为老这样下去，日子过得太无聊了。他帮忙管理一个菜园子，差不多每天按时乘电车前去上班。但在他看来，这不算工作，这点事情不够。老人家对同志们说，他懂得三种文字——匈牙利文、德文和罗马尼亚文，既能说，又能写。他希望拿这为俄国做点事。同志们把老人家的烦恼告诉了库恩·贝拉，问怎么办。库恩·贝拉为了让老人家安定下来，对他说："这里有一本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德文版，你把它读一遍，如果行，你把它翻译出来，我们送到美国的'新前进出版社'出版。这就算你的工作，还有钱。"

"库恩大叔"立即动手。我记不清他干了多久，也许是一年。

从老人家来到以后，家里从来也没有象这一年这么安静过。他一天在写字台旁边坐好几个小时。如果不翻译，也在那儿琢磨句子怎么能修饰得好些，至于那个菜园子，早就置之脑后了。他深信自己将要拿一大笔稿费。日益严重的疝气折磨得他连坐也很困难，但连这他也克服了，为的是尽早把这书译出来。等全书译完，他把手稿交给了库恩·贝拉，骄傲地说："你当时还怀疑我能不能干得了。现在看见了没有？我不老。"

大家都夸他译得好。手稿该送到美国去了。但手稿既没有送进纸篓，更没有寄到美国，而是被放到一个大柜顶上。手稿上的尘土越来越厚，直到 1937 年，个人迷信猖獗的年代，连同别的"反革命材料"被一起运走了。

老人家焦急地等待着从美国汇来的稿费。但是，美国那么远，又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一本书特别费事。当然，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别的"原因"，让老人家日复一日地耐心等待着。后来我们又建议他写他儿子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他欣然从命，但刚写了二十几页便病倒了。

1928年夏天在重病两个月以后老人家去世了。他原想在夏天见一见儿子："你们给他写封信，说我病了，想再见他一次。"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把报纸都藏起来了，）他儿子已失去了自由。插翅也难回来呢。

库恩·贝拉没法前来奔丧，我们把老人家安葬了。几乎所有在莫斯科的匈牙利人都来了。今天这些人也大都已经作古。汉布尔格、扬奇克、博加尔、迪奥希、凯奇凯什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都离开了人间。

由于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团结斗争，奥地利终

于没有敢把库恩·贝拉引渡给匈方。

1928年6月26日的审判根据《新三月》杂志6月号的报道，大致是这样进行的：

当宣读起诉书以后法庭庭长问库恩·贝拉是不是承认自己有罪？

库恩·贝拉：我是根据共产国际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方针，为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行活动的。我只对自己的阶级——工人阶级负责。我不认为自己有罪。

庭长要求库恩·贝拉连贯地提出辩护词。

库恩·贝拉：我将力求具体。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分析匈牙利政界人物的短长，我只想把与我有关的事情用政治连贯起来。为了在案子过程中不致出现误会，我想首先应该指出：这是一件政治案。检察官在起诉书中罗列了一系列罪状，但连他也没有否认，我的行动以政治目的为指针。我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匈牙利共产党一员进行活动的，因此，我应该从政治上来说明我的行动。其次应该指出：这是宗政治诬陷案。你们从陈纸堆里寻出了考尼茨—梅特涅时代的一条法律条文作为依据，而那条条文本来就源自匈牙利反革命历史，它不仅针对意大利的烧炭党也指向匈牙利的雅各宾派①，根据这条条文，哈布斯堡王朝在统治阶级的配合下把他们投入了监狱。后来，当维也纳和匈牙利的革命遭到镇压，1852年这条条文又被引用来对付科苏特·拉约什②。这次，这条条文不是用来对付我，而是用

---

① 在法国雅各宾运动的影响下于1794年成立的匈牙利激进知识分子革命团体。1795年主要领导人被处决，运动失败。——译者

② 科苏特·拉约什(1802—1894)，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译者

来对付共产国际一个最老的支部之一——匈牙利共产党。说明这个案子是宗诬陷案的不光是因为在经过五十年的沉睡之后重新又把这个条文从阴暗的角落里拿了出来借尸还魂。在文件中有一篇报纸上的文章，以十二万阴魂的名义要求把我引渡给匈牙利政府……

庭长：引渡不属今日审判的范围。

库恩·贝拉：我无意触及这一题目。这篇文章说明了：在整个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新闻界为了对我进行讨伐，掀起了一场多么大的叫嚣。这篇文章还引用麦克唐纳①的一个声明……

庭长：法庭禁止宣读报纸。

库恩·贝拉：维也纳的《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还把“库恩案”和一件鬼怪故事相提并论……

庭长：请谈实质问题！

库恩·贝拉：这就是实质问题……

庭长：不准在庭上信口开河！

库恩·贝拉：这个诬陷案……

庭长：不准使用“诬陷案”这一措词！

库恩·贝拉：我可以谈谈此案的预审过程：我的辩护人未能得到了解起诉的材料，我们每次谈话都有六名看守在场。在这宗诬陷案中国际反革命用了最现代化的工具。文件的翻译被歪曲了……

检察官：“歪曲”一词实系诬蔑。

辩护律师抗议检察官的无理行动。

库恩·贝拉：我的阶级尊严不允许我对检察长的语言作出

---

① 当时英国首相。——译者

反应。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一宗政治案子，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政治和社会背景。我想指出为什么要进行蓄意歪曲的原因。我在一封信里曾经写道："我对法国选举结果并不过分欢欣鼓舞。"翻译成德文后变成："法国选举使我精疲力尽。"根据被歪曲了的译文，一位法国政治家(此人尊姓是德蒙齐)在一张德国报纸上写文章道："库恩·贝拉为了领导法国选举进行了大量活动。当然，此举责任在苏联。"

庭长：外交不属于今天的审讯范围。

库恩·贝拉：我将会考虑到我的讲话不至于影响奥地利政府的借款愿望……

庭长：您将为此受到惩罚。

库恩·贝拉：我可以把起诉书里的内容整理得合乎逻辑些，我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按照顺序说明我行动的目的。

1. 我到维也纳来做什么？我违禁前来奥地利是否可以成为被起诉的根据？

2. 我为什么用假名字前来；

3. 我在维也纳是否建立了"外国秘密团体？

4. 我在这里是否召集过一个秘密团体的会议；

5. 我是否为在这里活动的秘密团体与在外国的秘密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不用说，我来维也纳是为了同对匈牙利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势力进行斗争。不用说，是为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企图进行斗争。不用说，我为在匈牙利建立工农政府和八小时工作制而战斗，就象苏维埃俄国已经实现了的那样。不用说，我到维也纳来是为了没收和分配匈牙利的大庄园。但我需要说的是：我为什么正好现在到维也纳来。我收

到一封信，信中附有不少关于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签订的秘密协议的材料，包括许多极为具体的项目。匈牙利总参谋部计划……

庭长：这里不允许谈论匈牙利总参谋部！

库恩·贝拉：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

法庭禁止库恩·贝拉继续谈这个内容。

库恩·贝拉：既然法庭禁止我就我的政治目的发言，那我就谈谈所谓违禁前来奥地利的问题：1920 年社会民主党的埃尔德施内政部长任内我被驱逐出奥地利的时候甚至没来得及和我的辩护律师见面，我只得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请他就这事进行抗议。我之所以写这张纸条，是因为那时在奥地利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我设想，这是一个民主政府，会保护政治避难者。我也从来没有从我的律师那里得到关于驱逐我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通知。因此我是怀着对我的驱逐是并无法律效力的信念前来维也纳的。用假名字？这点我承认。我承认，我是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我承认，我是用假名前来的。这是因为奥地利警察要迫害我。我记得 1920 年，在维也纳，当时我受到警察局的保护，可是我和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中了别人投的毒……

检察官：那只是一个企图！

庭长：您现在还活着！

库恩·贝拉：我将活到在匈牙利再建立另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就是说，那次投毒下的量没有能使我死去，那投毒者“只”放了点阿托品，后来被判了两个月监禁。我认为，把一个企图杀害我的人只判两个月，那确实不算多。既然这样，我就只好用假名字前来了。1920 年被押到边境的我叫做雅盖尔，此刻在押的

叫做萨波·米哈伊，都是我。因此，对维也纳警方来说都是一回事。在拘留所里我问，在我的拘留室门口为什么要站那么多人？我又不是巫师，不会插翅飞越铁窗的。他们说，为了预防来自匈牙利方面的暗算。可见，我使用假名是有道理的。

庭长：您如果不到维也纳来，那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库恩·贝拉：我之所以到维也纳来，是因为暂时我的事情要在这里做，而不是在布达佩斯。第三个是关于秘密团体问题。匈牙利共产党是个秘密团体。但它是不是在维也纳警察局面前也需要严守秘密？迄今为止我不知道维也纳警察局和布达佩斯警察局是一回事。我本来认为，有些事情不可以让布达佩斯警察局知道，而让维也纳警察局知道却是不妨的。至于维也纳警察局是不是了解匈牙利共产党存在一事，我想指出下面一件事：此刻放在桌上的这些书，是匈牙利共产党公开在维也纳出版的。这些书只是匈牙利党近三年来在维也纳出版书籍的五分之一。我们的报纸《无产者》，机关刊物《新三月》都在这里出版。那么怎么可以说匈牙利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无产者》在1921年的一条消息宣布了匈牙利共产党维也纳新城小组正式成立。从1925年起，《新三月》作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公开出版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作为政党的匈牙利共产党没有必要向当局报告活动情况，正好象没有必要请警察来分享党的秘密一样。……从前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在国外，现在还有一部分。就是说，维也纳、莫斯科、柏林、巴黎……有政治流亡者的地方它都在活动。中央委员虽然不邀请警察参加自己的会议，但从来也没有隐蔽过自己的活动。党的出版物是公开的，至于检察官没有看到过这些本来就是公开的出版物，那可不是我们的过错。

库恩·贝拉接着向法庭阐述了一个秘密团体和一个进行地下活动的政党之间的差别，但是庭长不停地打断他的话，粗暴地呵斥，采用一切手段进行干扰。

库恩·贝拉：我应该指出：我的申辩不断受到阻碍。

庭长：关于你指出什么，这我们并不感兴趣。

库恩·贝拉：我不想在阶级敌人面前为自己申辩。我想指出：这宗案子有着特殊的奥地利性质。它不光针对匈牙利共产党，也针对奥地利共产党……

庭长禁止库恩·贝拉继续往下说，于是库恩·贝拉声明：他不再回答庭长的提问。果然，此后他只对辩护律师的问题作答。

律师：中央委员会是什么时成立的？

库恩·贝拉：1919 年。实际上 1918 年就成立了，但我们犯了错误，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了。社会民主党出卖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些忠于革命的领导同志在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日重新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会是 1924 年成立的。

检察官：国外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

库恩·贝拉：我拒绝回答。

检察官：在柏林也举行过会议吗？

库恩·贝拉：我拒绝回答。

检察官：你们打算在维也纳召开党代表大会？

库恩·贝拉：这是党内事务，和法庭无关。

庭审的最后情况是这样的：

庭长（从座位中站起来）：法庭退席。

库恩·贝拉：这里还有被告……

庭长：就是说，您还有话想说？

库恩·贝拉：对。在整个庭审中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多余的。

但既然是被告，那么也许我有权作最后的发言。你们指控我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其实这不是一个秘密团体，而是一个政党，但我不能谈它为什么进行地下活动。这个案子的原因和它的相互联系我也不能谈。我不想进行申辩，但想说明一些事实。我到处受到禁令的限制，今天这个场合也许倒是个机会。我认为，这宗案子，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阶级革命斗争中是个重要的事件，它有其深刻的意义。如果有人认为，这宗案子只是赛佩尔总理关于“库恩事件断断不能小看”那句话的结果，那就看得太肤浅了。

庭长：请就事论事，否则本庭停止公开审讯。

库恩·贝拉：在庭长先生剥夺我发言权利（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之前，我认为应该指出：这宗案子是奥地利走向法西斯化的一步。……

庭长：如果您继续这样做，我将禁止您说话。

库恩·贝拉：从陈纸堆里拣出一个条文，根据这个条文，未经宣布，便可在奥地利实行紧急状态法。因为奥地利政府如今处境窘迫，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实施紧急状态。

庭长：被告不得再行发言！

法庭退席，半小时以后就宣布了早就拟就的判决。

案子结束以后在苏联政府要求下，奥地利政府同意把库恩·贝拉交给苏联，条件是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因此由两个密探用汽车通过迂回的路线，几乎用一种逃遁的方式把库恩·贝拉送到了德国。在德国由一位同志陪同，登上一艘去列宁格勒的船。

德共议员胡戈·埃贝莱因是这样记载那次旅行的：

“库恩·贝拉同志的监禁于7月27日晚六时结束，但一清早就有好几百人聚集在法院门口（资产阶级报纸当然把这些人叫成是共产党），我也去了，便和这些人谈起话来，原来他们是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想对库恩·贝拉采取某种暴力行动。

“当而事实上库恩·贝拉同志在十一点十分就离开东火车站了。我们要求陪他到俄国船旁，但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拒绝，甚至连库恩同志的律师也未能获准前往。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政府都要求库恩·贝拉同志自己单独雇一辆车。

“老远就可以看到火车站上布满了一见就使人不舒服的便衣。库恩·贝拉同志在火车启动前三分钟被送进车厢。送来时是十个便衣，路上陪伴他的有十二个。车厢所有的窗户都被神秘地关上，我们在后面一节车厢找到座位。我们每到一站都注意不让库恩·贝拉同志遭到任何袭击。

“火车在数百名便衣组成的人墙中开走了。火车经过的每个站上都有五至八个便衣以及数名高级官员。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下去六个奥地利便衣，上来八个捷克人坐在他们的位置上。最后，凌晨四点钟，我们到达德国边境，在那里，德国便衣换下捷克便衣，在这里我们总算和库恩·贝拉同志说上话了。到了坎特津，我们的车厢被调到一条备用线上等了三个小时。这时，这群便衣到处乱蹿，连我们的车厢里也上来好几个。但被我们轰走了。星期六傍晚六点钟我们到达斯德丁。五个警察把他带下火车，通过一条小路乘上汽车。

“一场追逐赛开始了。我们的汽车跟着警车，前面很快发现我们在尾随他们，于是他们时速加到一百公里，交通规则全都置之脑后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计划着什么阴谋还是只简

单地为了想甩掉我们，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我们用同样的速度，保持二十米的距离紧追不舍。村里的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辆车。说真的，真有点象侦探小说里的场面。

“疾驰三小时以后我们到达奥茨威纳港。库恩·贝拉同志登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警察摩托艇，我们也乘上摩托艇紧跟，就这样到了赫尔岑号苏联轮船。库恩·贝拉同志上了泊在港心的轮船上。这只轮船周围停满了警察摩托艇监视着，就象船上都是鼠疫病人似的。

“库恩·贝拉上船后不几分钟，赫尔岑号就启碇向苏联驶去，当轮船离开施维纳谬德港到达公海，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库恩·贝拉逃离了充满仇恨的资产阶级的魔掌。当读者看到本文时，这位久经考验的战士又在苏联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操劳了。”（原载1928年8月2日考绍出版的《工人日报》）

我接到库恩·贝拉已在路上的消息时，立刻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在那里的阿斯托里亚旅馆租了一个房间，给列宁格勒《真理报》当记者的霍迪·埃米尔打了个电话。霍迪说，据他们所知，轮船将于明天早晨到达，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俟知道船到达的准确时间，就立即来接我。后来码头通知：轮船要第二天上午才到达。第二天上午，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和霍迪·埃米尔一同来接我去码头。等我们到达时，码头上挤满了列宁格勒的工人和匈牙利革命者，还有仪仗队和军乐队。

轮船渐渐向岸边靠拢，指挥一做手势乐队立刻奏起《国际歌》。仪仗队指挥官也发出“立正”的命令……但是轮船甲板上有人在做手势，示意停止奏乐。等轮船快靠岸时听见这人在说：“你们等的那人不在船上。”乐队戛然而止，仪仗队士兵把刀

重新插进鞘里。等待的人群不安地互相问着:“那么库恩·贝拉在哪里?”

在船上做手势的同志从船上下来说，船上有个美国贸易代表团，所以他打手势叫停止奏乐。他没有听说关于库恩·贝拉的事,大概是乘另外一条船来。

又是一片猜测声,然后人群渐渐散去,我们还是等着。当局向正在驶回苏联的轮船发电报查询库恩·贝拉的下落。后来我们回到旅馆等待,但一夜没有结果。

次日清晨五点钟,霍迪·埃米尔来了，叫我立刻前往码头，库恩·贝拉就要到了。我迅速穿上衣服，下面汽车里市委书记对我说:“既然安排欢迎仪式已经来不及，我们至少争取别晚到!”汽车以最快速度向港口飞驶而去。

我们没有迟到。仪式固然没有举行，但在这么早的时候还是聚集着一大群人等待着欢迎库恩·贝拉。

片刻，轮船靠岸了。库恩·贝拉老远就向群众挥手致意。我向他跑去,简单说了几句话,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斯捷茨基同志和霍迪·埃米尔也走过来了,他们向库恩·贝拉致意,询问他的健康情况。我们一起走向汽车。汽车周围站满了人群，每人都想和库恩·贝拉说几句话，而他也确实有兴致和列宁格勒的工人们聊上一阵,只是在斯捷茨基同志的催促下才上了汽车。

阿斯托里亚旅馆里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的行李也被搬到特意为库恩·贝拉留起来的房间里。

不久来了许多匈牙利同志以及列宁格勒各界代表,他们说,当天还要举行大会，正式欢迎库恩·贝拉。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动，库恩·贝拉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大会以后我们前往火车站准备回莫斯科。火车站上人头攒动,不断发出欢呼,许

多人向库恩·贝拉抛来花束，围住火车。库恩·贝拉再次向人群发表谢词，并希望他们让火车开动，否则会打乱其他列车的正常运行。我们在热烈的气氛中离开了列宁格勒车站。

莫斯科车站的热烈场面不亚于列宁格勒。库恩·贝拉刚下车，立刻被人群包围，我也被挤在一边，直到他到了休养所我才和他重新见面。

在莫斯科车站上，曼努伊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向库恩·贝拉致意。亨利·巴比塞当时也在莫斯科，他也发表了讲话。欢迎仪式以后，曼努伊尔斯基把库恩·贝拉从人群中拉出，一起驱车径直前往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库恩·贝拉被选进大会主席团。

库恩·贝拉站起来，会场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等待他发表讲话，显然希望他谈谈狱中生活、法庭斗争，但他只是向大会主席说："请继续开会……"然后坐在座位上。

我和孩子们以及姐姐一起去到休养所，那里也在为欢迎库恩·贝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明尼赫·费伦茨、桑托·贝拉、波甘尼·尤若夫以及波尔·埃尔诺他们也住在那里。

阿格奈丝和希达什直到三个小时以后才到达休养所，原来他们是从车站上步行回来的。

休养所里的孩子们布置了精致的墙报，选出的代表团手持鲜花在大门口等待我们。可是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只见到了我，而库恩·贝拉没有来，更使他们扫兴的是我连库恩·贝拉叔叔什么时候能来到也说不清楚。

傍晚他终于来了，显得非常疲劳，但全家还是聊到深夜。我们庆祝他终于又回到家里。使大家都感到幸福的是他活着。

结　束　语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了。

库恩·贝拉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同志作一次小小的聚会。他由于忙于代表大会的工作一直未能和大家见面，而大家也实在有不少话要和库恩·贝拉说。

大家在莫斯科近郊的休养所见面，我们在城里的住所盛不下这许多人。

有人单独前来，有的则是双双同至。举行“招待会”的主人库恩·贝拉整个上午在树中拣树枝，然后送到院子里来。接着他削树枝、切腊肉、切面包、洗葱……兴致十足。

快到傍晚时分，充满游人喧闹声的波克罗夫斯基—斯特莱什涅沃园林慢慢安静下来了，“招待会”进入高潮。库恩·贝拉点起篝火，客人们团团围住篝火坐下，每人手里一根削尖的树枝尖上插着腊肉，就象举着一面面小旗。

库恩·贝拉谈笑风生，讥笑“城里佬”根本不懂烤腊肉的奥妙，不懂怎样就着火烤肉，让油慢慢滴到面包里面去，而是毛手毛脚，把树枝烧着了。

腊肉烤得通红，人们开始切肉大嚼起来。自己没带小刀的人由我姐姐发给他们工具。“没有小刀怎么过日子？”库恩·贝拉和他们开玩笑，然后说了自己怎么把小刀带进奥地利监牢的轶事。

两大罐酒很快就告罄了，孩子高兴地给大家打井水来代替，

他们以能参加这个“节日聚会”感到十分骄傲。

希达什唱起歌来，开始是独唱，接着大家都唱起来——革命歌曲、古老的民歌、创作的抒情歌。不知道附近休养所的人是怎样想这群引吭高歌的匈牙利人的？

库恩·贝拉要求“发言”。他一个人唱了起来。他唱的是一首谁也不熟悉的歌，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科洛日瓦尔山脚下，
有一潭清澈的泉水；
离乡远走的人儿，
喝一口这里的水，
怎能不心碎？
今天我来到泉边……

他的嘴唇颤抖起来了，我熟悉他这个状态，担心他唱不完这首歌。但是他还是唱完了。

大多数客人并不清楚，但是我和少数几个同志知道：有关方面已经作出决定，“不再建议”库恩·贝拉到外国旅行（也就是不派他去做匈牙利党的地下工作）。他在奥地利的出现引起了过分大的震动。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由惧变怒，但他们的怒气并不只针对库恩·贝拉，也指向了苏联。当时苏联正在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打算激化局势。同时，此次固然由于国际声援把库恩·贝拉从反动派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了，但谁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

在花园里此刻只有我们两人。

……快到半夜了。

库恩·贝拉用树枝拍打余烬。好久不说话。我开始说起来：

“别见怪！就我而言，即使不说高兴，但还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就说这次吧，也是险些出大问题，这样既于事无补，也使我永远提心吊胆。当然，您又会说：‘我不会出问题的！’”

“您不完全理解这个决议，”库恩·贝拉若有所思地说：“作出这决定，里面有别的因素。”

这句话我只是后来，在很久以后的后来才懂得，当时只是轻轻地从耳边滑过去了。

“大难不死……”我说。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在这一刹那我脑中掠过一连串事件：在瑙杰瓦劳德那颗瞄准他的子弹没有命中，在前线，这个布雷兵没有丧命，在战俘营，斑疹伤寒没有能伤害他，纳尔瓦和乌拉尔前线，命运之神保护了他，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中他也安全过来了，在布达佩斯的玛利亚·特利莎军营的那个军官没有击中他，监狱中敌人没能打死他，蒂萨河桥上手榴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但他安全无恙，匈牙利白卫军没能把他从卡尔斯泰因和施托克劳劫走，在施泰因霍夫没有能把他毒死，当他在南方战线，单枪匹马前往无政府主义者大本营去谈判时马赫诺没有打死他，克里米亚战争中死神也没有把他带走，此刻，世界性的声援又把他从霍尔蒂的魔掌阴影中解救出来了……

“大难不死……”我提高了声音说：“不过也别再勾引魔鬼了……在这里也可以工作，可以指挥运动……”

“是这样。”他回答，接着又说：“不过您大概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那您说说！”我说。

我今年七十五岁。如果精力允许，我还想写这本书的第二

部分——在 1928 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暂时我只是写个 1928 年以后与库恩·贝拉有关的几年大事情的轮廓：

公元 1930 年。

匈牙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激烈的气氛中举行。

接着 1931—1932 年到了。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尽管充满了凯旋和节日的气氛，但对于那些被称为列宁近卫军的，也就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来说，——尽管还是隐蔽着的——即将到来的悲剧已经隐约显现了。

库恩·贝拉在大会上发了言。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些阴冷的冬天傍晚，库恩·贝拉回家时多么消沉和失望。我和历来那样，没有去干扰他。

1934 年 12 月列宁格勒一声枪响杀死了基洛夫。

我好久以来就感到，1934 年 12 月的这天开始了新的“纪元”。

1935 年夏天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库恩·贝拉为准备大会提纲奋战了好几个月。

1936 年夏天，库恩·贝拉要求斯大林接见他。他说，如果他不能做匈牙利党的工作，他愿意在苏联做些实际工作。“我厌恶在写字台旁边咬文嚼字。我认为一个行动比一百页决议有意义得多。”

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陪同下，斯大林接见了库恩·贝拉，斯大林叫他继续留在共产国际。库恩·贝拉说，他没法和曼努伊尔斯基共事。因为曼努伊尔斯基虚伪，而且出尔反尔（库恩·贝拉过分天真，当着斯大林的面数说斯大林的心腹）。

“共产国际的工作连我也不能干涉，”斯大林说：“不过我倒有个建议：您可以请一年假，给共产国际写个新纲领。”

“干这我也没有兴趣。”库恩·贝拉说。

“那您愿意做什么？”斯大林问。

“我希望得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希特勒迟早会向我们发动进攻。把红军的战备认真搞起来，这工作对我很合适。”

“好极了……”斯大林说。

可是莫洛托夫插话道：

“红军总政治部让一个带有爆炸性名字的人来当主任不妥当。”

斯大林思索了一会，然后说：“如果请您在苏共中央担任理论和实际经验都需要的工作，您接受吗？”

“我接受，”库恩·贝拉说。

斯大林当即给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叶若夫打电话：

“库恩·贝拉将要在党中央工作。”然后转身对库恩·贝拉说：“明天您给叶若夫打个电话！”

库恩·贝拉一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我。

第二天他给叶若夫打电话，叶若夫说，斯大林到外地去了，要六个星期以后才回莫斯科。“没有他的意见，我们不能对您的事作出决定。”

库恩·贝拉扫兴地放下话筒。六个星期以后又打电话找叶若夫，“叶若夫今天不在办公室”电话那边这样回答。就这样重复多次。库恩·贝拉有一次终于忍耐不住了，使劲把听筒摔在地上：“我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让他打来找我！”

电话被摔碎了，只好找人修理。

其实，库恩·贝拉的命运这时已经被决定了，只是我们身上的组织性和信仰使我们没有，也不愿想到坏的事情上去，起码我们互相没有谈论这些。但迹象是越来越多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撤掉两名书记，并解除了他们在主席团的职务。他们——列宁很欣赏的皮亚特尼茨基以及克诺林——都被召回中央，尽管给了他们地位显赫的工作，但后来事实证明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两年之后，1937 年他们也遭到了列宁其他卓越的追随者一样的命运。

1936年的秋天挟着沉重的阴霾到来了。开始了第一个公开审讯案。

一天，叶若夫给库恩·贝拉打电话，请他于晚上八时前去。叶若夫这时已经是内务人民委员了。

库恩·贝拉去了，深夜才回到家。

“您以为他们会叫我在那里工作，对吗？”他问我，口气与其说是讥笑，不如说是伤心。他告诉我，谈了好久以后，叶若夫建议他写一本批判人民敌人的小册子。“您是怎么回答的？”我紧张地问。“我说，我不写小册子！”“那他……？”“我请求到外地去，当州委或是市委书记。伏罗聂日可以，图拉也行，哪里都一样……我可以去整顿工业，可以到集体农庄……会收获大量粮食……我会作出榜样……”“那叶若夫怎么说？”“他说，给他几天时间考虑。”

几天后叶若夫提出两个职务请库恩·贝拉选择。一个是农业人民委员，另一个是社会经济出版社社长。

库恩·贝拉选择了后者，并积极开始工作。

公元 1937 年。

举行了第二个公开审讯案。

每天下班回来库恩·贝拉既不说话，也不看书，只是盘腿坐在沙发上，独自一个人几个小时不说话。我问他，他也不回答。

他被捕以前几星期，有一天下班回家，劈头对我说："您猜，人们在说些什么？……在街上我遇见瓦尔加·耶诺，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暂时还是自由的。'您看，象瓦尔加这样的聪明人也说糊涂话。"

就在同一时候，一些外国报纸用大字标题大肆宣传库恩·贝拉在西班牙，是那里反法西斯运动的领袖之一。"

斯大林打电话来了：

"您在莫斯科，对吗？您看，我也知道是这样。那么您就接见一个外国记者，亲自辟谣，证明您不在西班牙。"

外国记者来了，仔细地打量着库恩·贝拉。库恩·贝拉对他说："这总可以相信我不在巴塞罗那，而是在莫斯科的住所了吧？"

记者用电报把采访记发给了自己的报社。

也是事出有因，原来不久前一艘"库恩·贝拉号"苏联轮船通过英吉利海峡向西班牙方向驶去。

1937年7月底斯大林又打电话来了：

"外国报纸现在说，您在莫斯科被苏联当局逮捕了。"斯大林开心地说，"您最好接见一名法国记者……"库恩·贝拉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法国报纸刊载了辟谣的声明。

但是几天后，1937年7月29日库恩·贝拉果真被捕了。

"别担心！"他对我说："大概是什么误会，个把小时以后我就回来。"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1938年1月9日，希达什·安道尔被捕。

2月人们纪念了纳尔瓦战役二十周年。

这场战斗库恩·贝拉是参加了的。苏联政府把2月23日定为红军建军节。

这天，1938年2月23日我也被捕了。九年以后，1946年秋我才获释放。

1941年阿格奈丝也遭逮捕，她总算运气，很快就被释放了。

1955年和其他几百名共产国际的同志一起，库恩·贝拉被恢复名誉。库恩·贝拉当年的罪状是反对共产国际阴谋的魁首。

不久，给我和家庭其他成员也恢复了名誉。

匈牙利流亡者也都逐一恢复了名誉。他们当年的罪名是库恩·贝拉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库恩·贝拉的生平、业绩和作用直到今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还没有能按照他的功绩来估量他的工作。原因之一是他还离我们太近。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某些同代人，还不能充分理解和估量他的伟大。

但我毫不怀疑，总会有一天，符合历史的库恩·贝拉的形象终将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

1939年11月30日凌晨——根据官方材料——库恩·贝拉还活着。

我想，——也可能我错了，——当时也许会有人希望：说不定会改变对这位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俄国国内战争和国际工人运动战士作出的判决。作出指示和执行这个判决的人洗不掉这个耻辱，他的，他们的罪行永远也得不到宽恕。

这本书写完了。我翻阅着已经写完的篇章不禁浮上一个问题：五十年前——当我作出决定要和库恩·贝拉结婚的时候——如果有人把这本回忆录放在我面前，并且对我说："钢琴教师加尔·伊琳！请读一读这本书，然后回答我：您愿意不愿意选择这个生活，选择库恩·贝拉？"我将会回答："我愿意！"

……我们这个世纪已经只剩下后三分之一了。在这个世纪里，世界遭受了无数苦难，真正的革命者尤其是这样。"最后的斗争"依然在进行。

但我坚定地相信，在这后三分之一世纪中，等待着人类的将不再是"光荣的牺牲"而是"美好的生活"。

正是为了世界劳动者最终得到这个"美好的生活"，曾经有一个战士以对待劳动人民的无限忠诚、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在战斗的前列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就是库恩·贝拉。

封面设计：仇天煦

Kun Béláné

KUN BÉLA

Magvetö Könyvkiadó, Budapest, 1978

根据布达佩斯“播种者”出版社1978年增订版译出

库恩·贝拉传

KU'EN BEILA ZHUAN

〔匈〕库恩·贝拉妮著

柴鹏飞　侯凤菁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84,000 字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书号 11001·817　定价 2.30 元

书号 11001·817
定价 2.30 元